艰难的改革家：中国现代教育改革先驱郭秉文*

◎周洪宇　陈竞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长江大学教育学院）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20世纪20—30年代是一个史诗般壮丽的教育革新时代。这一时期，以归国留美学生为主体的中国新教育界，不仅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确定了以“六三三”学制为标志的现代教育的基本格局，还涌现出了一批蜚声海内外的杰出教育家。而在这些犹如璀璨群星的中国教育家中，郭秉文是尤为引人注目的一位。作为五四时期中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曾长期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校长，并在世界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当时国际、国内诸多重要教育组织中出任要职，直接领导和参与了上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实为推动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先驱。时隔近一个世纪后，深入探讨郭秉文与中国现代教育改革的关系，能为当下我国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域改革、大力推进教育体制创新及促进中外教育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简介**] 周洪宇（1958—），男，湖南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和教育史学理论研究。陈竞蓉（1969—），女，湖北荆州人，教育学博士，长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郭秉文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大力传播与应用

(一) 赴美学习掌握实用主义哲学、教育学理论

郭秉文于1880年2月生于上海,少年时代曾就读于上海的一所基督教教会学校——清心书院,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接受新式教育洗礼的学生。教会学校注重实用的教育内容和全新的教育方法,不仅使少年郭秉文受到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精神的熏陶,为他日后进一步接受西方现代大学教育奠定了基础,更为他初步展现了西方文化的新天地。郭秉文就读于清心书院前后,正值中国社会发生急剧深刻的变化之际: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在举国上下强烈的改革呼声下,1898年发生了闻名中外的"戊戌变法"运动;1901年,清政府下令实行新政,进行以废除科举制度和建立新教育制度为中心内容的教育改革,"癸卯学制"颁布实施,各地纷纷改书院为学堂,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新式学校开始创立起来。适逢中国教育向现代教育发展过渡的起步阶段,目睹"国事败坏",郭秉文"思有以革之者","盖以为非振兴科学,无以救亡图存,而培养人才,则有赖于教育,"于是"担簦负笈,游学于美"。[①] 1908年,郭秉文毅然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远渡重洋,赴美求学。

赴美后,郭秉文先是就读于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学院(College of Wooster)。这是一所由长老会教友于1866年创办的文理学院。该校以追求卓越为办学宗旨,从成立起即强调"在生活中的任一领域和迈向科学的最高阶段上都能为人们做好准备",注重使学生养成"精通的习惯",让学生在校能留下"值得自豪的东西"[②]。伍斯特学院高度重视科学教育,在生物学、地理学、物理学、数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该校还十分注重教育的平等,一直坚持男女合校教育,并对国际教育给予了特别重视。

郭秉文在伍斯特学院主修理科,受到了良好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他不但学习勤奋刻苦,而且关心时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因思想活跃、知识面宽,加之年龄较长,有一定社会阅历,郭秉文顺理成章地成为学生活动中的活跃分子,并显露出在组织和演讲等方面的才华。如他担任了学校主办的《伍斯特之声》的主笔和中国学生协会总秘书[③],还是以训练演说和辩论艺术为主旨的雅典娜俱

① 高明.《郭故校长鸿声先生行状》,引自: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160.
② 冒荣.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2.
③《郭秉文先生年表》,引自:郭秉文先生纪念集[M].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

乐部和林肯俱乐部的成员[①]，多次在演说比赛中获奖，为学校争得荣誉。伍斯特学院的1912年年鉴曾这样记载："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人，他在到伍斯特学院之前就在中国政府部门占有重要的位置，他曾被选为伍斯特学院1908—1909年度的辩手。"[②]

伍斯特学院求学的数年间，不仅使郭秉文奠定了相当坚实的知识理论基础，进一步锻炼了才干，开阔了眼界，也使他树立了立志教育的人生理想。对此，后任国立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的孙洪芬曾这样写道："在伍斯特学院，郭秉文放弃了他原来学习法律的计划，而对教育改革产生兴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培养他的兴趣。毫无疑问，这是受他在伍斯特学院读书的影响。"[③]

1911年在伍斯特学院获得理学士学位后，郭秉文即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成立于1754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常青藤盟校之一。20世纪初期，哥伦比亚大学已是一所在国际学术界和教育界享有盛誉的名校，名师荟萃，英才辈出，为世界许多国家培养了在政界、商界、文教界、学术界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该校师范学院的前身为纽约教师进修学院，于1898年并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从成立起即立足于高起点办学，19—20世纪之交，在院长拉塞尔(J. E. Russell)的大力延揽下，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师资阵容之盛堪称执世界教坛之牛耳。这里聚集了一批在世界现代教育史上成就斐然、声名显赫的大师级学者，如著名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教育史家和比较教育学家孟禄(Paul Monroe)、实验教育心理学的先驱桑代克(E. L. Thorndike)、教育社会学家拉格(H. Rugg)、教育哲学家克伯屈(W. H. Kilpatrick)、教育测验专家麦柯尔(W. A. McCall)、教育行政学家F. Farrington等人。群星璀璨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当年世界上最大的教育研究中心和全美最具影响力的训练教育领袖的基地。该院亦因有杜威等一批执掌美国教育学术界的著名学者杏坛说法，成为世界各地青年学子心驰神往的教育圣地。不少中国学子也远涉重洋慕名而来，其中还包括日后成为中国文教界领袖人物的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陈鹤琴等人。

郭秉文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后，在著名教育行政学家F. Farrington教授的指导下研究教育。他结合导师注重学校行政的研究专长，最终确定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作为其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他借鉴以著名教育史学

① 冒荣. 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5.
② 冒荣. 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6.
③ David Gedalecia.《郭秉文与伍斯特学院》，引自：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83.

家孟禄为代表的20世纪初期美国学者形成的治教育史的研究范式，从比较教育的研究视角出发，立足中国立场，在系统梳理和解释中国教育制度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对中西教育制度进行了客观的比较分析，并对许多与此相关的教育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思考，1914年顺利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将中国教育制度史划分为从“上古教育制度之起源”到“民国时代所建之新教育”六个时期，开创了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之先河，是我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教育制度史著作。至于为何研究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郭秉文在绪言中开宗明义，指出：“盖欲考见吾国开化独早之由来，与夫数百兆人民集结之故，则不得不读此沿革史。欲寻求吾国操何治术，俾政体巩固，与夫人民得安居乐业，则不得不读此沿革史。夫一国之有教育制度，即所以助其国陶淑人民之性情，令日趋于坚凝与齐一，巍然并立乎于天地间者也。迨乎今日，吾国教育家既诸斯义矣，则殚精竭虑，思合近世之趋势，应最新之需要，故其教育制度沿革史，与他国同，亦既深饶趣味，且可多所借鉴。正言之，为模范，为指南；反言之，则亦前车之覆辙也”[①]，明确说明了其经世致用的目的。郭秉文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后，获得了国内外专家的广泛好评。孟禄高度赞赏论文的贡献，认为郭秉文的研究既肯定了本民族的教育传统，又借鉴西方经验，对中国的教育改革会有极大的启发作用，并亲自为之作序。1916年，该书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郭秉文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之时，正值西方教育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际。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一些国家不仅处于世纪转换的新时期，更是处于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工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新的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促使整个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为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迅速发展变化的新形势，以改革传统学校教育内容与方法为宗旨的教育革新运动应运而生。在欧洲，英国教育家雷迪（Cecil Reddie）于1889年在英格兰德比郡创办阿博兹霍尔姆（Abbotsholme）乡村寄宿学校，标志着新教育运动的开端。与欧洲新教育运动遥相呼应，在美国则掀起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热潮。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因云集了杜威、克伯屈、拉格、康茨等一批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领军人物而成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重镇，教师和学生都被新的教育思想包围着。其时，正值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成为美国哲学中的显学，杜威学说在哲学上为他们展现了一个实用主义思想的新世界。而校园内外如火如荼的教育革新运动及其

①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引自：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34.

所开展的种种教育实验也给郭秉文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很自然地成为他吸取西方现代教育的重要来源。郭秉文亲炙大师教诲,努力学习实用主义哲学、教育学理论,最终把握了其精髓。他自觉地将杜威等人的理论运用于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中,如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基本主张"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成为其分析教育制度得失与改进的理论指导。在追溯历代教育制度时,更时刻以教育与学生生活、社会需要相契合与否来审视其得失优劣。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第七编"现今国民教育之重要问题"中,郭秉文深入应用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分析了"教会教育与公共教育制度之关系"、教育与道德之养成、学校训练与行政、教育制度中之财政问题、普及教育、教员之养成、教育之关系生活等方面的问题。在论及"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时,他认为"吾国今日教育最后之一重要问题不可不特别注意者。曰教育有关系于受着之生活问题是也。泰西各国文字教育与实验教育之相讼久矣。其结果则实验教育能使儿童得应社会与工业之所需,卒归胜利……吾国学校之课程,如近世科目若地理、法制等,皆已列入,但不能参合学生与社会生活之所需以为教材。故多数热心实验教育家惑焉……彼不顾学生就学之目的,轻视处境生活之需要,甚非教育之本能也。"并指出"学校课程之如何编制?第一,应加手工与练习觉官之科目。无论如何,借学生以机会,熟认具体与实用之理,或实验法与归纳法之知识。"他还在结论中强调:"与国民进步最有关系者,乃教育也。教育必俾实用,他国所风行而收功之实际教育,当加意提倡之。"[①]从这些论述中,可明显看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郭秉文的深刻影响。

在哥伦比亚大学这座美丽的校园里,郭秉文亲历西方科学民主的沐浴,饱聆众多名至实归的学界大师之教,不仅在学术上得到很大提高,而且在哲学观念、思维方式和教育视野等多方面都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与影响。学习期间,郭秉文还充分展露了其过人的组织领导才能,如他被推举为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主席,全面负责留美学生的活动组织与服务工作。而担任这一职务,也为他全面了解美国各地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广泛结交留美学生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求学经历,使郭秉文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构建了中西合璧的知识体系,接受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树立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为其日后的教育改革活动奠定了知识、能力和人事关系的坚实基础。

---

①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引自: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46-47.

（二）极力促成和精心安排美国教育家来华

1915年，留美七年的郭秉文学成归国。时年35岁的他踌躇满志，立誓破旧迎新，以教育改革促成国民进步。为此他“以热诚、博爱与公心以赴之”，接受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的聘请。旋即参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筹建工作，初任教务长，后代理校长，1919年被任命为校长。1921年在他的大力倡议、推动下，该校改办东南大学，这是中国近代第二所国立大学，郭秉文出任东南大学首任校长。同时，他还参与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实际教育调查社、中国扩张教育研究会等多个全国性教育社团，并出任要职。汇通中西的学行优势、对世界教育发展潮流的敏锐把握以及身居重要高等学府校长之位，使郭秉文迅速成为民国初期文教界地位显赫的新锐人物。为改变民国成立后，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一波三折、亟待完善的局面，使中国教育汇入世界教育改革的时代大潮，郭秉文与陆续留美归国的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人一道，成为新思想新文化的有力鼓吹者和新教育推进的引导者。他们结成志趣相投的团体，盛情邀请杜威、孟禄等美国教育家来华讲学，给中国教育以理论和实际的指导。

1. 郭秉文与杜威来华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是近现代中外文化教育交流史上一件引人注目的盛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邀请杜威来华的发起单位之一。1919年1月，杜威应邀到日本讲学。郭秉文、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人闻讯后，在感慨日本教育界已捷足先登的同时，也立即协商酝酿请乃师来华，帮助中国推进教育革新。为促成杜威来华，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郭秉文专程赴日面请。由于郭秉文等人的盛情相邀，杜威不但应允结束在日讲学后即来中国，而且主动表示可在华讲学一年。4月30日，杜威抵达上海，陶行知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委派专程赴上海迎接。5月18日，杜威莅校演讲，这是杜威首次登上中国高等学府讲坛，郭秉文主持了极其隆重的欢迎仪式。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连续作4场演讲，并分别与南京教育界人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学生开谈话会，广泛宣扬了其实用主义教育主张，对该校师生启发甚多。翌年3月底，杜威结束在北京的长篇系列讲演后又南下讲学。从4月7日至5月16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专设讲席，请其系统讲授《教育哲学》、《试验论理学》与《哲学史》，由郭秉文、学监主任刘伯明、教务主任陶行知轮流担任翻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国内仅有的杜威作过系统演讲的三所学校之一（另外两所学校是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贯彻杜威教育思想，也为纪念杜威此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还特地将该校附属小学命名为“杜威院”。是年夏天，杜威又由蔡元培、黄炎培等陪

同,多次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讲演。由于郭秉文的支持,该校多位教授如陶行知、郑晓沧、陈鹤琴等人先后陪同杜威赴各地演讲并担任翻译,该校亦成为联络杜威在中国南方讲演的总机关。如1920年4月至6月30日,杜威应新教育共进社的邀请再次南下讲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演《教育哲学》《哲学史》与《试验伦理学》,同时在南京进行其他一般讲演。5月后到各地讲演,郭秉文与教务主任陶行知和学监刘伯明三人轮流担任翻译。[①] 杜威此次南下讲学,历时三个月,先后到了南京、扬州、镇江、常州、上海、徐州、无锡、苏州等十几个城市,作了40多场演讲,在各地知识界、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2. 郭秉文与孟禄来华

郭秉文与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的关系十分密切。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留学期间,时任该院教育研究部部长的孟禄所给予的指导与帮助,曾使他深受教益。为了将西方现代教育理论付诸中国的教育改革实践,从而迅速促进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1921年8月,郭秉文与黄炎培、范源濂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实际教育调查社,聘请孟禄来华调查教育状况。孟禄抵沪当天,郭秉文与陶行知、黄炎培等人到码头迎接。在孟禄调查与讲学期间,郭秉文多次参与座谈、讨论。孟禄也曾几次来东南大学参观、讲学,对该校的办学成就表示赞赏。他认为,东南大学有可能成为世界东方教育的中心,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大学","将来该校之发达可与英之牛津、剑桥两大学相颉颃"[②]。并建议国际教育学会每年派著名学者到东南大学讲课。兼任国际教育学会东方部主任的孟禄,此行还受美国洛氏基金会委托,调查中国各大学的科学研究状况,他对东南大学的师资力量和科研水平给予了高度肯定。洛氏基金会也因此决定捐赠30万元支持该校建造科学馆与购买仪器设备。1923年,东南大学接受洛氏基金会捐款,首开我国国立大学接受国外基金会捐款之先河。在孟禄的积极促成下,郭秉文曾代表东南大学与美国有关人士草签过一份《中美合办工科大学之计划》,对中外合作办学途径进行了最早的探索[③]。孟禄结束调查后,实际教育调查社在北京为其召开了盛大的讨论会。郭秉文专程赴京参加,还发表了《对于孟禄中国教育讨论之感想》一文。他高度评价孟禄的中国之行,认为孟禄对中国教育的批评与建议"鞭辟近里、恳切感人"。1922年1月4日,孟禄回国前夕,再次来到东南大学,与该校教职员开谈话会,亲自出席该校图书

① 1920年4月22日《民国日报》.
② 周川,黄旭.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130.
③ 周川,黄旭.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130.

馆、体育馆、中二院等建筑的立础纪念活动[①]，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7 日，孟禄结束历时 4 个多月的教育调查与讲学，将返美国，郭秉文亲自到埠送行。

孟禄此次来华进行大规模教育调查与讲学，是其在华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产生直接影响最大的一次。在为期 4 个多月的时间里，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调查了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开封、南京、无锡、杭州、苏州、上海、南通、福州、厦门、广州、济南、曲阜、天津、奉天（今沈阳）等 9 省 18 市的 200 多处教育机构和教育设施，发表演讲 60 余场，并频频与各地教育、实业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和讨论会。孟禄大力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主张中国教育“取平民主义”，并对在调查中发现的问题随时予以批评和纠正，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给予了许多实际的指导和建议。其中尤为精辟的是，他关于改革学制和改进中学科学教育的主张。

1922 年，美国教育家推士和麦柯尔先后应邀来华讲学，郭秉文在其中亦发挥了积极作用。

由上述可知，杜威、孟禄等美国教育家来华讲学，广泛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哲学、政治、伦理和教育思想，对于五四时期渴求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的中国知识界而言无疑是珍贵的及时雨。而郭秉文作为邀请杜威、孟禄等人来华的核心人物之一，在他们来华后，又盛情接待，精心安排其访华行程，其主政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更成为这批美国教育家在华的重要活动基地，他对于推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三）郭秉文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自觉运用

上世纪 20 年代前后，郭秉文不仅积极传播杜威学说，扩大实用主义哲学理论和教育理论的影响，指导中国的教育改革，而且努力践行实用主义的哲学、教育思想，将其运用于办学过程之中，取得了卓著成效。

1. 郭秉文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育人方针

在郭秉文掌校期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直坚持以“诚”为校训，训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的育人方针。该校提倡以诚植身，以诚敬业，以诚强身，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关于德育，郭秉文认为，德育要以养成学生作为国民对国家负责的完善人格为标准和旨归。而完善人格的要素，主要包括道德、学术和才识三个方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德育采取训练与管理兼重的原则。郭秉文对学生提倡“自动主义”，旨在提高学生的自觉、自立、自学和自治的能力。体育则以养成坚强之体魄与充实之精神为标准。郭秉文提出，体育是德、智两育的根本。

① 1922 年 1 月 6 日《申报》.

故他对于全校,则重体育之普及;对于个人,则注重全面之发育,务使人人各部分均得到平均之锻炼,人人能得到健康之幸福。至于体育的方法,一是重视养护,二是注意锻炼,三是及时医治。在智育方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养成思想及应用能力为智力的标准。郭秉文主张,明知识之本源,然后乃能用之无尽。为实现这一智育标准,主要采取下列两条途径:一是为养成思想的能力,注重兴疑与实验。"二是欲养成应用能力,必注重理想、理论与实际的联络,使所学者皆有所用,所用者皆本所学。"[①]当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学实验蔚然成风,各种新式教学法大胆试验,1920 年建立心理实验室,注重心理测验,并首次在中国采用智力测验法,测试报考学生和在校学生的智力。该校在科学人才培养方面亦独领风骚,被时人誉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主要基地"。

2. 郭秉文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课程及教学改革

民国初期高校普遍实行"学年制",学生在修业期限内修满规定的全部课程才能毕业,但这种学年制不利于因材施教。为贯彻以学生为中心和有利于学生自由发展的教育原则,经过试验和反复研讨,郭秉文在 1919 年主持校务会议,通过"改良课程案",决定采用选科制代替学年制,并于 1920 年秋正式试行。选科制的具体内容为:各科都有必修课、选修课,都有主、辅系之分。学生在校除了主学本系一定课程,达到规定学分外,还必须选一辅系,修满规定学分课程;另外,只要征得指导教师同意,还可选修其他科的若干课程。这种主、辅系课程的设置在国内亦为首创。选科制的推行,深受学生欢迎,它不仅有利于学生志趣和才能的发展,推动了教学的改革,也为实现该校"通才与专才平衡"的培养目标提供了一条具体的教育途径。

自清末兴学以来,我国各级学校一直使用"教授法"的提法,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依旧大行其道。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的陶行知对此持批判态度,他看到当时校内"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②],教与学严重脱节的现象后,首倡科学的教学法,强调学校教育应以学生为中心。1918 年,陶行知在教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应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这一建议遭到保守者的激烈反对。关键时刻,校长郭秉文坚决站在陶行知一边,在校内一批改革力量的支持下,"教学法"最终取代了传统的"教授法",并在全国流行开来。

郭秉文在执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期间,创造了辉煌的办学业绩。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为当时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的两大重镇之一(另一个是北京

①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60.
② 章开沅,唐文权. 平凡的神圣——陶行知[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147.

高等师范学校),也是全国师范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排头兵。该校改办东南大学后,更是英才辈出,校誉鹊起,迅速成为"东南学府第一流",蜚声国内外。如果探寻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则很容易发现这与他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自觉运用于办学实践大有关系。

二、郭秉文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改革的艰难推动

作为中国现代最早的大学教育家之一,文理兼通、融汇中西的学术背景使郭秉文对现代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有着深刻的理解与体验。他锐意改革、不断开拓创新,在民国初期高等教育的舞台上,尽力施展自己的才华,进行了把西方(尤其是美国)现代大学教育理念和模式与中国本土需要相结合的探索,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改革的新局面。

(一) 创办综合性大学——东南大学

1. 学科设置多元化

早在郭秉文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时,就已着手对学科设置进行改革。该校从创办之初就表现出与国内其他高等师范学校不同的发展路向:即完全突破师范学校设科的局限。郭秉文认为:高等师范学校的办学,不仅应着眼于中学教学需要,更要从社会需要出发。当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诸多学科设置均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1915 年前,该校只设有国文史地部与数学理化部。郭秉文主持校政后,为适应社会需要,又陆续添设了英文、教育、体育、农业、工艺、商业等 6 个专修科。如 1916 年体育科的专设,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为我国最早培养体育方面人才的高等学校。而设置此科,是因"社会体育不振,而任体操教师者又多不明体育之原理";又如设工艺科,既是因为"人民生产薄弱,而一般毕业生又缺乏职业之知识技能,解决之法惟有提倡职业教育"[①],也是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急需工业人才。1921 年,郭秉文更将国文史地部与数学理化部合建成文理科,下设国文系、英文系、哲学系、历史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地学系等 8 系,再加上原来的 6 科和新增的 2 科(文理专修科和国文专修科)共有 8 系 8 科。其学科结构突破了师范学校框架,形成了寓师范教育、基础教育和实科教育于一体的崭新格局。时人曾这样评价南京高师"诸所擘画,颇异部章,而专

① 刘捷,谢维和. 栅栏内外——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百年省思[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1-92.

科增设之多，尤为各高师所未见”。①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初具综合性大学雏形的基础上，郭秉文顺势提出改办大学的建议，得到校内外的一致赞同。正是由于校长郭秉文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发展前景深谋远虑，高屋建瓴，细心筹划，才使学校逐渐形成综合性的规模，升格为大学终成顺理成章之事。东南大学成立后，更是集文、理、农、工、商、教育于一体，其学科之众多和齐备，居当时全国之冠。东南大学首任工科主任茅以升在 1923 年时曾说：“本大学学制，以农、工、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所在也。”②

2. 创建“寓师范于大学”的师资培养模式

近代以来，中国教育模仿日本，中小学教师均由专门的师范院校培养。1922 年《壬戌学制》颁布后，高等师范学校纷纷升格为大学，但是改为师范大学还是并入综合性大学，成为教育界争论的焦点。对于这个问题，郭秉文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看法有所不同。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应有所区别，“学”是学理，“术”是应用。他坚持大学以研究基础理论为中心，而将发展应用科学的职能赋予专门学校。郭秉文却不太赞同这种“学”与“术”分离的做法。他对美国的师资培养模式倍加推崇，力主高等师范学校应并入综合大学，使综合大学兼有培养师资的功能。这与他具有综合性大学的办学理念以及对美国师范教育体制的深刻了解有关。晚年的郭秉文曾将自己当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的办学思想归纳为一个“平”字。他主张：大学教育应力求做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以及国内与国际的平衡。其中，通才与专才平衡的观点，反映了郭秉文对大学教育目标的理解。他认为，大学应培养各种类型的平正通达的人才，既要培养通才，也要培养专才，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在大学里要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具体体现在高等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上，他认为：中等以上学校的教师，“应该是双料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师范生的学业标准完全要与大学一样，并且希望能出类拔萃，有过之无不及。此外，还须加工加料，具备两种修养。”而这两种修养“一是教材教法的精研，一是器识抱负的培养”。因此，“教师的来源，不必局限于师范学院，应广求人才，着眼于全国大学的优秀青年，再加上一番训练和熏陶才好。”③郭秉文留学美国多年，他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是寓师范于大学的成功典范，在全美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院中师

① 周川，黄旭. 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122.
② 南大百年实录（上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2.
③ 朱一雄. 东南大学校史研究（专刊第 1 集）[G].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52.

资阵容最强，声誉最高，办得最有成效。正是在郭秉文的主导下，东南大学作为一所名副其实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在全国高校中首创了“寓师范于大学”的办学体制。这一体制扩大了师资培养的渠道，增强了师范教育的学术性，更有利于优良师资的培养。

（二）创新大学领导管理体制

为解决办学经费短缺的困难，促进学校快速发展，早在 1921 年东南大学筹备之初，郭秉文即以“欧美各大学为求社会赞助起见，常常设立董事会，协助校务进行”，首先着手建设的是学校董事会。他主持拟定了东南大学筹备处简章，并呈教育部核准，又多次主持会议讨论董事会章程，如在第一次校董事会会议时，郭秉文指出：简章虽经筹备处拟定呈部核准，但其中“第六章第六条载明，如有未尽事宜，应行修改者，由校董事会提议，今日诸君如有意见，可提出讨论修改”①。经过与会董事的热烈讨论，最终明确学校董事会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而非最初确定的议事、咨询机构。校董会中，既有著名的教育家，又有能对政府和地方施加影响的社会名流，还有实业界、金融界巨子。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和发挥董事各自所长，经董事会议决设立办事校董和经济校董，推定袁希涛、沈恩孚 3 位教育家为办事校董，聂云台、穆藕初、钱新之 3 位实业家为经济校董②。

在全国各国立、公立高校中首设校董会是东南大学在管理体制上的一个重要特色，事实证明，这是极为成功之举。它沟通了东南大学和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渠道，使学校在办学过程中获得了来自社会方面的更多的舆论、物质和经济上的支持，得以迅速发展。这一做法，后为其他许多学校所效仿。

为贯彻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原则，郭秉文又对原有的学校组织系统作了进一步完善，制定了《国立东南大学组织大纲》，经教育部核准同意后颁布实施。根据大纲，东南大学校内领导体制实行的是校长领导下的“三会”制，即评议会、教授会和行政委员会。校长兼此三个委员会的主席。评议会系议事机构。其主要职能为：议决本校教育方针；用于经济之建议事项；重要之建筑及设备；系与科之增设废止或变更；其他校内重要事项。评议会由校长、科主任及各系教授代表、行政各部代表、附中和附小的代表组成。为便于商榷工作，评议会下设各委员会，由主任 1 人，委员若干人组成，由校长在教授中指定担任。教授会系负责全校教务的机构。教授会由校长，各科、系主任及教授组成。其主要职能是讨论和议决全校教务的公共问题等。行政委员会是负责全校行政事务的机构，协助校

① 南大百年实录（上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4.
② 朱斐. 东南大学史（第一卷）[G].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132.

长处理校务。其职能为:规划全校公共行政事宜;审查行政各部事务;处理临时发生的各种行政事务等。这种管理体制具有较强民主色彩,能充分发挥教授作用。

东南大学在领导管理体制上实行的董事会制度、校长负责制和教授治校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无疑是典型美国式的管理模式。

(三) 改革学生管理制度

1. 鼓励学生自治。在推行民主管理,实行教师议政的同时,郭秉文也十分强调学生"自动自治"。1919 年底郭秉文在对学校组织系统进行改革的草案中指出:"学监处掌学生之训育及管理,关系一校风至重惟以数百学生之德行全赖一二人负督察辅导之责,心劳力疲,而其效亦甚浅薄,故训育之责似宜为全校教职员人人所共负,然后接触既多,耳目亦广,随时随地均有示范之机会……且高师学生大都成人之年,其辱小以前粗有办事经历者,亦复不少,似宜有学生自治会之设,以练习其自治之能力。"[①]他主张以杜威实用主义理论为指导,实行自动主义,组织学生自治会,倡导学生自治能力的训练。在郭秉文、陶行知、刘伯明等一批留美学者的支持下,东南大学实行学生自治会制度。校评议会亦设有学生自治委员会,负责指导学生的自治活动。凡生活、文体、游艺、学术、出版等活动,都尽可能让学生自行组织、自行主办。如陈鹤琴曾担任校游艺委员会主任,在他的大力提倡下,通过年级之间举行各种竞赛、交易会、联谊会,开展表演、讲座、辩论等活动,使学生的生活面貌大为改观,"一种动的、有生气的、有活力的校风产生了"[②]。

2. 实行男女同校。五四之前的中国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外,大都不招收女生。郭秉文就任校长后,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就是开放"女禁",倡行男女同校学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全国的大学中走在开放"女禁"的前列。1919 年 12 月在郭秉文主持的校务会议上,决定于 1920 年正式招收女生,并与北京大学商定,南北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经郭秉文等人的到处宣传、疏通,招收女生的考试终于如期举行。在百余名应考女生中,正式录取了 8 名女生,另有 50 余名旁听生。继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开"女禁"之后,各地高校纷纷效法,宣布实行男女同校,最终促使北洋政府教育部 1922 年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对女子受教育权给予制度保证。郭秉文等人率先倡行男女同校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

① 《关于校内试行简章呈教育部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648,卷宗号 0005.
②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陈鹤琴全集第六卷[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四）改革教学管理制度

自五四以后，中国教育民主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教育必须注重学生心理，尊重学生个性，给予学生学习自由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扬。郭秉文秉持通才教育的办学理念，站在时代潮头，在领导东南大学行政领导体制改革的同时，也积极推行学分制教学管理模式及以主辅修制为特点的选课制度。如前所述，1919 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政改革的重要举措——实行选课制，在校务会议上进行讨论并通过，成为当时国内最早实行选课制的两所国立大学之一（另一所为北京大学）。

继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先后实行选课制和学分制后，1922 年北洋政府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明确规定高校实行选课制和学分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当时各高校多以东南大学的选课制为依据，即采用主、辅系选课制。这种制度，为 20 世纪初美国许多大学所采用。选课制的推行，使东南大学培养了许多文理兼通、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优秀人才，广获社会好评。

（五）拓展高校的科研、服务职能

1. 重视科学研究。继蔡元培最早将科学研究的理念引入中国高等学府之后，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对科学研究工作亦十分重视。他鼓励教师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进行学术研究，要求自立风格，独树一帜。并努力为教师提供良好的科学研究条件，营造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如他将校内著名的口字房改为实验室，使之成为当时规模较大的实验楼；在口字房不幸毁于火灾之后，1923 年他又争取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建成当时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科学馆。在郭秉文的支持下，东南大学以科学社为中心，组建了一批新的学科和科研机构，科学研究领先于全国，取得了丰硕成果。

2. 郭秉文掌校期间，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成为东南大学的办学特色之一。如该校分设上海商科大学，其“地点拟定上海，意在适应环境”，以造就高等商业人才。东南大学商科的图书馆率先向社会开放，以缓和上海金融人才亟缺的矛盾；同时，商科还开办了商业夜校、商业补习学校、暑假补习学校等，为有志求学青年提供业余学习提高的机会。东南大学农科则通过举办展览会等方式，宣讲普及农业知识、推广优良品种、优良农具、高产技术。而东南大学教育科继续沿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做法，开办暑期学校，培训在职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在该校的带动下，国内遂兴起大办暑期学校的热潮。这种在高等教育的延伸方面所作的尝试，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创新意义。

上述举措，亦可明显看出美国模式的影响。郭秉文留学美国期间，正值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以后,高等教育逐渐摆脱了欧洲模式。大学突破象牙塔的束缚,教学内容密切联系美国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实际需要,以求更广泛地融入社会生活。郭秉文归国后,便极力仿照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进行改革,发展了高校的科研、服务职能,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内涵得以进一步开拓和深化,发展模式日益丰富。

1924 年 2 月,根据东南大学、北京大学两校的改革经验和具体做法,北洋政府教育部重新制定并颁布了《国立大学条例》,承认和肯定了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和郭秉文在东南大学的改革。如设立董事会、评议会和校长负责相结合的领导管理体制,实行教授治校、采用选科制,附设专修科及推广部等项规定,基本上是两校正在实施的内容。郭秉文等人创建现代大学制度的经验与做法,也由此推广到全国。

三、郭秉文对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有力推动

(一) 推动中小学课程及教学改革

20 世纪 20 年代,顺应世界教育革新的时代潮流,以留美归国学生为主体的中国新教育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现代教育改革运动。为促进教育改革活动的深入展开,1921 年 12 月,由“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和“实际教育调查社”三社合组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该社云集了国内教育、学术界知名人士,是当时规模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教育社团之一。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成立大会上,原实际教育调查社发起人郭秉文当选为 9 位理事之一。该社下设 32 个委员会,郭秉文还担任了规模较大的职业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自成立后,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开展了一系列教育研究、调查、测验、实验等活动,大力推进新教育,对 20 年代的现代教育改革功不可没。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郭秉文多次参加该社的年会,参与有关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各项重大决策,如曾参与《壬戌学制》相配套的课程标准的制定、中小学课程与教材改革研究方案的确定等。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郭秉文还积极鼓励、支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和附属小学率先进行大规模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实验。如 1919 年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在知名教育家俞子夷的主持下,进行了中国最早的设计教学法实验。此后,该校又将设计教学法的实验由开始时在低中年级进行,继而扩展到全校包括幼稚园在内的 13 个班全面铺开,在当时小学教育界

引起很大轰动，参观访问学习者络绎不绝，报载："一时参观南高师附小的，络绎不绝，做南高师附小参观笔记的，也不知有多少，在中国小学教育界的出版物上，到处都有他们的教学概况。"[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结合本校实际所作的教学改革实验，培养了儿童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了儿童的学习兴趣。又如1923年，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在归国留美学者廖世承主持下，进行了道尔顿制与班级授课制的比较实验。廖世承曾明确指出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实验道尔顿制的目的有二：一是"比较道尔顿制与学科制之优劣"，二是"唤起国人对于经过为期一学年的等组法实验研究之兴趣"，并请来华的美国教育心理专家麦柯尔（W. A. McCall）帮助制定各种标准测量。经过对比实验，廖世承指出道尔顿制不合我国的国情，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从事教育的人，当注意实地研究，不应该作趋时的论调。"[②]东南大学附属小学、附属中学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实验，推动了中国教学方法的进一步改革。

（二）改良中小学科学教育

虽然自清末办理新教育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小学科学教育从形式上看已颇为完备，科学教育制度已经创建，但是，中小学科学教育的程度之低下，仍旧令人触目惊心。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当时学校的科学教育是"课本的科学教育"[③]，只是贩卖科学的结论，并不教会学生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郭秉文对科学教育极为重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全国高校中首创暑期学校，培训了大批中小学科学教师；东南大学建起了当时全国大学条件最好的科学馆，培养了大量科学人才。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聘请美国著名科学教育专家、俄亥俄州立大学推士教授为科学教育督导，来华进行科学教育调查和研究，帮助中国改进科学教育。推士在两年的时间里到过10个省份，访问24个城市，调查了248所学校，发表了276次演讲，在宣扬科学教育重要的同时，着重介绍了美国研究科学教育的方法。他亦曾以东南大学为活动中心讲授科学教授原理，从学者二百余人，开启了训练中学科学教员的先例。自1923年后，中华教育改进社每年均举办科学教育暑期研究会，或与清华学校及洛氏驻华医社合办，或与东南大学合办，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讲学，以培训中小学科学教育师资，并与中国科学社合办科学教育全国展览会。[④] 在郭秉文等人的努力下，中小学科学

① 沈百英. 参观南高附小杜威院维城院记略. 教育杂志，1923年第15卷第11号.
② 廖世承. 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验报告. 中华书局，1925年出版.
③ 张准. 近五十年来中国之科学教育. 引自张子高演讲，周邦道记述. 科学发达略史[M]. 上海：中华书局，1928：250.
④《科学教员暑期研究会之筹备》，1925年5月11日《申报·教育消息》；《全国教育展览会筹备经过》，1924年5月25日《申报·教育消息》.

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最终促使中国从“课本的科学教育”转向“真正的科学教育”。

(三) 支持测验运动的开展

上世纪 20 年代前后,大批归国留美学生在锐意改革传统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同时,对教育测验这一已在欧美教育革新运动中获得巨大成功的科学工具也予以大力输入。1922 年下半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麦柯尔教授来华指导中国测验运动的开展。中华教育改进社为此专门成立了编制测量委员会,由该社主任干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陶行知负责。在该委员会的组织推动下,麦柯尔会同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教授编制了各种应用测验,并在全国各地进行测试,测验方法皆采用麦柯尔创造的“TBCF 制”。同时,东南大学教育科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合设“测验之编造与应用”学程,麦柯尔被公推为由东南大学测验专家组成的导师会的主任,培养和训练了大批测验人才。中华教育改进社还设立了“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推选东南大学教育科教授陆志韦根据中国的文化背景订正比纳——西蒙智力量表。随着麦柯尔来华,作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工具的统计法颇有声势地移植于中国,也将我国五四前后兴起的测验运动推向高潮,中华教育改进社和东南大学教育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亲历其事的陈鹤琴曾这样说过:“由于国内外专家的努力,测验运动总算在中国奠下了基础。那时候,东南大学的贡献也很大,校长郭秉文先生不但不反对,而且竭力鼓励我们来做新的尝试。此外,陶行知、陆志韦、俞子夷、廖世承、徐则陵、郑晓沧、孟宪承、朱君毅教授的参加与推动,也是测验运动所以能顺利开展的原因。”①

四、郭秉文对留美优秀人才的引进和起用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郭秉文深知优良师资对于办好大学的重要性。他曾说,办大学有两大难题,其一便是人才。他始终把延揽人才作为办学的首务,无论是在出差旅途之中还是在访问考察期间,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并以此著称于教育界。鉴于当时国内学术发展的实际状况,郭秉文尤为重视在中国留美学生中物色师资。他曾任留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会长,主编过会刊;任东南大学校长后,又数度赴欧美考察教育,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更是其每次必造访之地,故他对哥伦比亚大学乃至全美各地中国留学生的情况了如指掌。遇有优秀的留学生,就一

①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陈鹤琴全集第六卷[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638.

一与之见面，甚至观察他们的实验，旁听其教学，如认为确有真才实学，就千方百计地聘请他们回国到东南大学任教。由于他的极力延揽，东南大学俊彦云集，师资阵容极一时之盛。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其回忆录《在中国的五十年》中赞赏郭秉文："……延揽了五十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

1918年，在郭秉文的努力促成下，由数百名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总部迁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科学社于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创办，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其主要发起人为一批留美学生，任鸿隽任社长。该社自成立以来，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以推进科学的传播和研究等多项事业为任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成为科学社骨干成员云集之所，仅1918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科学社社员达16人；该社9名发起人中有6人，1918—1921年担任科学社董事和《科学》月刊编辑的绝大多数，都在南高—东大任教。由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和中国科学社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南高—东大被时人称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该校知名教师多为中国科学社成员，也使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在科学人才培养方面享有盛誉。郭秉文虽非科学社成员，但他对该社的发展非常关注，并总是尽力提供帮助。如中国科学社于1922年成立生物学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其倡建者和学术带头人秉志、胡先骕、钱崇澍及其他研究人员多是东南大学生物系教师，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前来做研究工作。当时限于条件，所内开展研究所用的仪器设备十分缺乏，许多仪器都是从东南大学借来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与东南大学生物系虽然分属两家，却形同一体，人员相互兼职，密切合作，教学和研究互促互补，为我国生物学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而这与校长郭秉文的鼎力支持是密不可分的。

截至1923年，东南大学的师资队伍中，归国留美学生已占极大比重。据统计，文科共有教授22人，除去国文系和历史系因学科性质多本土出身者外，有14人是留美出身；理科10名教授中8人有留学经历，其中7人留学美国。教育科10名教授，全部是留美出身，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生。工科6名教授中，5名为留美出身；农科共有教授19人，其中14人为留美出身；商科（上海商科大学）有教授18人，其中14人为留美出身。而在全校36个系、部中，除国文科、文牍部、群育部三部主任外，其余均为留美归国学者。①

① 张雪蓉.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41－42.

此种师资结构,在当时国内高校中极为罕见。郭秉文对优秀留美人才的引进和起用亦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办学思想一致、水平整齐、充满朝气的师资队伍的鼎力相助和密切配合,郭秉文才能顺利推行他的办学主张,东南大学也才能掀开其发展史上教育教学改革的新的一页,并迅速成为与北京大学齐名的中国南方学术重镇。

值得注意的是,郭秉文对人才的引进和起用可谓不拘一格,真正做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并重,西学与国学兼备。著名史学家梁敬谆(和钧)在《南楼随笔》一文中就曾提到:"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不亚于北大。"当年的东南大学,既是以发展科学为职志的中国科学社的总部所在地,也是以"昌明国粹"为宗旨的"学衡派"的大本营,而且二者在人员上还有交叉,如"学衡派"中的主将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均是科学社的成员,吴宓也是哈佛的博士。这种局面的形成显然与郭秉文一贯注重人文与科学平衡的办学理念有密切关系。他在发展人文科学时,非常重视民族精神的弘扬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整理与发掘。对此,郭秉文在南京高师时的学生张其昀回忆说:"……南高师一班维护中国文化的大师,如刘师伯明、柳师诒徵等,创办了《学衡》杂志,主张发扬民族精神,沟通中西文化。对于西方文化,不要仅作为空泛的介绍,而当更作深入的研究。《学衡》旗帜鲜明,阵容坚强,俨然负起中流砥柱的重任,影响所及,至为深远。"[①]他发出这样的感慨:南高最可自负的一点就是"留学生与国学大师的合作,文科方面有几位大师对中国文化有透彻的研究与超越的见解,同时他们也注意于科学的方法,故思虑周密,其探究事理常常有批评的精神"。

五、郭秉文对国际教育改革运动的积极参与

民国成立后,中外教育交流日渐繁荣。20 年代前后,中国文教界在对于域外新知的强烈渴求以及博采世界先进文化的开放心态主导下,大力引进西方各种新的思想流派、学说体系,盛情邀请多位享誉世界的知名学者如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等人来华讲学;在积极学习世界教育新潮的同时,也开始注重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改革运动。郭秉文在推动中国教育界参与国际教育改革运动方面可谓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郭秉文高度重视教育国际交流在国际关系和促进人民友好往来中的重要作

①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引自周川,黄旭.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128.

用，他曾说："英法美诸国注意以教育辅助外交，如交换教员、派员考察教育，此为国民外交上之要点。"[①]主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期间，他不仅数度出访欧美，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改革经验，还在《新教育》上发表译介文章，如《万国教育协会宣言》，向国内教育界介绍美国开展国际教育的情况，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有关中国应凭借国际教育组织及会议进行对外教育传播的言论。郭秉文亦曾多次代表中国教育界参与国际教育组织并出席会议，努力向世界宣传、介绍中国教育，成为20年代国际舞台上最活跃的中国教育家。

1923年6月，世界教育联合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成立大会，郭秉文率领中国代表团十余人与会。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在开幕式上郭秉文被与会他国代表公推致辞，他强调"这次会议的基本任务在商讨如何以教育促进世界和平……须透过教育及其他有效方法化除国家间之自私、骄傲、仇恨和报复心理，并从而建立友好同情与互信之精神"。并说："我国对于此种会议，当竭力赞同参与，仅此为国际之事，必须加入，且教育事业，宜共同合作，且一国之固有之国性欲特长，亦当保存，不可稍忽。"[②]在太平洋区组会议上，郭秉文提出大学应当成为世界精神的塑造者，所谓世界精神，应包括仁爱、容忍、信义与平等；须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入手，世界精神才能根深蒂固滋长起来。他还具体提出各国大学间合作的途径，包括交换教师、交换学生、交换访问、交换出版物、建立联合的教育事业，开设有关外国文化与国际问题的课程，组织国际大学联盟等。这些见解不仅为各国代表所重视，也得到美国新闻界注意。美国各大报纸都将郭秉文的演讲全文刊出，有的还将他所提倡的世界精神列为报道的标题。郭秉文还向新闻记者介绍中国教育取得的进步："民国成立12年以来，中国教育有显著长足的进展，大专学校由二十所激增至一百二十五所，仅其一例。"[③]中国代表团向此次会议提交了内容丰富全面的介绍中国教育的资料，其中《中国高等教育》由郭秉文亲自撰写。郭秉文在本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会长兼董事，负责亚洲部工作。郭秉文当选的消息传到国内，使教育界备受鼓舞，陶行知当时就不无兴奋地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年会上讲到："本社代表郭秉文先生，并被举为副会长。查正会长为美人，副会长一为英人，一为郭先生。到会着实有50余国之多，而我国代表，竟得此荣誉，实为空前未有之举。"[④]继1923年当选为世界教育联合会副会长后，郭秉文又分别于1925、1927和1931年多次

① 郭秉文.战后英美教育近况.新教育，第2卷第4期.
② 朱耀祖.郭秉文先生与国际文教合作.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
③ 朱耀祖.郭秉文先生与国际文教合作.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
④ 陶行知.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届社务报告.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342.

当选。

20世纪20年代前后,在世界现代教育改革风起云涌、中国近代教育亟待变革之际,郭秉文站在时代潮头,顺应时代趋势,以先觉者之明、先行者身份,与蒋梦麟、陶行知等一批归国留美学生结成志趣相投的团体,极力引进杜威、孟禄、克伯屈、麦柯尔、推士等西方现代教育家的理论主张,为中国教育改革和社会变革提供理论武器。他不仅积极传播实用主义哲学、教育思想,扩大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更自觉地应用实用主义理论研究、解决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如他先后发表了《中国现今教育问题之一:职业之指导》《战后欧美教育近况》《十年度之高等教育》《民国十一年度之高等教育》《吾国乙种农业学校之现状及其改进》等系列学术论文,对职业教育、义务教育、成人教育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办学实践中,实为民国初期传播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推手。郭秉文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领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他创办东南大学,创新大学领导管理体制,确立了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等办学模式,并将其推广到各大学,在推动仿效美国模式的现代高等教育改革中发挥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实为与蔡元培齐名的一南一北两位重要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奠基人。郭秉文还参与发起、组建中华教育改进社等多个教育、科学社团,积极推动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如支持开展教育调查,教育测验,改革中学课程、教材与教法,倡导科学教育等,实为基础教育领域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和坚定支持者;郭秉文深知,人才是现代教育改革事业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条件,他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引进和起用留美优秀人才。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立志投身教育改革实践的归国留美学生(如后来成为民国文教界领袖人物的陶行知、陈鹤琴等人都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充分发挥组织、制度的优势,在文教界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现代教育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推动了现代学制的建立,郭秉文实为民国初期最大的伯乐之一。此外,他还热情参与国际教育改革运动,为现代教育改革事业谋求外部助力。郭秉文为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郭秉文主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的十年,正是国内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教育经费极度竭蹶的时期,他苦心孤诣,在暗流涌动的政治漩涡中左右平衡,恪守学术中立;为解决财政困难绞尽脑汁,八方化缘,百般苦撑。尽管时常处于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他依旧矢志不渝,雄心勃勃地推进各项改革事业的进行。然而,1925年1月,北洋政府突然宣布免去其东南大学校长职务。对于教育改革探索的被迫中断,这位向来提倡教育、学术独立、从不过问政治的教育家此刻充满了无奈与怅然。当后人重温历史,在

为郭秉文的壮志未酬而扼腕叹息的同时，亦可从中得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

当然，不可否认，上世纪20年代郭秉文积极参与并大力推动的现代教育改革也存在一些消极影响：如在改革理念上有些不顾国情、照搬美国；又如过早推动“寓师范于大学”师资培养模式，当年曾在教育界引起很大争议，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多不赞成，而主张分设显然更符合当时国情，故师范学院并入综合性大学中多未成功，致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在20世纪30年代继续开设单立的师范学院（各省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等）。此外，郭秉文不懂妥协、略显独断，有时甚至有些意气用事的个性特点（作为学者可以，但作为领导者，则不理想，易使所领导的机构工作开展受影响）使得他在处理学校内部派别矛盾时有欠妥当，导致在当时特殊的政治斗争背景下为人所难容，东南大学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亦因此中断。从这一意义上说，郭秉文被免职，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幸。

郭秉文被免职后，尽管离开了高等教育界，但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不过是转换了表演场所。在国内他仍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诸多教育组织的领导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影响教育改革；他在东南大学的大批同事与学生依旧沿着他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在国际上，他仍是世界教育联合会副会长，表现活跃；在中外教育文化交流领域，他更是大放异彩，如在美国创办华美协进社、开展教育文化交流活动等；在经济外贸和国际慈善方面，他长期担任国际贸易局局长、联合国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呕心沥血，再建新功。基于此，我们认为美国知名学者基南在其论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中所言“1925年以后，郭秉文不再是中国教育界的领袖人物”的这一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他在教育界的重要地位与巨大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郭秉文与现代中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的建立

——基于《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及相关论著的研究*

◎周洪宇　李艳莉（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郭秉文（1880—1969）所著《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一书，是其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 1914 年撰写提交并获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1915 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英文本，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为之作序。1916 年，由周槃译述、黄炎培作序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译本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在中国教育学科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拥有多个“第一”的身份，作者郭秉文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人，该书是我国第一本中国教育制度史著作，也是现代中国第一本体现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的教育学著作。[①] 以往研究者多由于郭秉文曾担任东南大学校长的身份和在东南大学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实践而将研究视域集中对其

* [作者简介] 周洪宇（1958—），男，湖南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和教育史学理论研究。李艳莉（1986—），女，山西平定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史。

① 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 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1.

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和教育思想的探讨[①]，对其在教育史学[②]和教育学史[③]相关著述中虽有所提及，但大多语焉不详。本文拟围绕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及其相关论著的学理特点，通过与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杜威、孟禄、蒋梦麟、胡适多位师友相关论著的比较，明确指出郭秉文该书及其早期相关论著对中国教育学在由经日本引进的赫尔巴特教育学术范式转向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进程中所起的奠基之功，以期引起教育学界对该书的进一步重视，并反思未来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之路。

一、理论架构：体例及奠定的学术范式

作为郭秉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所作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集中体现了其理论内核和治学范式。文中由“第一编上古教育制度之起源、第二编上古教育制度及其退化、第三编汉以后各朝教育之沿革、第四编新旧教育之过渡时代、第五编新教育制度之建立、第六编民国时代所建之新教育、第七编现今国民教育之重要问题、第八编撮要与结论”[④]以及附录构成，通过深入分析本著作兼及郭氏后续的论文，其学术范式可大致概括为：

（一）理论的现代性：引入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分析

郭秉文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求学后，深受执教于此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影响。杜威的主要著作此时已出版了《我的教育信条》（纽约：E. L. 凯洛格出版公司，1897 年）、《学校与社会》（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

① 探讨郭秉文在东南大学改革实践的代表作有：霍益萍. 郭秉文和东南大学[J].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1995(2)；张雪蓉. 国立东南大学办学思想和办学实践的启示[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3(2)；周谷平，朱绍英. 郭秉文与近代美国大学模式的导入[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5)；石猛. 郭秉文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J]. 高教探索，2010(1)等。探讨郭秉文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有：王运来. 略论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办学思想[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0(4)；张大良，王运来. 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大学教学思想探微[J]. 中国大学教学，2007(10)；陈学军. 教育意味与持中之道：郭秉文的教育管理学思想[J]. 大学教育科学，2013(2)；陆华. 郭秉文和平教育思想探析[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2)等。

② 代表作有：蔡振生. 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反思[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3)；杜成宪，崔运武，王伦信. 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杜成宪，邓明言. 教育史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等。如上对郭书进行了初步分析，其中蔡文指出了该书表现出中国教育界美国影响日甚日本一筹的趋势，但尚未深入分析该书的理论根基、研究方法等而深究呈现此趋势的原因。

③ 代表作有：周谷平. 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金林祥. 20 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侯怀银. 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以 20 世纪上半叶为中心[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等。如上对《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有所提及或略微展开，但并未详细论述该书具备的学理特征和重要地位等，没有很好地正视该书开启中国教育学界由借鉴日本教育学转为偏向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的重要地位。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目录，9，145－146，绪言，150，序一.

社，1899年初版，1915年修订版）、《伦理学》（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08年初版；与J. H. 塔夫茨合著）、《我们怎样思维》（波士顿：D. C. 希斯出版公司，1910年初版）等。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至此基本成型。郭秉文在学习期间对之已经接触并受其影响。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重视经验的价值，主张“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学校即社会”等，成为郭秉文分析教育制度得失与改进的理论渊源。此书在追溯历代教育制度时，时刻以教育与学生生活、社会需要相契合与否来审视其得失优劣。第二编“上古教育制度及其退化”中，郭秉文分析周代教育时，指出“以近世教育眼光评论此种学校之课程，实包德智体三育。于人生有密切之关系。此教育即所以为人能竞争于生活界之预备。”[①]汉以后各朝的教育专为养成官吏，与生活严重脱节，周代教育“重实验而与当时生活相接近”的长处逐渐损益。第七编“现今国民教育之重要问题”，在谈到学生道德教育养成时，特别注重道德教育与经验的关系，重视中国已有的文学资料、教员品格等对学生个人经验的形成以及影响，指出此种经验连续推进于学生心目中以及与学生经验的互相影响，较之反复说教更为有效。在论述教育与生活关系时，分析我国“课程为学生将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之一物，是一进步也”，但教材“不能参合学生与社会生活之需要”，学校中应多设置科学、家政、手工等“求得技能”的学科，假若推进新教育时能“注重实用教育，不出十稔，必有成效可观已”[②]。《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在行文中注重展现历代教育制度变迁之余，同时深入应用实用主义教育学说进行分析，为此书打上了浑厚理论根基的烙印。此后郭秉文的著述在对中国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时，更是以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作为分析模板，在民国十年深入全国各地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民国十年我国中学教育学生自行性不足，小学教育则多与社会生活联系等，实现了宣扬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用意，表达了教育学界更新传统赫尔巴特教育学说过于死板而开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新风气的勇气和决心。

（二）结构的递进性：教育史学理论等指导自成体系

20世纪前20年里，史学由于孟禄的努力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大多数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题目。[③] 郭秉文治《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结合了指导教授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目录，9，145－146，绪言，150，序一.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目录，9，145－146，绪言，150，序一.
③ （美）拉格曼. 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困扰不断的教育研究的历史[M]. 花海燕等，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75.

F. Farrington[①] 学校行政的研究专长，但其力图做到从中国立场出发系统梳理和解释中国教育制度历史演进的史实，思想来源则无疑是从孟禄为代表的 20 世纪初 20 年代美国学者形成的治教育史的研究范式中获取的，且此书依此研究范式而循序渐进展开系统阐述。郭氏开篇注意点明研究任务、研究对象以及教育制度分期等教育史学基本理论的阐述。作者在绪言中表明了治教育制度沿革史的初衷有二：一、“盖欲考见吾国开化独早之由来，与夫数百兆人民结集之故”；二、“欲寻求吾国操何治术，俾政体巩固，与夫人民得安居乐业”。清楚基本事实基础之上，在实用主义哲学的指引下，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达成“正言之，为模范，为指南；反言之，则亦前车之覆辙也”[②]。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作者在行文中确定了此书的研究对象为我国上古至此书撰写之时止的“公共教育制度”沿革。同时，《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集中探索了教育制度史分期问题，尝试按照中国教育自身的演变发展特点并结合历史年代更替将中国教育制度史划分为上古教育制度之起源、上古教育制度及其退化、汉以后各朝教育之沿革、新旧教育之过渡时代、新教育制度之设立、民国时代所建之新教育六个时期。在前三个时期，作者依据了比较常见的历史年代划分大时期，辅以朝代更替作为小阶段的划分标准。在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进行划分时，则依据近代教育变迁分为新旧教育之过渡时代、新教育制度之设立以及民国时代所建之新教育。同时，此书还明确了近代教育的起点是“吾国近世教育制度之先道”的京师同文馆等。[③] 此种划分依据使此书条理清晰、脉络可循，展现了与众不同的学术个性，也受到此后其他研究者的认同，如周予同的《中国现代教育史》将中国近代教育进行划分考虑的依据便为“观察中国教育的演变而探究其社会的背景”[④]。不仅如此，郭秉文更是在借用西方学术概念之后，依据了西方教育学知识的分析框架将从属于这一研究对象的研究范畴一一囊括其中，从上古教育制度到民国时代所建之新教育长达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分析了各个时期的学校等教育机构、课程、科举、考试、教育法律和章程等，以合理和严谨的态度明确了中国教育制度的研究界限，促成了教育史研究纵横体系自成合理体系。

---

① 郭秉文和蒋梦麟等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具体参见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刘蔚之的研究，刘蔚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之初步分析(1914—1959)[C]//田正平，程斯辉. 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第五届海峡两岸教育史论坛”论文集.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326－327.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目录，9，145－146，绪言，150，序一.

③《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第 46 页。据杜成宪考证，这是中国学者中最早依据京师同文馆的创立为中国近代教育史起点的见解，见杜成宪，邓明言. 教育史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99. 此观点也为此后众多学者认同、支持。

④ 周予同. 中国现代教育史·导论[M].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3.

（三）立场的中国性：研究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变迁

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改革社会意识的觉醒，他们开始效法西方并引进西学以期望逐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其中维新派等主张“唯泰西是故”，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则“渐渐承认西洋文化的有用，而略加采取，但仍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此二种或完全不考虑中国实际情况而全盘覆盖，或进行简单的拼凑和割裂补缀①，无法被中国真正吸收、消化。与此相应，中国教育史要真正成为中国本土的学科，就必须“把外来教育学的学习和研究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发展以及对中国文化传统、教育传统内在血脉的把握结合起来，使三者融为一体”②。要做到将三者有机融合，做到构建中国本土的教育史著作，其中首要做到端正研究态度，时刻密切关注本土的教育实践和珍视、发扬本土的文化和教育传统。《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出现之前，国人翻译日本学者的著述中，中国教育史内容并未成为独立研究对象，大多是西洋教育史的附庸，即使国人自己著述中国教育史，也多为参照日本教育史的模仿之作。郭秉文虽深受西方教育学说、概念以及逻辑体系的影响，但并没有脱离中国教育立场而盲从照搬西方理论。他治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明确指出“宜于西人者，未必皆宜于吾国民。以西方之所长，与吾国数千年行之而宜者融合之，成为一种教育，庶几无枘凿之患”③。以此出发，郭秉文站在中国立场上展示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改变了引进的教育史著述中中国教育史从属于西方教育史的尴尬境地。同时，全书并不完全照搬和完全迷信于西方实用教育学说或教育史研究范式，只是将其作为分析和论证的依据，且更在细微处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也予以合理审视和发扬，如《学记》中教学原则的先进性、周代教育制度的优点等。当然，西方教育学说、研究体例等作为全书的理论和著述基础，有一定“以中铸西”的嫌疑，但是作者更多的是考虑本土教育制度的固有实际而有机吸收和融化理论根基的合理性和现代性，避免了全盘照搬西方理论而赋予中国味道。

（四）触角的现实性：结合现实问题提具体措施

教育史作为一种“舶来品”，在中国出现时不仅脱离研究中国自身的历代教育变迁，更未注意中国教育实践。《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除将视线放置梳理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变迁，从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注重“实用”的理念出发，更是开始将触角伸进当时的教育制度，注重反映和探讨民国成立前后教育界关注的热点问

① 嵇文甫. 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C]//罗荣渠. 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② 侯怀银. 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研究[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89.
③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目录，9，145－146，绪言，150，序一.

题。作者在第七编专列一编“现今国民教育之重要问题”,涉及教会教育问题、教育与道德养成、学校训练与行政问题、教育制度中的财政问题、普及教育、教员的养成、教育与生活、教育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学校课程等问题,并对此种现实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措施,如在谈到教育财政不足这一新教育制度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时,郭秉文通过系统总结我国或西方的教育实践经验而提出了裁减冗员,免添不急之校具与缓建校舍和借鉴西方私立学校备案法规,奖励和改良私立学校两项办法。嗣后,郭秉文又发表了《中国现今教育问题之一:职业之指导》《战后欧美教育近况》《十年度之高等教育》《民国十一年度之高等教育》等一系列学术论文,更是全方位密切关注和反映了中国的职业教育、义务教育、成人教育、军队教育、女子教育、体育、高等教育、留学教育等现实问题,同时进行研究时注重中西经验的借鉴以及更强调教育理论来剖析和解决教育实践问题,应用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相关原理等提出现实教育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开启了教育史、教育学研究不仅重视理论,也偏重实践而避免空泛只谈理论和思辨的优良研究路径,同时也促进教育史研究更好地切合现实所需,有效地促成和实现了历史和现实的双向统一,总结经验得失时更好地为当前问题解决出谋划策。

(五) 方法的科学性:注重教育调查和统计等分析

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孟禄的实证主义注重科学的方法,用调查、统计等为基础了解实际情况,以便对症下药而提出切合的解决措施。郭秉文在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沿革时即朝此方向努力,除遵循史料考证等传统史学方法,更将教育统计法等科学化方法插入其中。此书应用了教育统计方法对学部的统计报告、学务统计表等数据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力求研究能够走向科学化,如在第四、六编中,列出了清末《奏定学堂章程》《壬子癸丑学制》的系统表,并对此表进行了解释说明。第五编中,列出了清末 1905 年至 1910 年的各种学校、学生数的变化表,并进一步分析指出了学校、学生数增加速度颇高。在得出教育发展全貌的同时,作者还加以各省不同教育研究会数量的差异,推理出虽然学校、学生数总体增加,但由于各省差异则不能得出整齐划一的结论,这也体现了作者不盲目迷信我国教育的进步,而是在数据证明下,始终保持公允清醒的态度。第七编中,呈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到宣统二年(1910)各类师范学校学生数的变化表,归纳出各类师范学校学生数的高峰点,以及增减规律,且做到了深入现象之后透视原因。郭秉文不仅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长于教育统计等科学方法,在后续的研究中,他更是秉持“教育事业之改进,不能凭玄想与空谈,非先实地调查,洞察

现状，严密批评，提出解决办法”[①]，通过实际教育调查社奔赴全国各地深入考察教育事业并根据实际情况书写报告。自《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起，郭秉文主要通过教育统计法注重数理分析和“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教育调查法将教育学科学研究态度和方法在教育界不断试行和推广，促使教育学研究不断科学化。

二、承继更新：与杜威、孟禄、胡适等著述比较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成书之时，正是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学说逐渐成熟和不断影响之时，同时也是孟禄为代表的美国教育史学家研究成果涌现之际，郭秉文对二位老师的思想予以承继和更新。同时，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第一个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他开启的美国实用主义学术范式的先驱之路，被其后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借鉴、延续和发展，其中，胡适以《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建立的新学术范式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撼动之地位，而陶行知则构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生活教育学说，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理论。

（一）对杜威、孟禄等学说的承继与更新

杜威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大师，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实用主义哲学反对形而上学，强调经验、生活、行动和效果，把经验归结为行动的效果，知识看作是行动的工具，真理视为行动的成功；实用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均需接受检验，由假设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步骤获取证据和事实进行验证，只向证据和事实低头；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等，注重教育和学生生活以及社会需要的联系；实用主义史观呈现多元论史观，用“文化”一词概括人类一切交往和共同生活的各种条件，如法律、政治、科学、技术等，并指出其中任何一种因素都可以独立存在并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

孟禄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史学家，一生著述丰富。他曾于 1901 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进修，深受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其代表作《教育史教科书》（1905 年）即按照此范式展开。书中阐释了教育的心理起源论、西方教育史分期等教育史学基本理论，重视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思想决定教育实践，且注重研究教育制度，尤

① 郭秉文. 十年之教育调查[J]. 新教育，1922(4)3：369.

其是学校等。[①] 在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下，孟禄在书中抛弃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纯粹思辨而更重视感觉经验和“证”，强调自觉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其中并广泛搜集、批判以及审查大量资料展现如实的事实，促使教育史研究更为科学和严谨。此后，孟禄的后期著作逐渐呈现出注重实用的色彩，但是注重调查等科学方式搜集事实、证据一直是其坚持的方向。孟禄多次来华期间，更是深入进行和指导了大规模教育调查，力图改进中国科学教育和科学研究。

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孟禄坚持的实证主义，二者的相通之处在于均站在了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玄思冥想的立场上，注重在科学精神指导下应用科学方法获取经验和事实。但前者更注重经验的实用价值和效果，后者更注重科学严谨地展现历史事实，实用主义将实证主义进一步“功利化”。郭秉文深受二者的影响，但不墨守某一方学说，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各取所需，实现有机融合。首先，全书的理论基础以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为分析根据。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注重儿童的经验、教育与生活和社会需要相沟通、儿童“从做中学”亲身获得经验等成为郭秉文反思和探讨中国历代教育制度中课程、教育法、教育宗旨等得失的理论依据，也成为其评析和改进当时教育问题的思想来源和指导方针。第二，全书主要贯彻了杜威实用主义史观。郭氏在绪言即提出，撰写此书的目的不仅在于如实还原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演变，更强调“以古鉴今”。同时，在论证教育起源时，郭秉文更是指出“有文化之日，即有教育”，延续了实用主义多元史观的论断。此外，书中还花较多笔墨爬梳了近代教育制度，力图解决当前教育问题而注重教育史研究的实用价值等。第三，全书贯彻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和方法。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力图朝自然科学方法积极靠拢，以严密的材料科学地再现历史原貌。郭秉文在治中国教育制度史时除自觉依照传统史学搜集各种官方资料论证的方法进行研究外，应用了统计等方法首开中国人治教育史科学化的先河。而后郭秉文更是不遗余力地进行教育调查等，做到教育研究时不穷究思辨，而是深入实地进行教育调查等，并在调查中注重统计、测验等科学方法的融合，力图教育研究有根有据和科学化。第四，此书承袭孟禄治教育史的研究范式。郭秉文开篇探讨了教育起源的问题，注重教育阶段划分等，凸显了注重教育史学理论的探讨。同时郭秉文注重对教育制度中的学校深入研究，强调纵横比较，注重分析新旧教育的“变化”等，都是孟禄治教育史研究范式呈现的特点。

---

① 张斌贤. 孟禄教育史教科书[M]//郭齐家等. 中外教育名著评介.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1257－1261.

（二）与哥大同学蒋梦麟、胡适、陶行知著述的比较

蒋梦麟是继郭秉文之后第二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其博士学位论文是在斯特雷耶的指导下完成的，题目为《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是研究中国教育思想方面的先驱之作。与郭秉文一样，蒋梦麟首先站在中国立场上选择了研究中国教育史，力图将中国教育思想编联并最早尝试应用西方学理考察和分析中国历代教育思想[①]，且注重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中对个体个性和需要的肯定，如指出“教授历史，当以学生之生活需要为主体也”[②]；其次，蒋梦麟还系统应用了西方教育理论以及“在哥大学到如何以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而且体会到科学研究的精神”[③]研究和思考论文的研究构架，并形成了与传统中国哲学撰写方式迥异的书写框架，即从第一章开始至第五章依次论述人性论、论“学”之原则、论“教”之原则、论德育原则、结论等[④]；最后，蒋梦麟主张应用西方教育理论时不能全盘引进，提出了“要保持中国文化精华，同时要把某些西方理想结合到中国生活中来”[⑤]的教育构想。作为中国历代教育思想的通览，蒋梦麟的著作既与郭秉文历代教育制度的变迁展示形成补充，同时肯定和承继了郭秉文早其三年而奠定的研究理论化、中国化、科学化教育学术范式。

胡适于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17年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回国后，经过一年的增订和修改，于191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定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全书分为12篇，第1篇为“导言”，第2—11篇则以人物为主题，系统地论述从老子到韩非哲学思想的历史演变。第12篇古代哲学之终局，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哲学作了系统回顾和总结。此书在导言开宗明义地界定了哲学和哲学史的含义，并明确而系统地论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古代哲学史发展阶段的分期问题，凸显了此书在哲学学科体系构建方面的重要价值，同时该书更以西方现代学术的理性精神、实证主义为指导以及著述体例等展开系统的论述。胡适虽深受西方学术范式的影响，但书中仍秉着“平等的眼光”看待诸子之学。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史大纲》深入探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且立足本土借用

① 孙善根.走出象牙塔——蒋梦麟传[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38.
② 蒋梦麟.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M]//曲士培.蒋梦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8.
③ 蒋梦麟.西潮·新潮[M].长沙：岳麓书社，2000：92.
④ 刘蔚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之初步分析（1914—1959）[C]//田正平，程斯辉.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第五届海峡两岸教育史论坛”论文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327.
⑤ 陈竞蓉.教育交流与社会变迁——哥伦比亚大学与现代中国教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174.

西方哲学概念以及应用“证明的方法”、“系统的方法”[①]等研究中国的哲学，同时在研究时还注重以“平等的眼光”审视中西哲学，做到了学术概念更新、立足于中国本土、治学方法科学等现代学术范式的要求，这些也正是《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散发的优势，郭秉文开创的前驱之路被胡适予以吸纳且应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之中，推动和更新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

陶行知于 1915 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美国著名教育行政学专家斯特雷耶。陶行知在哥大求学期间，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成熟并影响达到高峰之时。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设想对不满中国旧教育，力图建立新教育的陶行知具有极大吸引力，成为其今后的“理论武装”。在对待实用主义教育学说上，陶行知在 1917 年进行毕业论文写作时，题目定为《中国教育哲学与新教育》，可以看出，陶行知注重吸纳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精髓上致力于研究中国本土教育哲学并求革新中国传统旧教育。陶行知回国后，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成为其改革中国旧教育的指南。1919 年，郭秉文被正式任命为校长，陶行知被聘为教务长且积极配合郭秉文进行教学改革，二人在实用主义教育学说要义的指导下落实“教授法”改“教学法”等；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上，陶行知除继承导师斯特雷耶的研究方法外，也深受实用主义提倡的科学精神和方法的影响。陶行知在《教育研究法》中指出“欲教育之进步，须先有正当之试验家，施行精密之试验术也明矣”[②]。试验术实施时应注重秉持客观的精神和数目的观念，“注意应用统计法”。因为统计法“是辅助试验的一种利器，也是建设新教育的一种利器”。“假如把这个法则带在身边，受用无穷。”[③]在此精神指导下，陶行知更是亲自进行调查并做出统计，编制了长达五十多页关于中国各级各类教育的统计[④]；在中西理论沟通和融合上，陶行知明确指出“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⑤]，反对不顾本国实际仪型他国的“洋八股”的做法。在这种站在中国本土实践、吸纳西方理论并注重融合和更新、讲求科学研究的精神和实践指导下，陶行知最终批判和更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并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以及“教

① 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序[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2.
② 陶行知. 教育研究法[M]//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室主编.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67－68.
③ 陶行知. 试验教育的实施[M]//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室主编.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111.
④ 陶行知. 中国之教育统计[M]//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室主编.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308－359.
⑤ 陶行知. 试验主义与新教育[M]//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室主编.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94.

学做合一”这一适合我国实践的生活教育学说，构建了本土的教育理论。

（三）后期影响较大的中国教育史著作的比较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史学者经过学术视野的开阔和研究范式的更新，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中国教育史著作，其中颇具代表的为王凤喈的《中国教育史大纲》、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以及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

具体而言，《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开创的教育学术研究范式被后三本著作予以吸收：第一，站在中国立场分析中国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进一步宣告了中国教育史学科建设的成熟和兴盛；第二，均开篇阐述了研究目的、分期、研究对象等教育史学理论问题，尽管一些教育史学理论存在歧义，但是反映出学者教育理论和史学理论不断提升；第三，讲求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后三本如王凤喈的《中国教育史大纲》不仅开篇明示了研究教育史“须用科学的方法”，还指出步骤为：第一步“征集关于教育方面的事实”，第二步“为有系统的排列”以及“用分析与综合的功夫”，第三步“为说明因果的关系”。[①] 该书还注重中西古今比较，既有秦汉与战国的比较，清和宋明等的古今比较，也有中西教育制度的比较。同时，书中还应用数理统计方法对近代学校教育的演进、侨民教育等予以直观展现和分析。陈东原在作《中国教育史》时自称“胡适之先生给我影响最深”[②]，陈氏所作《中国教育史》坚持实证主义教育史观，注重挖掘多方位史料阐明和考证正确的教育事实。可以说，郭氏开启了研究的本土化、中西融合、理论化以及注重科学化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教育史的先河，而后三书则继续予以深化和完善。

当然，后三书在做到遵循现代教育学术范式的基础上，较之郭秉文的著述又有所进步。如陈青之《中国教育史》已经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相关观点，指出教育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出现都是以社会为背景，以经济为基础的。同时，作者在评析教育家时体现了一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如郭秉文完全按照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相关观点评析，对我国学术的更新有巨大价值。可以说，陈青之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将我国教育史的理论根基进一步完善、深化。此外，后三书较之前书在史料挖掘之上功夫更为到位，《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虽注重旁征博引，但主要依靠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而后三本书则较之前者注重史料进一步开阔，注重正史、文集、家训等全面的史料，尤其是陈东原《中国教育史》除引用学者们习以为常引用的正史、经书、典籍等，更将学者忽视的笔记小说、稗闻野史、札记自传、诗书文集等大量引用，如通过《儒林外史》等

① 王凤喈. 中国教育史大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1－2.
② 陈东原. 中国教育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自序.

小说的经典场面，使读者可以触摸过去更为具体生动的教育活动场面。

三、影响弥远：奠定现代中国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自1916年初版，到1922年已经三版。由于该书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范式，自著成和出版时即很受关注，黄炎培为其作序称之为“盖空前之作也”[①]。该书作为哥大师范学院第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第一本学术著作，影响了此后哥大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并被其不断援引。同时，该书还率先开启了中国本土实用主义范式的建立，促使本土教育学研究转向参照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开创了现代教育史学的研究新局面，以及完善了教育史学科体系的构建等。

（一）开启了本土转向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

“范式”一词最早由科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提出，意指某一学术共同体从事研究时所共享和遵从的信仰、价值、理论、技术等的集合。一定意义上，教育学学术共同体采取何种学术范式对学科发展壮大影响至深。回顾我国教育学自20世纪初刚引进之时，国人编写的著作、教材等基本上是参照日本教育学的模仿之作，多没有顾及中国本土教育实际和教育问题等。同时，在传统伦理精神的影响下，教育研究更注重价值和意义的阐明，而少科学理性指导下使教育研究走向精密测验、数理统计等科学化路径。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及其后续的学术论文，较之此前的教育研究而言，已经走出了我国教育学发展初期“拿来主义”的浅显层次，开启了参酌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研究路径，致力于形成适合本土国情的研究和创造。郭氏考察到国内赫尔巴特教育学的不足，看到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和哲学的巨大生命力，成为第一个回国系统宣传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奔走者，将其作为研究的理论根基并在文中不断深化，做到教育研究的理论化和因时制宜的更新化；在借鉴西方的教育理论、学术概念以及学术著作体例时，郭秉文强调站在中国的立场之上考察、反思以及吸收，做到在中西融合基础之上实现教育研究的中国化；在开展研究之后，作者在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倡导科学精神和方法的基础上，应用数理统计、教育调查等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做到教育研究的科学化。

20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在前期奠定基础上，加之国人对日看法等改变，留美学生的持续努力引进以及力邀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目录，9，145－146，绪言，150，序一.

等来华讲学等因素，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开始占据中国教育学界的主导之位。郭秉文开启的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及其中内含的教育学理论化、中国化、科学化更成为教育学者深入探索的核心话题。就教育学理论化而言，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开始展现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中国学者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的理论依据，各种教育刊物如《新教育》《教育杂志》成为宣传阵地，更新国人的教育学理论视野，同时有的教育学者还引进了文化教育学等不断扩充教育学理论；就教育学中国化而言，教育学者进一步明确完全“国化”和完全“西化”是不合理的选择，真正合理的选择是站在中国立场实现中西融合，“注重反映中国的教育事实，反映中国教育的需要，指导人们参加中国的教育实践”①；就教育学科学化而言，20 年代后期，教育学者不仅注重以科学理性指导下应用教育统计、调查等方法进行教育研究，同时，教育统计、教育调查等研究方法也成为许多大学教育系的必修课，且随着教育调查法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许多有关教育调查法的理论和技术问题需要系统回答，一些教育学者还借鉴美国的先进成果，结合中国的国情撰写了一些相关专著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系统化。此外，各种教育测验也如火如荼地在中小学展开。可以说，自郭秉文起，宣告了中国教育学研究依托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而寻求建立适合中国本土的研究范式，中国学者改变了此前理论化不足、西化严重、科学化欠缺等现象，开始积极寻求先进的教育理论、科学理性的精神和方法以及立足本土构建教育学学科不断发展壮大。

（二）开创了现代教育史学理论研究新局面

清末至民初，我国教育史教材或著作多停留在翻译或模仿日本学者的教育史著作，在研究时大多忽视中国本土教育历史的展现或简单依托进化论的观点来予以解释，学术性和中国化意味严重缺乏。郭秉文由于深受美国教育史研究范式以及西方教育学说、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等影响，书中自觉注重引用美国教育史研究范式来拟定学术研究路径，自教育起源等基本理论问题一直贯穿至民国初年。同时，作者还使用了西方的学术概念如“公共教育制度”等来研究中国教育制度史，更在行文分析中运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相关观点透视和分析我国教育制度的优缺点，指明今后的发展路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应用现代全新的教育学术范式对中国教育制度史进行了研究，并影响了此后教育史研究者应用新的教育学术范式研究教育史。《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标志着中国教育史研究改变了引进日本人编写教材的尴尬局面，转而实现了中国人自己研究

① 陈桂生. 略论教育学“中国化”现象[J]. 教育理论与实践，1994(4)：3.

这一历史性转变，也预示了中国教育界美国的影响超过中国这一交替时代的到来。[①]

在郭秉文之后，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开始自觉应用西方教育学术范式进行研究，他们如前述王凤喈、陈青之、陈东原等注重探索教育分期、研究方法等教育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服膺于实证主义、唯物主义等教育史观，其他如舒新城、盛朗西、姜琦、周予同、方与严、杨贤江等也注重在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唯物主义教育史观等指引下，分析和研究中国教育史，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史著作。如杨贤江等在唯物主义教育史观的自觉坚持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形态的理论将教育史分期为先史时期——原始氏族社会的教育、古代教育——奴隶制社会的教育、中世的教育——封建社会的教育、近代的教育——资本主义时期的教育。此种划分改变了按朝代分期等做法，从与教育最基础的影响因素社会入手，是首创之举。[②] 郭秉文注重教育史学基本理论，服膺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等无论被后来学者继承还是抛弃，其开创的注重教育史学基本理论探讨，并融合西方教育学分析框架进行分析研究的现代教育史学研究范式则深深镌刻于后继者心中，虽然彼此理论依据不同，但多走向了重视学术范式、理论、研究方法的预设，凸显了现代教育史学理论的学术个性，并自觉构建属于本土特色的中国教育史学科。

（三）完善了中国现代教育史学科分支体系建设

《现代汉语词典》对学科的解释为如下两种："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如自然科学部门中的物理学、化学，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学、经济学"和"学校教学的科目，如语文、数学、物理、地理、生物等"[③]。任何一门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研究对象的不断细化和分裂，学科体系不断增加和完善，而这也日益完善和巩固本学科的不断发展。中国教育史作为专门研究中国教育历史演变的学科，学科建设要日益走向完善，研究对象应不断细化以不断充实中国教育史的分支学科体系。

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写成之前，国人所作或译述的中国教育史著作或教材，多为照搬日本学者的教育史著作，并没有明确的中国人自己研究的教育历史，且不清晰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对象，故而没有认清中国教育史可以对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实施状况、教育生活等进行研究，更没有从教育的主体、教育

① 蔡振生. 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反思[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3)：37－38.
② 李浩吾. 教育史 ABC[M]. 上海：世界书局，1929：目录.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Z].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1166.

组成要素、教育发生的不同时限等进行专题史研究等。郭秉文不同于之前的教育史研究者，开始将教育制度作为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之一，因此充实了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也扩展了其分支学科体系，促进中国教育史的学科建设更加坚实。自郭秉文之后，中国教育史学者完善学科建设的信念更为坚定。其中努力之一，就是在郭秉文的影响下继续进行中国教育史分支学科体系的构建，并且涌现了一批断代思想史，教育制度进一步细化的教育行政制度、学制、书院制度以及女子教育、科技教育、地方教育、课程等专门史。专门史更是因将此前未曾划入的书院、女子、幼稚教育、课程等纳入其中，出现了第一部近代学制史（陈宝泉）、第一部教育行政制度史（薛人仰）等。这些中国教育史分支学科的著作，力图或从历史的教育制度、思想、实施状况入手，或从教育的组成要素入手，或从教育学知识框架入手，力图做到涵盖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研究领域。同时，中国教育史学者还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新成果和新观念而做到中国教育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新的门类。在郭秉文细化中国教育史分支学科体系的尝试下，中国教育史学者一直自觉地完善学科建设，重要做法之一就在于分支学科体系的构建，又出现了中国教育活动史研究以及中国社会教育史、师范教育史、少数民族教育史等专门史，学科体系更为充盈和成熟。

（四）掀起了中国近代教育史史料整理和研究热潮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虽为研究上古时期到民国时代的教育制度通史，因其实用主义哲学注重实用的精神旨趣，作者更为关注当下教育制度，故而此书的重点放在了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书中将京师同文馆作为近世教育开始之先声，并专列四、五、六编阐述近代教育的演变和发展，第七编分析民国初期公共教育制度的紧要问题。可以说，郭秉文虽治中国教育通史，实则首次将中国近代教育纳入中国教育史研究范畴，也开创了“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局面，引导后来的研究者进入近代教育史这一专门和独立的研究领域，也为后来者研究近代中国教育制度史留存了资料和参考模式。

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引领下，加之当时中国历史学界在二三十年代开展的社会史论战在教育史学界的影响，中国近代教育史更是成为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关注点。除一般的中国教育通史的时间范畴均截至该书成型之时而进行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外，还大量涌现出一批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著述，如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0 年版）、庄俞和贺圣鼎《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 年版）、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 年版）、

卢绍稷《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丁致聘的《中国七十年来教育记事》(南京国立编译馆,1934 年版),还有大量有关教育行政、学制、课程、商人和女子教育、地方教育等专题研究和论著,如陈宝泉《中国近代学制变迁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年版)、姜书阁《中国近代教育制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版)、梁瓯第《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南京正中书局,1936 年版)、马宗荣《最近中国教育行政四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年版)、张敬熙《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 年版)等。其中,最值得一提和最具代表的是舒新城穷十年之功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一系列作品,如《近代中国教育史料》(1928 年版)、《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1929 年版)、《中华民国教育史料》(1931 年版)、《近代中国留学史》(1927 年版)、《中华民国之教育》(1931 年版)、《中国近代教育史稿选存》(1936 年版)等。这些作品充实了近代教育史料,同时也在继承郭秉文对某些近代教育论断基础之上继续理论化,如对中国近代教育起点定于京师同文馆这一郭氏提出的观点进行了认可和强有力证明。可以说,郭秉文对近代教育史的关注开启了中国教育史研究者关注近代、关注当前的研究,也更好地充实了中国教育断代史研究这一分支学科体系的完善。

(五) 构筑了中国教育制度史的研究路径和模式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是我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其研究模式遵循美国 20 世纪初治教育史的范型并按照中国教育制度的特点划分演变阶段,引进西方学术概念并运用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来分析中国教育制度,同时应用教育学知识框架来细化教育制度的研究对象,注重分析各个时期教育制度的特点以及不同时期教育制度的变迁。同时,以中国教育制度为出发点,又参酌教育学知识将不同时期的中国教育制度划分为学制、考试、教育行政、课程等,形成了中国教育制度史的研究模式。这区别于此前引进和翻译日本学者时依托于陈旧的进化论学术范式、理论指导不足、忽视本国教育制度等不足,开创了本土的中国教育制度研究模式和路径。

在郭氏之后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和专史著作中,多延续了郭氏治教育制度史的研究模式,如坚持教育史观和依照教育学知识框架进行细化教育制度,对古代教育研究时分为中央、地方教育机构,科举考试等展开研究。以民国时期至今以来出版的颇具影响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李国均、王炳照总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为例,该书八卷,开篇即谈教育的起源、学校的起源等问题,并且将中国自先秦至 1999 年的中国教育制度依据各时期的教育特点以及朝代更替等进行

阶段划分，各阶段的研究对象以教育学分析框架拟定，对教育制度中的文教政策、各级各类学校、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考试等进行了研究。一定程度上，该书采纳了《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研究模式，既有教育史学基本理论的探讨，教育史观的坚持，又注重根据教育学分析框架划定中国教育制度的研究对象等，予以更加合理更新的是《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对唯物主义史观的坚持，时刻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审视当时教育制度的优缺。此外，由于认识、材料等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在细化的教育制度中加入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同时在分析学校时做到了从目标、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全方位的书写。郭氏研究中国教育制度的模式，既为后续研究者所采纳，而不足之处亦得到了更新和完善。

“不拘一格求新变，但开风气敢为先”。《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较之前的教育学著作、教材而言，开启了中国由借鉴日本教育学的模仿之作转为引入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并结合本土实际的教育学研究和创造的转折点。在他之后，中国教育学者大多没有跳出其开创的基于中国本土而尝试引入西方现代学术范式、学术概念和知识框架等进行研究，并力求中西融合中做到研究的理论化、科学化、本土化。当年，郭秉文哥伦比亚大学的学弟胡适在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时曾自信满满地说道：“我自信，治中国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要算是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科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①]郭秉文是中国本土实用主义学术范式的开山之人，较之胡适更早地开辟了后来学者采纳的学术范式的先驱之路。郭秉文因《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更能自信地宣称，“我是治中国教育制度史的开山之人，也是中国本土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的奠基之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开创的学术范式使后来学者研究教育学都躲不开本书的影响，多按照本书构建的学术范式进行研究”。郭秉文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① 胡适. 整理国故与“打鬼”——给徐浩先生信[M]//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第三集·第一、二卷）.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160－161.

华美协进社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关系及对中国文化的传播*

◎何　勇（联合国中文组，美国华美人文学会）

1926年成立于纽约的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是在美国成立的第一个致力于向美国大众介绍中国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教育文化组织。它与纽约另一所闻名于世的教育机构——哥伦比亚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当时屈指可数的具有东方院系和众多中国留学生的卓越教育机构之一。本文主旨不仅在于探讨华美协进社和哥伦比亚大学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重点介绍几位在两所机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物，还在于通过华美协进社和哥伦比亚大学之间关系及相关重要人物的介绍，评述华美协进社及其介绍中国概况、传播中国文化和促进中美文化教育交流的业绩。

一、华美协进社的创办

创办华美协进社的是四位具有哥伦比亚大学背景的著名人士，他们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著名教育家郭秉文，世界著名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国际教育领袖、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比较教育学教

*［**作者简介**］何勇，男，生于江苏南京，现任联合国中文组组长，美国华美人文学会共同主席，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和南京理工大学等校兼职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本文由郭晶萍译，周棉审校；曾发表于《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授保罗·孟禄(Paul Monroe)。

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博士时是杜威的学生。他于1917年获得博士学位,返回中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1919年,胡适发起一个项目,邀请著名的英美学者来中国作西方思潮方面的演讲,其中最早邀请的是杜威。胡适对杜威非常敬仰,以至于后来将自己的儿子起名为"思杜"。杜威欣然接受邀请。本来他打算在中国只是短期讲学,但由于他在中国的巡回演讲大受欢迎,最后竟延续了三年。在演讲过程中,杜威惊喜地发现,很多大学教师和学生对美国的历史和文化非常熟悉,而且大多数不需要翻译就能听懂他的讲座。与此相反,他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却不容乐观,那里很少有人对中国有充分的了解,会讲汉语的更是寥若晨星。一回到美国,杜威就向孟禄教授提出了这一问题。孟禄教授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此后不久,孟禄就应胡适及其他人的邀请来到中国演讲、考察。杜威和孟禄都迫切感到有必要在美国创办一个文化教育机构,来传播有关中国的基本的、可靠的信息。这种想法被广泛接受,但是需要资金支持,而当时却无经济来源,直到庚子赔款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成立,这一梦想才得以实现。

庚子赔款是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署的条约,主要内容是中国向包括美国在内11个列强1900年义和团运动造成的所谓损失而赔付巨款。1908年,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决定退回庚子赔款的大部分款项余额。退回的赔款根据不同的用途,分为几部分。其中第一笔被用来创建清华奖学金,用以资助大批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其中就包括下文将提到的胡适、郭秉文、孟治和张彭春)。由于第一笔退款的成功落实,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准备建立基金会,于是,乃有庚款的第二次退款。在中美政府的共同协商下,双方同意成立由15人(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理事会,成立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对此基金进行监管。其中美国理事5名,包括杜威、孟禄,尽管基金会的款项应该用于中国,但是杜威和孟禄还是成功地说服其他理事,将其中25 000美元用于在纽约建立一个机构,并将这一机构命名为"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如按字面翻译就是"美国中国学院"),并于1926年5月25日正式开展工作。

二、华美协进社的先驱

新成立的华美协进社首任社长是郭秉文,成员包括杜威和胡适等。

郭秉文(1880—1969),原籍江苏江浦(今南京浦口),生于江苏青浦(今上海

青浦)。1896 年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1908 年赴美留学,1911 年获伍斯特大学理学士学位,后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1914 年获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他当选为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会长。1915 年他回到中国,先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代校长和校长,后任国立东南大学首任校长。1924 年,中国政府任命郭秉文作为监管庚子赔款的理事之一,随后他成为创建华美协进社的先驱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 10 个中国理事之一。

根据华美协进社理事会的规定,华美协进社的职责包括:交流中美教育文化信息,增进中美教育机构之间的联系,如在中美间交换教授与学生,增强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兴趣,协助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等。华美协进社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在创建之初,尚处襁褓中的华美协进社立即成为中国信息的中心,向中国学生提供关于美国教育的咨询,并向对中国教育感兴趣的美国人提供咨询。协进社还协助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申请进入美国大学,提供介绍信和证明信,帮助他们获得实习的机会,办理移民手续,并发放紧急贷款等。

1926 年即华美协进社成立初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华美协进社成功地主办了中国教育展。此次展览吸引了大批参观者,展示了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展现了美国人前所未闻的灿烂的中华文化以及中华文明的演变和现代教育的发展。经世博会评选,中国被授予“全面公共教育发展”大奖,而华美协进社也被授予“独特原创展览”的荣誉奖章。

为实现促进中美教育界密切交流的使命,华美协进社安排美国教授来到中国访问,也邀请中国教授前往美国演讲。应邀前往美国的中国教授有大众教育运动协会主席 Y. C. James Yen 以及燕京大学的 William Hung 教授。为了向美国公众宣传中国,郭秉文和他的团队以及华美协进社推荐的演讲者们,在全美范围进行了巡回演讲。

随着华美协进社所需资金的不断增加,1929 年以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不再能支持华美协进社的运营。为此,郭秉文重组华美协进社,将其性质改变为民间社团。但是,此时他受命返回中国,担任国际贸易局局长。于是,包括杜威和孟禄等组成的委员会,开始物色新的社长。

1930 年,孟治当选为新任社长,宣布就职。理事会成员包括两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成员,一位是国际学院院长孟禄,另一位是政治经济学教授 Edwin R. A. Seligman,孟禄是理事会主席。其余的 12 名理事很有可能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在随后的 40 年里,孟治的名字与华美协进社息息相关。从 1930 年到 1967 年,他任华美协进社社长达 37 年之久。作为孟子嫡传后裔的孟治,曾

就读于著名的南开中学，后来通过严格的考试，从 20 000 名申请人中脱颖而出，以前 50 名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1919 年，他获得了梦寐以求的 5 年奖学金，前往美国留学。他先就读于北卡罗来纳州的 Davidson 学院。两年后，他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读社会学博士。幸运的是，杜威成为他的导师。但这并不是孟治与杜威友谊的开始，因为早在杜威于中国巡回演讲之时，孟治就是他的陪伴和翻译。在哥伦比亚大学，孟治成为中国学生联谊会的发言人，积极参与有关中美交流的活动。1923 年，他当选为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主席。这一协会在当时是拥有 2 500 名会员的美国全国性组织。同时，他还当选为在美国的清华和南开同学会主席。

孟治当选为华美协进社社长后，就将华美协进社重组为一个独立的、自负盈亏的机构，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华美协进社的发展有中兴之功，尤其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他领导下，华美协进社真正成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海外之家。在 20 世纪初，对中国来说，派遣更多的留学生赴美读硕士乃当务之急，而这些学子赴美后也同样迫切需要协助。1933 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任命孟治为中国教育使团驻美荣誉主席，负责选拔清华奖学金留学生赴美，并帮助他们解决在美遇到的困难。为此，孟治走访了美国 46 个州的 288 所高校，会见了 1 700 名留学生。为了使孟治更好地熟悉国内的情况，中国教育部邀请其回国考察从美国学成回国的留学生情况。在 1936—1937 年间，他走访了全国 14 个省，会见了 2 400 名回国的留美生，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国内已成为政府、财政、工业、商业和教育等领域的中坚力量。

1937 年春天，日本即将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决定把一部分款项转移到美国，孟治负责在美通过华美协进社监管这笔奖学金，以使该款项能真正用来资助在美国有困难的留美生。但是，人们很快发现“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提供的款项，对于帮助在美的 2 000 名留学生，不过是杯水车薪。孟治便全力以赴寻找新的资金渠道，包括向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寻求帮助，而罗斯福总统夫人也对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艰难处境深表同情。应孟治邀请，1943 年，罗斯福总统夫人在哥伦比亚大学湖边路上的国际学生公寓，对中国留学生发表了演讲。

到 1940 年代为止，华美协进社已得到中美两国政府的充分信任，成为中美两国交换学者和学生的渠道。截至 1943 年，通过华美协进社所颁发的奖学金高达 2 500 000 美元。

孟治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他通过发起和组织一系列项目，让美国大众了解中国。20世纪初，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大众对中国的了解只限于唐人街，而唐人街当时给人展示的多是阴暗的一面。孟治在重塑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和消除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成见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他是通过主办一些教育项目和活动取得上述成功的。1930年孟治上任后不久，就和杜威门下的另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张彭春[①]，成功邀请著名戏剧家梅兰芳先生来纽约、芝加哥、旧金山和洛杉矶演出。梅兰芳的出色表演使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感受耳目一新，立刻轰动美国。《纽约时报》评论道：

> 美得如同一个中国古色古香的花瓶。你能欣赏到的是绝妙可爱的身姿和戏服，你隐约感受到的不是此刻的喧嚣，而是陌生的古老文明。或许，你也会反思西方的戏剧而有点伤心，因为尽管我们的戏剧形式活泼生动，但它却是死板的，而且缺乏想象力的。梅兰芳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优雅、美丽、华贵、冷静、富有真正的想象力。[②]

孟治在促进美国人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兴趣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不仅仅局限于纽约。1940年代初，华美协进社已经与全美范围的40所文化教育机构建立了联系。在1948年到1961年间，孟治组织的重要中国文化活动，遍及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加州斯托克顿的密尔斯女子大学、纽约科特兰州立师范学院、康涅狄格州的中央大学以及旧金山州立大学。1950年代，孟治先后成功地在新泽西州和美国中西部发展了华美协进社的姊妹社。另一个获得成功的项目是，1955年起华美协进社与马里兰大学合作举办中美文化关系年会，此年会持续举办了10届。1966年发展成为独立的专业机构——“美国中华研究协会”。

孟治还为纽约公立学校的教师设计了若干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入门课程。他还做了甚至连杜威都没能做到的，即于1933年说服纽约市市长Fiorello La-

---

① 张彭春(1892—1957)，天津人，张伯苓胞弟。1908年天津敬业中学(即天津南开中学前身)毕业。1910年考取北京游美预备学务处，作为第二届庚款游美生入读克拉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教育学硕士学位。1916年至1918年任南开学校专门部主任兼代理校长。1919年赴美攻读哲学，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26年任南开中学主任、南开大学教授。1929年赴美，1931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抗日战争开始后，从事国民外交活动。1940年起，正式担任国民政府外交官。1946年联合国大会期间任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中国代表。1947年7月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国代表。1948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世界人权宣言》。1957年逝世于美国新泽西州。

② 《纽约时报》转引自孟治著“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A Sixty—Year Search”(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1981)。

Guardia 同意华美协进社给纽约公立学校的教师提供在职培训，并发学分，从而使华美协进社的教育项目向美国人开放，并成为美国第一家，也是最大的一家为非专业教师提供培训的中国研究机构。

1955 年，孟治在华美协进社组织了一系列的公共讲座，演讲者都是著名的学者。其中具有哥伦比亚大学背景的著名演讲，有胡适的“中国思想的三大奠基者”、L. Carrington Goodrich 的“中国科技贡献”、张彭春的“中国剧院之发展和技巧”和周文中的“中国音乐及意义”等。

为了感谢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对中国留学生的资助，中国教育部在 1940 年代末设立专项奖学金，奖励那些在战时为中国作出贡献的美国人，他们可以在中国或者美国学习中国文化 3 年。受教育部委托，华美协进社负责实施这一项目，孟治负责委员会成员的选择，其他成员还有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以及 L. Carrington Goodrich 教授。

三、华美协进社的继任者

1967 年，年高德劭的孟治退休，他的继任者多数是有哥伦比亚大学教育背景的学者。自 1980 年代以来，负责华美协进社教育项目的人都有哥伦比亚大学教育背景。包括 1982—1985 年的教育项目负责人 Marsha Wagner，1986—1987 年的教育项目负责人 Morris Rossabi 和 1988—2008 年的教育项目负责人 Nancy Jervis。

Marsha Wagner 获得哥大中文及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哥大任副教授，教授中国文学。她于 1982 年加盟华美协进社，担任副社长及中国研究会主任。1985 年她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首任 C. V. Starr 东亚图书馆馆长，后来成为监察员。①

Morris Rossabi 于 1970 年获哥大中国历史博士学位，1986 年任华美协进社中国研究院院长。目前（指 2004 年，编者注）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尽管他回到了哥大，但他仍积极参与华美协进社的“教育中国”项目工作，书写课程大纲并为中学教师提供资料。2005 年，华美协进社在哥伦比亚大学组织暑期培训班，主题是中国及伊斯兰世界的文化，Rossabi 教授作为主旨发言人。②

Nancy Jervis 于 1987 年获哥大人类学博士学位。在哥大求学期间，她师从

① Marsha Wagner 现已退休。
② Morris Rossabi，现在还是哥大的兼职教授。

Morton Fried 教授——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而且是最后一个在 1949 年前从事中国田野调查的学者。有趣的是，Jervis 还是 1949 年以后到中国做田野调查最早的学者之一。从 1972 年起，她在中国河南做了多年的调查研究。自从 1988 年加入华美协进社，Jervis 一直担任副社长兼项目主任[①]，主要分管华美协进社的中国研究院。该院建于 1933 年，是美国历史最久的中国研究中心，70 000 人曾参加过其培训。中国研究院早期主要为公立学校提供在职培训，现在研究院虽然仍在为教师开设课程和举办研讨会，但也向公众开设一些中国特色文化的课程，如中国语言、历史、文化、饮食、绘画、书法、音乐、太极拳，还有关于艺术、文学、商业、旅游和当代中国社会的戏剧、电影的讲座和展览。近年来，中国研究院已经发展成为包括公众项目、语言项目和教育项目三个分支机构，以针对不同的受众。

1998 年以来，华美协进社开办了中国概况的系列讲座，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其中关于历史、哲学、传统和中国文学等四个概况讲座，构成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系列讲座，继承发扬了华美协进社推介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悠久传统，吸引了很多美国听众，仅 1999—2000 年，听众就多达 500 人。演讲嘉宾中常有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教授，如人类学系的孔迈隆（Myron Cohen）教授，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和 Madeleine Zelin 教授。2000 年王德威教授还在华美协进社主持了一场重要的活动，即当时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裔作家高行健作品的讨论会。在华美协进社的公众项目里做讲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名人还有：Wm. Theodore de Bary 教授，John Mitchell Mason 教授，政治学教授 Andrew Nathan，中国法学教授 R. Randle Edwards，新闻学教授 Steve Ross，以及哥大东亚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 James D. Seymour。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批卓越的哥伦比亚学者获得了华美协进社的奖章和殊荣，其中包括核物理学家吴健雄博士、艺术学院副院长周文中教授、著名作曲家谭盾等。

中国在历史和当代事务中的地位广受学者的关注。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华美协进社扩展了针对学校老师的“教育中国”项目，这个项目提供在职培训课程、暑期教师进修班、中国考察，并开发了教师培训课程。2001 年，华美协进社在哥伦比亚大学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与世界的暑期培训，2005 年将会在哥大继续举办这一活动。[②]

华美协进社的语言培训项目是美国大学以外的最大语言项目之一。它从

① Nancy Jervis 现在是独立中国研究专家，受聘于不同机构。
② 这个项目一直延续至今。

1930年代的只有几个班的课程，发展为今天拥有400名学生的成熟项目。华美协进社的语言部也建立了一个高水平、敬业的教师团队，团队里有许多或者曾经是哥大的老师，或者是目前在哥大任教的老师。华美协进社《1999—2000的年度报告》这样写道：

> 华美协进社有一个文化名人，他的名字叫汪班。汪老师教授中国语言、书法、中国传统文学、戏剧，以及麻将和中国象棋。①

汪班教授是华美协进社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其成就可能也是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他轻松的教学风格、认真的态度、互动的方法，使学生们虽坐在教室里，对中国文化却有身临其境的感受。因为具备丰富的中国语言文学知识，汪班已成为纽约的一块文化品牌。在他18年华美协进社的教学生涯中，他代表华美协进社在美国许多的大学和博物馆演讲，向成千上万的听众展示辉煌的中华文化，让他们如醉如痴。汪班原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员。他分别于1974—1975年和1987—1991年任教于东亚系。除了作为高级讲员在华美协进社教授语言文化外，他也经常赴哥伦比亚大学演讲。近年来，他在哥大做了关于中国古典戏剧和书法等方面的讲座，总是场场爆满。华美协进社的兼职教师中有哥大背景的还有张晓丹、王海龙和赵瑞雪等人。

四、来自华美协进社的哥大人

华美协进社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关系不只是单向的。很多华美协进社的成员也满怀对中国研究的热情来到哥大工作，最近的两个例子是Torrey Whitman和Heidi Johnson。

Torrey Whitman在1997到2002年间任华美协进社社长，他先在斯坦福大学获中文硕士学位，随后，在牛津大学师从David Hawkes及其他导师，主修中国文学。1970年代，Whitman在哥大师范学院做博士研究，并获得哥大法学院的法律学位。2003年以来，他出任哥大Weatherhead东亚研究所的执行所长，也是本次会议②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在华美协进社社长任期内，Whitman亲自主持了华美协进社的装修重建工程，把它建设得如同精致的苏州园林，奇石、流

① 《1999—2000年度报告》，这是华美协进社2000年编纂发布的年度报告，藏于社内。
② 指2004年9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立250周年“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的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

水、植被和假山，再现了理想的中国景色。这个花园似的建筑，是曼哈顿第一个真正的户外中国传统园林。它宛如一幅山水画，让访客徜徉在美妙、精致的自然之中。

2000 年，Whitman 带领一个由联邦政府、州、市和学区分管人文历史学科的教育官员组成的考察团到中国访问。在当年 5 月的两周中，17 位来自纽约教育局不同部门的教育决策者，包括教材出版商 Prentice Hall，走遍中国城乡，在讲座和切身体会中去了解现代和传统的中国。考察的结果是令人振奋的，正如纽约州教育局的 Jo Ann Larson 所说：

> 我们曾在社会学科（类似国内的历史课）的核心课程的增减问题上难以抉择，但是这次旅行加强了我们的信心，我们需要在课程里减少西方文化的内容，而增添更多异国文化的内容。

Heidi Johnson 是又一个来自华美协进社的工作人员。她在 1997—2002 年间就职于华美协进社，首先任社长助理，然后被提拔为政府和基金支持部主管。在这个岗位上，她成功地为华美协进社从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Blakemore 基金会、Robert Sterling Clark 基金会、Fidelity 基金会以及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等机构，申请到大笔资金。她现任哥大东亚研究所东亚课程扩展项目（ExEAS）的经理，负责该项目的全面工作。这一项目是 Freeman 基金会资助的，其初衷是要开发新的课程和教学材料，把东亚研究和主题研究、跨国度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结合起来。她还负责协调一些研讨会和扩展东亚研究所课程的发展协作，目前有 20 多个博士后、哥大和纽约其他地区机构的教授参与此项目。另外，Heidi Johnson 还管理扩展东亚研究所的博士后奖学金和本科生实习项目。

五、回归传统

在此，我也不得不提及一下本人与哥伦比亚大学和华美协进社的关系。

和 Nancy Jervis 一样，我在哥大人类学系学习，先是师从 Morton Fried 教授，在他去世后，我师从 Myron Cohen 教授。学习期间，我协助 Cohen 教授做了一项关于中国家庭的 3 年的研究课题。在课题成员中，还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学者以及和我同样关注中国的一些研究生同学。1992 年我获得博士学位。饶有趣味的是，我是在哥大哲学系大楼里杜威教授原先用过的办公室里做了我的博

士论文答辩的，而当时没有想到日后我会进入他60年前帮助创立的华美协进社工作。

从哥大毕业后，我换了好几个工作，最后在1997年来到华美协进社任教，并于2000年成为华美协进社语言部的主任。在我任期内，华美协进社的语言项目每学期的学生人数大量增加，突破400人。这不仅表明公众学习汉语兴趣的剧增，也说明我们敬业的教师团队吸引了纽约各界的学生。

从1926年成立以来，华美协进社已经成为纽约地区中国知识分子的磁石。旅美的著名学者如胡适曾是华美协进社的重要讲员，一些从中国来的作家包括老舍，也曾来到华美协进社作报告。讲演的语言有时是英语，更多时候是汉语。这一传统，几年前在乔治湖的银湾通过暑期讲学班的方式得以保持，如今获得了重生并注入新的活力。因为从2001年1月起，我们每周六都举办和中国文化有关的讲座。每周都有一些著名的作家、演员、收藏家以及其他领域的杰出人才，来用汉语(有时是双语)进行演讲。其中许多演讲者有哥大背景，如王念祖、夏志清、Shirley Mow和周洪宇。讲座吸引了众多不同背景的讲英语和讲汉语的听众，其中有许多是哥大的学生。在3年的时间里，我们组织了100多场演讲，主题范围广泛，包括诗歌、小说、艺术、戏剧、历史、语言、考古、电影和宗教。①

系列讲座对于纽约迅速发展的中国社区有三点重要作用：一是使留学生和移民保持与祖国文化的联系；二是给中国学者一个发表爱国情怀的讲坛；三是给中国移民社区以及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通过汉语聆听专家关于最新的现代文化讲座。2001年以来，我亲自主持了系列讲座。为满足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和移民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华美协进社还于2003年开始发起组织了人文学会，作为一个主要负责举办中国讲座和活动的机构。人文学会目前由我和汪班教授共任主席。

六、展望未来

再过两年，华美协进社就要庆祝它的80寿辰了。回溯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华美协进社在20世纪成立之初，就与哥伦比亚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美协进社的成立肇始于两位资深的哥大教授杜威和孟禄，而其早期活动则多赖于他们的学生郭秉文和胡适。之后，华美协进社的组织和管理基本由具有哥伦比亚大学背景的人掌握。多年来，华美协进社的使命有了些许改变，目前的重心在

① 截至2013年，华美协进社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已经增加到300余场。

于中国教育，最近的目标似乎回到了原点，即交换学者，而人文学会则关注中国学者的讲座。哥伦比亚大学有着丰富的教育、人文和学术资源，华美协进社不曾停止奋进的脚步，我们希望两个机构的合作传统将继续发扬，并寻求共同目标，促进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人类长远的和谐与福祉共同努力。

郭秉文与陶行知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互动与选择*

◎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郭秉文和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一对奇妙的组合。这对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同门校友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为舞台,在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相互配合,曾取得当时中国教育上登峰造极的成就。

一、郭秉文与陶行知的人生交集

郭秉文和陶行知的人生交集始于何时,尚缺少可靠资料证实。郭秉文1908年赴美留学,陶行知则在1908年前尚未到南京,所以直到1914年前他俩不会有交往。

一种猜想是他俩在1914年8月第一次见面或交往。当时陶行知正准备从南京出发去美国留学,而郭秉文则是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到南京帮助江谦筹办南高师。但是,由于陶行知1914年8月15日从上海招商局码头登上"中国号"邮船赴美留学;现有文献只能确认郭秉文正是1914年8月回国,但不能

*[作者简介]储朝晖(1964—),男,安徽岳西人,教育学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理事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教育史研究》副主编。本文曾发表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确定是8月的哪一天回国[①]。所以他俩此时直接见面的猜想证据不足。

尽管郭秉文与陶行知在1914年8月直接见面的依据不足，但在这一年他们的人生出现交集的证据是充分的。成为这一交集的第一个媒介是当时任江苏教育会副会长的黄炎培。1914年6月22日，金陵大学举行毕业典礼，陶行知在该校当年20名毕业生中以第一名毕业于金陵大学文科哲学心理系，他以优秀毕业生的资格被推选在毕业典礼上宣读论文，江苏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应邀参加毕业典礼并授中文文凭，陶行知面赠所编《金陵光》，自此陶、黄二位结为深交，共同为教育事业奋斗。1946年黄炎培在陶逝世后所写的《哭陶行知先生》一诗中，首句即称颂陶为“秀绝金陵第一声”。

而在这一年回国的参与江谦筹备南高师的郭秉文不与同在南京城教育圈的黄炎培交往的可能性实在太小。郭秉文回国后，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191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除了英文原作191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时导师孟禄所作序外，还加上了黄炎培所作的序，可以作为侧证。

成为这一交集的第二个媒介就是江谦。江谦与陶行知为徽州小同乡，1913年陶行知与汪纯宜结婚，陶行知父亲陶位朝在南京汇文女校任教，全家迁至南京，与南京教育圈内的江谦交往在情理之中。陶行知1946年与柳湜说他搞生活教育的第一位先生是张謇[②]，而江谦就于1902年受张謇之邀担任通州师范学堂堂长，有可能是陶行知知晓张謇的早期导引；另一种可能是张謇与黄炎培当时分任江苏教育会正副会长，从这条线上也说明郭陶之间交集的出现。又正是在1914年江谦找到郭秉文和郭的同乡熟人留美教育学士陈蓉帮助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所以，把郭秉文与陶行知的人生交集起点定在1914年是能成立的。此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美学生会、中国科学社都成为他俩人生交集的媒介。1915年秋，陶行知从伊利诺斯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有无受曾在哥大师范学院就学的郭秉文影响，尚无确切证据。

1917年9月，陶行知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世人仅讲到陶行知的这一工作选择与郭秉文有关，就本人长期研究陶行知的直觉而言，多少还与江谦有关，只需查一下南高东大的徽州人任职情况便可了然。

从此，郭秉文与陶行知有了最为直接、密切的交往，郭秉文成为陶行知在哥

① 冒荣. 至平至善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34.
②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第4卷[C].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805.

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同门学长之外，又成为顶头上司。在此后郭秉文与陶行知有了一段同步升迁的奇妙缘分：1918 年 3 月 21 日，江谦因病休养，原教务主任郭秉文代理校长后，陶行知即代理教务主任；1919 年 9 月 1 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后，郭秉文聘陶行知任教务主任，直到 1922 年 2 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上海开董事会会议上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还维持了一段南北两地奔波的时间，1923 年多次向郭秉文请求，才辞去教育系主任。这 5 年多是郭与陶深层交往的一段时光。他俩精诚合作，默契配合，完成南高和东大的多项创举。

此后，直到 1925 年郭秉文被免除东南大学校长的一段时间内，郭与陶都有较频繁的交往。陶行知还在 1925 年 7 月 28 日，被聘为郭秉文任董事长（1924—1929 年）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部执行秘书，掌管美国庚款分配工作。依据能见到的史料，1926 年郭秉文去美国后，他俩的交往日少，除陶行知主持编辑的《新教育评论》1927 年第 3 卷第 9 期发表郭秉文写的《费城博览会中国展览第三次报告》外，未见其他交往记录。一直到 1946 年陶行知先于郭秉文离开人世，在多次影响甚大的追悼仪式中，却未见到当时已在美国的郭秉文的悼念文字。

二、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互动

与一般的同事不同，郭秉文与陶行知都致力于推动中国教育融入世界教育现代化的潮流，并为此相互支持，合力同心。

郭秉文在教育上的业绩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明了并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教育历史；二是利用欧美教育资源变革中国教育；三是依据他的教育理念创制东南大学。在这三项中，后两项都有陶行知的参与。

准确地说，郭秉文所写《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是第一本以非中国传统视角，用英文简约介绍中国教育体制沿革的书。郭秉文之所以选定这个选题，与当时“世人关注中国新教育时代到来的兴致显现”直接相关，为满足外界想了解中国当时正在发生的变革是什么以及它的历代教育制度渊源的需求，他没有选定美国当时的新教育思潮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而是选定以中国人的立场向英语世界的读者系统清晰地梳理中国教育复杂的历史。

陶行知则是一回国便通过讲课、写文章介绍世界教育发展的新知和新思潮，他曾写文介绍过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福禄贝尔、詹姆斯、杜威、桑代克、克伯

屈、伯克赫斯特等人的教育思想，介绍过活动教授的课堂、杜威的教育学说、普鲁士的教育改革等。进而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站在中国立场上对整个世界新教育运动进行呼应。

陶行知与郭秉文合力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件事上：

1. 促成杜威来华讲学

郭秉文与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期间都听过当时美国进步教育运动的思想家和领军人物杜威的课，并有频繁接触；都是孟禄等多位哥伦比亚大学教师的学生，直接感受到这股世界教育前进的潮流，回国后自然试图将这股思潮体现在他们对中国教育的变革之中。

1919 年 3 月 12 日，陶行知写信给胡适道："三个礼拜前听说杜威先生到了日本，要在东京帝国大学充当交换教员，当头一棒，我觉得又惊又喜。"惊的是"我两三年后所要做的事体，倒日本先做去了。"喜的是"杜威先生既到东方，必定能帮助东方的人建设新教育，而他的学说也必定从此传得广些。且日本和中国相隔很近，或者暑假的时候可以请先生到中国来玩玩，否则就到日本去看看他也是好的"①。于是相约南北统一起来写信邀请杜威来华讲学，他与校长郭秉文当时就讨论决定由郭即将去日本的时候当面邀请。

郭秉文在日本向杜威提出邀请后，杜威欣然答应，并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教授前日来看我，他们问我能否在中国住一年，做演讲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帖了，我也愿意做。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工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②

1919 年 3 月 31 日，陶行知再次给胡适写信说接到郭秉文从日本的来信，"郭先生请他到中国来，他就一口答应……杜威先生曾发表他的意思说，除今年之外，还愿意留中国一年。"③商讨如何安排好这一年的接待。后决定以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五个文教团体的名义联合邀请杜威来华讲学。

1919 年 4 月 30 日午后，杜威与夫人阿丽丝和女儿罗茜抵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代表各团体前往欢迎。此后由陶行知、胡适、凌冰等分别陪同杜威至各地讲学并分担口译。杜威夫妇对接着发生的五四学生运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一边讲学，一边要看一个究竟。哥伦比亚大学准予杜威教授一年的假，以后又

①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 · 第 8 卷[C].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14.
② 元青. 杜威与中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5.
③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 · 第 8 卷[C].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14.

将假期延长到两年，他在中国的时间总共是两年又两个月，从 1919 年 5 月到 1921 年 7 月。足迹遍及中国当时 22 省中的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江西、湖北、湖南、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 11 省以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当时经各报刊全文刊登的讲词总共有 58 篇，后来结集出版成《杜威五种长期演讲录》单行本大量发行，在 1921 年杜威离开中国以前，已经出版到第十版。以后几十年也不断再版，具体内容包括：近代教育的趋势三讲、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十六讲、教育哲学十六讲（京）、伦理学十五讲、思想的派别八讲、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三讲、现代的三位哲学家（詹姆士 William James，伯格森 Henri Bergson 和罗素 Bertrand Russell）三讲。1920 年 4 月 6 日起，杜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的教育哲学十讲（宁）、哲学史十讲、试验的论理学三讲，历时 3 个月，由陶行知主持并翻译。这次讲学在中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 1922 年适应儿童个性发展的新学制确立，渗透到中国文学、语言、历史、哲学，乃至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影响深刻且久远。胡适在杜威回美国的时候说："我敢预定：杜威先生虽去，他的影响仍旧永永存在，将来还要开更灿烂的花，结更丰盛的果！"①

2. 协力办好中华教育改进社

为了推动教育变革，1918 年 12 月 22 日，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联合发起组建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成立大会于 22 日在江苏省教育会召开，陶行知代表南高师参与组建，并任该社机关刊物《新教育》月刊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编辑代表及该刊专任师范教育审稿，1919 年 1 月 16 日经教育部备案更名为新教育共进社。

1921 年 7 月，陶行知与范源濂、蔡元培、张伯苓、严修、袁希涛等在北京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推范源濂为社长，蔡元培为副社长，决定聘请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华调查科学教育实际情况，该社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孟禄的实际教育调查。1921 年 9 月 5 日陶行知与黄炎培、郭秉文一道到上海码头欢迎保罗·孟禄来中国作科学教育之调查与讲学，对推动中国科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孟禄到中国的另一重要成果是促使并见证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成立。1921 年 12 月中旬，实际教育调查社邀孟禄博士开讨论会。16 日，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的当事人都自动要把三个机关合并为一，三社公推陈宝泉、李建勋、马叙伦、朱经农、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章程起草员。21 日，三社代表联合会讨论，当即通过简章草案。12 月 19 至 26 日，实际教育调查

① 胡适. 杜威先生与中国[J].《东方杂志》第 18 卷第 13 号，1921－7－10.

社在调查了九省教育之后，邀集各地教育界代表到京开会讨论改进教育方案，并研究改进办法，包括教育总长、各省教育行政负责人、大学校长和特邀代表共一千余人出席会议，并与孟禄交换意见。陶行知代表中华教育改进社主持讨论会，到会社会团体于23日组建中华教育改进社，通过社章，成立董事会，推蔡孑民（元培）、熊希龄、张伯苓、汪兆铭、黄炎培、郭秉文、李建勋、袁希涛和范源濂等九人为董事，杜威、梁启超、严修、孟禄、张謇、张一麟、李石曾为名誉董事，董事长由范源濂担任（1922年7月范出国考察，董事由梁启超接任，蔡孑民任董事长）。公决请董事会聘定主任干事后三社事业即行归并。23日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会也是孟禄与中国教育界同仁的饯别会。1922年1月7日孟禄离开中国，陶行知与黄炎培、郭秉文一起到上海码头送别。孟禄在中国的活动由陶行知、胡适、凌冰编辑成《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一书于1922年4月出版。

中华教育改进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陶行知宣布中华教育改进社诞生时，提出教育革新运动须具开辟与试验精神。1922年2月7至14日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上海的董事会会议上，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并通过了他与黄炎培起草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筹划全国教育委员会简章》，在暑假前先行筹备，筹备期内临时事务所暂设在南京东南大学。4月12日，中华教育改进社总事务所在北京正式成立。从此，中国近代第一个集教育研究、调查、编辑、推广四项任务为一身的机构开始了真正运转，陶行知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也从南京到北京往返奔波了一年多，大约三分之一精力放在南高师，三分之二的精力放在改进社。直到1923年7月东南大学才同意他辞去学校之职，保留教授名义，给予无薪长假，陶才举家迁往北京，全力从事社务。

中华教育改进社为中国新教育建立了比较坚实的研究与组织基础，是当时中国最为前沿的教育家群体展现才干共同合作的舞台，因董事会和董事长不驻会办公，实际上是主任干事陶行知当家。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这几位崭露头角的教育改革少壮派与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袁希涛、张伯苓等旨在革新的元老派汇聚成一股力量，协力推进中国教育除旧革新，演奏出中国从泛义的新教育向目标更为明确的平民教育、科学教育转化的非凡乐章。

1924年3月，改进社确定第三届年会于7月3至9日在南京东南大学召开，这次年会增加了与东南大学教育科合办全国教育展览，向包括南洋华侨学校在内的全国学校征集展品。这次年会上力谋收回教育权、促进蒙古教育、推进平民教育成为重要的议题，陶行知、范静生、章太炎、马寅初等作学术演讲。陶行知的

主任干事任期届满，6日董事会议决请陶行知连任。全国教育展览会成为这届年会的看点，展览由徐则凌（养秋）、陶行知任会长，经费由中华教育改进社担负，展览内容分教育行政以及高等、中等、师范、小学、幼稚、乡村、职业、农业、科学教育，教会教育、青年会教育，蒙古、日本、英美、南洋教育，特殊（聋盲哑）教育、儿童玩具、教育经费、中等学校心理仪器、教育书报、学校训育、教育统计、卫生教育、美育、教科书、学校建筑、图书馆教育、童子军等计30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教育展览，使与会人士用最短时间就近参观全国教育状况，获比较观摩之益。10日，改进社董事讨论推举出席下届世界教育会议代表，议决推蔡元培、郭秉文、张伯苓、陶行知四人为代表，所需旅费请政府补助。

1922年9月10日，陶行知主持在南京邀集东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多人与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麦柯尔讨论智力与教育测验计划的进行；18日，在北京召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有关教授学者，与麦柯尔讨论智力与教育测绘计划的进行，商定测验地点以北京、南京为南北两大中心，麦柯尔博士开展心理测验等24种测验的编造。

改进社一建立，筹集经费就成为一件难事。以1922年为例，当年社费实收21 000元。有特别捐黎元洪总统捐洋1 000元，教育部捐洋1 000元，周子庚捐洋1 000元，许世英及安徽省署同仁捐洋1 200元，朱其慧捐洋5 000元（专为发展女子教育之用），孟禄捐金洋4 000元，洛氏基金会捐金洋5 000元，国际教育会捐金洋3 000元，司徒雷登捐金洋1 000元。此外，交通部发各路火车免票，通火车之地社员都可享受；招商局的轮船折价，使能通轮船区域的代表都可享受。然而，要将这些费收起来却不容易，东南大学在交社费上就遇到麻烦，陶行知不得不于10月28日和11月14日两次写信给校长郭秉文，“改进社社费，万万不能以千二百元了事。他校均照三社社费总数担任，本校何能独异？若因此牵动他校援例，本校岂能免于破坏改进社之责言。孟禄先生尚如此尽力，吾辈自谋，岂能后于外国之师友乎？事关学校信用，务请嘱行政委员会诸公兼筹并顾，重加考虑。且相差不过一千二百元，只需大家出点力，是不难弥补的。吾校在这个团体中，万万不能失信。”[①]这样的言词足以见证东南大学与改进社的关系，也足以见证陶行知与郭秉文的“吾辈”关系。在改进社基础上建立平民教育促进会后，陶行知还热心向胡适、郭秉文、郑晓沧、推士等多位大学教授以及他们夫人、他所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写信推广连环教学法，附寄《平民千字课》，鼓励推行女子平民教育。

①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第8卷[C].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31，238.

改进社1926年6月参加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教育博览会，展品获得一大奖[①]，郭秉文电告："此次教育产品参展成功，实为我国教育在国际上之荣誉。"[②]

3. 积极参与世界教育大会

陶行知与郭秉文还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活动传播世界新教育。1922年3月，鉴于1923年6月28日至7月6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世界教育联合会成立大会、世界成人教育大会，陶行知对中国参与国际教育运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批评政府"不早些从事准备，那世界真要以为中国没有教育了。世界以为中国没有教育犹事小，若中国真无教育可说，那就真要惭愧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有人办教育，一方面还要有人分门别类地观察、调查、研究各种教育之消长和真相，报告国人，使彼此有所参考。"[③]

为了积极参与国际教育会议，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着手准备材料；2月，陶行知即着手撰写英文版《中华教育改进社之历史、组织及事业》作为会议资料；4月25日，会议讨论中国代表的应对方案等问题，会议决议推举名人分途担任具体事项，其中：朱经农、陶行知、郑芝园、刘廷芳、孙世庆、徐则陵、程伯庐研究教科书问题，张伯苓、郭秉文、胡适之、秦景阳研究互换教师及免费学额问题。议决定推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郭秉文、张伯苓、胡适、汪兆铭、陶行知八人出席会议。定于6月4日由沪乘船起程，并预定于8月20日以前回京在第二届年会报告，后因陶行知要筹备第二届年会而未赴会。

郭秉文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如期出席世界教育会议，中华教育改进社编撰系列丛书作为出席世界教育大会材料，其中有郭秉文著单行本《民国十一年之高等教育》和《中国近代教育之进步》。《新教育》1923年第6卷第2期发表《民国十一年之高等教育》。《申报》馆编印《最近之五十年》内有郭文《五十年来中国之高等教育》，《教育与人生》1923年第5期发表郭所写《太平洋各国大学如何最能增进国家了解与友谊》。

中国代表向大会提交的材料、发言与提案引起了与会代表的高度关注，代表团领队、改进社董事郭秉文当选为世界教育会议副会长，并且成功争取到了第二届年会在中国举办的机会。尽管后来的实际开会地点移至加拿大，但当时中国受关注的情况可见一斑。在这届年会上，还表决并一致通过了由国际教育委员会议决的关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加入世界教育联合会的提案。

---

① 美国展览会我国教育得大奖[N]. 申报，1927－09－26.
② 郭秉文. 费城博览会中国展览第三次报告[J]，新教育评论，1927(03)：9.
③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第1卷[C].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461.

此后郭秉文连续3次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3次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陶行知此后又被中华教育改进社诸董事推荐出席第二、三届世界教育大会，虽都因故未能出席，但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身份与东南大学教授程其保共同撰写了介绍中国教育情况的英文报告《民国十三年的中国教育状况》提交给第二届大会，该报告收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教育所所编《1924年世界教育》。

正是由于郭秉文的这些努力，才产生胡适所说的结果："1920年代在各国人士眼睛里，中国外交界上只有顾维钧、施肇基，教育界上只有郭秉文。"①

4. 实现男女同校

1919年9月胡适写《大学开女禁问题》倡大学招收女生。12月17日，陶行知依据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最不发达，中等学校毕业后女子几无上进之路的实际，在校务会议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提出南高师的"各科功课，有宜女子旁听者，可否通融办理，容其旁听，遂其志愿"，并提出具体办法，"自第二学期起实行"。该案1920年1月14日临时校务会议议决组织委员会讨论，4月7日下午南高师第10次校务委员会专门讨论此案，张子高代表招收女生委员会将委员议决案说明理由后由主席郭秉文将原案逐项宣付讨论，陶行知报告了赴京与教育部接洽的情况："兼收女生问题宜注重三点：一、须规定女生入学资格以期程度相当；二、须备有宿舍使学生起居妥善；三、须有相当女职员负指导责任。如筹划妥当，暂行试办。"报告毕，主席请大家表决，多数赞成，当即决议请招收女生委员会草拟下学年兼收女生详细办法，再交校务会议讨论②。考虑到这一举措可能遇到的阻力，当时保守的人斥之为洪水猛兽，为造声势，郭秉文、陶行知与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人商定，北京大学和南高师还是相约南北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试行男女同学。4月21日第11次校务会议决招收180名女生。但受各种因素的限制，1920年夏南高师正式招收8名女生，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高校中第一个招收女生的高等学校，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

南高师虽然这样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并未完全转变过来。1921年11月18日，陶行知积极支持并参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辩论"中等学校应否男女同学"问题。他们回顾了自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得风气之先，开放女禁以来，南京高等师范附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江苏第一中学高二班、广州执信中学、湖南岳云中学等校实行男女同学后，社会上研究并呼吁中学男女同学

① 胡适.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M]. 中华书局，1979：234.
②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卷[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85－87.

的人一天天多起来了。辩论会就中学男女生在生理上、心理上、智育上、体育上、德育上、理论上、事实上详加讨论，认为中学教育应和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一样，实行男女同学，教育机会均等。

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对男女同学不再限制，但因保守势力反对，中学男女同学还是社会吞不下去的一根鱼刺。为此，陶行知1923年1月在《新教育》第6卷第1期发表《为反对中学男女同学的进言》，认为在社会无法大量设立女子中学的情况下，中学男女同学势在必行，并以求精神食粮为喻反问那些反对者："既不能为女子另外开饭，又不许男女同桌吃饭，是不是要看他们饿死呢?"①

5. 戮力南高东南大学事业

哥伦比亚大学在管理上有一套较系统体现民主精神的管理规范，这些在郭秉文与陶行知变革南高与东南大学的过程中发挥了深刻的作用，引导他们创立现代学校。

1918年3月江谦病退，郭秉文任南京高师代理校长，1919年9月正式继任校长，刘伯明为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陶行知为教务长兼教育科主任，对南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南京高师成为南方最高学府。1920年4月7日，郭秉文在校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经过讨论，一致赞成。9月联名上书教育部"拟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设南京大学，以宏造就"②；12月经北洋政府国务会议正式通过并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在南京高师成立东南大学筹备处；此后以南京高师范学校之教育、农、工、商四个专修科改归国立东南大学，1921年10月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始上课，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各本科仍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办理。南高自1921年起不再招生，俟其学生全部毕业后即并入东大。1922年12月，郭秉文校长呈文教育部提出，南高师与东南大学设在一处，"职员、教员两校共同延聘，校舍设备亦两校共同应用，名虽两校，实则一校"，提议南高并入东大，教育部对此未表异议；1923年7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牌撤去。数年间，南高东大广揽英才，其中延揽了五十余位学有所成的留学生，所聘教授皆一时之选，每一位都精通自己所教的学科，完成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陶行知在南高师曾担任工读协助研究、学生自治和改良考试等委员会主任，担任暑期学校和女生研究等委员会委员。他主持教务工作后，率先在中国实行学分制、选科制，将所习课程分为必修和任选两类，提倡各系科参观学习以扩大

①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第1卷[C].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525.
②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卷[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2.

知识面；特聘美国专家麦克乐任体育主任，开展各项球赛和各项竞赛，支持戏剧研究会到校外演出新剧；组织学术演讲。为使学生对南高师办学方针全面准确理解，约请学监刘伯明讲德育大纲，体育主任麦克乐讲体育大纲，陶自己讲智育大纲。

陶行知发现所有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这不是要把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都变成书呆子和字纸篓吗？就认定有改革的必要，在南高师的一次校务会议上，陶行知讲述了这番道理，公开提出要用“教学法”代替“教授法”。然而他的提议遭到了全体出席会议人员的抵制和反对。陶行知坚持己见，毫不退让，与这些反对者辩论了两个多小时，但结果还是被校方拒绝。他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的名义，以示不妥协。1919 年 2 月 24 日，他应主编蒋梦麟之约，在《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发表《教学合一》一文，批判教学分离、重教太过的流弊，阐明教学合一理念。五月中旬，学校受学生运动的冲击和影响，南高师的教授们无暇坚持，陶行知排课时将南高师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均改为“教学法”，为改革中国旧教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陶行知还与郭秉文一道提倡学生自治。陶行知曾大胆提出由学生自治委员会替代学监，1919 年 10 月，他在《新教育》第 2 卷第 2 期发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认为德育注重自治与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是自动主义的三个部分，学生自治是学生结起团体来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续，能养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有自立立法、执法、司法的意思。自治重要性在于“养成服从的人民，必须用专制的方法；养成共和的人民，必须用自治的方法”，“自治可以养成我们对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才力”，可为修身伦理的实验；“学生自己共同所立的法，比学校里所立的更加尽情，更加易行，而这种法律的力量也更加深入人心”，能适应学生之需要；学生自治还能辅助风纪之进步，促进学生经验之发展。要避免将学生自治当作争权的器具，不可误作治人，不是与学校对峙，不可闹意气，因此应有相应的范围和标准。

在 1920 年到 1924 年间，陶行知写了十余封给郭秉文、刘伯明和东南大学的信，内容涉及筹集经费、招聘教员、教务等各方面。

南高、东大办学理念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就出许多著名教育家，除了郭、陶之外，还有曾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国立交通大学校长茅以升、国立重庆大学校长何鲁、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国立中正大学校长胡先骕、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吴有训、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圣约翰大学校长涂羽卿、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清

华大学校长叶企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严济慈。南高东大的校制校风，因而成为开创发展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资源。

国立东南大学成为中国现代大学先驱的同时，在郭秉文、陶行知的倡导和支持下，南高与东大附属学校推动基础教育现代化，促成了中国整个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其中，有教育科俞子夷主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推行新教育，试行设计教学法；有廖世承主持附属中学，试行现代中学教学法，开创中国“六三三制”中小学学制；教育科陈鹤琴主持“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鼓楼幼稚园；鼓楼幼稚园为中国最早的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其创设的教学体系后来在全国推广，开创发展了中国的现代幼稚教育事业。

1918 年 5 月 23 日和 6 月 4 日，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会召开第 8 次和第 12 次常会，专门对职业教育设施法进行系统讨论，陶行知两次均参加讨论，认为了解社会需求，“调查毕业生之出路，为职业教育设施之最要根据”。1920 年夏，鉴于中小学教职员的职业素质较低，陶行知倡议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利用该校教师及设备的优越条件举办暑期学校，以提高全国教育行政人员以及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能力。他亲自主持，约请梁启超、胡适、任鸿隽、陈衡哲等作学术演讲，各省选送学员 1 300 多人，由于条件限制实际入学学员 1 041 人，自 7 月 12 日开始至 8 月 20 日止，历时 1 月余，为全国高校开办暑期学校之始。1921 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二期暑期学校尚未开办，四方来学者即踊跃异常，因校舍不足，限制名额，仍收了 1 000 人。举办暑期学校这一做法在南高师及其他高校延续发展开来，对发展各类职业教育发挥了较大作用。

经过几年发展，东南大学从学科结构来看，覆盖面之宽居全国之首（北京大学只设文理科和法科，中山大学设文理、法、农 3 科）。无论从师资条件还是办学设施看，东南大学在国内大学中都堪称一流。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称赞“东南大学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在当时政局动乱，政府办学经费严重短绌，许多学校因经费困窘以致学潮迭起的环境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曾派专家来华调查中国各大学的科学研究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东南大学在师资力量、科研水平等方面具有坚实的基础，遂捐赠建造一座当时一流的科学馆，首开中国国立大学接受国外基金资助的先例，南高东大由此蜚声世界。

三、郭秉文与陶行知教育思想共同内核与差异

郭秉文是一位有教育家天赋，也曾立志创建教育大业的难得人才。但历史阴差阳错，一批信奉党化教育的国民党人合谋在1925年初罢免了他国立东南大学校长职务，也就中止了他的教育职业生涯，此后他虽还涉及教育事业，但失去了在教育上充分发挥其才干的机会，这是近百年中国教育史上损失巨大的失误。陶行知则几乎一直未曾离开教育。

1. 倡行民主包容，反对党化教育

郭秉文与陶行知共事期间，正是民主与科学思潮空前高涨之时，陈独秀、胡适等人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对传统文化进行宣战。在教育领域，出自哥伦比亚大学杜威门下的胡适、蒋梦麟、朱经农、郭秉文、陶行知、陈鹤琴则掀起了民主主义教育思潮，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教育，促进了中国学制的改革。在1922年制定的“六三三”学制影响中国百余年。

南高和东南大学均倡行民主治校，学术自由。主张“学者不干预政治”、“学者不党”。注意培养学生自觉、自治的良好风尚。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为评议会，在学校行政管理上设置董事会，还设置了十几个各种委员会。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学衡》即为该校学人创办，在创刊号的“弁言”中，柳诒徵申明该刊宗旨：“以中正之眼，行批评之职事”，以“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态度“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①。“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间的争论显示“学衡派”在“四面楚歌”中独树一帜的学术风骨。当年以“昌明国粹”为宗旨的“学衡派”和以发展科学为职志的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竟同在东南大学，而且在人员上还有交叉，如“学衡派”中的主将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均是科学社的成员，吴宓也是哈佛的博士。这种格局充分体现了东南大学的学术自由状况。

1925年1月，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鼓吹“党化教育”，鼓动策划北洋政府免除郭秉文东南大学校长，在郭秉文被免后的第十天，陶行知1月16日在《申报》发表致教育部电：“国家教育经费出于各党人民共同担负之赋税，断不能视为一党之武器……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机关，对于各党党纲政策，均应抱持虚心研究审查批评之态度，与党化运动绝对不能两立。既是大学，即不能党化，既受党化，即不成其为大学。”②

① 创刊弁言.《学衡》创刊号，1922－01.
② 陶行知.党化运动与国家教育[N].申报，1925－01－16.

1925年9月，陶行知与高仁山、赵廼传、查良钊、孟宪承、汪懋祖、王希曾等发起创办《新教育评论》周刊，参办单位有北京大学教育科、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教育科、北京清华学校、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香山慈幼院、中华教育改进社等，主办者郑重声明："我们在一切讨论里，不愿意掺杂任何个人的问题，也绝对没有任何党系的作用。"而"现代国家的教育，要本着民治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去建设他的制度，分析和估定他的内容，发明和实验他的方法，而考核他的效果"①。以谋教育改进。

陶行知主持的改进社具有较浓的自由、理性气息，党派政治色彩较淡，1926年有人问及改进社的"色彩"，陶行知于12月27日郑重宣言："本社是透明的，不是白的，不是黑的，不是红的，不是灰的——是透明的，水晶样透明，使各种光、各种颜色都能透出真面目。"②

2. 力求科学实证反对主观臆断

郭秉文用统计等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教育史，并采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它们进行比较和分析，在当时当属首创；执掌"南高"以科学为重，最典型的表现是接纳中国科学社的整体进驻。中国科学社1912年由丁绪贤、石瑛、王星拱等人在伦敦发起成立，1914年与任鸿隽、赵元任等人于该年6月在美国发起的同名组织合并。

1915年，陶行知参与科学社的活动，并于1917年3月在《留美学生季报》发表《遗传论》。1918年陶行知主持南高师教育科后将科学教育列为教育科的基础课程，亲自为学生讲遗传学，此外还开设了心理学和教育统计、教育测量、科学发展史、生物学，心理学则分普通、教育、儿童、实验、心理学史等科教学。

南高成立时，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尚在美国留学，由于郭秉文在留美期间交游广泛，还曾担任过留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会长，经他笼络，这些陆续学成回国的人中不少应邀到南高任教。1918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总部就设在南京，南高—东大遂成为科学社骨干成员的云集之所。1920年南高改组东大时，文科的梅光迪、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陆志韦，理科的任鸿隽、竺可桢、张子高，农科的邹秉文、胡先骕，工科的茅以升，商科的杨杏佛，教育科的陶行知、陈鹤琴，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被时人称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这也形成了南高—东大"注重科学"的特色，使之迅速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重地。

陶行知提倡科学，尤重科学精神与方法，主张改革旧教育，建立新教育，一是

①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第2卷[C].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66.
②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第8卷[C].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120.

以调查为基本依据，二是以试验为根本方法。试验主义是中国教育破旧立新的最佳工具。1917年，陶行知支持南京高等师范学生建立教育研究会，被推选为该会指导员，并在该会成立大会上演讲《教育研究法》，向大家推荐观察和试验方法。1918年春节期间，陶行知指导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准备了7份表格，请各会员调查家乡教育情况。3月14日，陶行知依据大家的调查在该研究会的第二次演讲《江苏市乡教育状况之一斑》中，他又以《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为题写文发表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会刊》第1期，主张“试验者，发明之利器也”，断言“欲教育之刷新，非实行试验方法不为功”，“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

1918年9月27日，陶行知再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就教育研究方法问题演讲，他说：“国之盛衰，视乎教育；而教育之新旧，视乎研究。守陈法而不革，拘故步而自封，则亦造成旧国，不适于新势而已。”并对政客之教育家、书生之教育家提出批评，认为“惟有以科学之方，新教育之事”的才是“真教育之人”。引导学生进行“都市教育调查”，并就调查的细节做出详尽指导。

郭秉文论事也尽可能客观，对清末教育变革的决心，现在不少人可能仅简单理解为保守，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道出了真实的状况：“清末，政府对于新教育的态度绝不像胆怯的没有经验的海浴者。它已不是一次跳水，而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惜任何代价为人民兴办新教育。”[①]而对辛亥革命本身对教育发展的影响，作者没有一味唱赞歌，而是道出了它强迫中断了“预备立宪的分年筹备教育计划”的真相，而这项计划如果真能逐渐推进，则到1916年末“中国的教育制度不难与世界上最发达的教育制度一比优劣”[②]。革命还导致教育经费被移用作军费，校舍被充作军营，校具和书籍仪器被抢掠毁损，学校停课或被废弃，“使正处在发展前行中的新教育遭遇顿挫”[③]。

3. 主张自主中西融合反对割裂封闭

郭秉文所写博士论文讨论的主题“公共教育制度”本身就不是以中国传统的视角看待教育，而是依据当时哥伦比亚大学的学术视角和当时中国教育变革的现实需求叙述中国教育管理的历史演变，将本国之国粹转化为教育学共同的原理加以表述，既方便西方学人了解中国教育历史，也有利于当时中国人从历史中找到变革现实的借鉴。若以西学来看，它不够西学；若以中学来看，它又不够传

① 郭秉文. 储朝晖译：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12.
② 郭秉文. 储朝晖译：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96.
③ 郭秉文. 储朝晖译：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16.

统正宗，恰是西学话语中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以这样的视角看问题，美国学者缪塞尔·亨廷顿所提到的“现代国家形态”与其固有“文明母体”亲和性问题，或者说千方百计与自己的文明母体断绝关系而造成的“自我撕裂的国家”[①]就不会出现。

郭秉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在教育上的建树与他对中国教育制度历史沿革的感悟直接相关，他在明了中国教育的优劣和需要的基础上，利用西方教育资源变革中国教育，并形成独特的教育理念，力求国内与国际平衡，创制东南大学。

陶行知对新旧和中西的基本态度是：“去与取，只问适不适”[②]。陶行知与郭秉文教育意识中的欧美观念主要表现为：倾向儿童中心，而非中国传统的群体本位，强调“知行合一”；倾向学生自治而非管制，郭秉文建议慎选校长、提高教师素养和培育学校全体合作之精神。他虽看到“富于自治精神之美国”实行学生自治制度的结果是“失败尚多”，认为中国学校要吸取美国的教训，不可骤然改“严厉的管理”而进入“学生自治时代”，却在东南大学同意陶行知的提议废除了学监，设置学生自治委员会。

东南大学的体制的意义在于它既非模仿日本，也非简单学欧洲，而是基于对中国教育历史深刻感悟，对美国大学模式消化后的移植，学校订有章程，选科制、评议会、教授会等发挥作用，是中西融合的典型案例。

正因为此，郭秉文注重通过教育交流积极促进中国教育对世界教育资源的利用。他从 1923 年起连续三届当选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1926 年后又在美国与他的老师孟禄一起创立“华美协进社”，并担任首任社长；1945 年任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委员；1947 年任华府中美社会科学协会总干事；1957 年任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1958 年创办华府中美文化教育协会并负责主持会务；直至 1969 年去世，他一直致力于用美国的教育资源为华人教育做贡献。

4. 平衡点用力与激进参与改造

郭秉文与陶行知毕竟是两个人，他俩之间有诸多不同，反复考察他们的不同，根基还在于人生态度。简言之，郭秉文是位力求找到平衡点并在平衡点用力的人，陶行知则是位激进的社会参与和改造者。这一差别决定着他们其他各方面的差异。

---

① [美]缪塞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8：3.
② 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第 1 卷[C].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40.

郭秉文所创立的东南大学体制可简括为:四个平衡、三育并举、学术并重、民主治校、服务社会。这些方面都显示出他找平衡点的思维方式。

从中国风起云涌的1919年5月他俩不同的应对就可看出两人的不同。虽然当时郭秉文在国外,若他在国内也会选择找到自己的平衡点。陶行知则不然,成为南京学生会运动的领袖,5月10日与各校代表会见英美两国领事,13日当选南京学界联合会会长,14日参加了南京绅、商、学各界万余人召开的国民请愿大会。

5月20日,南京各校学生不听官府明令,自行罢课。当时陶行知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仍以学联界联合会会长名义领导各校学生进行爱国运动。校长郭秉文在美国,校务由陶行知和学监主任陈容代行,陈容极力反对学生游行和罢课,陶、陈争辩,陈辞职离校,校务由陶行知暂行代理。6月2日,南京各校学生因陈容等人反对罢课,并以辞职要挟,陶行知遂脱离学界联合会,学生独立组成南京学生联合会,聘请陶行知为顾问,继续参与此后的学生运动。

也许正是性格和态度决定着命运,陶行知一生大起大落、生命短暂。郭秉文则力求做政治的回避者,即便1925年当政治找到他身上的时候也是谨小慎微。这种人生态度决定着郭秉文虽然在中国教育变革方面没有一直执着献身的陶行知影响大,却能政、商、学各界游刃有余,一生充满活力,摄生有道,有比陶行知长30年的人生,晚景安逸。

可见,陶行知在人生价值上更接近于基督和墨家,他所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最经典的诠释;而郭秉文奉行自己定下的箴规:"急在事先,事到时就显得从容了。"他"养生处世之道,宅心温和敦厚,持躬宁静淡泊,深得道家反诸自然之妙。可是在做事方面,始终是积极的,关于这一点,他实已得儒家哲学之真传。"①

郭秉文与陶行知两位先驱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所作的探索,可资今人借鉴之处甚多,有待进一步全面研究分析。

① 曹文彦.郭秉文老师的晚年——充满活力乐观前进[J].中大校友通讯.

郭秉文的现代大学文化引领观论要*

◎王运来(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一、中国现代大学的开拓者郭秉文

郭秉文(1880—1969)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为著名的教育家之一。1914年即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与陶行知、蒋梦麟一道被称作杜威的“中国三大弟子”;参与创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高),先后任教务主任和校长;后又创办了孟禄眼中的“中国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①——国立东南大学(以下简称东大)和中国最早的上海商科大学即今上海财经大学。被誉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开拓者”②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先驱”③。他是当时国际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中国教育家,连续三次以中国首席代表的显荣身份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均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主持亚洲部会务。笔者认为他是集高明的教育家、高超的管理家、高妙的经营家、高调的活动家于一身的杰出的大学校长,是中国近现代大学校

*[作者简介]王运来(1962—),男,山东嘉祥人,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管理、中国教会大学史、高等教育近代化研究。现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又称全国高校校史研究会)副理事长。

① 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73.

② 柯小卫.中国现代大学的开拓者——郭秉文.生活教育[J],2010(1):封面.

③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扉页.

长中的不世之才。现在常有学者[①]将他与蔡元培等人并列，称他与蔡元培为“北蔡南郭”、一时亮瑜。

1960年代，南高校友、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创始人张其昀赴美拜访当年的校长郭秉文。郭秉文“畅谈五十年前他的办学方针，归纳为一个平字”，认为《大学》里修齐治平的“平”字，“乃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而办理大学，他认为应该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②] 四个平衡，是郭秉文办学理念的高度概括。

对于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台湾与大陆已有比较透彻的研究。它是在郭秉文卸任数十年以后归纳总结出来的。这种归纳——尽管是对自己的思想沉淀了半个世纪以后的提炼与归纳——是否涵盖了郭秉文最主要的教育思想？还有无与“四个平衡”比肩而立的其他平衡呢？

笔者对郭秉文和那段历史研究有年，尝试利用“从后思索法”的研究方法与思考路径，回望郭秉文治校十年的历程，追溯其办学理念的脉络，透视南高东大骄人的业绩，研读郭子——黄炎培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序言中如是称呼郭秉文——身前身后的文献，深感有第五个平衡跃然纸上，那就是学术与事功的平衡。

二、学术与事功是郭秉文办学方针的“第五个平衡”

“学术与事功平衡”，简言之就是“学”与“用”的平衡，大抵可以用“学以致用、学用一致、用其所学”12个字，从目的、价值、功能三个维度来概括。

（一）学以致用：“注重实用教育”实乃“教育之本旨”

民国初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可以说还处在“前象牙塔”时代，大学对于“服务”和“应用”的意义与作用还没有清醒的认识，更遑论予以主动的应对。郭秉文就多次直陈国内教育的弊病，指出其“成绩甚少，进步甚迟”的症结就在于“不切于实用”。而“教育不切于实用，则凡教授（即教学——笔者注）、训练、管理等，必不能深合于社会之需要”。虽时过百年，而郭秉文发聋振聩的质问仍犹在耳：“学生

① 持此类观点者有王悦芳、陈华等人，王悦芳所著《蔡元培、郭秉文办学思想与实践的比较研究》已由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2011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陈华的《名校长与名校长的成长——中国近代“校长群落”研究》则将蔡元培、经亨颐、黄炎培、郭秉文并列为各学派的领军人物，称郭是“科学教育派”的主帅，麾下云集有陶行知、廖世承、陈鹤琴、俞子夷、舒新城、艾伟、赵叔愚、孟宪承、郑晓沧、朱君毅等名家，风云际会，饮誉学界。

②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G]//国立中央大学.中央大学七十年（国立中央大学建校70周年纪念特刊）.台北.1985：75.

之抛弃社会而求学于学校，毕业后既不能为农，又不能为工商，教育之本旨安在哉？”①

教育的本旨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注重实用教育”②和“教育必裨实用”③。郭秉文呼吁：“教育必裨实用，他国所风行而收功之实际教育，当加意提倡之。”④何以才能使教授、训练、管理等深合于社会之需要，才能使教育有益于实用？郭秉文开出了两剂药方，就是“发达学子身心”和“注意于学子职业之选择，而予以正确之引导”⑤，以“养成思想”和“应用能力”，“使学者能思想以探智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智识之归宿”⑥。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郭秉文极具眼光地提出了要从“职业引导”——即今日就业指导——切入的重要命题和独到见地。郭秉文告诉世人的新鲜思想是：“在世界文明各国中，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教堂、学校以及各种社会等，皆视职业引导为其分内之事。”在考察和研究英美教育之后，他更是得出了“教育日趋于实用”的结论。⑦ 若不引以为戒，有力应对，中国很快就会面临“高等游民”浪潮的冲击，“教育为世诟病，学生被人唾弃”。郭秉文条分缕析，忧心忡忡：“当今吾国教育，尚未普及，彼毕业于学校者，已供过于求。若教育大兴，则毕业于学校者……势必流为高等游民而不止也。则教育为世诟病，学生被人唾弃，在所不免矣。”⑧在论述过“选择适当之职业，诚重要事也”之后，郭秉文提出了学校成立“专司学生职业引导之事”的“职业引导会”并由“富于职业之知识经验者”充任引导员的观点。郭秉文对此充满了期待：“一校行之有效，则推及于全国，我国教育之前途，庶几有为！”⑨

---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93.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93.
③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94.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94.
⑤ 郭秉文. 中国现今教育问题之一：职业之引导(1915年1月)[G]//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06.
⑥ 郭秉文. 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1918年10月)[G]//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6.
⑦ 郭秉文. 中国现今教育问题之一：职业之引导(1915年1月)[G]//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08－109.
⑧ 郭秉文. 中国现今教育问题之一：职业之引导(1915年1月)[G]//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09.
⑨ 郭秉文. 中国现今教育问题之一：职业之引导(1915年1月)[G]//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09.

（二）学用一致："社会需要"即为"设科主旨"

郭秉文主张"以适应社会需要，为设科主旨"①。由于社会需要随时变化，因此东大所设系科也因之而异。例如，鉴于社会体育不振，而任教者又多不明体育原理，而设体育专修科；鉴于人民生产力薄弱，而一般学子又缺乏知识技能，因而提倡职业教育，设立商业专修科，并且考虑到"人才与环境"的关系把由此扩建而成的商科大学开办在上海；近代因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之进步，教育学已成一种专门学科，"不造就此种专门人才，不足以促教育之进步"，遂增设教育专修科；等等。东大首任工科主任茅以升对此赞赏有加："本大学学制，以农、工、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所在也。"②

东南大学不仅十分重视科学研究，硕果累累，独步海内，而且各系科皆格外重视科学的普及与推广事业。例如，参与《新学制》的制定和《新教育》的创办；以中国科学社为大本营，组织各种专门学会，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科学传播；创办《学衡》，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首创"暑期学校"，提高从业教师的素质与水平，并使他们获得"亲知"（指自身的教育实践，是根本）和"闻知"（指他处学得的知识，是接枝）的根枝相接。而农科、商科的推广事业更可以说是功在当时，利在千秋。

（三）用其所学："所用者皆本所学"

郭秉文特别看重知识的活化和能力的迁移，"注重理想与实际之联络"，强调"所学者皆有所用，所用者皆本所学"③。一个凝聚着郭秉文深刻教育思想的"本"字，胜过万千学理。而他自己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践行者。1925 年，"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先驱"④郭秉文突遭北洋政府免职，倡言"学者不党"的学者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祭品，就此结束了教育生涯。但他先进宏富的教育思想和绚烂多彩的办学实践，却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份丰富遗产，留给后人许多启迪。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退出教育界以后，郭秉文又将他的抱负、学识、才干倾注到其他领域，用"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恬静、大江之雄毅"般的国士言行诠释了"学术与事功平衡"的另一种成功。1931 年，郭秉文出任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

① 郭秉文. 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1918 年 10 月）[G]//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6.
② 茅以升，杨铨，等. 提议添设土木工程及机电工程案（1923 年 3 月）[G]//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6.
③ 郭秉文. 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1918 年 10 月）[G]//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6.
④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扉页.

长。抗战爆发后，他奉派驻英，以财政部次长兼任中英贸易协会主任，“争取友邦舆力，以纾国用之困，堪称外交、金融战中的第一线尖兵”[①]。抗战以后，他代表中国出席善后救济预备会议与世界粮农会议，被推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兼秘书长”。他举重若轻，“卓越政治才华，也不在其教育外交之下”[②]。其事功受到当局的肯定[③]和后世的缅怀：“巍巍钟山，万人空仰芳惠在；浩浩江水，千古长留教泽存。”[④]

三、文化引领是现代大学的重要使命

大学，不仅要适应社会的需要，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为社会服务，将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利用自己的发明创造为社会增添财富，而且还要为预判和引领社会的发展，为改良社会，为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等，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这既可以看作是学术与事功平衡的题中应有之意，更可以看作是学术与事功平衡的升华与超越。如果从政治、经济、社会的维度来考量，这种文化引领则可概括为维护正义、促进进步、改良风俗。它们堪称作郭秉文现代大学文化引领观之三义。所谓义，就是思想行为合乎一定之规，“行而宜之之谓义”。义者，公正、合理而当践行之也。笔者认为，这种文化引领，具有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量齐观的作用，堪称是高等教育的第四职能。[⑤]

（一）“维护正义，敢讲真话”，是大学的“最高使命”

“大学的一个价值是追求真理。”[⑥]郭秉文在 1923 年发表的《太平洋国家的大学如何促进国际间了解与友谊》的演讲中如是说。而真理是不分地域和时空的，也不受种族和民族的限制。“大学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思想、兴趣和同情感的普遍性。”郭秉文认为，大学的责任“是造就具有国际头脑、贤明、无私、能够抛弃

① 茅以升，杨铨，等. 提议添设土木工程及机电工程案（1923 年 3 月）[G]//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74.
② 茅以升，杨铨，等. 提议添设土木工程及机电工程案（1923 年 3 月）[G]//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74.
③ 1970 年元月 20 日蒋介石明令褒扬郭秉文“才识宏通，学术渊博。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国立东南大学校长，成材綦众，望重士林”。参见：宋晞. 郭秉文传[G]//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286.
④ 王成圣. 郭校长秉文传[G]// 国立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七十年（国立中央大学建校 70 周年纪念特刊）. 台北. 1985：74.
⑤ 王运来. 学术与事功平衡——郭秉文高等教育思想蠡测，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21.
⑥ 郭秉文. 太平洋国家的大学如何促进国际间了解与友谊（1923 年 7 月 2 日在世界教育大会泛太平洋小组会上的发言，原文为英文，由王丽莉翻译）[G]//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129.

自己民族偏见与偏爱的世界主义者”，就是“培养四海之内皆兄弟、宽容、和谐与平等的精神”。在利用教育机构促进国际间了解与友谊方面，大学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的大学应该站在“国际正义”和“平等”的立场上——“无论是否与其国家有关”。如果国家的国际行为与最高的道德理想一致，“那很好”；如果不一致，那大学就应该“维护正义，敢讲真话”，唯有如此，“才不辱其最高使命”。也唯有如此，大学才会受到人们的推重和追随。大学的使命，在世界范围尚且是要如此地“追求真理”、“维护正义”，更遑论是在其所在国了。大学素得风气之先，易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之精髓，“当求四境之新状况，以改革教育制度”①。

（二）“与国民进步最有关系者，乃教育也”

“与国民进步最有关系者，乃教育也。”②这是郭秉文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提出的重要命题。在这里，他首先从反面论述了教育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掣肘作用——“学校教育关系于国民进步之重要，吾国教育史，实一明证也”③。“数千年之教育性质，皆偏于文学、哲学与道德诸方面，而近世所谓实验教育则百不得一焉。”④我国数千年来的教育方法，则“颇似欧洲希腊文艺复兴时代以前所盛行者”。这种特别的传统教育，“其性质影响于国民之过去颇大”。换言之，这种教育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与科学的产生。自西方新学输入以来，“中国的政治、工业、社会等，同时皆显改革”。古今相较，我国科学技术之所以发展迟缓，我国之所以落后，个中原因“可以恍然矣”。这里的国民进步，除了人的进步以外，显然还同时包含了社会各个方面——自然也包括了经济方面——的进步。所以，他认为，“教育之改良为一轴纽，牵动各种事业皆随之而变新”，“教育造成人才，为国家之栋梁，措国家于磐石”⑤，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最为密切。这种教育是社会之基石、人才乃国家之栋梁的思想，十分新鲜，弥足珍贵。可见，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对于社会的引领作用——不管是进步还是后退——都是客观存在着的。而大学的开放性、进步性、宽容性则决定了它自然会

① 郭秉文. 太平洋国家的大学如何促进国际间了解与友谊(1923 年 7 月 2 日在世界教育大会泛太平洋小组会上的发言，原文为英文，由王丽莉翻译)[G]//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129.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94.

③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94.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94.

⑤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94.

给社会以“革新”的引领。

（三）大学对于“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

“大学对于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①]的思想，是郭秉文提出来的。这反映了一位大学校长的角色自豪感、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要想真切、透彻地理解郭秉文的这一先进思想，就必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

1918年秋，南高代理校长郭秉文撰写了《关于本校情况报告书》，其中之一是《教育概况》。教育概况，分训育、智育、体育三项，这句话就是他所报告的“训育”中的点睛之笔。

按照郭秉文的解释：训育，取训练与管理兼重之义。训练注意启发，使学生知其所以然；管理注意实践，使学生行其所当然。二者交相为用，以致达到知行合一。换言之，对学生的训育是双管齐下，既反对“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也反对“茫茫荡荡地悬空去思索”[②]，旨在使学生学用结合，言行一致。训育有着一整套的标准、方法、程序和实施途径。

首先是标准。以养成对于国家负责任的国民为理想中的人格。“此人格要素，必具有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而于道德、学术、才识三者又有适当之培养。”道德培养强调注意两点：一是品性，如智力、情感、意志等都要趋于中正；二是行为，如容仪、言语、动作等都要趋于平和。学术培养则强调注意这样两点：一是知识，如普通知识、专门知识等都要使之明确；二是技能，如应用、美感等都要使之精熟。才识培养也强调两点：一是计划，如全局、局部等都要有悠久即长远的打算；二是执行，如作业、协调等均要有宽厚的精神。而中正、和平、明确、精熟、悠久、宽厚，又都须本着“诚”字。

其次是方法。惟有启发学生的自动精神，才能使他们向着所定的标准不断地前进，即依据“利用天性、触发感觉、引起兴味、应用暗示、选择思想、养成习惯”[③]的原则来进行。

再次是程序。先由自己，而后他人；次由学校，而后社会。总之，以成己为始，以成物为终：“对自己之品性行为负修养之责任”；“对于同学之品性行为负规劝之责任”；“对于本校校风负巩固发扬之责任”；“对于本校附属学校之训育负协

① 郭秉文.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1918年10月)[G]//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5.
② 王德滋.南京大学百年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0－51.
③ 茅以升，杨铨，等.提议添设土木工程及机电工程案(1923年3月)[G]//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5.

助之责任”;“对于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①

最后是实施。实施训育的方法有二:一是修养,二是服务。在修养方面,重视躬行与省察。设有学生省察表,每周由学生自己登记,学监调阅,教师根据学生的品德进行诱导。每学期汇交学监处,以此来评定学生的品行,并分别给予劝告或勉励。在服务方面,重视实践与研究。校内凡与学生有关的各方面,均制定有《服务生职务规程》,由在南高各处所“实习”的“服务生”分期轮流服务,必要时还会召开服务生会议进行研究。每日由学监检查,并进行记载。在修养、服务两方面,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以说服和鼓励为主,直到完成为止。

联想到前文郭秉文所说的“一校行之有效,则推及于全国,我国教育之前途,庶几有为”②这句话,如果大学都能“对于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则高等教育对于社会之引领便会蔚成风气。

郭秉文的思想不独在当时甚受推崇,而且对后来的教育家和大学管理者们也具有或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后来的许多颇具声望的教育家就明确地表达了大学应该起到引领社会发展作用的观点。如曾被郭秉文聘任为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创系主任、后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就提出过多重使命的观点,尽显大学功能:“社会责任:服务地方,改良社会;道德责任:海上灯塔,社会之光;学术责任:振兴科学,繁荣文化。”③当然,最能显示大学对于社会的引领作用的观点还当数郭秉文的后来人、国立中央大学(由国立东南大学等校组成、南京大学之前身)校长罗家伦提出的中央大学要“创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的使命说。④

① 茅以升,杨铨,等. 提议添设土木工程及机电工程案(1923 年 3 月)[R]//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5.
② 郭秉文. 中国现今教育问题之一:职业之引导(1915 年 1 月)[G]//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09.
③ 张彬. 倡言求是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66 - 190.
④ 罗家伦. 中央大学之使命[G]//国立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七十年(国立中央大学建校 70 周年纪念特刊). 台北. 1985:96 - 100.

郭秉文的通识教育观及其现代价值*

◎张亚群(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上,郭秉文以其独特的教育理念和杰出的办学成就享誉海内外。作为首位在哥伦亚大学荣获教育学博士的华人学者,郭秉文学贯中西,文理兼通,具有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他运用现代教育科学方法,总结传统教育的精神特征,系统阐释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历程、现实问题及发展趋向。其归国后的办学实践,不仅奠定东南大学的发展根基,也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变革。本文从通识教育的视角,考察和分析郭秉文教育思想的内涵、特征、成因及历史影响,揭示其通识教育观的现实价值。

一、郭氏博士论文中的通识教育理念

在英文语境中,“通识教育”通常译为“general education”。19世纪以前,“general education”一般指中小学教育的总称。1829年,美国博德因学院的帕卡德(A. S. Packard)教授最早把它与大学教育联系在一起,赋予新的特定内涵,是指包括古典语文、文学和科学课在内的大学公共课程。[①]这种意义上的通识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课题批准号:BAA100015)。
[作者简介]张亚群(1961—),男,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

① 李曼丽,汪永铨:《关于“通识教育”概念的讨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年第1期。

育，亦称为“自由学艺”(liberal arts education)或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

在郭秉文论著中，一般使用“liberal education”指称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这是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现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还不是一个普遍使用的词语，人们更习惯使用“liberal education”。为便于讨论，本文论析郭秉文的通识教育理念，即以“liberal education”指称“general education”。

从文献的角度来看，郭秉文1914年完成的博士论文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是我们了解和认识其通识教育理念的最早和较完整的文本。该论文1915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英文本，次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本。通读全书，不难发现，郭秉文的通识教育理念跨越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融合中西教育传统，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 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个体参与日常生活之准备”

郭秉文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均有自由教育的传统。在先秦时期，“自由教育包括五礼、五乐、五射、五御、六书、九算。以现代观点来看，这种训练具有德育、体育和智育的特征，与生活密切相关，是个体参与日常生活之准备。”周代教育的理念，于身心和谐、均衡发展，可以称得上体现斯巴达和雅典教育理念的结合，同时兼备智力、道德、身体和军事的教育。[①] 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鼎盛时期，为后世所称道。

在论述秦汉至清末民初教育制度的变革过程中，郭秉文参照这一教育理念，评价各历史发展阶段教育与文化重要举措的得失。如其评析汉代独尊儒术的负面影响：“这种对孔子及其学说的高度崇拜，历代相承，自此中国教育比从前减少了自由教育的特性，教育的内容狭窄地限定于儒家经典。”他认为，“从远大的眼光来看，过分强调一个学派的思想而排斥此前产生的其他思想体系，对于中国文明的进步实为一大不幸。因为研习儒经成为学生阶层的习惯，从那时起，固执遵从古代圣人的言论，不敢提出自己的新思想”[②]。其结果，学者阶层的思想持续徘徊在古人走过的路上，不复享有文明真正进展所需要的自由。

在论述元代教育成就时，郭秉文高度评价宋末王应麟所著的《三字经》。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这本蒙学教材的通识性、生活性和文化性密切相关，也体现了郭

①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p. 18

②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pp. 34 - 35

氏的通识教育观。元代以降，六七百年间，《三字经》风靡全国。它概括了哲学、经典文学、历史、传记及普通知识，被称为袖珍版历史鉴镜。三字一句，朗朗上口，易于记诵，为每个中国人所熟知，推动了古代通识教育的普及。

2. 经学教育（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training）“养成中国人某些优良和稳定的品质”

儒学教育是一种以人格养成为目的、以儒家经典为范本的通识教育，主要通过经典学习和主体自觉实践而实现的，由此产生了源远流长的“经学”。[①] 郭秉文高度评价先秦儒学的教育价值与历史地位，认为孔子不仅是哲学家，也是伟大的道德家和政治家，更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导师。“孔子的教育原则与方法与其信徒孟子的教育思想，因具有现代性的气质，对人性特征与作用的深刻见解，而超凡脱俗。”[②]孔子著作中所包含的道德、社会与政治的原则及其信徒所阐发的原则，最终成为后世选士考试制度的基础和中国教育的内容。

郭秉文批评清代科举考试（the competitive examination）演变为庞大的机器，扭曲了教育目标：“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教育只不过是求取官员生活之准备。”[③]这样的教育显然失去通识教育的本义。尽管如此，郭秉文仍然肯定二千多年间经学教育的文化贡献。他指出：“在过去的教育制度下，经学成为学校课程的中心。既然经学作为某些高尚思想与言论的宝库，既然以此为中心的主题不得不涉及人之个人、家庭与公民责任，受其教育熏陶，国人能养成高尚的道德和某些优美、稳定的品性，这成为维系中国文明经久不坠的力量。”[④]

3. 科学教育（science education）是国民进步的保障

郭秉文认为，数千年中国教育的性质属于纯文学、哲学和道德的教育，很少具有现代含义的实用或实践教育的性质，也没有任何要求实验方法或归纳推理的知识。这是近代中国教育大变革之前，社会生活和科学落后的根源。

在晚清科举考试改革中，1887 年增设算学和科学，是中国历史上将现代科学与经学并重之开端。郭秉文高度评价这一举措：“官方对于科学与文学同等地位的承认，预示着现实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未来胜利，这在现代西方大多数国家的

① 张亚群：《科举制下通识教育传统的演变及其启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②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p. 31

③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pp. 61 - 63

④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p. 141

类似进程中是令人瞩目的。例如，1901 年、1902 年德国和法国改革计划的相继实施，就是如此。”[①]他指出，虽然此后十余年间科举改革裹步不前，但是，已经迈出的步伐具有极大意义，在中国教育史上举足轻重。正如当时评论家所言，科举这项改革犹如凿木楔于考试制度之中，使中国保守思想的墙壁逐渐分裂，解放文人学士的心灵，将之推向进步与变革的道路。

由于以科学教育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学校教育日益成为国民进步的动力，因此，郭秉文主张，必须尽快和完全消除教育为官员生活预备的观念，代之以更宽广的观念：教育不仅是为从政服务，而且作为培养各类人才的手段。“这种观念变革越快速，越利于中国发展。”[②]由此可见，科学教育在郭秉文教育理念中的特殊地位。科学所运用的实验方法和归纳推理是现代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他引述 19 世纪西方世界在人文、科学、道德、制造、运输、金融、商务、贸易领域所取得的大多数进步，都是使用精确观察、精密记录和适当推论的归纳方法，因而呼吁：“不管怎样，必须给予中国新一代人在基础科学、精确观察和诚实记录方面的训练，因为新的共和国的最终成功主要依赖于这样的教育。”[③]

综观郭秉文有关论述，不难发现，其通识教育理念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和传承性的特征。

首先，中国通识教育源远流长，反映民族文化特色，可与西方教育传统互补。

郭秉文认为，判断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优劣，不依赖于先设的条件，而依赖于其制度适应各自国情的程度。因为问题不在于哪一种教育制度更好，而在于教育制度更适应其社会和政治的环境。若以公正、适当的眼光考察，中国在世界教育史上享有盛誉。要回答“何种教育制度能培养最善良之公民”，必须厘清不同国家“最善良之公民”的含义。就中国而言，保持自己的优良教育传统更为合适。因为任何一国教育制度的成功，必须适合本国的需要。[④] 他指出，热衷学习西方，应避免过于强调西方教育的重要性而忽视我国人民生活的动机。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对于西方人是最好的教育未必能保证对中国人也是最好的。以

①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p. 67

②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p. 164

③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pp. 166 - 167

④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pp. 4 - 5

西方教育之长，与我国数千年教育历史所证明适宜者相结合，才能建立良好的教育制度。①

其次，适应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识教育应改进其内容与方法。

在清末民初的教育变革中，道德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课程中占有显著地位。与新教育倡导者一样，郭秉文反对走回头路，恢复经学课程的至尊地位，而主张改造和利用经典，以收育人之效。他指出，已编写的系列伦理教材可用于普通教学，通过适于学生年级的图画和寓言故事，不仅显示改良旧教学方法的进步，帮助年幼学生记诵经典，而且旨在坚持孔子所阐释的“君子”理念。② 在这里，郭秉文切合时代发展，赋予儒家“君子”理念新的教育功能。

从通识教育理念出发，郭秉文认为，道德养成不限于学校伦理科目的教学，其他科目如文学、历史的教学，也能有效加深和提升学生的感情与志气，这些都是道德教育反复灌输所要达到的效果。通过这种方式，历史和文学教师能够用大量生动的事例充实学生心灵，对其形成正确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产生有价值的影响。不仅如此，道德养成还受教师人格等因素的影响。郭秉文总结：“经验显示，学生的品质，很大程度上为教师的日常榜样和激励所改变，聪明、豁达和公正的教师默示感化，比口头训诫更为有效。”因此，道德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要“知行合一”。③

第三，在教育变革中，应弘扬古代通识教育的优良传统，融入新的教育理念。

近代中国通识教育变革具有一定的传承性。郭秉文在博士论文“序言”中指出：“今日中国教育变革的精神与数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教育精神并无不同，就是说，仍保持对学习的高度尊敬。其变化不在好学的本质，而在学习的特征。过去崇尚古代经典的文学及伦理，而今则扩展到西方科学的实验与致用，因为它清楚地意识到，藉此可实现新国民和爱国的理念。”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教育理念的延续性。

在教育宗旨改革方面，也是如此。郭秉文指出，民国初年颁布的教育宗旨，“其侧重点放在道德养成，这与孔子的理念实相吻合，所不同的是，每个人对‘道

①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p. 166

②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pp. 141 - 142

③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p. 143

④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p. 6

德'二字有各自的解释。"他认为,毫无疑问,道德应以公德为主,只要不阻碍世界进步与个人发展,道德教育主要是为国家谋利益。他引述蔡元培的观点:"道德教育是将自由、平等、博爱的知识逐渐灌输到人民的心中",需要辅以实利(industrial)教育、军国民(military)教育和美感(aesthetic)教育。①

二、办学实践中通识教育理念的发展

1915年回国后,郭秉文历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代理校长,东南大学校长兼上海商科大学校长等职。在长达十年的办学实践中,他切合人才培养需要和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制定办学方针与课程计划,发表教育研究的新见解,丰富和发展了通识教育理念的内涵。

在南高师,1918年10月,郭秉文作《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系统阐明训育(德育)、智育、体育并重的办学方针及"三育"的标准、方法和实施概况。

首先,训育兼重训练与管理,以实现"知行合一"。郭秉文认为,训育的标准是要养成对国家负责任的国民的完善人格。人格的要素包括坚强的体魄、充实的精神以及道德、学术、才识三方面。其中,道德包含品性和行为,如智力、感情、意志、仪容、言语和动作,品性要趋于中正,行为要趋于和平。学术包含知识和技能,前者如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要使之明确;后者如应用、美感,要使之精熟。才识包含计划和执行,前者如全局、分部,要皆期乎悠久;后者如作业、游戏,要皆期乎宽厚。"而所谓中正、和平、明确、精熟、悠久、宽厚者,则要皆本于至诚。"②

其次,智育以"诚"之校训为本,以"养成思想及应用能力"。"必使学者能思想以探智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智识之归宿";"至于所思想、应用之事物,则以适合于社会需要为本,总期所思、所用,皆与社会生活有密切之关系。"

智育实施分为六种途径:(1)依据智育标准和社会需要,重视学科建设。开设国文、理化两部及体育、工艺、农业、商业、英文、教育专修科,培养专门人才。"各科授业初期皆授国语",以适应语言统一的需要。(2)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启发、自修。增加参考书,增设教务研究会。(3)理工科教学,"皆重实验,一以为学理之佐证,一以养发明之习惯"。(4)提出"研究亦为锻炼思想独立之一法",规定各部各专修科,"于末一学年均定有研究一项。凡关于该科之各种重要问

①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pp. 114 - 115

②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 - 112页。

题，令学生各认一题或两题，详细研究，各撰报告书留校，以养成独立思想，并以是征其心得”。（5）注重实习。一为“实科之实习”，以养成各科之技能；二为“实地教授”，以养成应用教育原理之方法。（6）组织学生“观摩”活动，作为增长知识的一种途径。规定学生毕业前，均派往相关单位“参观一切”。①

第三，注重体育及卫生防疫。“盖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欲求德智高尚，苟使身体孱弱不徒，任重道远，难以负担，且不足以表示优秀国民之完全人格。”体育标准为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②

为了促进人才培养，1919 年校务会议通过《改良课程案》，采用选科制。其优点在于：促进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选课的灵活性，打破分科的界限，促进学科知识的交叉，发挥教员之特长，学生在各科学习上，亦可扬长避短。③

在东南大学，郭秉文注重融合中西文化，将“止于至善”作为校训，贯通古今“大学之道”，富有深刻的文化意蕴；而其致力弘扬的“和平”、“平等”的文化观，体现了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时代精神。④

在办学理念上，他秉持“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其中“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的理念，集中体现其大学通识教育观。前者以美国大学教育为楷模，确立了东南大学的办学目标与培养模式；后者则阐明实现目标的途径与文化导向，凸显其学科发展特色。张其昀⑤回顾说：“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专修科注重专才教育，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但两者并非截然划分，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通才与专才互相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大学生都应该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这就是南高、东大、中大一贯相承的学风。”⑥

这种通识教育观，还体现在对师范教育的认识和实践上。郭秉文借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模式，提出“寓师范于大学”，极力主张将南高师改建为东南大学。他认为中等以上的教师应该是双料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师范生的学业标准，完全要与大学生一样；此外，还需具备两种修养：“一是教材教法的精研，一是器识

①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2－114 页。
②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5 页。
③ 朱斐主编：《东南大学史》第一卷，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第 2 版，第 45－46 页。
④ 张亚群：《“同归而殊途 一致而百虑”：郭秉文与林文庆办学理念之比较》，《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6 期。
⑤ 张其昀 1919 年考入南高师，1923 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其间，经历了 1921 年东南大学创立、1923 年取消南高师名称的过程，其求学时期乃是南高师之全盛时代。
⑥ 张其昀：《郭秉文的办学方针》，载左惟等编《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9－50 页。

抱负的培养。”[①]为了培养学生的“器识抱负”，大学须注重道德教育与实践，养成健全、高尚的人格；开设中西方课程，学习中外文化，拓展文化视野。

郭秉文特别重视国际文化教育交流，以取长补短。这是其通识教育理念的又一重要内容。

1923 年 7 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世界教育大会泛太平洋小组会上，郭秉文指出：“大学的责任是造就具有国际头脑、鲜明、无私、能够抛弃自己民族偏见与偏爱的世界主义者，其影响在国家之间的交流中会显现出来”；“从课程设置角度看，通过学习外国文明、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和艺术，以及政府制度、金融体系和社会生活，大学能够增进国际间的了解和友谊……因此学习外国的语言、历史和艺术十分重要。”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落后，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事实上除少数著名的终身从事汉学研究的专家外，中国文明对一般受过教育的西方人来说仍然是一部尘封的书。”[②]因此，中国大学亟须拓展对外教育交流的途径，增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理解。1925 年，郭秉文提出：“中国可以学习美国科学的知识，美国也可以学习中国对人生的想法和鼓励学习中国文化的精神。”[③]这些主张，反映了郭秉文对于中美文化价值及国际教育交流意义的认识，具有开放性和时代性。

三、通识教育观的成因及历史影响

从以上考察可见，郭秉文的通识教育理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色。其核心理念包括：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个体参与日常生活之准备”，而非“为官员生活预备”；学校教育变革应适应现代社会生活需要，加强科学教育，传承本民族教育精华，更新道德教育的内涵；大学教育是双向的国际文化教育，而非单一的西方文化教育或中国文化教育。这些教育理念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教育与文化原因。

首先，从教育因素来看，留美教育及文理交融的学科背景，为郭秉文奠定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这是其通识教育理念的主要来源。

郭秉文学贯中西，文理兼通。1908—1911 年，他在伍斯特学院（The Uni-

① 张其昀：《郭秉文的办学方针》，载左惟等编《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9－50 页。

② 郭秉文：《太平洋国家的大学如何促进国际间了解与友谊》，载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29－133 页。

③ 葛德卫：《郭秉文与伍斯特学院》，载东南大学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83 页。

versity of Wooster)接受本科教育,获得理学学士。这是一所著名的文理学院,以"知识与宗教同源"(Knowledge and religion from one source)为校训,注重自由教育,培养通才。在这里,郭秉文得到优良的科学与人文教育,奠定其通识教育理念的基础。

1924年,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孙洪芬博士(Dr. Clarence Senn)写道:"在伍斯特学院,郭秉文放弃了他原来学习法律的计划,而对教育改革产生了兴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培养他的兴趣。毫无疑问,这是受他在伍斯特学院读书的影响。"①2011年5月9日,伍斯特学院校长Grant H. Cormwell在致东南大学易红校长贺信中,称伍斯特学院为"郭秉文先生教育思想的发源地"。"自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怀着追求100年前郭秉文先生所定义的人文教育理念来到美国,来到伍斯特。他的教育思想中深刻烙上伍斯特印记的便是他所提倡的'四个平衡':

1. 专业知识与通识教育的平衡;

2. 人文学习和科学研究的平衡;

3. 教育人才与教育设施的平衡;

4. 关于优质教育的国际和国内标准的平衡。"②

1911—1914年,郭秉文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硕士、博士学位。在这里,他系统学习和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和研究方法,并受其导师孟禄(Paul Monroe)等教育名家的影响,形成涵盖通识教育理念的教育观点、理论与方法,包括自由教育和科学教育等理念。这些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其博士论文中。

孟禄曾为郭秉文博士论文作序,强调现代科学知识对于中国变革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东西方民族的差异,不在于智力,而在于技术与知识。由于中国人的生活价值观念与西方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未能发展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现在中国人已开始接受新的价值观念,无疑将会产生基本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民族,人口众多而缺乏动力,若将现代科学知识融入中国人的智力,其结果将是西方世界不能比拟和尊贵的。"③

郭秉文也极力倡导科学教育,将之作为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

---

① 葛德卫:《郭秉文与伍斯特学院》,载东南大学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3页。

②《来自伍斯特学院的贺信》,载东南大学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③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aul Monroe's "Intruduction",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Ⅺ

1922年3月，他曾高度评价孟禄来华考察教育所提出的改进建议，进而强调："实则提倡科学，应贯彻全教育系统。即以中学言，亦仍恃小学之基础，与高等师范所养之师资。故小学应鼓舞学生对于理科之兴味，而高师及大学宜提高科学程度，养成研究科学之专家，此须同时并进也。"[①]这一主张与孟禄的教育理念一脉相承。

此外，郭秉文留学期间，曾任中国赴美学生会会长、中国学生月刊总编辑、《伍斯特之声》主笔，广泛参与学校社会活动，扩展眼界。这些对于其教育理念也产生潜在影响。

其次，就文化因素而论，郭秉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会通中西文化精华，丰富了通识教育理念的内涵。

郭秉文1880年生于上海，童年正值洋务运动后期，而上海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地。因其父为基督教徒，他在北美长老会创办的清心书院接受西式普通教育。早期教会书院为适应中国社会文化，兼授中国传统经典。因此，郭秉文自幼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这些成为其教育思想的文化渊源。

1896年，郭秉文自清心书院毕业，在该书院任教一年；后在海关、邮政和浙东产金局等处任职，直至1908年赴美留学。[②] 这段阅历，使他扩大了对中西方文化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1897年成立的中国现代最早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与清心书院有不解之缘。它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文化，出版教科书和工具书籍，成为联结中西文化的纽带。1914年郭秉文回国，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16年，任清心书院校长，其博士论文中译本在该馆出版。这表明，郭秉文的文化理念与清心书院和商务印书馆的宗旨颇为契合。

留学美国期间，郭秉文十分关注国内教育改革问题。他选择"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作为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就是要展现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漫长的发展历程，对传统教育的盛衰给出透彻的观点，并勾勒现代教育变革的景象。[③] 这篇博士论文融会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观念，表达了对中国教育历史演变的"通识"观点。

郭秉文的通识教育理念对其办学活动及自身发展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首先，在办学实践方面，以自由教育理念为指导，确立南高师、东南大学及附中的办学宗旨，聘用大批归国留学生和国学人才，注重科学与人文的平衡，完善课程设置与教学管理，促进了人才培养、现代科学发展和文化建设。

---

① 郭秉文.《对于孟禄中国教育讨论之感想》,《新教育》第四卷第四期。
②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③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by Ping Wen Kuo, Paul Monroe's "Preface", Published by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1915, v.

受郭秉文教育理念的影响，从南高师到东南大学及其附属中学，自由教育传统一脉相承。

在大学培养模式方面，致力通才教育。不仅所聘名师具有通识的理念与通才的能力，而且在学科建设上注重科学与人文的平衡，营造优美育人环境。张其昀回顾说："据作者所知，南高虽分为许多部，但有一共同倾向，即注重国文，注重科学的国文，且认为，造就优良师资的先决条件，欲图国文之进步，必须将俗语俗文在相当程度之内，加以洗练，使渐与雅语雅文调和，又须使文字内容不悖于近代思想与科学方法。""刘伯明先生深恐母校同学失之过专，常常提倡博约之旨"；"南高学生倘不致变成狭隘的专家，昔年良师提携之功，诚不可没。""留学生与国学大师的合作"。"调和文理，沟通中外，实在是当年南高办学的宏旨。"①

在国际教育交流方面，郭秉文经常考察国外高等教育，邀请美、英、德、印度等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1920—1924 年间，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杜威、孟禄、克伯屈、罗格、麦克尔等人，德国哲学家杜里舒、韦里博士，印度诗人泰戈尔等来东大讲学或演讲。特别是罗素、杜威、孟禄的中国之行，在中国高等教育界产生重大反响。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东南大学的国际声誉，也促进中外高等教育和文化的交流合作。

在中学教育方面，郭秉文同样注重自由教育。在 1916 年出版的《学校管理法》中，他指出："宜知如何培养儿童天赋之性质，能使之独立也。夫欲使儿童之独立，则必先使儿童有自由之思想，自治之能力，与自生之技术。"②这些论述，继承和发展了教育乃"个体参与日常生活之准备"的理念，对附中教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郭秉文博学多才，在社会文化事业方面做出卓越贡献，这是与他所受通识教育密不可分的。

郭秉文既是著名校长、教育家，亦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在文化、经济、外交和社会服务方面贡献良多，堪称"通才"之典范。

1922 年，在任东南大学校长期间，郭秉文兼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编译出版《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他在序中评价其价值："全书千七百余页，单字都十万余言，间以精图，缀以附录，详审赅博，蔚为巨观。不特前此坊间所刊字典，未见其俦，即东邻所出英、和文诸字书，亦尚无此巨帙。其裨益于教育与文化者，讵

① 张其昀：《南高的学风》，载左惟等编《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1－186 页。

② 转引自陈履伟：《郭秉文教育思想在附中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载东南大学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2 页。

可自矜，而其能适应今日知识界一大需要，则所深企也。”[①]这是中国学术界、文化界的重要成就。

此后，郭秉文曾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中华教育促进协会会长；在纽约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出任会长；担任中国首席代表，出席四届世界教育会议，连续三届出任会议副会长；担任中国国际研究所所长，泛太平洋协会会长，中国季刊发行人。在经济领域，他曾任上海信托公司总经理，中国海关税务局总税务司，工商部国际贸易局局长，巴黎商务总会会长，中国财政部次长，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总长兼秘书长，等。这些头衔背后，凝聚着郭秉文的才华与奉献，也折射出通识教育的价值。

四、对当今教育的启示

与当今学术界对通识教育的阐释相比，郭秉文对通识教育并没有作过多的理论分析，而是从自由教育的理念出发，结合教育史实与现实变革，探究教育的性质、特征、涵义与功能。其通识教育理念涵盖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丰富内涵，对当今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通识教育是受教育者通向成功之路

郭秉文认为，通识教育是个体参与社会生活之准备，其内容极为广博。郭秉文的教育实践表明，实施通识教育，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通向成功之路。当今社会发展对于人的知识、能力和文化素质要求日益提升，个体要成功参与社会生活，须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和多项才能。这就要求学校教育应树立通识教育的理念，通过课堂教学、教师人格感化和校园文化熏陶等途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更好地适应社会要求。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需要重视和加强通识课程的教学。

2. 推进通识教育需要融合中西教育之长

东西方教育均具有自由教育的传统，推进通识教育，应有历史与国际视野。从教育传统中，我们能够认识通识教育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辨析和传承千百年来我国教育制度所证明的具有活力和韧性的优良因素，以适应现代社会变革和教育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发展，需要开拓视野，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从国际教育比较中，认识通识教育的丰富内涵。立足国情，学习和借鉴

① 郭秉文：《韦氏大学字典序》，载东南大学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9 页。

那些适于中国社会发展要求的西方教育理念，取长补短，使之与本民族文化教育传统相融合，促进我国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更好地发挥通识教育的育人功能。

3. 大学教育应以育人为本，实行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结合

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以培养专门人才为导向，存在过分专业化的弊端，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通才”，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尽管一些重点大学开始重视通才教育，积极探索新的培养模式，但由于办学理念、招生标准、课程模式和教育教学管理等因素制约，仍存在不少困难与问题。最近，杨福家院士呼吁在中国推广实施“博雅教育”。他提出，世界一流大学都把育人放在第一位，中国大学教育，要拥有广博的知识，博学多闻，博古通今，培养学生文理相通的能力；提倡“做人第一，修业第二”。[①] 这些建议是与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成功经验相吻合的。

4. 教学课程需保持人文与科学的平衡

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体现了一定的办学理念，是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大学培育通专结合的人才，需要改革过分专业化的课程设置，推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一方面，建立以核心课程为主导，文理学科交叉的通识教育体系，另一方面，改善师资结构，鼓励更多名师教授通识课程，提升教学水平和成效。通过加强通识课程教学，培养大学生的完整人格，改善其知识结构和能力，提升综合素质。

总之，深入探究郭秉文的通识教育理念及其成功实践，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人才培养规律的认识。历史经验和现实要求表明，加强通识教育是培养优秀人才的有效途径。这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① 屈建成等：《院士炮轰高教怪象：一二三本之分“完全错误”》，《武汉晚报》2014 年 7 月 5 日。

留学教育与中国近代大学的定型

——以1920年前后三所国立大学改革为例*

◎张亚群(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中,一个国家通过留学教育,借鉴、吸收别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大学制度和办学模式,这是普遍存在的教育现象;对于"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的国家,尤其如此。中国近代大学制度发端于清末的西学东渐与废科举、兴学堂,经过民国前期的教育改革而逐渐定型,其中留学教育所发挥的媒介作用不容忽视。从20世纪初年兴起的留日运动,到连绵不断的留欧、留美浪潮,留学教育培养出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不仅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推动了国内教育的改革与发展。1920年前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改革实践,就是颇具典型的事例。这三所国立大学的成功改革,推动了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定型。

一、留德教育与北京大学的改革

中国人留学德国始于1876年官费生军事留学。1881年清政府又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10余名赴柏林学习。据旅德华人

*[作者简介]张亚群(1961—),男,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

注:本文发表于田正平等主编《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141页;张亚群著《科举革废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6-172页。

学者孟虹等人统计，1901—1902年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现为洪堡大学）注册学习德国文学、哲学、政治或神学等的中国学生就有120余人。[①] 在1908至1910年前后，中国留德学生有77人，少于留法、留英者，而略高于留俄学生数。[②] 与同期留日、留美相比，留德学生人数明显偏少。尽管如此，留德教育对于民国初年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影响却并不逊色于留学日、美或欧洲其他国家。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以来，德国大学制度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影响遍及美、日等国，以德为师是中国近代大学改革的必然选择。做出这一正确选择并付诸实践者则是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

1907年7月至1911年11月、1912年9月至1913年4月，蔡元培两次赴德求学，在莱比锡大学广泛研习与教育有关的数十种课程。[③] 这段留学经历对于蔡元培教育理念的形成及其后在国内的教育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就职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短短七个月内，蔡元培所厘定的教育方针、大学宗旨和大学设置标准，奠定了民国教育的基础。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提出大学是教授高深学问之所，强调文、理学科的学理作用，重视学术研究，废止经科。这些内容表现出德国大学理念的导向，而与清末所仿效的日本分科大学模式相异趣。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推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其中所受德国大学教育模式的影响则更为明显。

首先，在改革方针上，蔡元培强调学术自由。他后来回顾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④]这一指导思想是与德国的大学理念一脉相承的。德国大学制度的精髓是学术自由的原则，它"既适合于教授的教学自由，也适合于学生的学习自由"。"学术自由成为德国大学的保障，正是因为学术自由的原则，才使德国大学在19世纪成为进步思想的中心，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⑤]。

这种学术自由的精神，通过蔡元培的大学理念，转化为北大的改革举措。表现之一，不拘一格选聘人才。北大聘用教师不受学历、年龄、学术派别、国籍的限制，主要视其有无学术积累、研究兴趣和新思想而定。所延揽的文科教师中，既有留学东洋、信仰马克思学说的李大钊、陈独秀，也有留学美国、信奉实用主义哲

① Meng Hong, Dagmar Yü-Dembski. Chinesen in Berlin. Berlin: Die Ausländerbeauftragte des Senats von Berlin, 1996: 31.
② 王奇生. 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57.
③ 田正平. 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98－199：204.
④ 蔡元培.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C]//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第七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89：200.
⑤ 贺国庆. 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2)：119.

学的胡适，还有留欧归来、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的“文化怪杰”辜鸿铭；一些虽未出国留学或未读大学，但在某一学术领域却颇有研究心得的学者，如梁漱溟、刘师培等，也被破格聘用。表现之二，推行校内民主管理。主要包括：学校设立评议会；设立教务处、总务处、行政会议和各种委员会；各学科（系）成立教授会；教授参与学校重大决策和学术、行政管理，由此确立了“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表现之三，改革不适应的教学体制。率先将清末以来所实行的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并采用“单位制”（学分制），以增强学校办学和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与适应性，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

其次，在学科设置上，蔡元培崇尚德国式的“纯学术观念”，强调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①]依此办学理念，蔡元培大力扩充北大的文、理两科，在原有中国哲学、英国文学、数学、物理、化学五门之外，增设中国史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和地质学四门；把工科逐步并入北洋大学，所节省的经费用于理科建设；商科并入法科，另将北洋大学的法科并入北大。1919 年，取消文、理、法三科界限而列为 14 系，基本体现了现代学科分类的特点；废学长，设系主任，实行跨系选修课程。

第三，重视科学研究，创立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创办学术刊物。蔡元培主张：“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②]自 1918 年开始，北大先后设立国文、英文、哲学、政治、经济、法律、数学、物理、化学、俄文、地质等 11 个研究所。在此基础上，1920 年又加以改组。其《研究所简章》明确规定：“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 Seminar 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暂分四门：国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③]这里的 Seminar，是德国大学最基层的学术组织，为德国大学最重要的制度特点之一。蔡元培将研究所的建立作为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可见其所受德国大学观念影响之一斑。因条件限制，当时北大只创立了国学研究所，但它“已树立起一种新型研究机构的样板，并对中国的新学术体制的形成产生了影响”[④]。此外，北大建立了

① 蔡元培.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C]//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第六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8：352.
② 蔡元培.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C]//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第六卷）. 北京：中华书局，1988：352.
③ 朱有瓛.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68.
④ 陈洪捷. 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63.

哲学会、理科化学演讲会、国文学会等各种学术组织，并创办《北京大学月刊》(1923年改为《国学季刊》等四种季刊)、《新青年》、《国民》、《新潮》、《国故》等学术刊物。

蔡元培1917—1923年间在北大的改革实践，是与其留学德国所形成的大学理念密切相关的，由此创立了中国近代国立大学改革的崭新模式。这一改革使北京大学脱胎换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也推动了国内其他大学的改革。北大所倡行的选科制改革，为1922年的《壬戌学制》和1924年的《国立大学校条例》所采纳，逐步推广到更多高校，这“实在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①。北大改革所孕育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方向。

二、留美教育与东南大学的创立

在1908年前后，受外部留学环境变化和国内教育发展的影响，中国出国留学重心逐渐从日本转向美、欧诸国，其中留美教育成为牵牵之大端。清末以降，留美教育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以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及由其发展而来的清华大学最为典型；此外，我们也能从民国中后期其他大学的改革模式，以及大学设置标准的演变中，得到更多的例证。② 1921年由郭秉文创办的国立东南大学，从师资来源到办学模式，深受留美教育的影响，形成了具有鲜明美国色彩的大学改革模式。

东南大学的前身为清末三(两)江师范学堂，1915年复办后改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清末其他独立设置的高等师范教育机构一样，三(两)江师范学堂深受日本教育模式的影响。在清末办学期间，先后在此任教的日本教习多达29人③；而1905—1911年间该校的40名中国教席和日语译员中，就有9名曾留学日本，另有6人为国内学堂(包括教会学校)毕业，其余多为科举功名或职官出身。④ 复办后作为六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性质未变，仍以培养师资为办学目标，但在办学模式上却逐渐受美国大学教育模式的影响，以至于6年之后最终改制为国立综合性大学。之所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主

① 何炳松. 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C]//张元济. 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105.
② 邓岳敏，张亚群. 探析民国时期大学设置标准的演变[J]. 交通高教研究，2003：(6).
③ 汪向荣. 日本教习[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90－91.
④ 苏云峰. 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1903—1911[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9－120.

要是因为以郭秉文为代表的一批留美归国毕业生发挥了推动作用。

郭秉文1908年赴美留学，先攻读理科，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科，获得教育硕士、哲学博士学位。他是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学生，1915年返回原籍江苏后，即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1918年后他就任代理校长，次年任校长。为了提升南京高师的办学层次，郭秉文广揽留学人才尤其是留美毕业生，并促成由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迁入南高师。据统计①，1918年南高师94名教职员（包括兼任教员9人）中，有外国专门大学毕业、肄业者32人，其中留美者24人，留日、留英者各有3人、1人；另有美籍教员3人。陶行知、陈鹤琴、廖世承、陆志韦、艾伟等教育专家前来任教。以留美毕业生为主体的师资结构，不仅充实了学校的教学、管理和科研力量，而且为引进美国大学模式铺平了道路。

在学科建设上，郭秉文立足于师范教育，不断加强教育学科建设，但不局限于师范教育。其办学目标是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楷模，“寓师范于大学”，将南高师改建为一所多学科、综合性的大学。为此，学校从1915年只有国文、理化两部和国文专修科，逐步扩展到1920年拥有国文、体育、工艺、英文、商业、农业、教育七个专修科和文理科（下设八系），从而为创立综合性大学奠定了必要的学科基础。

在外部环境方面，郭秉文把握大学改革的机遇，广泛寻求各界支持。民国初年，教育部曾拟议在南京建立一所国立大学，但因经费缺乏、政局动荡等缘故，迟迟未能实现。1917年《修正大学令》颁布后，大学设置标准放宽，学制改革迫在眉睫，创办国立大学的时机成熟。郭秉文一面游说各方，力主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建立综合性大学，使之兼有培养师资的功能；在蔡元培、云六等一批学者支持下，这一大学改革方案终被教育部所接纳。另一方面，郭秉文利用留学美国期间与中国留学生、侨界、外国学界的广泛联系以及在国内教育界的影响，多方筹集办学经费，为东南大学的建立提供物质保障。1921年7月，郭秉文兼任新成立的东南大学校长，1923年南高师并入东大。

东南大学的创立与发展，是中国近代大学发展史上一次重大变革。它从原有的日本师范教育模式向美国大学模式转变。与北京大学改革相比，东南大学的改革同中有异。其基本相同点包括：崇尚学术自由，坚持学者治校和学生自治；重视招揽人才，带动学科建设；强调文、理渗透，促进学术研究发展；以学系为本位，实行选科制和学分制。不同点主要在于：东南大学在办学理念上注重“四

① 朱有瓛.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653－660.

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人文与科学平衡、师资与设备平衡及国内与国际平衡；在学科结构上，强调多学科并举，学与术并重，初设文理、教育、农、工、商5科22系，后发展为6科31系，是当时国内学科最为齐全的大学；在领导体制上，建立校董会，将一些热心教育的实业家和社会名流吸纳为董事，使之发挥筹措经费、舆论宣传、决策咨询及监督校政的作用。

上述大学改革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所大学所受德、美两国教育特点的影响。东南大学主要借鉴美国的大学模式，而美国大学在19世纪后期吸收了德国的大学制度与办学经验。因此，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在办学理念和改革举措上，具有某些相通之处。另一方面，美国的大学制度结合本国实际而发展、创新，在20世纪初已形成不同于德国大学教育的特点。如：既重视理论科学研究，又关注应用科学的发展，重视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建立董事会组织，沟通大学与社会的联系，等。美国大学发展的新特点，藉由留美教育的媒介，对东南大学改革产生示范效应。其影响之大，从东南大学师资构成中留美学者比例之高即得到明显反映。据不完全统计，1915—1925年间，有将近60名留美归国学生在南高师和东南大学服务，其中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者就达11人。[①]在美国大学模式的影响下，东南大学与北京大学在改革取向分道扬镳。

南京高师改制为东南大学，在中国教育专业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郭秉文、刘伯明、胡先骕、杨铨、任鸿隽等一批留美学人的努力下，《学衡》杂志独成一文化学派，“中国科学社”大力推进科学文化传播，东南大学俨然成为南方之学术重镇与“近代中国科学的摇篮”。[②] 东南大学的改革，掀起了国内高师改办综合大学的潮流，开创民国后期综合大学设立教育系、院之先河；其设置董事会之举，也为其他大学所仿效，并被正式列入《国立大学校条例》。

三、留日教育与北京师范大学的定型

中国人赴日留学兴盛于清末“新政”时期，其特点之一就是偏重于师范教育。留日学生深切感受到：“日本以区区之岛，崛起东亚，究其自强之要政，莫不推本于国民教育。”[③]因此，这些学子呼吁清朝统治者重视发展教育，并积极投身于国

① 田正平. 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416－418.
② 王信凯. 现代中国教育专业化之形成过程——南京高等师范学院与东南大学个案研究(1914—1928)[J]. (台北)东方人文学志，2003：(3).
③ 刘显志. 论中国教育之主义[A]. 张枏，王忍之. 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C]. 北京：三联书店，1963：887.

内教育变革。民国初年，留日学生总数虽呈下降趋势，但研读师范者仍占较大比例。据《中华民国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①]，1914—1915年留学日本官费生共853人（未包括预备科学生254人），其中学习师范者有137人，占总数的16%，仅少于学习工科（290人）、医科者（144人）。另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31年留学研习教育科共有42人，其中留日17人，留美16人，其余为留学法（2人）、德（5人）、英（2人）。可见，留日师范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留日教育对中国近代师范教育模式的定型产生深刻影响，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制为师范大学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前身为成立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是中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的起点。它历经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变迁，至民国初年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年代前后，在国内纷纷设置单科大学及高师改办综合性大学的潮流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没有并入普通大学，而是升格为独立设置的师范大学，在国立大学改革模式上独树一帜。这一大学改革模式的形成，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中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提高教师人才的培养层次和学术水平；另一方面也是清末以来仿效日本所建立的高等师范教育体制的延续与发展。

清末民初，留日毕业生群体具有一些重要特征：其一，以研习教育为主，熟悉日本师范教育模式，致力发展国内师范教育。范源濂1898年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大同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他曾在东京创办速成法政、师范诸科，广纳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服部宇之吉的翻译助教。陈宝泉1904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邓萃英、李建勋分别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后均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三人先后担任北京高师校长，其中陈宝泉任职长达九年。其二，在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和教育部（学部）的人员构成中，留日毕业生占较大比例，对学制修订、课程设置等实践层面的改革产生直接影响。[②] 范源濂在清末任学部参事，民国初年几度出任教育部次长、总长，重视发展国民基础教育。陈宝泉清末任学部实业教育司司长，1920年冬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1923年7月兼任教育部代次长。邓萃英1922年8月以教育部参事兼教育部代次长。这些留日学者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对北京高师的改制、升格产生重大推动作用。

---

① 沈殿成. 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上册）[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297.
② 田正平. 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353，359.

在学科建设方面，北京高师按照教育部定章，完善学科门类。至1917年，已成立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物理、物理化学、博物六部，并根据中等学校师资需要，开设教育专攻科、手工图画、国文、体育等专修科及音乐训练班、职工科。自1919年开始，学校先后创办了《数理杂志》、《理化杂志》、《博物杂志》、《教育丛刊》、《史地丛刊》、《英文丛刊》、《国文学会丛刊》、《心理杂志》等专刊，推动学术研究的开展。为了提高学科程度，1920年学校将本科延至四年，次年又把课程分为四年、六年两科；继开办教育研究科后，1921—1923年，陆续增设了理化、博物、数理及国文、英语、史地各部的研究科，培养研究人才。另一方面，学校聘任大批归国留学生作为教学和研究的主力，尤以留日毕业生为多数。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丁文江、傅铜、邓以蛰、张敬虞、陈映璜、毛邦伟、林砺儒、高步瀛、杨阴榆等，其中不乏东京高师毕业者。这些举措为师范大学的成立奠定了学术与人才基础。

为了因应学制改革和师范教育发展的需要，北京高师力主将高师改制为师范大学。从1919年起，在历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上，北京高师的代表据理力争；师生们不断著文宣传这一改革主张。1922年10月，在北京政府教育部召开的“学制会议”上，李建勋校长代表北京高师提出“请改全国国立高等师范为师范大学案”，从师范教育之目的、方向、训练等九个方面，论述师范教育应当单独设校；高师“亟宜提高程度，延长修业年限为六年，与其他六年制之大学平等，改成师范大学。除设教育课外，宜兼设学生毕业后应担任教授之各种学科”。[①] 此案最终由会议通过，为《壬戌学制》所吸收，仅将师范大学修业年限改为四年。这就为北京师大的诞生提供了法律保障。其后，由范源濂、袁希涛、李煜瀛、邓萃英、陈宝泉、程时煃、张敬虞组成筹备委员会，并推荐范源濂为北京师大首任校长。这些筹备委员除李煜瀛留学法国外，大多具有赴日留学或考察学务的经历，而日、法两国师范教育模式本是一脉相承的。从北京师大筹委会的构成，到校长的选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师范教育理念的影响。

1923年7月1日，国立北京师大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大学定型的又一重要标志。学校以造就师范与中等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研究专门学术人才为宗旨，重视人格教育。本科设有教育、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史地8系，另设体育、手工图画2个专修科，实行学分制。师资阵容壮大，董事会参与学校重要事务的决策、监督与管理。在北京师大的带动下，国立武昌高师、北京女高师、成都高师相继改制为师范大学。此后尽管师范教育存废之争时起，北

①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68.

京师大几经分合，数易校名，但始终未改自己的办学模式。实践证明，在教育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初期，相对独立的高师办学体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能较好地满足不发达国家的师资需求。师范大学办学模式的创立，对20世纪中国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近代大学的定型受教育内外部诸多因素制约，以上仅以三所国立大学为例，探讨留学教育与中国近代大学定型的密切相关性。同一时期国内其他公、私立大学的办学模式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留学教育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郭秉文、范源濂等早期留学者，具有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根底，他们在借鉴国外大学模式的实践中，能够立足本国的教育实际，推动中外文化的互补和融合；虽然彼此所秉持的大学理念略有差异，但都能尊重、支持各自对大学改革模式的选择。这些无疑是三所国立大学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大学改革模式铸就了各具特色的办学风格。北京大学重视学术自由、基础科学研究和文理综合，东南大学注重多学科综合和应用科学的发展，北京师大重视普通教育的研究和教师人才的培养，这些办学传统影响至今。

郭秉文在 TC(1911—1914)
——社会生活史的视角*

◎周慧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前　言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简称 TC)中国学生群体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甚为深广,而作为 TC 博士学位获得者的第一位中国学生,郭秉文无疑是明星级人物。既往研究成果中,学界对其创办东南大学独特的办学理念、教育思想、中外教育交流及博士论文的影响力有相当的认识①,对其办学理念的"美国色彩"达成共识,"他(郭秉文)是按照美国模式来推进教育事业的②"。但是,有一个特别奇特的现象,学界广泛认同在美留学(特别在 TC 期间)对郭秉文影响巨大,却甚少有史料能对这一结论作出推演,对郭秉文在 TC 学习期间的情况,大多履历般一

*[作者简介]周慧梅,(1975—),女,河南延津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近代社会教育史。

①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田正平:《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谢长发:《借鉴与融合——留美学生抗战前教育活动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冒荣:《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陈竞蓉:《教育交流与社会变迁——哥伦比亚大学与现代中国教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杜成宪等:《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等。

② 周谷平、朱绍英:《郭秉文与近代美国大学模式的导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 7 卷 5 期,2005.

笔带过,语焉不详,甚至以讹传讹(如师从孟禄,英文版出版时间,英文版序、学位类别、将 TC 等同哥大研究生院等),换句话讲,对于 TC 期间学习情况对郭秉文的影响,学界在没有史料做立论支撑的情况下得出了一个"结论",曾和一些素有研究心得的学者交流,史料匮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在学术研究中极为尴尬。笔者借在哥大 TC 访学契机,查证郭秉文英文版博士论文及相关档案,并以郭秉文后人 Carllyn Hsu 女士的授权档案资料为佐证,借助相关研究成果,应"郭秉文研讨会"师范学院会议筹备组邀请,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对其在 TC 学习期间(1911—1914)历史做一探索,还原郭秉文真正而全面的学习面貌。本文包括的问题如下:

(1) 郭秉文为什么选择进入 TC? 学业成绩如何? 同时期的博士获选人的成绩对比及修业年限。

(2) 郭秉文的硕士及博士论文选题是什么? 包括指导老师,选题初衷,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期其他博士的论文选题;就读期间与哪些教授有较深的交往和情谊?

(3) 郭秉文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生活(主要是社团活动)怎么样? 郭氏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选择师范学院动机、学业成绩及修业年限

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留学生,1911 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 TC 攻读学位的郭秉文年届而立,履历丰富,却大多与教育无关。1908 年赴美国伍斯特学院(Wooster College)自费留学时,郭秉文已经 28 岁,在国内有长达 10 年的工作经验,凭借娴熟的外语长期从事海关、邮局和浙东厘金局等工作,仅有数月在清心书院担任教员[①];郭秉文进入伍斯特学院主修理科,1911 年获得理学士学位。该学院的葛德卫博士在撰写《郭秉文与伍斯特学院》一文时,也曾提到郭氏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放弃之前研修法律的计划"[②]。可以推测出,出国留学前或到美国之初,"教育"作为专业并没有进入郭秉文的视野。

这个推测,可以从郭秉文博士论文英文版的"个人简介"得到佐证。1914 年出版的英文版博士论文的正文后附有"vita",从对国内十年的工作经历的英文

① 目前学界大多认为担任一年清心书院的教员,但就郭秉文博士论文的英文版的"个人简介"(vita)中描述,他只在清心书院担任几个月的教职,九年半的时间在上海海关、上海邮局办公室等工作。

② (美)葛德卫:《郭秉文与伍斯特学院》,选自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83 页。

表述看，对担任清心书院教职（和教育有直接关系）并没有太多感情，数月后弃去教职时，采用“成功通过海关考试”的词语：

Soon after his graduation he became one of the teachers of the Lowrie High School. A few months later, having successfully passed the necessary examinations, he was appointed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for nine years and a half he served in various capacities in the following departments: the Shanghai Customs House, the Shanghai Post Office, The Kashing Customs Station, The Hangchow Custom House, and the Eastern Chekiang Likin Collectorate. ①

尽管表述中采用的是第三人称，但按照出版惯例，“vita”或由作者提供，没有史料证明该文是郭秉文直接操刀，但可以肯定的是，郭本人是认可这种表述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郭秉文“弃法律就教育”？

目前学界公认的说法，他选择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初衷是“有感于‘培养人才，则有赖于教育’”②。伍斯特学院的葛德卫博士也证明这一点，认为郭氏在该校读书时对教育改革产生了兴趣，放弃了之前研修法律的计划，转投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③换句话讲，郭秉文选择教育作为专业方向，其兴趣点却在于“教育改革”的力量，“国事败坏，思之以革之者”，他在博士论文中做了进一步阐述，在论及“教育与民族进步”关系时强调：“现在中国的教育改革为一枢纽，牵动各种改革事业，皆随之而变化；因为教育为国家造就栋梁之才，置国家磐石之坚”。④ 这个选择缘由和国内“教育救国”的舆论遥相呼应⑤；一些留学生放弃之前的专业，纷纷转向“教育”⑥，次年进入 TC 的蒋梦麟“弃农就教育”亦是如此。有留学生专门撰文分析了中国学生“弃实业而从文哲”心态变化，“一言以蔽之，

① Ping wen Kuo,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Vita,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14, vita.

② 高明：《郭故校长秉文先生行状》，选自《郭秉文先生纪念文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 年版，第 4 页。

③ （美）葛德卫：《郭秉文与伍斯特学院》，选自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83 页。

④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now forms the very pivot around which all other reforms turn, for it is to education that China is looking for the men to steer the ship of state into the haven of safety. Ping wen Kuo,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Vita,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14, P163 - 164.

⑤ “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见佚名：《教育通论》，《江苏》第 3 期，1911 年。

⑥ 据统计，1920 年代前留美学生中有 80％选择农业、矿业和商业，20％选择经济、政治科学和教育。详见 Shu His-chang, Modern history of China's sending students aboard, Shanghai, Chung Hua Book, Co., 1929, P28.

即归国后无正当之用途。无论在外国时所习何科,归国后辄以官吏及教员两途消纳之,此外虽有间执他业者,亦多用非所学。”[①]而选择教育作为研习学科,即能在“官吏和教员”两途之间游走,适应“归国后畸形的从业环境”,亦能践行所服膺的“教育改革”力量及顺应国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心态。从郭秉文和蒋梦麟回国后从业轨迹看,他们全部精力亦放在了“教育改革”的推动上(做校长),而不是教育学术和教学实践。

1911 年的 TC,中国学生群体并不庞大。据保罗·孟禄回忆,1905 年 TC 迎来第一位中国学生,之后的数年每年一人,这种局面到了 1910 年得到改观[②];据 Dr. Kao 统计,孟禄认为有“持续增长”(continually increasing)的 1910 年有 2 名中国学生,郭秉文入学的 1911—1912 学年有 3 名中国学生注册入学,其他国家的学生(除去美国)是 57 名,当年 TC 入学总人数为 1 476 人。[③] 中国学生占师范学院学生总人数的 0.002%,绝对属于少数群体。而考察此时期的 TC,经过 Mr. Vanderbilt、院长詹姆斯·罗素(Janes Earl Russell)近 10 年的苦心经营,TC 在美国教育研究机构中声名鹊起,其在教育领域的博士授予规模也最大,以 1905 年为例,当年全美共授予 6 个教育领域的哲学博士学位,全部来自 TC。[④] 詹姆斯·罗素在全美范围内为师范学院网罗优秀师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杜威亦被聘为兼职教授,名师璀璨,囊括了全美教育各个分支学科领域发展的关键人物,中国学生师承大师的机会颇多。郭秉文 1912 年获得硕士学位,随即选择“教育基础理论”方向,师从 Prof. George D. Strayer,攻读博士学位。

就 TC 的培养目标看,外国学生要通过该院组织的考试(1. 甄别运用英语能力;2. 申请各级学位的英语考试),哲学博士学位获选人要修满 72 学分,入学及学位考试对英语娴熟的郭秉文没有任何挑战,学业成绩为中等略下,与美国学生的成绩有一定差距。以 1912 年的学业成绩单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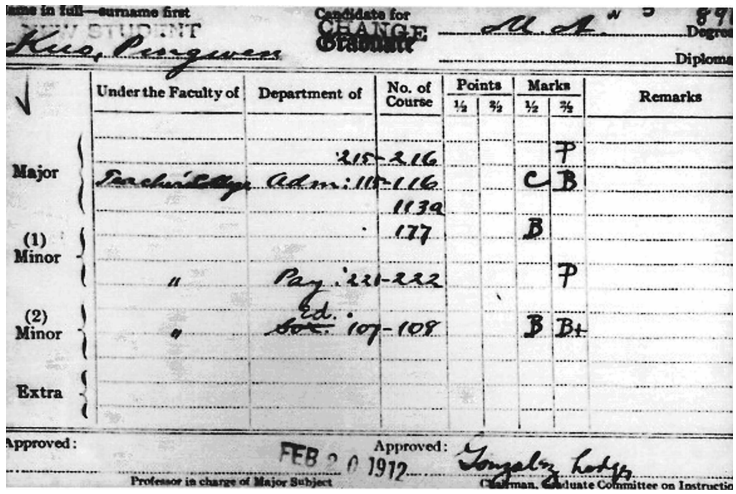
---

① 张贻志:《告归国留学生》,《留美学生季报》1916 年春季号。

② Paul Monroe, Project for training foreign students of education in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survey for foreign lan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achers College, Report of the Director, ‘Dean's report’, 1921,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3.

③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ttending Teachers College during the period 1909—1929, students from other lands, and total enrollment in the College, Lin Ying Kao. Academia and professional Attainments of Native Chinese students Graduating From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09—1950).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51, P43.

④ Doctorates Conferred by American Universities. Science, New Series, Vol. 22, No. 559 (Sep. 15, 1905): 321 - 327.


Name in full—surname first
NEW STUDENT
Kuo, Pingwen
Candidate for
CHANGE
Graduate
A. M.
Degree
Diploma
Under the Faculty of
Department of
No. of Course
Points
Marks
Remarks
Major
Teachers College
Admin. 115-116
113a
117
C
B
(1) Minor
B
"
Pary. 220-222
Ed.
P
(2) Minor
Soc. 107-108
B
B+
Extra
Approved:
FEB 20 1917
Professor in charge of Major Subject
Approved:
Chairman, Graduate Committee on Instruction

资料来源：Registrar office，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得到家属授权使用。

从档案资料看，除去两门课程是“通过”外，郭秉文的学业成绩大多为“B”，最低为“C”，最好成绩为“B+”，同时期的美国学生成绩大多在“A－”到“B+”之间。师范学院采用的是权重分数法，分 A、B、C 三个等级 9 个分阶（每个分阶相差 1 分，A+为最高 12 分，C－为最低 4 分），相应的分数被划分为 10 个不同的等级，如 10.16 及以上被划分为 10 级，7 分及以下被划分为 1 级，等级越高，学业成绩越好。郭氏的成绩等级换算后分别为 7 级（9.01－9.35，郭氏 B+，可对应为 9 分）、4 级（8.01－8,35，郭氏 B，可对应为 8 分）和 1 级（7－；郭氏 C，可对应为 5 分）。这个成绩分布，与其后的中国学生极为一致。Dr. kou 曾对 TC 中国毕业生（1909—1950）抽样调查，结果显示，Ph. D 学位获得者的学业等级均值为 4.2，美国学生学业等级均值为 7.15（1940—1950 年间的随机数据）。[①] 有研究者曾对此进行追因分析，认为中国学生的学业成绩与英语水平有显著相关[②]，此种推论得到孟禄教授的高度认可。[③] 但具体到英语水平较高的郭秉文，此种分析却难以解释妥帖，是否和郭氏之前教育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缺失，抑或与郭的兴趣点等存在正相关，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① Lin Ying Kao. Academia and professional Attainments of Native Chinese students Graduating From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09—1950).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51, P80－82.

② Chu, Jenning Pingkwei,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2, P51.

③ Chen Paolo-chuen, Tao Hsing-chih, Monroe's Discussion on Chinese Education, Chung-Hua Book, Co., 1922, P15.

郭秉文 1911 年入学,1912 年获得 M. A 学位,1914 年 7 月前后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据 Dr. Kou 统计:中国学生攻读学位的年限:M. A 的平均年限为 1.6 年(1—6 年),哲学博士的平均年限为 5.2 年(2—11 年);M. A 的毕业平均年龄为 30.1 岁,哲学博士则为 32.6 岁。[①] 具体到郭秉文,不论其 M. A 学位抑或 Ph. D学位耗时均低于平均值,郭氏入学时年龄偏大(31 岁,毕业时为 34 岁)的劣势得以极大扭转,郭秉文教会学校出身以及多年海关工作经历所累积的娴熟英语表达能力及丰富的社会阅历,对其顺利毕业起到了关键促进作用。

论文选题、旨趣及指导老师

郭秉文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为"中国现代学校的教师"(Teachers for Modern Schools in China),其后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继续围绕中国教育问题,选择了中国教育史,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为题目,自称其撰著目的在寻求历史借鉴,"正言之,为模范,为指南;反言之,则亦前车之覆辙也"[②]。此外,亦希望为英语系的人们介绍繁复的、不同时代中国教育制度的演进(Kuo,1914,Preface,V)。实际上,郭秉文选择教育史作为论文选题,或许和当时 TC 为教育史研究重镇(以孟禄为学术领袖的教育史研究团队)有关,有不小比例的学生以此领域来选择论文题目。据不完全统计,在 1899—1921 年间,TC 的 191 篇研究生学位论文中,46 篇属于教育史领域,接近四分之一。[③] 在郭秉文攻读博士学位(1912—1914)期间,孟禄的学生就有 6 位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内容全部属于教育史领域(沈文钦,2013)。

郭秉文采取了通史式样布局论文。郭氏坦言这种通史式写法会遗漏或简化一些重要的材料,但利大于弊,不仅对中国教育感兴趣的西方读者有所帮助,也为自己进一步研究奠基基础。该论文共分 8 章,资料大致分为两类,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时段从上古到宋朝宁宗时期)和法国教育家 E. C. Biot 的《中国学校铨选史》(1847 年出版)是论文前六章的主要资料支撑,梳理了从上古到中华民国成立的教育制度沿革;第 7 章"当前重要教育问题"及第 8 章"结论"的资料来源为教育法令、教育部及其他教育团体的报告、教育期刊文章等。

---

① Lin Ying Kao. Academia and professional Attainments of Native Chinese students Graduating From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09—1950).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51, P59 - 60.

② 郭秉文著、周棨译:《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22 年,第 14 页。

③ Birdseye, C. F. Individual training in our colleg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7:134.

郭秉文对中国教育问题的态度，集中展现在论文第7、第8章中。第7章围绕“教会学校与公共教育体系的关系”、“教育与道德发展”、“学校纪律与管理”、“新教育体系的融资”、“普及教育”、“教师培养”和“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七个内容展开。在论述展开过程中，郭秉文既有的学习经历、宗教信仰和擅长交际的个性成为底色，如论及“教会学校与公共教育体系的关系”，郭氏不忌自己教会学校出身，大力肯定教会学校（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培养和正在培养大量毕业生，教会学校亦在积极响应政府提倡“通过教育培养民族自信心”，提出教会学校能制定更适合时代发展的教育目标，补公共教育体系之不逮。“教育与生活的关系”部分，特别援引江苏省教育会会长黄炎培对当时与中国生活相脱节之新教育的质疑，在对黄炎培实用主义教育主张表示支持的同时，还专门对黄氏其人及主张做了注释说明。郭秉文学成归国后，黄炎培不仅为其博士论文中文版（1916）作序，盛赞“空前之作”，更以江苏省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全力支持郭秉文南高师改造及组建东大。第8章郭秉文援引孟禄“从实际使用出发学习”的观点，批判中国传统教育远离日常生活，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西文化各有短长，国人不应妄自菲薄，“搜集前清至今日兴新教育之经验，再参用欧美制度之所长，以及保存吾国自古教育之所宜是也。”[①]孟禄应邀为郭秉文博士论文中文版做序（1916），“郭博士之著是书，不独表扬己国之事迹，且俾西人，恍然又悟于中邦维新之变革”[②]，给予大力肯定。

审视郭秉文博士论文风格，8章加上介绍，篇幅长达171页的正文却只有105处注释（分布如下：Introduction，1；chapter Ⅰ，15；chapter Ⅱ，12；chapter Ⅲ，12；chapter Ⅳ，7；chapter Ⅴ，10；chapter Ⅵ：24；chapter Ⅶ，19；chapter Ⅷ，5）（Kuo，1914），第七章注释19“黄炎培”却是全书唯一一处对资料作者进行详细介绍的（Mr. Huang yan pei，162页）；在chapter Ⅷ结论章节中，在课程（Curriculum，166页）和教育模式（Method of Education，167页）中援引资料全来自孟禄（Chinese Students' Monthly，1913），占该章节的资料来源的40%。虽不能依此来做因果推论，不能武断郭秉文借此和孟禄、黄炎培联络情谊，但郭氏审时度势、人情练达却是不争事实。

郭秉文博士论文于1914年由师范学院出版，依照扉页署名“Ping wen Kuo，M. A.”及“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Philosophy，in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Columbia University”字样说明，足以证明

① 郭秉文著、周槃译述：《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22：155.
② 孟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序一》，郭秉文著、周槃译述：商务印书馆，1922：6.

郭秉文此时尚没有被授予博士学位。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哥伦比亚大学要求博士毕业生出版博士论文的传统,博士论文出版和博士毕业时间不一致是常事。

郭秉文英文版博士论文的扉页,同样传达了值得深味的信息,作者下方的身份说明罗列了郭氏一系列社会职务,不仅江苏省欧美教育委员会成员,甚至不定期的中国海关事务成员也赫然再列(member of the k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al commission to Europe and America and Sometime Member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 Service),加上"Preface"(Vi)标注的写作时间看,至少1914 年 6 月 1 日前,郭秉文似尚未正式收到南高师的聘书。之前研究成果中认为"次年(1915 年,笔者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导师孟禄教授为之作序"及"1914 年,当郭秉文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准备博士论文时,收到正在筹备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校长的一封聘书,邀请其做教务主任"等结论(冒荣,2004),似需进一步推敲斟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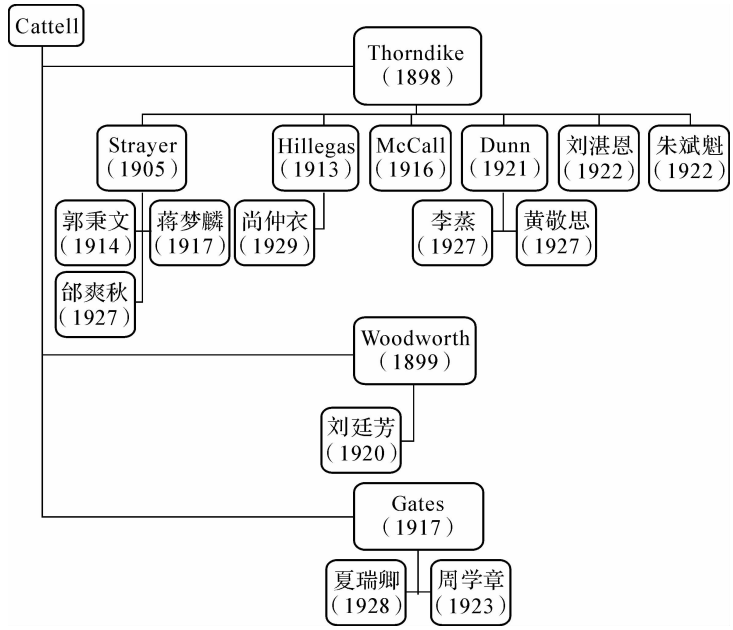
有意思的是,郭秉文虽与孟禄关系颇密,却选择了以"教育行政与统计"为专长的 Prof. George. D. Strayer 作为导师。据研究者统计,在 1903—1922 年,孟禄先后指导了 23 名教育史方向的博士论文,却无一名中国学生。[①] 当然,这和郭秉文、蒋梦麟(1917)之后近 30 年再无中国学生选教育史领域为论文题目、不受中国学生青睐有很大关系(刘蔚之,2013),但郭秉文、蒋梦麟(A study in Chinese principle of education)均以教育史领域题目却同时选了 Strayer 为导师,背后却意味深长,学缘圈子应该是最大考虑。

从外在条件看,孟禄 1897 年博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受过系统的史学和社会学训练, 1899 年被院长罗素招致麾下,担任教育史副教授,1902 年晋升为教授,研究专长为教育史; Dr. Strayer 师从师范学院知名心理学家 Thorndike,1905 年获得博士学位,1910 年出任教育行政学系主任。两人相较,Strayer 最为突出的是学缘优势,刘蔚之博士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②]。人情练达如郭氏、蒋氏,深知学缘、流派留绪所及,借助导师 Thorndike 的关系,拥有庞大学缘关系网的 Strayer 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

---

① 沈文钦:《教育史学科在美国的早期制度化历程——以孟禄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中心的考察》,《教育学术月刊》,2013(10).

② Thorndike 师从师范学院心理学系知名教授 J. M. Cattell(1905),与 Prof. Woodworth、Prof. Gates 为同门兼同事,而 Thorndike 指导的 Hillega(1913)、McCall(1916)、Dunn(1921)同时留在师范学院担任教职。1930 年前获得博士学位的 7 位中国学生(教育心理学方向)均与 Thorndike 有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详见:刘蔚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学生博士论文分析(1914—1929)》,台湾:教育研究集刊,第 59 辑第 2 期,2013,第 31 页。



Dr. Strayer 学缘谱系图

资料来源:刘蔚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学生博士论文分析(1914—1929)》,台湾.教育研究集刊,第59辑第2期,2013,第31页

后来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截至1940年代,Dr. Strayer又先后指导了邰爽秋(1927)、何荫棠(1933)、陈友松(1935)和刘彭年(1944)等4位中国研究生。陶行知的博士论文指导导师亦为Prof. Strayer(惜未能完成),Dr. Strayer成为师范学院指导中国学生最多的一位导师。据刘蔚之博士统计1914—1930年15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除去Strayer亲自指导的3名外,其他12名的导师分别为R. S. Woodworth(刘廷芳,1920)、E. L. Thorndike(刘湛恩,1922;朱君毅,1922)、I. L. Kandel(庄泽宣,1921;李建勋,1925)、W. H. Kilpartrick(张彭春,1922)、A. I. Gates(周学章,1923;夏瑞卿,1928)、F. W. Dunn(李蒸,1927;黄敬思,1927)、R. Pintnar(陈选善,1928)和M. B. Hillegas(尚仲衣,1929)。Prof. Woodworth和Prof. Gates为Strayer的师叔辈,而Dunn和Hillega则为Strayer同门,根深叶茂的导师人脉几乎悉数将中国学生覆盖进来(刘蔚之,2013)。门派之别,同学之谊向来为国人所重视,"中国为人情社会,而且实际上地缘较血缘

作用更大,同乡同学又是维系人情的重要纽带,这种感情因素往往制度化为社会组织功能"[①]。作为 Strayer 指导的第一位中国博士学生,郭秉文获得了不可多得的人脉积累契机,为其和其后师范学院中国学生群体结下了繁复的学源谱系。

当然,尽管选择 Dr. Strayer 为导师,孟禄对郭秉文的学业指导并无阻滞,郭秉文在论文的"Preface"中,除去对导师 Dr. Strayer 和 Dr. Farrington[②] 致以敬意外,还对师范学院教授 Farrington、Monroe 和 Hillegas、哥大教授 Hirth、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的 Dr. Sailer 及同事 Messrs 作了致谢。[③] 从孟禄为郭秉文博士论文中文版做序以及其回忆中对郭氏的描述,都表明两人之间虽无直接师承关系,但谊如亲炙。这也为两人之后 20 余年的亲密合作(如孟禄前后 10 余次访华,几乎每次都和郭秉文有过交集)打下了坚定基础。从其博士论文及选课记录所传达的信息看,郭秉文与师范学院兼职教授杜威(John. Dewey)没有学业交集。

社团活动及人际谱系

郭秉文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读书之时,恰逢近代中国第一次留美高潮。随着旅美学生人数的增加,原本松散的留学生联谊组织渐趋正轨,经过多方努力,特别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顾维钧直接推动下,1911 年全美学生会组织得以统一,留美中国学生总会成立,下分东、中和西三个分部,郭秉文当选为首任主席。

实际上,郭秉文之所以能当选,哥伦比亚大学以 36 名中国学生居各高校之首(中国学生居多的高校为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各 26 人,麻省理工学院 24 人,芝加哥大学 22 人等)(1910 年,朱庭琪)、人数众多有关,与曾担任东美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同时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顾维钧的支持有关;更为重要的是,郭秉文在伍斯特学院时积累了宽厚的人脉。早在 1909 年,郭秉文与姻亲

---

① 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3).

② 郭秉文在 Preface 先后表述有出入:致谢段开篇便向 Prof. Farrington(教育史专家)致敬,"I wish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Professors Farrington, Monroe and Hillegas, of Teachers College……"而该段最后再次提到 Farrington,且将其列为自己指导老师之一,"My thanks are especially due to the two professors in charge of my major studies, Dr. Strayer and Dr. Farrington, who have taken a deep interest in my work for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笔者尊重作者的说法,照实录入。

③ Ping wen Kuo,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Preface, P. v-vi,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1914.

王正廷(耶鲁大学学生,时任留美学生青年会总干事)、曹云祥(耶鲁大学学生,1922—1927年担任清华学校校长)一起,成立了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并成为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除此之外,郭秉文还担任东美中国学生会(The 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of the Eastern States)总秘书。① 东美中国学生会以"成立最后,而人数最多,势力最大",郭秉文作为该会总秘书,担任英文月刊《中国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②总编辑,加上郭秉文极善演说,为雄辩之士(朱友渔,1971),和中国留学生群体有大量交往。这些履历,为郭秉文当选做了重要铺垫。

在郭秉文等人的倡导下,夏季年会交流的制度化的同时,更加强了留学生与国内社会的联络,主要体现在办刊方面。中国学生会不仅对《中国学生月报》内容和目标做了改动,刊载载美国政治风俗并设立"学生世界",对回国留学生的情形予以详细记录,以期收"新大陆文化之导线,习英文者之良师,新学界不可不读"之效;而且增设《中国学生月报》中文版,以"年报"为名,"使国内之人略知美国情形及留学界情形","年报"纽约编辑国内"中华书局"代为出版,每年出版一期,至1914年元月出年报共3期,是年春季改为季刊。《留美学生季报发刊序》(Quarterly Report of Chinese Students Forward)开宗明义:"吾留美同人负笈海外,国人之所期望,父老之所训诲,固无日不以祖邦为念。羡彼北美民国,而欲以其目所见耳所闻心所得以为是者,语于吾国人。"(编辑部,1914)。揆之史实,尽管中国学生总会给予大量支持,编辑部历届主编及编辑殚精竭虑,但因经费距离等诸多原因,加上"季报常年亏损",与《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等教育杂志相比,发行量不足为道③,且订阅者大多为留学生,其时在国内影响也难以评估。实际上,以郭秉文为代表的留学生领袖,他们之所以坚持发行中文季刊的策略意

① Stacey Bieler, "Patriots" or "Traitors"? A Hi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Students, New York, 2003, P223.

②《中国学生月报》创刊于1905年,由美东中国学生会所发起,目的为联络留学生,"留学生散处于各方,声气不易贯通,故有月报。平日所用皆英文,且印刷亦较便,故用英文。"其内容有论说和新闻,"凡可以贯通声气者皆备载焉。"朱庭祺:《美国留学界》,留美学生会编:《庚戌年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6月出版。

③ 季报编辑部在美国,在上海出版,前后与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合作(1914年1月至1916年年底由中华书局印行,1917—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发行)。1914年总干事程懋庆与中华书局协商,议定版权归中华书局,须寄赠编辑部500册,1916年因季报常年亏损,遂减少为400册;1917年胡适继任主编后,改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每期印刷1000册(其中500册由商务印书馆直接寄给订阅者,其余500册在国内发行)。

义可能远远大于其实质内容,它与其说给留学生发表见解、相互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倒不如说是留学生面对国内时局变化时所自发形成且尤为必要的一种回应。

郭秉文在 TC 期间,还参加了中国教育研究会,该研究会成立于 1907 年前后,成员由师范学院的中国学生和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美国教授组成,就中国热点教育问题不定期举行讨论会。据顾维钧回忆"中国学生俱乐部"也是郭秉文常去的地方,他和郭秉文虽住同栋学生宿舍(Hartley Hall),因不同院系平日碰面的机会甚少,但在纽约领事馆举行的中国学生俱乐部月会成了两人增进友谊的平台,他们兴趣相投,热衷于谈论中美问题等问题。[①] 郭秉文还时常被邀参加纽约社会名媛的集会,同去的朱友渔(General Seminary in New York,1909)自称为"郭的跟班"(tag along),回忆郭秉文以"庄重、善谈、绅士般的学者气质"而成为最受欢迎公共演说家(public speaker)。[②] 借助校内外的社团活动,郭秉文得以结识全美各地高校读书的中国学生,加上郭秉文借助导师 Strayer 及知名教授孟禄等编织的学缘谱系,为其后归国办学、延聘大量留学生到南高师及东南大学、从事社会兼职(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都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读期间,郭秉文前后加入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Phi Beta Kappa ,由 Stanford University 授予)和 Phi Kappa Lambda(由 oberlin College 授予),成为其会员,并获得"Livingstone Fellowship in Education(由 Teachers College 授予)"(郭夏瑜, 1971)。根据朱君毅对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 37 所大学 644 名中国留学生(TC 博士论文,1922)研究发现:不同于美国学生,中国学生的学术工作和非学术工作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而且,这个显著相关还揭示了一个更意味深长的意义,即它表明中国学生在美国的非学术工作,是一个高度的学术型,而不是一个社会、娱乐和运动类型。非学术活动中,中国学生在美国的普遍参与和发展自己的能力,包括领导能力,几乎完全由学术讨论、演讲、辩论、写作等组成,其中学术贡献显然占很大一部分。另一方面,非学术活动,如各种形式的社会事务,从那些至关重要的奖学金

① We had interesting chats abou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 We talked about the contrast in their wealth and strength on the international scale and the reasons for it, as well as the ways and means of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详见顾维钧(V. K. Wellington Koo):*In Memoriam*,China Academy,1971,Ⅷ.

② We used to be invited out together to give talks to groups of society ladies. In those days, Dr. P. W. Kuo was always the favorite public speaker, for he had such a style and eloquence in his way of talking & presenting a subject. His dignified and impressive way of conveying his ideas always attracted attention. Dr. Andrew Yu-yue Tsu, 1971.

或荣誉组织看，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很少参与。[①] 而 Phi Beta Kappa 就是朱君毅说的至关重要荣誉组织之一。据 Kou 统计，在 1909—1950 年 408 名师范学院中国学生中，共有 2 人被 Phi Beta Kappa 吸收为会员，郭秉文为其一（Kou，1951）。从这点看，郭秉文的社会交际能力，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读书期间，在高度学术型的留学生圈子已经得到充分展示，为其回国后掌校南高师（东南大学）延揽留学生做了至关重要的铺垫。

朱君毅“在美中国留学生社会活动评判标准数值表”同样证明了这一结论。按照朱氏分类，郭秉文的社会活动（不完全统计）对应着如下数值（从高到低）：留美中国学生会主席（Chinese Student's Alliance in America）为 9.2；博士学位获得者（PhD）为 8.9；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成员（Phi Beta Kappa）分值为 7.4；留美中国学生基督会执行会理事（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和留美学生月报总编辑（Chinese Student's Monthly）均为 7.3；教育俱乐部或社团为 6.2—2.8 分（没有确切史料说明郭秉文在哥大未来教育社担任的职务）；省教育委员会委员（member of the kiangsu provincial educational commission to Europe）为 4.8—2.8 分。朱氏认为这些转换为数值的所有个人记录合并为其总内在信用（total credit therein）[②]，除去留美中国学生基督会和留美学生月报总编辑是在伍斯特学院期间担任，其余各种社会活动均是在师范学院。所以，师范学院期间是郭秉文在留学生群体中获得社会声望、积累人脉的关键时期。

---

① “This hig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clearly indicates that academic work has a significant bearing upon non-academic work. But it has an even more significant meaning: it indicates that the non-academic work of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is of a highly academic type instead of a social, recreational, and athletic type, as is the case with American students. The non-academic activities in which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n generally Participate and develop their capacities for leadership include, almost exclusively, academic discussions, speeches ,debates, writing, etc. , to which scholarship evidently contributes a large part. On the other hand, non-academic activities such as athletics, social affairs in various forms ,in which leadership would require qualities different from those essential to scholarship , are rarely participated in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Jennings Pinkwei Chu,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Qual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ir Succes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22:27－28.

② idid. ,42－45. (With the help of this scale, the individual records were turned into numerical values. If a student had several records in any one quality, then all the transmuted values were combined representing his total credit therein.)

结　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和讨论，主要研究发现可以总结如下：

(1) 郭秉文选择师范学院，动机在于“教育改革”的力量，而不在“教育”专业本身，这一点，从他回国后只担任教育行政职务可以证明，“公在校未任课”(吴俊升，1971)。相对同时期美国学生，学业成绩中等偏下，修业年限低于中国学生平均值。

(2) 郭秉文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选择中国教育问题，博士论文为教育史领域，导师 Dr. Strayer 研究专长为教育行政与统计，师范学院教育史教授孟禄和 Farrington 对其学业指导甚多，并与孟禄教授结下一辈子的友谊，孟禄对郭氏极为倚重，视郭氏为“最胜任、最可靠”的人。[①] 没有史料证明郭秉文在师范学院时期和杜威有学术交集。

(3) 郭秉文在师范学院期间继续热衷于学生社团活动，参与了各种类型的留学生组织(基督教学生会、东美留学生会)活动，并与关键人物王正廷、顾维钧等人有密切交往，当选为留美中国学生会首任主席(该位置在“在美中国留学生社会活动评判标准”分值以 9.2 分高居榜首)(朱君毅，1922)，积极推动《中国学生月报》增设中文版“年报”；通过社团活动广泛交结美国各高校中国留学生，积累人脉，他的宗教信仰(基督徒身份)为他提供了有利契机。

郭秉文作为师范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他不仅开启中国留学生在师范学院申请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新纪元，有意思的是，郭秉文兴趣点虽在于“教育改革”力量，但其选择师范学院主修“教育”，却推动了“教育”作为中国学生选择“Professional”的进程。截至 1950 年，先后有 47 名[②]中国留学生在师范学院获得博士学位；郭秉文在师范学院学习期间的成绩、学术兴趣以及学术成就，与其后的中国留学生有很多共性。郭秉文在师范学院期间利用社团活动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积累人脉，为回国后延聘留学生师资提供极大便利。他的博士论

---

① To carry out such an important and delicate mission, Professor Monroe invited Dr. Kuo to help him both as secretary and counselor. Indeed, he could hardly have found another person more competent and trustworthy than Dr. Kuo. . V. K. Wellington Koo: *In Memoriam*, China Academy, 1971, X.

② 关于具体人数，有不同版本，华东师大的丁钢教授认为有 48 人，其中获得教育学博士人数为 14 名，详见《20 世纪上半叶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一份博士名单的见证》，高等教育研究，第 34 卷 5 期，2013 年 5 月；而据台湾师大的刘蔚之博士考证，邱椿(1924)李昂(1925)未统计其中，相应总数亦会有不同。(刘蔚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中国学生博士论文分析(1914—1929)》，台湾. 教育研究集刊，第 59 辑第 2 期，2013 年 6 月)就目前笔者查阅的资料看，只发现 13 名中国留学生教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所以本文暂采用 47 名。

文“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更是开中国留学生以本土教育问题为博士论文选题先河，同后继者一起，为西方学界提供了一个更深入了解中国教育的机会[①]，引起并强化了美国知名教授对“中国教育问题”的强烈兴趣[②]，并同回国的哥大毕业生一起，直接推动了师范学院知名教授杜威（兼职）、孟禄和麦柯尔先后访华，扩大师范学院对中国教育改革影响的同时，也使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郭秉文与孟禄在师范学院时期结下醇深师生情谊，历经岁月发酵，慢慢延展成了中美文化交流的一座坚实桥梁，具有了历史的意义。不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1924）抑或华美协进会（Chinese Institute），两者早期事业发展都与孟禄、郭秉文的努力推动不无关系，这一点，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和师范学院的国际影响力扩大，意义都极为深远，值得深入探讨。

① Bailey 认为，在近代中国，相对于杂志论文，中国留学生的学位论文更有条理，用英文善于分析性地介绍了中国教育的现状。详见 Paul J. Bailey , Reform the People: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Popular Educa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1990，P6－7.

② 1921 年，孟禄在撰写“Project for training foreign students of education in Teachers College ,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survey for foreign lands”中，专门论及留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对美国的贡献，认为通过这些中国学生，让美国教师和人民开阔了视野，改变了对中国学生的印象，认识到他们中的很多人英语说得很流利，而且比一般美国学校的教师拥有更深厚的文化修养。（to realize that the Chinese are not all washer man, but that many of them speak better English and have a wider culture than the average American school teach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Teachers College, Report of the Director, ‘ Dean's report’，1921,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P11.

教育意味与持中之道：郭秉文的教育管理学思想*

◎陈学军（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对郭秉文思想的探寻不在少数①，但既有研究多专注于郭秉文办学治校实践与思想的考察，而缺乏对其学术思想的梳理与剖析。事实上，郭秉文不只是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管理实践的开拓者，也是我国现代教育管理学研究的开创性人物。本文以其《学校管理法》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两本著作为依据，提炼了郭秉文对教育管理的五个一般性主张。透过这些主张可以发现，郭秉文的教育管理学思想有着两个极其鲜明的特点：一是重视教育管理的教育意味，坚持教育管理的教育性与公共性；二是强调教育管理的持中之道，倡导教育管理在世界与中国、过去与当下、激进与保守之间求得一种平衡。

一、教育管理的教育性：为了教育而管理

郭秉文在《学校管理法》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学校管理法不是管理者可以武断擅定的，而是要依据管理的原理确定，其有三个具体的标准：一是要以学校之治安能否维持和校务之

*[作者简介]陈学军（1978—），男，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本文曾发表于《大学教育科学》2013年第2期。

① 奉莉. 近40年郭秉文教育思想研究综述[J]. 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5)：107－111.

进行能否辅助为标准；二是要以儿童天赋性质能否修养为标准；三是要以社会需用之人能否培养为标准[①]。这三个标准中，第一个标准强调的是教育管理的管理职能，后两个标准则侧重教育的要求，即教育管理要以能否促进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为标准。同时，郭秉文还指出，这三个标准的地位是不一样的。维持学校治安与辅助教务进行，虽是学校管理者的天职，但“学校之所以建设，校务之所以整理”，并不是为“学校校务本体之治安进行”，而是为了“运用此机关修养儿童天赋之性质与培养社会需用之人物”。那种“但求学校之治安与校务之进行，而妨碍儿童身心之发育，造就社会之游民废物”的态度与做法是不可取的[②]。换句话说，在郭秉文看来，教育管理是为了教育而管理。在教育管理的管理职能与教育要求之间，教育要求的达成是首要的，管理职能的履行则是从属性的，是为促进教育活动，实现教育目的服务的。

正是基于“为了教育而管理”的理念，郭秉文提出了各种极具教育意味的教育管理主张。首先，他强调，教育管理一定要以学生个体之天性为基础，以“学生”为教育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郭秉文没有纠缠于哲学层面有关人究竟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分析，而是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指出，现实中学生的种种性质倾向“有善恶之分、有发现早晚之分、有发展快慢之分、有长幼男女之分”[③]。这种“万世万国终无二人有同一之性质”的现实，意味着学生不可“用同一之方法以管理之”。而是否以学生天性为基础，以及能否促进学生天性发展，也成为判断教育管理善恶的标准。那种能够保存学生“固有之个性，而善为损益”的管理，才是管理学生之善法[④]。反之，则是管理学生之恶法。将学生个性的保存与发展而不是教学秩序或管理的经济性，作为评判教育管理优劣的标准，最为直接地说明了教育管理是为教育服务的，要以育人为本。

其次，郭秉文强调，作为教育组织的学校有着与其他组织不同的特征和使命。当时，受教育民主化与学生自治运动的影响，很多教育管理者主张变革传统的学校组织，将学校组织为家庭、城市或国家等。对此，郭秉文认为，从“养成遵守法律，奉行命令之习惯及独立之智能与合群之精神”的角度出发，可以引导学生将学校组织为家庭、都会或国家。但在此过程中，既要“注意于精神，不可但效其形式”，更要避免“模仿过度”而“学校反失其本体之功能”的问题。这是因为，

① 郭秉文. 学校管理法[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3.
② 郭秉文. 学校管理法[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3－4.
③ 郭秉文. 学校管理法[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4－9.
④ 郭秉文. 学校管理法[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0.

“学校究非家庭与都会、国家也”①。将学校组织作为家庭、都会或国家,并不是真的要把学校变为家庭、都会或国家,学校就是学校,它是为了达成教育目的而设的组织。因此,无论哪种组织形式,都需明确三个标准:第一,要计算何种组织形式最有教育之价值与完善之效果;第二,要考察何种组织形式最易培养道德与消灭不道德;第三,要研究何种组织形式为最合儿童身心发育与社会发展状况②。

再者,在郭秉文看来,各种具体的教育管理方法的选择,必须以积极实现学生的成长为鹄的。譬如,在激励学生方面,他认为用惩戒不如用诱导的方法。因为,惩戒倾向于抑制,诱导侧重于启发,抑制会摧残学生的能力,启发则会扩张学生的能力③。又如,在诱导儿童为善方面,他认为“记分列等之评判”方法虽能够记录学生的表现,鼓励学生勤勉用心,但亦会造成以分数等第本身为目的反而轻视学习的后果;“比较胜负”方法虽可以鼓励儿童竞争,但也会偏于表现较好者而忽视后进者,且容易引发嫉妒心和自私自利之心。因此,这两种方法在使用时,都需要加以适当的补救④。

可见,郭秉文对于教育管理教育意味的强调,既体现在“目的”上,也涉及“手段”本身。即,教育管理首先是作为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而存在的,是稳定教育教学秩序、为学生发展服务的工具;同时,教育管理除了工具价值外,还具有本体价值,特定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力量,要发挥其积极的教育效果。

二、教育管理的公共性:面向大众办教育

郭秉文所强调的教育管理的教育意味,又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的教育意味。在他看来,教育管理之所以要具有公共性是因为,教育是一项具有公共价值的事业。他说:“与国民进步最关系者乃教育”,“教育之改良为一轴纽,牵动各种事业皆随之而变新,教育造成人才为国家之栋梁,措国家于磐石之安”⑤。这是因为,“学生者,未来之国民也。”如果“不先有以培养之,则今日为不道德之学生,安能他日为有道德之国民”⑥。一个国家正是有了适宜的教育制度,才能使人民的性

① 郭秉文.学校管理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6-17.
② 郭秉文.学校管理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7.
③ 郭秉文.学校管理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26.
④ 郭秉文.学校管理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28-29.
⑤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47.
⑥ 郭秉文.学校管理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2.

情得到陶淑，并日趋于坚凝与齐一，魏然并立于天地间[①]。易言之，从教育中受益的不只是某一个体、群体或地区，而是整个社会与国家。

因此，郭秉文主张，一个国家应当积极地发展其公共教育制度。“所谓公共教育制度者，乃指国家所维持与管理之学校，所以为人民教育者。”他的这一概念，既强调公共教育制度在对象上面向的是所有公众，也指出了公共教育发展的首要责任主体是政府。

郭秉文强调，“教育者，人人所当受者也”[②]。一如当年陶行知给哥伦比亚师范学院院长迪安·罗素的一封信中所说到的：“我生活的唯一目的，不是通过军事革命，而是依靠教育来进行民主主义建设。”“我将回国同其他教育者合作建立我国有效的国民公共教育制度，以便仿效美国人的足迹，也能保持和发展真正的唯一能实现正义与自由理想境界的民主。”[③]郭秉文也深信，只有开通民智，启迪与发达人民的国家观念，民主共和的理想才有可能真正实现[④]。而他之所以写作《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一书，正是为了作“吾国公共教育制度沿革之概观”，以获取办理新教育的指南。他指出，在我国旧教育时代，对于普及教育的重要性知者寥寥，直至新教育制度确立，普及教育问题才盛昌一时。然而，即便此时，群众中也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接受了教育。在他看来，摆脱普及教育踌躇不前的状况，需要有效化解两大难题：一是要解决文字语言所造成的学习难繁问题；二是要解决学校建设所需教师的培养及其经费问题[⑤]。

普及教育难题化解的首要责任主体又是政府。郭秉文通过梳理我国古代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举士制度的关系发现，公共教育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行为。上古三代的教育制度与举贤任官制度基本上是合而为一的，学校虽不是专门造就官吏的场所，官吏却多出于学校。如此，“虽其教育制度有一部分为养成官吏之预备，然普通人之教育自初等以至高等皆秩然有序。”[⑥]两汉时期，选举法变更，虽然获举之士都入官，但官却非尽出于学校，从而使“人民之教育不为国家所重，而渐成退化之现象”[⑦]。唐朝时，试士属礼部，试吏属吏部，造成“士之获举未必入官”的情况，使得当时的士子多重考试而轻学校[⑧]。及至清朝前半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32.
③ [日]阿部洋. 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的陶行知[A]//周洪宇，等. 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C].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267.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2.
⑤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32－133.
⑥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20.
⑦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23.
⑧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77.

期,“学校在京师者贵族与特殊阶级之教育也,若各行省之书院,仅徒有其名。甚言之,亦不过为俊秀士子之地,徒无国家拟一普通学制”①。在郭秉文看来,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之所以分离,是政府窄化教育目的,无视自身教育责任的结果。政府主持教育“非以教育为目的”,而是为了“造成治事能吏”,“教育既为养成官吏之物,官吏已得,则教育为人民之一语早不成问题”。政府就像是“一采果之人,而以功名官职与他种荣耀为鼓励,其繁殖至于栽培、灌溉,则不过问焉”,“所谓公共之教育尽付私人或团体之善举”②。

同时,郭秉文也提醒我们,强调公共教育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并不是说其仅仅与政府有关。作为一项面向大众的事业,公共教育既需要政府承担主导角色,也需要多方力量和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一方面,就政府自身而言,需要融合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制度的长处,充分发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从而既能“破除省界地方观念而代之以国民自觉心”,又能“参合社会需要”、“谋本地之利益”③。另一方面,公共教育的发展也有赖民间力量的支持。用郭秉文的话说,“全国国民之教育问题,规模大而性质复杂,非但需最高之教育技能,且必以热诚、博爱与公心以赴之,方得成效之解决”④。他认为,东汉时期优良的社会风俗正是得益于私家学校“补国家学校之不足”,是“上下从事学校之效也”。

三、教育管理的本土化:建设合乎境地的制度

一方面,郭秉文对于西方教育制度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从创造美好国家前途的角度,对西方公共教育制度心向往之。另一方面,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所倡导的“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主张不同,他又有着明确的文化自觉意识,强调教育制度建设一定要在世界眼光中保持清醒的本土思考。

郭秉文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与该国家的特性,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国家的教育制度表现着国家的特性,而国家的特性又是国家教育制度者的造因⑤。他指出,我国人民富于平等精神,其教育制度也是这样。古制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受同等之教育,由匹夫而为卿相。秦汉以来,世世有之。时至近世,学制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44.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43-44.
③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48-149.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55.
⑤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3.

虽变，而平等精神仍存。无论官立、私立学校，自小学至大学，各种社会子弟均可入学。同时，我国人民也富于保守性，其教育制度亦多呈保守之现象。如登庸考试、国子监以及其他诸多教育组织，都经历了千年而没有什么变化①。

因国情有不同，善于彼者或不善于此，所以教育制度没有绝对善的，也没有绝对不善的，一切都“要以合乎境地审乎政治社会之现象为主”②。据此，在处理外国制度与本土实情的关系上，郭秉文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要理性评判不同国家教育制度的优劣。一方面，不同国家实施相关教育制度的时间有先后，我们不能抛开时序上的纵向差异，简单从横向层面对一个国家教育制度的优劣作出判断。郭秉文指出，我国的新教育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存在诸多不完美的地方，这主要是因为各国采用新教育制度的时间有长短，我国实施新教育制度为时不久③。另一方面，不同国家的教育宗旨亦有不同，对于教育宗旨不同之两国，也不可简单比较其教育制度优劣。郭秉文强调，“欲问何种教育制度能造成最善良之国民必先有一前提为，何国欲造成最善良之国民。能造成德国最善良国民之教育制度，未必能造成法国最善良之国民”。因此，一个国家必先要考察己身之需要，确立教养国民的宗旨，然后再选择特定的教育制度④。相应地，我们也只有结合一国基于自身需要所确立的教育宗旨，才能合理评判其教育制度的优劣。

其二，要避免简单将外国理想制度施于己国。一种教育制度，特别是国外的教育制度，虽然看上去很完美，但未必适合本国的情况。在当时社会精英普遍有着高涨的向西方学习热情的情况下，郭秉文指出，“求西学之热诚有一相伴之危险，不可不先事预防者。该恐致力西方教育太过，而忽吾国人民生活之动机”。要避免此种危险，就必须知道“教育之宜于西人者，未必皆宜于吾国民”⑤。否则，一味地模仿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便是削足适履，“必难获良好之结果”⑥。进一步地，郭秉文还强调，所谓外国理想的教育制度，在其自身实践过程中也显露出各种问题，未必能够取得成功。针对当时国内教育学者受美国教育影响而极力推崇学生自治制度的情况，他指出，美国人最初因学校欲补救训练管理之局限，而倡导学生自治制度，但从实际结果看，制度实施失败者很多，因此很多学校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3－4.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4.
③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4.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5.
⑤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50.
⑥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4.

又仓促废除了该制度①。

其三,要积极借鉴其他国家行之有效且适合我国的教育制度。反对外国教育制度的简单运用,并不是鼓励闭目塞听,或对其他国家教育制度视而不见、盲目排斥。深入地看,郭秉文所强调的是,要在权衡本土适应性与有效性的情况下,思考对外国教育制度的学习与借鉴,对于那些合理有效的外国教育制度一定要积极实施。在讨论教会教育与公共教育制度关系问题时,他便认为,考虑教会教育在满足社会教育需求方面的重要作用,我国可以结合日本和印度管理教会教育的经验,"采用承认之制,而不干预其宗教教授,惟限以实行一种教育标准而已"②。就教育与生活之关系问题,他也指出,"泰西各国文字教育与实验教育之相讼久矣,其结果则实验教育能使儿童得应社会与工业之所需,卒归胜利"。考虑我国"学生就学之目的"与"处境生活之需要",我们也应向这些国家学习,注重教育的实用性,"慎选教材"、"改进各种科目教授之法"③。

郭秉文本人所引用的孟禄在一次演讲中提到的话,或许最能体现他的教育管理本土化思想:"所当取法西方文化之所长与其精英,而非其糟粕也。采西方文化时,融会而非变置"④。在他看来,只要将世界眼光与本土思考结合起来,一方面采用欧美制度所长,一方面保存、发扬我国教育之所宜是,我们就能够迎头赶上,创造教育和国家的美好前途⑤。

四、教育管理的历史感:关注现实与过去之关系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管理史著作。在该书的绪言中,郭秉文提到:"何为而作教育制度沿革史,吾知研究历史、政治与教育者,必乐闻斯言也。盖欲考见吾国开化独早之由来,与夫数百兆人们结集之故,则不得不读此沿革史。欲寻求吾国操何治术,俾政体巩固,与夫人民得安居乐业,则不得不读此沿革史"⑥。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关注教育制度的历史沿革,主要不是为了记叙史实,而是为了解教育的过去,理解当下教育的来路,以及思考未来教育治理的去向。同时,他也是用这种方式提醒教育管理者确立教育管理的历史意识。

---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28.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22.
③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45-146.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50.
⑤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55.
⑥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

首先，郭秉文相信，现实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是经历史一步步演变而来的。正如涂尔干所指出的，任何一项教育主题或一个教育机构，都处在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的效果累积与时间演进过程当中，人们不能局限于自己所处的特定时代，而是必须把自己移送到历史的时间刻度的另一端，将过去作为“起点”，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才会达到今日的处境①。郭秉文也认为，教育管理很大程度上不是管理问题，而是历史问题。很多现实的教育管理问题，必须回到过去，才能明白现实的由来，找到问题的原因所在。他指出，新教育之所以不能适应社会，与生活脱节，便有其历史根源。我国文化初始之时，教育宗旨本是审察境地，以发达实利为事。但自汉代以后，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逐渐分离，以及教育的政治功能日益凸显，从而使“教育不为生活而设，乃为官吏之养成”，“父兄对其子弟之最高理想，即希其得入仕途以为荣”。“此种见解深入吾国之人心，往往轻视工业，以为有损于士子之价值。虽至今日，学校之毕业生仍以政府位置为报酬之具。法政学校招考则人数拥挤，而工业学校则应者寥寥”，并使“数千年之教育性质皆偏于文学、哲学与道德方面，而近世所谓实验教育则百不得一焉”②。由此可见，“所以成今日之教育者，岂偶然哉”③。

其次，郭秉文认为，现实虽是历史一步步演变而来的，但今未必胜于古。晚清民初时期，我国社会各领域都深受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进化论强调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其隐含着一种单一的、线性的历史发展思维，认为社会是依循固定的程式不断前进的，今必胜于古。郭秉文讨论教育与生活关系问题时指出，我国古代早期的教育，都以人我相亲、国家安宁为达教育宗旨之道，以修己治人为教育不刊之经，强调教育要审察境地，发达实利。到了古代后期及新教育产生时，教育却疏离于生活之外，不切实用。有如黄炎培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序言中所提到的，这让人“转觉古代教育之犹近人情而相与尊之矣”，突破了“进化论之壁垒”。此外，郭秉文也认为，孔子所提出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反三”等教育法“颇合于自动主义”，与“当代教育之法不期而合”④，王阳明“所主张之教育宗旨大类裴斯泰洛奇派，深信教育为发达个人能力之温和主动物”⑤；而在新式教育中，这些方法与理念反倒为背记、强制等所替代。诸如此类的观点都表明，郭秉文相信过去未必不如今。

---

① [法]涂尔干. 教育思想的演进[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47－148.
③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20.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1.
⑤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39.

再次,郭秉文也强调,时事有变迁,宜于古者未必宜于今[①]。他指出,我国人有“好古心”传统,习惯于尊重过去之一切事物,追溯既往之文明,而忽视将来之进步[②]。这既造成我国采行新教育较晚,也造成了教育管理上的各种问题。民国初年,学校风潮迭起,严重影响学校教育的秩序和效果。郭秉文认为,“学校风潮之起,其咎非学生所独任”,也有学校行政者管理的问题。在崇尚自由与活动精神的大趋势下,行政者仍用旧制学校管理方法对待学生,持强压与骄蛮之精神,滥使权力以驾驭学生,必然要引起学生反对力的发生。作为应对,学校行政者不能囿于过去的管理习惯,要根据新的社会和教育情势,提升自身的素养与能力[③]。

可见,郭秉文不仅强调教育管理的历史性,而且倡导一种辩证的历史观,不迷信“今必胜古”,也不陷于“复古主义”。如此,我们既可了解现实之由来,也可从历史中寻得“模范”、“指南”或“前车之覆辙”[④]。

五、教育改革的渐进性:反对教育骤几而变

我国近代教育改革者总是在处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上,表现出极其矛盾的心理,由此也形成了不同人士对于教育改革的不同态度。心仪西方现代价值者,往往持激进改革的态度,主张全盘西化,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与教育制度;迷恋本土传统文化者,则往往持保守态度,推崇传统的教育形式与方法。

有如前述,郭秉文尤为强调在各种教育管理问题上,实现本土与世界、过去与当下的平衡。正因如此,他在教育改革的立场上,也选择了激进与保守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既不盲目媚外、求新,剧烈地变革既有的教育价值与制度;也不盲目自大、囿古,一成不变地坚持传统的教育理念与实践;而是在全面考察、理智分析基础上走务实的渐进改革之路。郭秉文坚信:“中国教育家之所当保持者,古代文化之所长与其精英,而非糟粕也。所当取法者,西方文化之所长与其精英,而非糟粕也。采西方文化时,融会而非变置,以渐进而非骤几。”[⑤]

郭秉文的渐进改革立场,一方面体现为,对于传统的教育观念与教育内容不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4.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3.
③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27.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
⑤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50.

是简单地排斥与否弃，而是在肯定其价值的基础上寻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道德教育问题上，他就认为，传统经学是“吾人高尚思想与言论之宝库。凡个人、家庭与人民责任，皆不能脱此藩篱。受其陶淑者，能养成一种高尚之道德及优美稳定之性质。”尽管他相信旧经学与旧道德之教授法“必不能若昔时之重大”，“当合近世之需要”，但对于“以复古为志者”提出的“置经学于小学校中占重要之位置”的主张，他也不一味反对，而是强调“新教育之能力若善用之，则其成效必出乎吾人之所料”①。此外，郭秉文也认为，不仅传统经学有助于现代道德教育，中国古代文学同样可经变更发挥积极效用。他指出：“中国之文学资料有意撰，有稗官，有传记与诗赋，于养成人民道德之生活均占极高之价值。不独关于智慧一方面而已也，且所以振触其感觉，导引其动力和其思想行为与志气之力甚巨。他若历史则古人之理想功业，跃现于纸上，读其书想见其丰功伟烈，有动于心。遂能铸成高贵品格。”②

另一方面，郭秉文的教育渐进改革立场也体现为，在倡导新兴教育价值与教育制度的同时，也关注其局限、现实适应性以及实施条件等问题。譬如，他虽极力主张培养儿童自由之思想、自治之能力与自生之技能，但也直言，“新教育制度既行后数年，学生未免过趋自由”，并对学生过度自由所引发的学校暴动提出批评。郭秉文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过度自由以及学校暴动问题，既与“学生颠倒自由平等之想象，不受约束而肇祸”有关；也与学校行政缺乏治事之才，教员团体素质不良有关③。因此，学校行政改革切不可一下子由严格高压变为放任自流，不能“迈大步子”，只能“一步一步走”。同样，在当时教育界普遍倡导的“学校全体共作之精神”与“学生自治”问题上，郭秉文也主张审慎对待，不可求之过切、操之过急。他说：“若遇机缘，有几种自治团体，使学生分任一部分关于整理学校秩序之事。”不过，“所宜输入者也，但含试办性质则可，若骤改常度，则易滋流弊”。因为，“仓卒废除严厉之管理与约束，太驰其利”，反倒会“不胜其弊”。“自严厉管理时代而入学生自治时代，其过渡当以渐，庶无放纵扰乱之虞。”欲自治制度之有成效，既要学校行政者加以承认，也须是学生能力所及之事。只有教职员知其管理权之界限，学生又敬守学校行政者法权的情况下，学生自治方可顺利进行④。

郭秉文的渐进改革理念倡导的是一种宽容精神与经远之计。他呼吁时人对于新教育要有耐心，虽然“将今日之教育与欧美相较，其幼稚而待改良之处甚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23－124.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24－125.
③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26.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28－129.

多”,但“欧美之教育制度,屡经变革,殆数百年,时至今日,未尝无不满人意者。吾国之忽改新教育制度,而所改者较旧制所差极远,则学校之瑕疵非出乎意料者”①。各种不尽理想之问题,也皆“因旧制度与新制度之过渡尚未完毕,是亦无足怪者”,毕竟“改良非可骤然而致”②。

对照郭秉文办学治校实践思想,可以发现,其学术思想与实践行动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此种将“治事”与“治学”紧密结合的态度,尤其是其所强调的教育管理的教育性与持中之道,对处于社会转型与教育急剧变革时代的当下教育管理者而言,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55.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78.

郭秉文“训育”方法与儒家教育思想的关系*

◎李淑萍　刘学伦(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

一、前言

郭秉文(1880—1969)先生是中国史上第一位教育学博士,同时也是近代著名的教育思想家。郭先生之学术养成虽深受西方新式教育的影响,然实际上他是一位“博览中西,贯通古今”的学者。他的许多教育观点,皆从中西教育的理念中,汲取双方的优点综合而成。郭秉文有关“三育并举”的主张,特别是训育的方法,透过对中国传统古籍的阅读与梳理,笔者认为即是郭氏贯通中西教育思想明显之一例。历来关于郭秉文教育理念的研究,较少涉及与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关联性,故本文拟从郭氏主张之训育的方法,以《论语》、《孟子》、《礼记·学记》的内容为研究范围,探讨郭秉文提出的训育方法与儒家教育思想的关系,并进一步说明郭氏的训育六大原则,与中国传统的道德、学术、才识等教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者简介**]李淑萍(1966—),女,中国文学博士,现任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专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字训诂学、汉字文化学及辞书编纂研究、“中央大学”校史。刘学伦(1974—),男,中国文学博士,现为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陆军专科学校兼任助理教授。

二、训育的方法

何谓“训育”？郭秉文于《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中认为“训育”，即是“取训练与管理兼重主义。训练注意启发，使知其所以然；管理注意实践，使行其所当然；二者交相为用，以期知行合一。”[①]又说：“本校实施训育之大别有二：一曰修养，二曰服务。修养方面，于学生则重躬行与省察；于职员，则重感化与考察……服务方面，于学生则重实践与研究，于职员则重示范与检查。”[②]以今日观点来说，“训育”是一种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建立道德观及操守，并且培养学生热爱社会，遵守纪律和热心助人等精神的一种品格教育。关于训育的方法，郭氏云：

> 欲使学生之体魄、精神、道德、学术、才识各方面有相当之发达，固不可以抑制，亦不可以助长，惟宜启学生之自动之机，使自向所定之标准进行，以至于能自立而止，所当依据之原则分列如下：（一）利用天性之原则；（二）触发统觉之原则；（三）引起兴味之原则；（四）应用暗示之原则；（五）选择思想之原则；（六）养成习惯之原则。此本校训育方法之大概也。[③]

郭氏认为“训练注意启发”，换言之，训育必须注重如何启发学生自动学习之机。今参证于《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所载，郭氏云：

> 除《礼记》之外，述古时教育之法者，要以孔子之言为主矣。其言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是当时教育法，颇合于自动主义。[④]

郭秉文深谙中国古代儒家已有符合自动主义的教育观点，故在此基础上，结合西方教育思想，进一步提出“利用天性”、“触发统觉”、“引起兴味”、“应用暗示”、“选择思想”和“养成习惯”等六大原则。在《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之训育标准，郭氏主张，养成学生之人格要素，“必具有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而于道德、学术、

---

①《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4—55页。
②《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第55页。
③《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第55页。
④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9页。

才识三者又有适当之培养。”[①]是知，学校教育之训育标准，囊括了道德、学术、才识等方面，以下将就这些原则与儒家教育思想在渊源上的关系，进行分析，兹分述如下：

(一) 利用天性之原则

郭秉文于“训育”方法的六个原则，首先提出要注重学生的“天性”。“天性”指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包括人格特质与才性。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云：

> 《礼记》中《学记》、《内则》两篇，于当代教育法，言之颇详，极端排斥谙记法，与近世教育法，多有吻合。一本人生天然之理，以开发其天性为主，谓学仅为得一种知识不可也，必也心得，始谓之无负所学乎。[②]

郭氏文中所及《内则》一篇，据唐孔颖达疏云：“名曰《内则》者，以其记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闺门之内，轨仪可则，故曰内则。”[③]知其主要内容，实为家庭教育之属。郭氏此处所论学校教育当以《学记》为主。《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又载：

> 战国时有孟子，服膺孔子之道者也，于教育之法，亦颇有所称道。其言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申言之，孟子之教育法，专注学者之个性，顺其性而陶冶之。[④]

郭秉文已明确指出《礼记·学记》以及《孟子》所言的教育法，实皆着重于个人的天性，顺其性情而加以陶冶、开发。其中关于孟子之教育法，郭氏进一步阐释曰：

> 有如时雨化之者，谓学者天资聪颖，有闻必悟，教者因势而利导，犹如及时而雨之，则其化速矣。有成德者，谓学者好谈道义，则纳之于成德之正轨。有达材者，谓学者富于理想，或治事之能力，各因其所长而达之。有答问者，谓就所问而答之也。所私淑艾者，谓人或不能及门受业，但闻君子之道于

①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第55页。
②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第9页。
③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注疏·内则》，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517页。
④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第9－10页。

人，而窃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诲之所及。综观孟子五者之教，皆因材而施，或小成，或大成，无弃材、无废人。教育普及之道，其在斯乎！①

人之天性禀赋虽有不同，但只要透过适当的因材施教，都可以有一番成就。其最终结果，学生成就虽有高有低，但却能“人尽其才”，不放弃任何一位学生，所以“无弃材，无废人”，这才是普及教育的真正意义。

孔子教育学生，向来注重因材施教。而因材施教的前提，为师者必须充分了解学生性情、才能、志趣、优缺点等各方面的差异，引导他们发展自己的专业。因此孔门弟子中才会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之别。如此一来，再针对学生的差异给予适当的教育方式，以期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以诸弟子同样问“孝”于孔子为例：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②

从《论语》记载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四人询问孝顺之道，兼之孔子与樊迟的对答。孔子的回应因人而异，各有不同，原因在于这五人才性资质的个别差异。孔子对孟懿子、樊迟和孟武伯等人回应，从最基本的“无违”、“以礼事之”，到“不让父母忧其疾”的根本做起。回答子游、子夏时，则更进一步认为孝事父母还需要讲究恭敬、脸色和悦等态度上的表现。

除此之外，孔子对于众多问政、问学的应答，也是根据求教者的天性资质不同，多有不同的回复。这些都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具体表现。因此，在学校的训育工作中，教师职员在教育引导学生行为时，若不能针对学生的天性资质而有所调

①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第12页。

② 以上“问孝”四例，参见[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为政》，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年，第16-17页。

整，则会使学生产生抗拒的心理，而无法达到教育的成效。所以，在训斥导正学生行为时，必须衡量学生的人格特色、天性资质予以因材施教，此乃学校训育人员不可不慎也！

（二）触发统觉之原则

“统觉论”为赫尔巴特针对人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感官心理上所提出的一种主张。林玉体《西洋教育史》对此有详细的阐释：

> 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的“统觉论”（Theory of Apperception）认为观念、情感及意志，乃是心灵与环境相接触的结果。……“统觉”最强有力也最清晰不过的，就是新观念与旧经验相联合，此时所联合而生的印象，就是“统觉团”（mass of apperception）……儿童从熟悉的旧有经验，踏入到陌生但却与熟悉部分有紧密关系的新观念里。新旧结合成“团”，外来的变成自己的而形成“统觉”了。①

学习新技艺、新经验时，必须建立在旧有经验上，让各种经验连成体系，形成系统，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例如《礼记·学记》云：

> 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②

拨弄弦琴的基本指法不熟练，就不能把琴弹得出色；不广泛地学习鸟兽草木、天时人事等情状之譬喻，就无法正确地理解诗意，进而作出好诗；不学习基本的洒扫应对仪节，行礼就做不好。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学习要从根本做起。根基巩固了，才能进入更高阶的学习。因此，在学习“安弦”、“安诗”和“安礼”之前，必须先将“操缦”、“博依”、“杂服”的基础学好。此即是将旧有熟悉的经验，融入到陌生却又有熟悉部分的事物中，按部就班地学习。所以，《礼记·学记》云：

> 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③

优秀的铁匠之子，在学习冶炼修补铁器之前，必须先学会补缀兽皮以做衣裘。等

① 林玉体：《西洋教育史》，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第109页。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注疏·学记》，第651页。
③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注疏·学记》，第655页。

到熟悉如何缀皮成裘之后，要学习冶炼修补铁器也就相对简单了。杰出的弓匠之子，在学习屈木为弓之前，必须先经由软化柳条编制簸箕，练习矫揉手艺。等到这项手艺精湛之后，再学习制作弓具就比较容易。其原因在于冶补铁器和缀皮成裘、屈木为弓和软化柳条编制簸箕，它们制作“观念的相似性，有彼此增强作用”①。即是将旧有的经验运用在虽然陌生，但却与熟悉的部分有紧密关系的新观念中。在技艺学习的过程中，如能让学生将新观念与旧经验联合，成为体系，即可触发“统觉”，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更有效率地达到习艺的目的。因此，“触发统觉”的做法运用在学校训育工作中，也是必要的原则之一。

(三) 引起兴味之原则

不论是知识的学习，或是生活技艺的培养，“引发兴味”都是促成学生乐于学习的最大动力。因在“触发统觉”后，学习成效好，产生成就感，学生自然兴趣盎然，乐于学习。故《论语》云：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②

求学习艺若能不断地获取新知，以及时常温习已学得的知识和技能的话，那将是一件令人愉悦之事！学习新技能若是建立在旧有技艺基础上，使它们彼此之间能够联合，继而“触发统觉”，而达事半功倍的效能。学习效率好，学生自然乐于学习，产生兴趣，就容易引发学习的续航力。诚如《论语》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③、“学而不厌”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⑤，以及《学记》所载：“不兴其艺，不能乐学。”⑥皆是也。

对于教学者而言，老师在教学时要设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寓教于乐”，让学生乐于学习。《学记》云：“善教者，使人继其志。”⑦善于引导教育学生的人，之所以能够使学生继承他的志向，原因固然有很多，其中之一为教师在教导学生的过程中，能够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才能使学生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老师学习，继承其志，进而贡献一己之专业，服务于社会人群，以达训育之宗旨。

---

① 林玉体：《西洋教育史》，第 109 页。
②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学而》，第 5 页。
③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述而》，第 62 页。
④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述而》，第 60 页。
⑤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雍也》，第 54 页。
⑥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雍也》，第 54 页。
⑦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注疏・学记》，第 653 页。

(四) 应用暗示之原则

暗示即是诱导、启发。儒家的教育向来重视启发。老师教育学生,必须针对学生的资质能力,运用适当的方式让学生晓喻明白。正如《学记》所云:

> 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①
>
>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②

老师在教学时,必须考虑到要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让学生通晓上课的内容。如遇一种解说方式而学生不明白,就须再换另一种解说的方式,甚至要多方比喻,所举之例要简单明了,直到学生了解为止。为师者因为了解求学的深浅次第,就要针对学生的品性材质,广泛地晓喻使学生真切地了解学习内容。同样的,训育人员在引导教育学生时,也应当善于晓喻的三种方式:“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③利用引导的方式,不强迫学生勉强就范。其中“开而弗达”即是引导学生启发而不直接表达,使其能自动思考,反省自身的行为。

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在追随孔子学习的历程中,他深受夫子启发教育之影响,因此,颜回称赞孔老夫子的教育之法是“循循然善诱人。”然而,孔子对于启发教育的实施仍有其原则,如《论语·述而》云:

>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④

孔子教导学生,一定等到学生意欲通晓而却不明白、想要说清楚却无法表达的时候,才会去启发他。如果学生不能举一反三,则不再勉强告知。启发教育的进行,也是要促使学生自动自发,本身须有强烈学习欲望,方施以启发诱导的学习方式。如《学记》云:“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⑤又如同《学记》云:

---

①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注疏·学记》,第653页。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注疏·学记》,第654页。
③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注疏·学记》,第653页。
④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述而》,第61页。
⑤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注疏·学记》,第655页。

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则小鸣，叩之以大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以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①

唐孔颖达疏云：“此皆进学之道也。”是知，求学进德之道如此，从事训育工作之精神亦是如此。

(五) 选择思想之原则

训育工作要掌握“选择思想之原则”，因为思辨能力是人类独有的特性。《论语·公冶长》：“季文子三思而后行。”②是说季文子为人谨慎，考虑周到，凡事都想清楚后才去做，避免轻举妄动，造成遗憾。说明吾人凡事要化为行动之前，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做出正确、理性的选择。故知，思考是内化知识的重要途径。孔门教育，重视学思并重。如《论语·为政》云：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③

我们要把书本学到的知识落实为生命中内化于心的永恒价值，“思考”就是必要的转换过程。如果只知一味地学习而不知思考，就不知所学为何，益处何在，容易产生迷惘和困惑。若只知思考而不加以学习，就容易胡思乱想，无法分辨是非对错，产生危险。是故，孔子以切身的经验告诉我们：“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④孔子体会到只专注在思考上是没有益处的，终究还须务实学习，使思考的境界提升。

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学思并重。学习当下能同时进行思考，就能有自己的心得见解，不会一味地只知死记背诵，也不会人云亦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简而言之，学习不但要思考，还要更进一步懂得应用，所思所用，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上的需求。这也是训育工作“选择思想”下的重要目标。

(六) 养成习惯之原则

郭秉文先生将“养成习惯之原则”列为学校教育“训育”方法的原则，然参证于中国古籍之记载，“养成习惯”其实也是智识教育的养成方法。建立良好学习态度，并使之内化为生活中一部分，养成习惯，才能使道德、学术、才识等各方面日益精进。以下先就中国古代典籍所载，在整体教育精神与理念上，归纳出养成

①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注疏·学记》，第655页。
②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公冶长》，第45页。
③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为政》，第18页。
④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卫灵公》，第140页。

习惯之要点有三：

1. 持之以恒

为学求艺要持之以恒，不可半途而废，否则徒劳无功。如《论语》所云：

>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①

朱熹注云："盖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②为学持续前进或停止懈怠皆操之在我，勉励学者自强不息，持之以恒。又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朱熹以为"自此至篇终，皆勉人进学不已之辞"③。又如："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④孔子认为冉求以"力不足"为推诿之词，实乃因画地自限，未能持续学习，以致中道而废。《孟子》书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如：

> 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⑤
> 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⑥
> 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⑦

此等皆说明为学求艺、进德修业，均贵在持之以恒，倘若无法持续不怠，半途而废，就如同掘井不及泉，犹未掘也。

2. 潜移默化

郭秉文于"教育与道德之养成"中云："盖道德教训非具体而抽象者，若离真正生活而独持此注入学生之脑筋，必无甚价值可言。"⑧然而，要如何增进学生在道德教育上的学习成效，郭氏以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教员之品格"。他说："从经验上而知学生之气质，由聪明豁达之教员默示感化，渐觉其向慕而变化者，则其效必较教员之口讲为真切。"⑨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

①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子罕》，第80页。
② [宋]朱熹：《四书集注章句·论语·子罕》，第114页。
③ [宋]朱熹：《四书集注章句·论语·子罕》，第113页。
④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雍也》，第53页。
⑤ [汉]赵岐注，[宋]孙奭注：《孟子·告子上》，第200－201页。
⑥ [汉]赵岐注，[宋]孙奭注：《孟子·尽心上》，第239页。
⑦ [汉]赵岐注，[宋]孙奭注：《孟子·尽心下》，第252页。
⑧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第88页。
⑨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第88页。

ra)曾于1977年提出“社会学习理论”,主张人们在观察学习的过程中,学习者可以获得实际的示范活动,并直接引导适当的操作。这种藉由模仿而达到学习的效果,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有相关的记载。诚如《学记》云:

> 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①

刚开始学驾车的小马,主人会先把牠拴系在马车之后,让马儿随车而行,适应如何驾车,等到时机成熟,就可以马儿独当一面。藉由模仿让马儿循序渐进地学习驾车,时间一久自然能够胜任,不致惊奔。同样的,如果在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中,学生从小受到父母、师长的熏陶,经年累月地潜移默化,自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与道德思想。

《学记》又云:

> 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②

根据唐孔颖达正义之意,大学教育必须按着时序来施教,除了有正规的课程外,在学生下课及休假时,仍需以学习为念,持续惕厉心志。古人期待君子在道德、才识各方面的学习,要藏之于心,力行于外,不论休息或游乐时,都要念念不忘,所以“退息必有居”。换言之,无论是课堂上的学习,或是在课堂外,对于品德的陶养、才识的养成,不可须臾懈怠,让学生随时沉浸在道德陶冶的氛围中,进而达到潜移默化之功效。

此外,《论语·子路》亦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③说明训育人员自身端正,以为表率,则不用强下命令,学生自然会跟着行动起来;反之,若自身不端正,而要求他人端正,则虽下令申戒,学生也不会服从。所以,郭秉文认为:“由于学生之天性与感觉,凡善于训育之教员,必深悉己之行善风采与优美习惯影响及于儿童甚大。”④因此,学校训育人员能够以身作则,具备优良品德,以达到示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事。

---

①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注疏·学记》,第655页。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注疏·学记》,第651页。
③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子路》,第116页。
④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第88页。

3.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所提出。所谓“知”，是指人的道德意念和思想感受，“行”是指人对“知”的具体践履和实际行动。一个人如果只有道德观念，而没有践履之实际作为，则形同空言，毫无意义。郭秉文认为“理想与感觉，非有真实行为之表现，仍不能成儿童能力与习惯之一部分。故吾人之于道德也，非独知之且宜行之，是谓知行合一。”[①]知行合一，是道德教育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学校训育工作也是如此，不仅教育学生正确的观念，还要期许学生能在日常生活中实际践履。

《周礼·冬官考工记》云：“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②]《道德经·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③]后人遂推衍出“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一语，用以强调具体实践的重要。简单来说，就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道理。在学校训育工作中，则可以透过“知行合一”的落实，让学生去进行道德实践的工作，并使之养成习惯，这对学生的人格教育实在是具有十足正面的作用。

综言之，藉由“持之以恒”、“潜移默化”、“知行合一”三项要点，具体落实后，皆可达到养成良好习惯之原则，对于学生道德、学术、才识等各方面的增长，也将有极大帮助。

三、结论

儒家教育不以记诵之学为限，而是着重在修己善群、立身处世的道理。因此，道德教育是学校课程中之重要项目。郭秉文认为“训育”工作实施的大方向有二：一曰修养，二曰服务。所以，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在培养学生正当的态度和建立高尚的理想。换言之，也是在树立学生健全的人格品德。如《荀子·劝学》所云：“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行乎动静。端而言，蝡而动，一可以为法则。”[④]透过训育工作的实施，导引改善学生的不良行为，变化学生气质，使其拥有堂堂正正的人格。

总观中国古籍所载之道德教育，与现代教育中的训育主张若合符节。是故，郭秉文云：“孔子所乐称君子之观念，以学生程度之高低，施用各种摹绘情状法与

①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第 88－89 页。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周礼正义·冬官考工记》，台北：艺文印书馆，2001 年，第 593 页。
③ 楼宇烈校释：《老子王弼注校释》，台北：华正书局，1983 年，第 111 页。
④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台北：华正书局，1988 年，第 7 页。

譬喻开发法，俾其了悟于心，虽选辑之材料或不无可以批驳之处，而大体则甚妥适。”[①]大体上赞同孔孟教育思想之方法与观点。郭秉文所提出的训育方法“利用天性”、“触发统觉”、“引起兴味”、“应用暗示”、“选择思想”、“养成习惯”等六大原则，可以看出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也与中国儒家教育思想有其相应之处。由此可见，郭氏教育主张的构思缜密、论述周延，也能体现郭秉文实为“博览中西，贯通古今”的教育思想家。

①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第87页。

郭秉文和平教育思想评析*

◎陆　华（东南大学军事教研室）

当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沉浸在甲午战败的悲痛之中，苦苦寻求救国之良方时，作为20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成材綦众，望重士林”[①]的教育家，郭秉文先生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教育乃是振兴民族、提升国力进而促进世界大同的重要途径。他提出了以通过教育改革实现国家乃至世界和平发展的一系列教育思想，这些和平教育的理论及实践不仅推动了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全面发展，使之成为率先践行国际化办学理念的主要代表，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也留下了浓厚笔墨。

一、郭秉文和平教育思想的形成

郭秉文和平教育思想是20世纪初国际国内教育形势发展的综合产物，它萌芽于郭秉文留美学习期间，形成于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的过程中，并伴随其一生不断发展。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教育思想的发展为郭秉文和平

*[作者简介]陆华(1969—)，女，江苏宝应人，东南大学军事教研室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防教育，教育思想史。本文曾发表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3年第2期。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杰出教育家郭秉文的高等教育思想研究”(B-b/2011/01/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中华民国名人传：第三册[M].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286.

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较为丰厚的理论基础。郭秉文于1908年赴美至1914年回国，共留美6年，这正是青年郭秉文思想趋于成熟的关键时期。美国文化的开放、思想的自由、科学的发展为郭秉文寻求人才培养之路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从革命时期起，教育就被认为对形成民族特点、培养社会凝聚力、推进共和观念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一个松散的、种族多元化、因建立不久还很不稳定的共和制的国家”①。当郭秉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求学时，杜威在哥大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时节，成为全美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撰写的《学校与社会》、《民主与教育》、《经验与教育》等成为脍炙人口的畅销书。杜威提出，教育不仅是建国的理想工具，也是促进种族和谐、社会平等或经济生产力的有效手段，他视教育为“有意识地带动社会进步”的引擎，推动了以“透过学校教育来改善个人及社会”②为主要特色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在美国的发展。杜威还兼任师范学院教授，培养了一大批享誉中外的教育界人士。无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经历使郭秉文既全面接受了美国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熏陶，又特别接受了杜威的教育学说，为他日后在中国推行美国式教育改革打下了理论根基。1919年5月，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郭秉文怀着敬仰之情请杜威来校讲学，一时间，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盛行一时。

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对郭秉文的影响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和神圣使命是郭秉文和平教育思想形成的内在驱动力。郭秉文回国后，正值中国军阀统治和连年混战，文化教育的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不过，这种混战使得中央政府放松了对文化教育的严格控制，客观上给新文化、新教育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某种契机，从而使实用主义、国家主义等教育学说得以盛行一时。郭秉文渴求通过教育改变连年动荡的国内形势。他曾提出，《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平”字乃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他自称，生平为人为事，终是本于“和平”二字，平乃能和，和乃能进③。其提出的“四个平衡”教育方针归根结底也是一个“平”，只有实现了这个“平”，才能推进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他继承和发展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一任校长江谦的教育主张，以诚为训，以德为高，以培养学生完善人格为办学标准，勉励学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爱校到爱国、报国，实现人生的转变。他早年提出的学生德育标准是要养成“对国家负责的国民的完善人格”，在担负起校长的职责之后，他始终坚守着一个教育工作

① 安迪·格林. 教育与国家形成[M]. 王春华等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184.
② 林玉体. 美国教育思想史[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276.
③ 冒荣. 至平至善，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13.

者的历史使命，使自己“具有国士的志节和风度，以国家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①，并提出“止于至善”为东南大学的校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正如J.奥菲尔·泰勒所描述的那样：“他希望他的国家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希望他的国民不断进步并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他希望伟大的自由与自我管理永存，为了这一切，他将尽他的全力去教育人民。”②

二、郭秉文和平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笔者以为，郭秉文和平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大力倡导教育强国，以教育促进世界和平。就像同仁们所公认的，郭秉文“是近代的大教育家。他主张教育为立国之本，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兴衰，都和教育的成败有关”③。在南高师时，他就力求以教育救国强国。通过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要求学生养成“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恬静，大江之雄毅”般的国士风范；通过开设文史类课程，务必使学生明白祖国的历史与全貌，明白民族的精髓与民族文化的精华，明白当今之危难与自己应尽之责任；通过气节士节教育，让学生重自信，立大志，谋国家与民族之崛起。在筹备国立东南大学之际，郭秉文与张謇等十位发起人在致国务院及教育部的信中列数了在南京创办东南大学的十利，其中明确提出“设一学府，焕发国光，植吾国于世界大学之林”；“振兴教育，倡导民治，东南倡之，各方继之，功在国家”④。1925年郭秉文因故被迫辞去东南大学校长一职，不久受邀出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基金会旨在研讨国际问题、增强国与国之间了解、以促进世界和平的第二届讲座。会上，他以“中国与美国”为题，阐述了现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趋势，中国在远东的地位及中美关系，体现了一位中国学者对国际问题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基本认知。而后他在英国世界教育会议年会上首次全面阐述了和平教育理念：他认为在解决国际矛盾的所有方案之外，还有一种教育手段，它能教会世界人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关于世界和睦的理想，了解战争的谬论；他认为教育必须承担起确保世界和平的重要角色和重大任务。他还指出：“我们必须告诉世界各国，一国之伟大不在其领土广褒、军备之扩充或财力之充沛，而在其能以正义无私对待他国，我们必须通过教育及其他有效方法去除国家间的胆怯和相互不信任，消除仇视和报复，摆

① 朱斐.东南大学史：第一卷[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120.
② 安迪·格林.教育与国家形成[M].王春华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23.
③ 查良鑑.长者之风，永不念忘[G]//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40.
④ 朱斐.东南大学史：第一卷[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97.

脱偏见和愚昧，我们必须培育起亲善、和睦、协调和彼此间的信任”；“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消除战争的根源，通过教育正确的历史，通过交换老师和教授，通过不同国家间学生的交流，通过很多其他方法和途径去创造一种国际间的理解与合作”；“假如全世界五百万教师都充分认识到战争的罪恶和和平的重要，他们将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任务，他们将为世界和平作出巨大的贡献”①。

其次是密切加强各国大学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培育世界精神。作为一个具有民族灵魂、世界胸怀的教育家，郭秉文把美国先进的教育制度引进国内，并在国立东南大学进行了全方面的改革，特别在其“四个平衡”中倡导国内与国际平衡，他提出东南大学应成为国内外学术交流的中心，博取百家之长，广求知识于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世界各国正忙于战后恢复、重新“享受”短暂的和平带来的幸福时，郭秉文于 1923 年到达美国，出席由美国教育学会发起的世界教育会议，全面阐述了他关于太平洋地区的大学如何促进国际间了解与友谊的基本思路，即通过交换教授、互遣学生、互相交流各自的课程、相互派遣教育考察团等实现教育实体之间的真正合作，通过就国际问题的研究、世界精神的培育、组成国际性的大学联盟等方式真正发挥大学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角色，体现出一个教育工作者广博的胸怀和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在他看来，交换大学教授或讲师表面上看只能引起学术圈内的一点兴趣，其实这直接促进了国际友谊，因为每一个教授的交换都意味着一种国际间思想的交流，一个国家文明的核心也能通过这种方式传遍世界②。“当政治家们高谈阔论国际政治和国际安全时，当财阀们寻求国际间的利益时，当酋长们专心致志于他们的人生哲理时，当上层社会不断地发出警告和呼吁时，当相当部分的公共出版物迎合越来越多且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威胁时，教育机构在很多方面都以平和、智慧、有效的方式加强联络，紧紧地团结在一起”③，增进相互间的了解，谋求世界和平。同样，交换学生带来的利益不仅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整个国家和全世界的。他列举了中国从 1868 年起派出的留学生有一大批归国后在政府机关、工业和教育事业等单位工作，他们带来了西方的思想和方法，促进了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们

① Ping Wen Kuo“Proceeding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Associations held in Edinburgh, July 20 - 27, 1925”, in *In Memoriam* (China Academy, 1971), 16 - 17.

② Ping Wen Kuo, “How Can the Universities of Pacific Countries Best Promo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liness?”in *In Memoriam* (China Academy, 1971), 1.

③ Ping Wen Kuo, “How Can the Universities of Pacific Countries Best Promo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liness?”in *In Memoriam* (China Academy, 1971), 2.

又把中国的学说和文化介绍给西方，从而拉近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①]。当然，交换刊物、杂志等出版物也能增进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了解，从而为世界和平奠定基础[②]。如当时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地学系成立南京气象测候站，自1922年起每月刊行南京气候报告，就常与国内外有关机构相互交换[③]。

黑格尔认为，各民族在其相互关系中的命运和事迹是这些民族的精神有限性的辩证发展现象。从这种辩证法产生出普遍精神，即世界精神，它既不受限制，同时又创造出自己；正是这种精神，在作为世界法庭的世界历史中，对这些有限精神行使着它的权利，它的高于一切的权利[④]。国家与国家彼此之间都是特殊物，都有其自身特性所决定的利益所在，但它们在相互组成的世界这一共体中，都应以普遍的利益为追求的价值所在，以“普遍的绝对精神”即“世界精神”为力量来源，“世界精神”既是一种集世界性与民族性为一体的精神，更是一种自在自为的意志自由。黑格尔的思想既影响了美国教育界如哈里斯和杜威等人，也同样感染了郭秉文等中国教育界人士。郭秉文在1925年7月太平洋区域会议演讲中就鲜明地提出“真理是具有世界性的”，高等教育学府如能发扬世界精神，可增进国际了解与友谊。作为一个从小接受了儒家传统学说长大后又常年受欧美教育思想影响的教育家，郭秉文身上体现出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教育理念。在他看来，世界精神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集中体现，所谓世界精神应包括仁爱、容忍、信义与平等，而在大学中须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入手，才能实现世界精神的滋长[⑤]。当1947年结束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定居华盛顿后，他依然对教育文化事业极感兴趣，曾草拟过国际大学（或称联合国大学）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但他没有放弃，继续在中美社会科学协会、民国政府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新中国驻美大使馆文化参事处、中美文化委员会等机构中担任要职，在冷战期间为中美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开启了另一扇沟通中美关系的大门。

第三是强调以教育与科学服务社会、服务全人类。早在留美期间，郭秉文就清醒地认识到了教育与社会的贡献，“教育之改良为一轴，牵动各种事业皆随之而变新，教育造成人才为国家之栋梁，措国家于磐石之安，故曰，与国民进步最有

① Ping Wen Kuo, “How Can the Universities of Pacific Countries Best Promo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liness?” in *In Memoriam* (China Academy, 1971), 4.
② Ping Wen Kuo, “How Can the Universities of Pacific Countries Best Promo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liness?” in *In Memoriam* (China Academy, 1971), 7.
③ 中华民国名人传（第三册）[M].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209.
④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51.
⑤ 中华民国名人传（第三册）[M].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266.

关系者乃教育也”[①]。既然抱定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与信念，郭秉文在教育实践过程中可谓呕心沥血，在所不惜。其制订的人文与科学平衡的教育方针深刻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两者互为补充、共同发展的本质，他也努力使东南大学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基地、人文科学的基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科学的结合点。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国立东南大学，从单一的师范院校到一所享誉中外的综合性大学，他都坚持科学服务社会、服务全人类的基本办学理念。郭秉文一方面努力扩大国际影响，力争把东南大学办成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方面他也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始终坚持教育服务于社会、提升全民族素养的理念，就像陶行知所说的“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②]，沟通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使大学更好地推广教育，服务社会。1920 年起，南高师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暑期学校，聘请了竺可桢、舒新城、袁希涛、黄炎培、朱经农等著名教授进行授课，还邀请了梁启超、蔡元培、蒋梦麟，甚至美国的杜威等前来讲学，提高了各类教师和各级教育行政管理人员的水平，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师资力量。暑期学校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师资阵容之强、办学效果之明显，充分体现了郭秉文融和平教育理念于社会教育的价值取向，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离开教育行政岗位之后，郭秉文 1926 年在美国创办了华美协进社，作为促进中美了解与友谊的教育文化机构；1932 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会，通过举行专题研讨会、与中外相关机构合作、交换刊物与意见等促进与他国的文化教育交流。对于科学的价值，郭秉文在 1941 年出席英国科学协会年会上曾进行过全面的揭示：“科学的使命乃创造，而非破坏；乃提高人类幸福，而非增加人类痛苦。富于服务精神的中国科学家，已准备与他国科学家合作，创造一新世界，使各民族均获科学最大之利益”，并坚信“中国的科学家们被服务世界的精神所深深感染，他们已准备好遵守与其他国家科学家合作的信念，去共同创新一个发挥科学之最大价值为全人类谋福利的新世界”[③]。

三、郭秉文和平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作为 20 世纪初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郭秉文先生殚精竭虑，践行着自己的和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2：147.
② 冒荣. 至平至善，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52.
③ Ping Wen Kuo，“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cience in the government of China”in *In Memoriam* (China Academy，1971)，198.

平教育理念，为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开创了新局面。如今，历史已进入到21世纪头20年，我国也已进入至关重要的发展机遇期，“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①。在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重温郭秉文的和平教育思想，仍可清晰地感受到它的生命力与远见卓识。

（一）开国际化办学之先河

郭秉文不仅大力倡导各国大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而且亲力亲为，提出了一揽子具体方案，使国立东南大学成为当时极具国际化影响力的著名学府。一方面，各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授课，几乎必到南高师、东大。美国著名教育家哲学家杜威、英国逻辑实证派大师罗素、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孟禄、德国著名哲学家杜里舒、韦理、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吕留、菲律宾工科大学主任刘诺治等先后来此讲学。1922年孟禄博士来华对中国教育体制的重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②。杜里舒博士还留在东大一学期，亲自讲授《生机哲学》、《哲学史》、《欧美新近哲学思潮》等课程，受到了师生的追捧，1923年被授予东南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美国大教育家、国际教育会东方部主任孟禄博士对中国教育尤为关心，他认为东南大学是“中国最有希望之大学”，“将来该校之发达，可与英牛津、剑桥两大学相颉颃”③，并通过实地考察，促成了洛氏基金会赞助东大建造科学馆。另一方面，郭秉文不断派遣教师出国进修。“与其攫人之所有，不如培植己之所无”④。1918年他刚代理校长之职，因学校缺乏体育教师，即派卢颂恩赴美学习，并提出了教师出国培训的相关规定，从而使教师培养工作制度化。他自己也曾多次外出考察，学习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引进国外优秀人才，并担任了多个国外文化教育机构的要职，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东大，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他试图通过中西文化学术交流，增进国家和民族间的相互了解，最终促进世界和平。在郭秉文等一批留美知识分子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教育体制由原先的仿日、仿欧转变为仿美，在不断探索中向前发展。而今，我国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数以亿计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但从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

① 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C]. 人民日报，2011－4－25(2).
② Ping Wen Kuo，“How Can the Universities of Pacific Countries Best Promo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Friendliness?”in *In Memoriam* (China Academy，1971)，5.
③ 陈乃林，周新国. 江苏教育史[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559.
④ 冒荣. 至平至善，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47.

育的要求，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仍须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

（二）首倡教育去行政化

作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海归人士，郭秉文早在美国留学期间就接到了南高师聘任他为教务主任的邀请函，并于江谦校长辞职后接任校长，后又忙于筹备国立东南大学，最终将其建成了居全国之首的著名大学，其远见卓识和组织管理才能受到了各方的青睐，连孙中山先生都邀请他参与革命大业，但他坚辞不就。他认为，学校是学术机构，是培养人才的地方，非学者不能担当起这一重任。与此同时，他强调教育不应卷入政治风潮，政治更不应该干预教育，学校应由教育家独立办理，否则不能保持学府的纯洁性[①]。为充分调动专家治校的积极性，发挥高等学府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东南大学采用了校长领导下的“三会制”，即评议会、教授会和行政委员会相互协调，相互监督，共同实现学校正常的机制运转。这种“学者治校，学者不参与政党、政治”的思想，对南高师、东大师生影响甚深。当然，这是郭秉文理想中的治校方针，由于军阀纷争混战的不争事实，想完全摆脱政治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因此，当皖系军阀掌管的教育部下达免郭令时，他也只能无奈地接受事实，被迫漂洋过海。后来发生的“易长风潮”则进一步说明郭秉文的学者治校、教育独立的主张只能是“以幻想曲始，以悲剧而告终”[②]。在某种程度上讲，郭秉文的这一思想正是今天所呼吁的教育去行政化的早期尝试，当年知识分子为追求真理和理想而不懈奋斗的精神及竺可桢在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潮”时愤而去职体现出的那种正义和气节等正是当今社会和知识分子群体所严重缺失的。

（三）勇做文化传承的急先锋

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中在高校长期以来担负的三大职责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基础上增加了“推进文化传承创新”这一新的时代使命。他强调提出，“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并传播到社会、延续至后代，不断培育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增进对国外文化科技发展趋势和最新成果的了解，展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风采，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努力为推动人类

① 陈乃林，周新国. 江苏教育史[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557.
② 朱斐. 东南大学史（第一卷）[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117.

文明进步作出积极贡献”[①]。抚今追昔，近百年前郭秉文所倡导和终身践行的正是这一思想，他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宣传中国的民族文化，并通过比较研究向各国阐明中国人的民族观和世界观。1926 年，郭秉文在美创办的华美协进社借庆祝美国开国 150 周年这一契机，在费城举办了中国五千年教育文化的图片展，获得了巨大成功，并荣获优等奖；1930 年他协助梅兰芳一行在美巡回演出 70 天，轰动一时，向美国民众展示了中国戏剧的神奇魅力，美国加州波摩那学院与南加州大学均授予梅氏以名誉博士学位[②]；华美协进社还与马里兰大学合办“中美文化关系圆桌会议”，每年一次，郭氏每次必参加，有几次担任会议主席，言简意赅，风度极佳[③]。郭秉文真真切切地做了那个时代文化传承的急先锋，在宣传中国民族文化和加强对外文化教育交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给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郭秉文先生才识宏通，学术渊博。究其一生，始终恪守着和平教育理念，无论是在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期间，还是被迫辞去校长赴国外停留阶段，无论是抗战时期受任财政部次长，还是战后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之时，他都秉承着民族文化中“和”的精髓，以教育文化为推进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用他的智慧和能力书写出了 20 世纪初一位杰出知识分子的人生画卷，并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遗产。

① 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重要讲话[C]. 人民日报，2011 - 4 - 25(2).
② 中华民国名人传(第三册)[M].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272.
③ 中华民国名人传(第三册)[M]. 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285.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的学术文化交流*

◎王悦芳(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郭秉文(1880—1969),字鸿声,祖籍江苏江浦(今南京),生于上海。1908 年留学美国,先后就读于伍斯特学院、哥伦比亚大学。1914 年回国,成为中国学人中第一位教育学博士。[①]曾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校长;我国第二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东南大学(简称“东大”)的校长、创始人;上海商科大学即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的校长、创始人;第一、二、三届世界教育会副会长。

一、郭秉文创建国立东南大学

南高在郭秉文校长期间迅速发展,在短短的五六年的时间,便可与北大相颉颃。“民国十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隐隐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上两大支柱”。[②]郭秉文并不满足于“师范”的框架,在南高的基础上仿照美国模式成立大学是郭秉文多年来的夙愿。“自高师校长郭秉文博士接事以来,即日夜以创设该校为念”,认为“苏皖浙赣诸省,文化素称发达,竟无一国立大学,以

*[**作者简介**]王悦芳(1972—),男,山东嘉祥人,教育学博士,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从事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研究。本文曾发表于《教育与教学研究》2014 年第 1 期。

① 冒荣. 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7.

② 中华学术院.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M]. 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1.

造就有为青年，殊为遗憾”。[①] 经过郭秉文的多方奔走与精心擘划，国立东南大学于1921年10月正式成立并开课。1923年南高完全并入东大。由于南高与东大既一脉相承又彼此交叉，为了研究的方便，人们往往“南高”、“东大”并称。郭秉文因开创东南大学之功，被后人尊称为“东南大学之父”。东大的成立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打破了北京大学一家独大的状况，成为中国继北京大学之后的第二所国立综合性大学。20世纪20年代，北大与东大一南一北，共同引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二、郭秉文对东大学术文化交流的规划与设想

民国初年，中西文化激荡，教育界面临着如何促进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认为中国需全面向西方学习，不但在科学方面，而且尤其是在人文方面。国家要想强盛，必须先改造国民思想，所以蔡元培首重文科，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目的是为了削弱封建文化势力，在北大这一旧思想、旧文化的阵地里，引进新文化、新思想。于是，蔡元培在北大文科改革期间，大力引进“思想新进”者，组成了以陈独秀为首的北大“新派”。他们遂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先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后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甚至提出要废除汉字，改用拉丁字母的主张。

郭秉文认为做学问要“平”、“和”，“平乃能和，和乃能进”[②]。“平”是平衡，既不能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只强调西方文化，而应该使其共存共荣，不可偏轻偏重。“和”是和谐，学术文化可以批评、辩论，但不可以“打倒”，即不可人为地摧毁或限制他种学说，而应该遵循学术文化的发展规律，任其优胜劣汰，自生自灭。只有坚持“平衡”、“和谐”的原则，中国学术文化才能进步。因此，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郭秉文认为应坚持以下几点：

（一）坚持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郭秉文认为，北大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反省中国传统文化，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这狂飙突进式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激进做法颇为不妥。郭秉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

①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卷）[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9.
② 张其昀. 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C]//郭秉文先生纪念集. 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3.

国家之根、民族之源，虽有不足，“但非尽坏”；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持执中务实的态度，既不要全盘否定，也不能奉为圭臬，而应实事求是地分析与评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西方文化虽好，但毕竟要同中国传统文化对接，方能发挥作用。若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没有了“根本”，即使把西方学术文化移植、嫁接过来，也“难以枝繁叶茂”。据东大学生高明回忆，对于“时倡科学与民主者（即北大新文化运动），欲取固有文化一举而毁灭之”①，“先生（指郭秉文）不以为然也。夫欲枝叶之茂者，必固其根，欲濬其源。岂有拔其根而移接之枝可以活，塞其源而横溢之水得所归者也哉？固有文化，国家民族之根与源也，其不可以毁弃，固彰彰明甚”②。

（二）学习西方文化要人文与科学同时并进

郭秉文认为，北大的新文化运动虽然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但并非要同时学习西方的人文与科学。它强调“民主”是为了反对专制，强调“科学”是为了反对迷信，都属于西方的人文方面。蔡元培主要整顿和充实北大文科而没有顾及学术力量相对薄弱的理科，这一状况引起留美学界的疑惑乃至不满。任鸿隽、朱经农曾先后致函胡适，认为北大“尽收罗文学、哲学的人才，那科学方面（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却不见有扩充的影响，难道大学的宗旨，还是有了精细的玄谈和火茶的文学就算了事么？”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大学专重文科，把理工科看得无关紧要，这种见界太偏浅了。”③

郭秉文认为，学习西方“人文”有利于振奋民族精神，以救亡图存；学习西方“科学”有利于振兴实业，以富国强国，两者同样重要，不可厚此薄彼。“不发扬民族精神，无以救亡图存；非振兴科学，不足以立国兴国”。因此，学习西方文化要人文与科学同时并进，甚至后者比前者还重要一些。郭秉文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就是因为传统教育只注重文学、哲学、道德等方面，而对于“近世所谓实验教育则百不得一焉”，所以“自海禁开通与欧美人相接近，教育制度根本上为之一变，大抵为新科学之输入，与留学生赞助力为多，不独国民生活为之一新，置国家于进步改革之途。凡政治、工业、社会等，同时皆显改革”为此，郭秉文主张我国应“注重实用教育，不出十年，必有成效可观矣”④。

（三）融合中西文化

面对北大“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疯狂做法，郭秉文颇为冷静。

---

① 中华学术院.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M]. 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5.
② 中华学术院.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M]. 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5.
③ 张晓唯. 蔡元培评传[M].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75.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4.

他承认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与世隔绝，已经陷入了狭隘的自我满足、固步自封的境地，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和竞争中缺乏优势。但是，郭秉文并不由此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低级的、劣等的。相反，郭秉文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有各有所长之别。文化交流的目的就是相互取长补短，互惠互利，从而达到“双赢”、“共赢”的目的。文化交流是促进文化的繁荣而不是文化间的相互替代。因此，相互交流是推动文化发展的最好途径，与世隔绝只能导致狭隘的故步自封。所以，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之际，郭秉文不是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自卑和担忧，而是为它感到庆幸和欣慰。他说：“目前它与西方文化正进行着最具历史意义的接触，是扩展和提高自身的绝好的机会。”[①]正像中西教育制度“未尝不可取二者之长而合之，成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那样，郭秉文也希望中国学者能够融合中西文化之所长，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

（四）倡导国家立场与世界立场相结合

郭秉文认为对待中西学术文化交流有两种立场：一是国家立场，即站在本国的角度来处理问题。坚持这种立场的人，或为了自己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注意引进、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或为了增强自己的国际影响，输出、宣传本国文化。一切褒扬取舍全本着一国的利益，虽是为着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但终究有视野偏狭之嫌。若在国家危难之时，持此种立场之人易于急躁、冒进，所采取的措施也易于“偏激”。故郭秉文对北大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做法“不以为然”。

一是世界立场，即站在世界发展潮流或趋势的基础上，来观照一国文化。随着世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世界各国学术文化交流日益加强，虽然交流的方式、内容各异，若从全局上看，总有发展规律与趋势可循。正如孙中山所说：“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郭秉文认为中西学术文化交流除了坚持国家立场之外，还应倡导世界立场。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处理好各种事务。否则，不仅影响本国发展，还会影响他国甚至整个人类的发展。

因此，郭秉文考察欧美战后教育后，特别强调“中国在今日教育之设施非常重要，不独关系本国前途，且关系世界之进化。因人口之多，冠于全球，倘教育方针不准确，世界人类均将蒙其影响也”。“自欧战起后，世界各国对于教育咸起疑问，以前之方针，是否符合于世界之趋势，是否适应于国家社会之需要，无不希望在此改造期内，详慎研究，俾无遗憾。”“我国教育上之政策，亦应注意是否符合于世界趋势，是否适应国家社会需要，如其未敢自信，则于教育上之改革，宜应致力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3.

研究。”[①]

三、东大成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国内、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中心

无论是在中西文化观上，还是在办学方针上，郭秉文都本着“平衡”、“和谐”的原则：既学习西方科学又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既重视发展理论学科又重视发展实用学科；既重视人文又重视科学。东大对中外各种学术文化坚持持中务平、不偏不倚、兼收并蓄原则，使得许多国学大家以及海外学成归来的科学人才纷纷南下。东大遂成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国内、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中心。

（一）南高、东大是“学衡派”的策源地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潮流中，郭秉文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认为固有文化是民族之根，应发扬光大而不可毁弃。在郭秉文的倡导下，一大批对传统文化始终怀有敬意的学者纷纷南下，聚集在以批评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张为职志，旨在“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派”周围。其中，梅光迪、胡先骕，吴宓、刘伯明、柳诒徵、马承堃、萧纯绵、邵祖平、徐则陵、汤用彤、缪凤林、景昌极等都是当时东南大学的教授。其阵容之整齐，可谓极一时之盛。难怪北大历史学教授梁和钧发出这样的感慨：“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②]这些学者通过撰文、著书、聚会、演讲，宣扬“东方文化一语……实含有中国民族之精神，或中国民族再兴之生命之义蕴”[③]，不断告诫和提示国人：中国的新文化绝不能脱离历史文化的根基，而必须有历史继承感，以冷静、理智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从中国现代“反传统”到“接续”传统这一文化潮流来看，“学衡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④]

（二）南高、东大是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

中国科学社是于 1914 年 6 月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成立的中国最大的民间科学团体。1918 年，中国科学社迁回国内，并应郭秉文之邀，把总部设在南京。中国科学社以东大人力资源、资料设备为依托，团结全国的科学精英，创办学术刊

① 郭秉文. 战后英美教育近况[J]. 新教育，1918：12.
② 中华学术院.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M]. 台北：中华学术院印行. 1971：93.
③ 柳诒徵. 中国文化史（下）[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88：870.
④ 王根泉. 吴宓主编《学衡》始末与整体面貌的初步考察[C]//李赋宁. 第一届吴宓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 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2：322.

物，举行科学讲演，召开学术会议，建立研究机构，鼓励科学发明等，为我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在郭秉文的努力下，中国科学社的大多数成员都被邀请来南高、东大任教。当时东大文科的梅光迪、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陆志韦，理科的任鸿隽、胡刚复、熊正理、竺可桢、孙洪芬、张子高、熊庆来、王琎、何鲁，农科的邹秉文、秉志、胡先骕、钱崇澍、过探先、陈桢、陈焕庸、张景钺、戴芳澜、邹树文，工科的茅以升、涂羽卿，商科的杨杏佛、胡明复，教育科的陶行知、陈鹤琴、郑宗海等都是中国科学社成员。东大的许多系科与科学社相应的研究所虽然分属两家，实则形同一体，人员相互兼职，教、研互促互补。科学社与东大在国内声名鹊起，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一个主要基地”①。

（三）南高、东大是中国新教育的中心

郭秉文认为“教育之改良为一轴纽，牵动各种事业皆随之而变”，而要在中国进行教育改良，“非但需最高之教育技能，且必以热诚、博爱与公心以赴之”②。郭秉文博士毕业后即来南高、东大任职，试图融合中西教育制度之所长而形成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在他的感召与邀请下，许多学者如陶行知、刘伯明、陈鹤琴、汪懋祖、郑晓沧、孟宪承、廖世承、俞子夷、陆志韦、韦悫、郑宗海、朱斌魁、程其保、徐则陵、赵叔愚、卢颂恩、张信孚、洪有丰等先后来校任职，南高、东大遂成为中国研究、推广新教育的中心。

1918年12月，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暨南学校等单位联合发起组织的“中华新教育社”宣告成立，次年1月改称“中华新教育共进社”。该社创办的《新教育》杂志自第4卷第1期起，由东大教务主任陶行知担任杂志主编。南高、东大教育科的教员既是《新教育》的主要撰稿人，又分别是该杂志各栏目的主要编辑成员。

南高、东大教员站在新教育研究的最前沿，积极介绍当时欧美流行的各种教育理论；开展各种教育调查与实验，进行各种心理测试等活动；撰写教育方面的中文教材，以便推广应用；发起举办义务学校，使得适龄儿童均能免费入学；以鱼市大街为实验区，推广平民教育；在江苏省各城乡开展学务调查与指导；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合作举办全国教育展览会；举办暑期学校，邀请杜威、孟禄、推士、杜里舒、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一批名家前来讲学，以提高各类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水平。

---

① 中华学术院.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M]. 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65.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4，110.

（四）南高、东大是中国史地研究会的所在地

在办学中，郭秉文一直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学术之研究，应特别提倡，为国家根本计，学术不精，凡百不能进步”①。五四运动前后，南高、东大的学术研究非常活跃。1919 年 10 月，地学会在东大成立，1920 年 5 月改名为“史地研究会”。该会“以研究史学地学为宗旨”；会务分讨论、演讲、调查、编辑等项；会员在 60 至 100 人之间。龚励之、陈训慈、胡焕庸、诸葛麒、向达等先后担任总干事；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等人相继担任编辑主任或总编辑。竺可桢、柳诒徵、徐养秋、曾膺联、萧纯绵以及来校讲学的梁启超、陈衡哲、白眉初等教授担任指导员。

史地研究会组织了许多演讲活动。这些演讲对于拓展人们的视野，启发人们的思维，激发人们的研究兴趣颇有益处。另外，1921 年 7 月史地研究会会刊《史地学报》创刊，该刊共出版了四卷数十期，设有评论、通论、史地教学、研究、古书新评、调查、史地家传记等栏目。许多史地大家多有文章刊登，其中梁启超的专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胡焕庸的译著《美国国民史》在该刊上连载，并引起广泛关注。总之，东大的史地研究会十分活跃，在校内外影响颇大，其成就为学界所称道。

（五）南高、东大是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中心

郭秉文倡导“国内与国际平衡”的办学方针，认为大学不仅要成为国内学术研究与交流的中心，还要成为国际学术与文化交流的中心。大学只有广求世界知识，广纳人类无限的智慧，才能使学生开拓心胸，放眼世界。

1. 邀请外国专家访学、演讲。郭秉文不但具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强烈的国际意识，而且自身虚怀若谷，交游广阔，每年都邀请各国的名人、大家，来东大参观、指导、讲演、讲学，甚至是授课。孟禄任国际教育会东方部主任时，郭秉文便极力建议他帮助中国发展高等教育。在郭秉文的努力下，国际教育会每年都派著名专家来东大讲演、授课或开设科学讲座。由于得到国际教育会的支持，南高、东大的国际学术文化交流活动日益活跃，“几成为东西文化、学术交流的热点，各国著名学者来华讲演、讲学，几乎必来南高、东大”②。

1920 年 4 月，杜威继 1919 年之后，再度来华，并来南高专门讲授《教育哲学》、《新人生观》等课程。10 月，罗素来南高作了关于哲学的演讲，倡导逻辑推理与科学方法。1921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孟禄博士来东大，作

① 郭秉文. 战后欧美教育近况[J]. 新教育，2(4)：375.
② 郭秉文. 五十年来中国之高等教育[M]// 申报馆. 最近之五十年. 上海：申报馆编印 1923：132.

了两次演讲，一次讲“平民教育”，一次讲“教育与实业”的关系。1921 年 10 月至 1922 年，孟禄博士多次来东大参观、考察，并发表演说。1922 年 10 月，美国伊利诺大学加纳博士在上海商科大学作了“关于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演讲。同月，杜里舒、卫礼贤及美国推士博士来东大，并发表演说。杜里舒博士在东大演讲后，即留下来授课一学期，开设了《生机哲学》、《哲学史》、《欧美新近哲学思潮》等课程。1923 年，鉴于杜里舒在学术及其交流上的贡献，东大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郭秉文亲自致辞。1924 年 4 月 20 日，印度文豪泰戈尔在东大体育馆讲演，轰动了整个南京。其他来南高、东大的著名学者还有：柯脱博士，邹秉文的老师、康乃尔大学农学院院长贝利，法国巴黎大学吕留教授，美国华盛顿大学乔温博士，菲律宾大学工科主任刘诺治等。

2. 选派留学生。郭秉文同样注重向西方各国选派留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文化。据记载“郭校长以历届毕业学生，颇有志愿留学研究高深学问者，特商请校董穆藕初捐助留学基金 5 万元，穆当即允许”①。竺可桢也曾建议东大派遣“地学系”的学生留学，“窃以我国地理人才缺乏……留学生中鲜有专门地理者……故欲得专门人才，非由本校物色毕业生中成绩卓越者，资遣欧美专门地理不可”②。

3. 资助教师出国考察。郭秉文认为“专门人才教授数年，常有游学及赴外考察之愿望，盖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故欲再一探最近学术界之蕴奥，以溶发其思想之泉源，主持教育行政者，宜有以辅助而奖励之”③。南高、东大也有资送教师出国考察的规定，据记载：“南高开办后，教员方面曾派有二人赴美留学……校董穆藕初……更捐银 5 000 两，派遣该校体育教员张信孚赴美国专学体育二年。”④为了筹集费用，郭秉文曾给国务院、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呈文，要求将德法两国退还庚子赔款作东大的经费。⑤

4. 开利用外资之先河。20 年代初，孟禄是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代表，郭秉文通过他争取到了卡内基基金会的支持。如东南大学在苏浙两省所作的“心理知识测验”，该基金会曾捐助 1 万美金，用以购置设备，开国立大学接受外国基金会捐助之先例。

郭秉文还通过孟禄争取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帮助。20 年代初，洛克菲

---

①《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卷)[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1.
②《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卷)[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2.
③ 郭秉文. 五十年来中国之高等教育[M]// 申报馆. 最近之五十年. 上海：申报馆编印. 1923.
④《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卷)[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1.
⑤《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卷)[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8.

勒基金会也有意在中国某大学捐建一科学馆。1923年东大“口字房”毁于大火，郭秉文以此为契机，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寻求捐助。该基金会派孟禄博士等专家前来调查，认为东大在师资设备及科研力量上实力最雄厚，于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向东大捐助建筑费10万美元；科学馆建成后又捐助了仪器设备5万美元；并派专家前来讲学。

5. 尝试中外合作办学。在郭秉文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努力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东南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筹划合办工科大学之事。2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打算在中国物色一所适当的大学，合办工科大学，孟禄博士遂推荐东南大学。东南大学校董、外交部长王正廷也极力支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便派代表麦洛埃、沃德尔与孟禄博士来东大考察、洽谈，达成《中美合办工科大学之计划》。该计划已经东大校董会讨论通过，并经郭秉文、麦洛埃、孟禄草签。后因连续两年的江浙战争，省库罗掘一空，上海工商业亦凋敝衰退，美方也失去积极性，致使计划落空。①

6. 积极参与国际教育事务管理。1923年6月，东大校长郭秉文作为中国教育界的首席代表，出席了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教育会议。与会者有60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郭秉文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太平洋各国大学如何最能增进国家了解与友谊”的讲演，颇得赞赏。大会选举郭秉文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1923年至1929年，郭秉文作为中国教育的首席代表，出席了历届世界教育会议，包括美国旧金山会议、英国爱丁堡会议、加拿大多伦多会议和瑞士日内瓦会议，并连任三届世界教育会副会长，负责管理亚洲的教育事务。对此，朱斐在《东南大学史》一书中评价说：“在20年代的国际科教文舞台上，国内似没有比郭秉文更活跃的了。”②

在国内、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东大迅速崛起，成为蜚声海内外的高等学府。原美国驻华大使、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在其《在华五十年》中回忆说：“东南大学是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大学，在当时也自然是最好的大学。”校长郭秉文辉煌的办学业绩和他为中国高等教育及学术文化交流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① 朱斐. 东南大学史(第1卷)[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135.
② 朱斐. 东南大学史(第一册)[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136.

“止于至善”与郭秉文的教育理想实践*

耿有权(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校训,不仅是一所大学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一所大学文化传统积淀的具体表现。据《辞海》释义,“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20 世纪 20 年代,经被后人誉为“东南大学之父”① 的国立东南大学第一任校长、我国近代杰出教育家、近代中国学人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第一人(1914 年)的郭秉文先生的倡议,东南大学的校徽设计为银质圆形,上镌“国立东南大学”六字,中镌“止于至善”四字。“止于至善”源自儒家经典《大学》。《大学》开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四个字,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有光辉的历史沉淀,以其作为校训,不仅是郭秉文精心选择、凝聚共识的智慧成果,而且是其大学教育理念的自觉呈现。2002 年百年校庆时,东南大学回归“止于至善”校训,不仅彰显了杰出教育家郭秉文的深谋远虑和文化眼光,而且对东南大学继承优良传统文化于 21 世纪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有深远意义。

*[**作者简介**] 耿有权(1967—),男,安徽全椒人,博士,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教育伦理研究。本文曾发表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3 期。

[**基金项目**] 东南大学国际合作项目“杰出教育家郭秉文的教育思想研究——纪念郭秉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 100 周年”(编号:8651079006)和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杰出教育家郭秉文的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编号:B-b/2011/01/00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王运来. 学术与事功——郭秉文高等教育思想蠡测[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2):16-23.

一、郭秉文“教育救国”理想境界与“止于至善”校训

郭秉文(1880—1969),江苏江浦人,有昆仲和姐妹各三人,排行第三。父亲是一位医生,同时兼任长老会教堂的长老。1896 年毕业于上海清心书院,毕业后在书院任教一年,先后在海关、邮政及浙东产金局等处任职。他从小就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但儒家社会的传统对其影响没有间断。1908 年入美国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进修,担任《中国学生》月刊总编辑,是“伍斯特之声”的主笔、中国学生协会总秘书。[①] 1911 年以优异成绩获伍斯特学院理科学士学位。根据伍斯特学院历史系讲座教授葛德卫(David Gedalecia)对院史的研究和院长 Grant H. Cornwell 的贺信内容,郭秉文“可能是当时伍斯特学院唯一的中国学生”。“他的教育思想中深深地烙上伍斯特印记的便是他所提倡的‘四个平衡’”。[②]葛德卫的研究资料还显示:“在伍斯特学院,郭秉文放弃了原来学习法律的计划,而对教育改革产生兴趣。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培养他的兴趣。毫无疑问,这是受他在伍斯特学院读书的影响。”[③]南京高师学生高明指出:“先生盖以为非振兴科学,无以救亡图存,而培养人才,则有赖于教育,故所习如此(教育学)。”[④]1912 年,郭秉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14 年,郭秉文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的学位论文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博士学位,是近代中国学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一位教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因为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教育成就和国际影响,郭秉文后来连续三届担任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和亚洲分会会长。从求学经历和国际教育的影响和地位看,郭秉文显然是走在教育家成长的道路上。

肇始于 1887 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大的教育学院,也是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院。20 世纪 20 年代,著名实验主义大师杜威、著名教育家孟禄和著名心理学家桑代克等一批世界名流学者在该学院任教。后来成为中国著名思想家的胡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蒋梦麟等,都是在郭秉文毕业后到该学院深造的。南京大学冒荣教授指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不

① 郭夏瑜. 郭秉文先生年表[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2.
②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来自伍斯特学院的贺信[M]//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80.
③ [美]葛德卫. 郭秉文与伍斯特学院[M]//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84.
④ 高明. 郭故秉文先生行状[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4.

仅使郭秉文在学术上得到很大提高，也在多方面对其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①]从其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内容和水平看，郭秉文深谙儒家教育传统文化精神，领悟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大学文化的底蕴，拥有将中西教育文化进行对比且有机贯通以形成独特见解的学术实力。那个时代，多数学人抱着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热忱求学于国外，且不断思考着中国的问题，因此在论文选题上多数以中国为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宗旨。他们境界高远，信念坚定，学术扎实，在撰写学术论文时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事实上，无论在学术思想和学术规范方面，还是在学术影响方面，郭秉文的博士论文堪称学术作品典范。1915 年，郭秉文的博士论文广受好评而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1916 年中文本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博士在序言中给予很高的评价：“郭博士之著是书，不独表扬己国之事绩，且俾西人恍然有悟于中邦维新之变革。”[②]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在给郭秉文博士论著的序言中写道：“郭子鸿声示我所著《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受而读之，盖空前之作也。”[③]

1914 年，郭秉文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江谦校长函请郭秉文担任教务主任，协助其管理处于发展中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由于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理念存于心中，迫于实现，郭秉文应允回国履新，从此开启了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教育家办学旅程。1915 年至 1920 年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代理校长。1920 年至 1925 年担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兼任上海商科大学（现为上海财经大学）校长。经过若干年的教育历练，郭秉文对建设什么样的大学以及如何建设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如郭秉文在南京高师（1914—1923）校训——“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止于至善”的校徽文字（1920—1927），后人理解为东大校训。郭秉文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止于至善”四个字刻于校徽上？目前尚未查到当时的具体信息，但其博士论文及在学校办学的相关文件和笔迹透露了许多信息。如其博士论文所言“搜集前清至今日兴新教育之经验，再参用欧美制度之所长，以及保存吾国自古教育之所宜是也。”[④]该书从我国“上古教育制度起源”研究到“民国时代所建之新教育”和当时“国民教育之重要问题。”书中大量引用《尚书》、《礼记》等儒家经典史实，足见郭秉文对儒家传统文化领悟之深、见解之独到。可以说，正是认识到“止于至善”是儒家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是指导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理念，郭秉

① 冒荣. 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9.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5.
③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10.

文及其团队最终将其定为校训文字，无疑表达了20世纪20年代国立东南大学鲜明而独到的文化立场和价值选择。

郭秉文在国立东南大学时期提出“止于至善”的校训，旨在要求师生在言行、品性、知识、能力等方面不断追求，臻于完美。那么如何使学生“止于至善”？郭秉文借助东大所在地南京的地理环境，要求学生应具备“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恬静，大江之雄毅”①。郭秉文不仅这样要求学生，而且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为国家履行光荣使命和道义责任。如郭秉文在1916年出版的《学校管理法》一书中深刻指出：“夫欲培养国民之道德，为巩固民国之基础，非当今吾教育界之惟一大问题乎？共和之国民，不当以刑威，不可以法制，而宜以德导之。学生者未来之国民也，不先有以培养之，则今日为不道德之学生，安能他日为有道德之国民乎？是故当今吾国之教育家，如不欲培养国民之道德为国民之基础也，则亦已耳否则此惟一之大问题；不能竭尽心力以解决之，将谁负其责而谁任其咎耶。”②其夫人郭夏瑜女士在《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序文中写道：“凡是认识或和我先夫同事的都知道他是一个有高识远见的人。他总尽最大努力做他应做的事或做其他更有价值的事。即在不如意时，他绝不气馁，尽量用新思想和毅力去干。他毕生的思想是尽其所能替国家和人民而服务。”③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毕业生吴俊升在纪念郭秉文的文章中评价说：“公一生精力以用于教育文化事业者为最多，而创办南高东大，树立诚朴精进之学风，造就建国之人才，尤为生平最大之贡献。”④

二、郭秉文主政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时期践行“止于至善”校训

历史证明，管理一所学校，没有正确而独到的管理理念不行，没有崭新的理论驱动，实践也难以达到新境界。郭秉文从接受江谦校长邀请后就开始思考具体的办学思想和治校思路，之后又撰写了《学校管理法》一书，系统全面地阐述学校管理的原理、体制以及训练法、激励法和感化力的理论及其应用。⑤ 如果说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世界一流教育并撰写高水平博士论文，奠定了教育家应有的素养根基，那么执掌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则使他获得了实践其大学教育思想、实现其宏伟抱负的事业舞台。在这里，郭秉文对影响学校精神传统的校训的斟

①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3.
② 郭秉文.学校管理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2.
③ 郭夏瑜.序文[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1.
④ 吴俊升.业师郭鸿声先生教泽追思录[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8.
⑤ 郭秉文.学校管理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1.

酌和慎重显而易见。首先，校训须有历史来源，须有深刻内涵，须有实践应用价值，且符合学校精神追求。在确立南京高师—东大校训问题上，郭秉文继承江谦校长的“诚”的理念，并随着南京高师转型为综合性大学，将“诚”的校训提升到“止于至善”的境界。在哲学的意义上，“止于至善”不仅包含“诚”的意义和内涵，而且将校训意义做了更大的发挥和更深的拓展。《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止于至善”，一方面要求个体以“诚”立身“明明德”，发扬光大人类个体本有的善良品德，另一方面要求个体“诚”心待人以“新民”、“亲民”，使他人得到光明的品德，品性更加完美。而要实现这两者，个体须抱有“诚”心和爱心，做出巨大努力，直至完美境界。事实上，郭秉文在南京高师期间，不断思考着世界高等教育演变趋势和中国大学发展走向，自觉推进学校改革发展事业，以实现其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宏伟理想。他强调，中国教育“亦应注意是否符合于世界趋势，是否适应国家社会需要”①。“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②

郭秉文确立“止于至善”的校训，有着深刻的理性反思和严密的逻辑论证，体现在其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环境和学校实际对学校管理的理论创新上。郭秉文深谙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大学里平天下的平字，乃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③就大学教育而言，办学治校应达到“止于至善”境界，“最高之善”就是力求实现“四个平衡”：一是“通才与专才的平衡”，本科注重通识教育，也不忽视应用，专科注重专才教育，不忽视基础；二是“人文与科学的平衡”，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既倡导民族精神，又倡导科学精神；三是“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大学教育以师资为第一，但物质设备亦不容忽视；四是“国内与国际的平衡”，既重视已有的饱学之士，又广求知识于世界。需要重视的是，近年有学者总结郭秉文办学的第五个平衡，即“学术与事功的平衡”④，可以视为“四个平衡”理论的新发展。为了实现人才培养的“最高之善”，郭秉文要求大学做到“三育并举”，即通过“训育”（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举而使学生在才能、体魄、精神、道德和学术诸方面达到“相当的发达”的境界⑤，要使学生“具有国士的志节和风度，以国家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

① 郭秉文. 我国今后教育问题[M]//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16.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74.
③ 张其昀. 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4－5.
④ 王运来. 学术与事功——郭秉文高等教育思想蠡测[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2)：16－23.
⑤ 朱沛莲. 五十年前之南高[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109.

人才”[①]。即使在今天看来，郭秉文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这种平衡理论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郭秉文看来，立足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纯粹在师范学校培养教师和学生不合时代要求，大学应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教育，应走“综合大学”的发展道路和建设道路，应该“寓师范于大学”。因为在综合大学内，不仅可以开展“通才教育”，而且可以实施“专才教育”，让两者相得益彰，顺应人才培养规律。南京高师毕业生张其昀在纪念郭秉文先生的文章中解释说：“南高改组为东大，并非如一般所想的升格，或好高骛远，而是他（指郭秉文）的教育理想的实践。”[②]为此，郭秉文以南京高师为基础，把它扩建为一所“综合大学”。课程体系上，既设“正科”，便于实施“通才教育”，又设“专修科”，便于推进“专才教育”。“正科”分文史地部与数理化部，“专修科”设立工、农、商、教育、体育等科。这样，学校可让“通才和专才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于狭隘”[③]。郭秉文的办学思路和实践方针，使东南大学在短短十年间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跃成为国内一流名校。著名近代史专家梁和钧在其著《记北大（东大府）》一文中说：“（南京高师）所设文史地部、数理化部、教育专修科、农商专修科，皆极整齐，尤以所延教授，皆一时英秀，故校誉鹊起……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④]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先生在其著作《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中写道：“当时的东南大学是现代政府高等教育机构的原型，也是全中国最好的大学。他（指郭秉文）招募了50名归国学生，每一个都在自己的领域出类拔萃，凭借美国教育体系的基础推动了东南大学的进程。”[⑤]确实，在郭秉文带领下，国立东南大学从1915年仅有国文、理化两部和国文专修科，逐步扩展到6科（文、理、农、工、商、教）31系。文理学科之齐全，居全国之冠。其中一些系科为国内大学之首创，如物理系、气象系、航空系、体育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金融理财系、国际贸易系等。可以说，教育家郭秉文的不断努力和杰出成就，使东南大学不仅拥有了雄厚的历史资源，而且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

① 张其昀. 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4.
② 张其昀. 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3.
③ 张其昀. 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4.
④ 王成圣. 中国哲人郭秉文先生[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92.
⑤ [美]司徒雷登. 在华五十年[M]. 常江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1：95.

三、东南大学恢复“止于至善”校训传承郭秉文教育思想

从1902年建校以来，东南大学历史上出现过六个校训，其中有三个校训（第二、第三、第六个）与郭秉文有关。这六个校训依时间顺序分别为：第一个是“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由时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的书画家李瑞清（任职1905—1912，下同）于1905年书写；第二个是“诚”，由时任南京高师校长的江南硕儒江谦（1914—1919）提出；第三个是“诚朴、勤奋、求实”，由郭秉文（1919—1925）总结提出；第四个是“诚、朴、雄、伟”，由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1931—1941）提出；第五个是解放后提出的“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第六个是现在使用的校训，即“止于至善”，由国立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提议过，并刻于校徽上。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前所长陈怡教授指出：“上述校训在当时并非都明确地称为校训，有的称为校风，有的称为学风，但都在学校的办学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以今天的观点，是可以称为校训的。”[①]应该说，六个校训各有独特意义，各自因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但在哲学意义上统一于“止于至善”，或者说，“止于至善”涵摄了“五个校训”之意义，这些校训伴随东南大学历史发展，积淀为东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凝结为东大人文精神，融入了东大传统文化之中。在这个比较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杰出教育家郭秉文的睿智远见和教育精神。

为什么郭秉文确立的“止于至善”校训在80年后继续被认同，仍有现实指导意义？对此，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董群教授在《对校训“止于至善”的说明》一文中作了详细解释，“在百年校庆到来之际，我校经过广泛的讨论，多方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决定恢复‘止于至善’的校训，使我校的文化建设进一步完善。”[②]在简要阐述学校校训的理由和校训的一般特点后，董群分析了学校恢复旧训的原因和此训本义。在董群看来，恢复“止于至善”这一老校训至少基于三点考虑：一是历史和生命意识，即校训要反映出东南大学的悠久历史传统和生命底蕴。“逐一考察老校训，选择其解释空间最大的一个，老训新释，既可以反映历史感，又提出时代性”。[③] 其二，本原意识，即对历史传统和生命底蕴的反映必须坚持本原性追问，有寻根意识，就是寻找校训的最早提出阶段。比较看历史上的校训，“‘止于

① 陈怡. 东南大学历史上的校训及其解读[M]//郑立琪主编. 百年回望话精神，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223.

② 董群. 对校训“止于至善”的说明[M]//郑立琪主编. 百年回望话精神，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229.

③ 董群. 对校训“止于至善”的说明[M]//郑立琪主编. 百年回望话精神，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230.

至善’解释的空间更为广阔，意境也更为高远。所以对本原和根的追溯，至此比较合适。”[①]其三，个性意识，即避免和同根兄弟院校已用的校训重复。鉴于台湾“中央大学”已经传承了同根学校——老中央大学——时期的校训“诚朴”、南京大学恢复了老中央大学罗家伦执校时的校训“诚朴雄伟”，“因此，一般来说我校不宜再用此二训。此两校都采纳古训，而中央大学历史上还有一古训是此两校未用的，这就是老东南大学的‘止于至善’，新东南大学承此古训，成为一种必然，从校名到校训兼具历史的纵深感，成就对老东南大学及其发展阶段的整体性继承，且与同根两校用训又有差别，虽有差别，三者相合，又构成历史发展的完整性和空间的差异性。”[②]显然，透过董群的历史比较和现实综合的考察，人们不难理解东南大学慎重选择“止于至善”校训的明智和意义。

结合董群教授的总结和观点，我们认为对“止于至善”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是“止于至善”本身的意义；第二是结合“三纲八目”来理解。也就是说，只有结合整个《大学》来理解，才能完整地反映“止于至善”的原始意义，才能开出“时代性的新释”。首先应该考察“止于至善”的本意。宋朝大理学家朱熹释“止”为“必止于是而不迁”，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而不休止，释“至善”为“事理当然之极”（《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事情的最高原则，即“最高的善”。虽然各家解释表达有差异，但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均指要通过道德个体的道德修炼达到并保持最高的善或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也是“止于至善”的一种具体表现。其次结合“三纲八目”来解释和理解。“三纲”指“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明明德”，意指使个体的光明品德发扬光大；“新民”意指在个体达到道德觉悟后也要主动推己及人，使他人也成为有道德的人。可以说，“明明德”、“新民”是达到“止于至善”的内容、方法、阶段和途径。“明明德”致力于实现“个体至善”，而“新民”是致力于实现“他人至善”直至“社会至善”。实现了“个体至善”，实现了“社会至善”，个体也就是达到了“至善”的境界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学教育适恰其意义。

所谓“八目”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

① 董群. 对校训“止于至善”的说明[M]//郑立琪主编. 百年回望话精神，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230.

② 董群. 对校训“止于至善”的说明[M]//郑立琪主编. 百年回望话精神，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229-230.

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依照朱熹的解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均作为“修身”的内容、方法和步骤，属于“明明德”的内容和“内圣之道”，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修身的功用，是新民（亲民）的内容和“外王之道”。这样，以修身为核心，内圣是修身的内容，外王是修身的功用，由己及人，由近及远，由内而外，由道德事功，实现人生的价值。“作为校训，从简洁的要求出发，只要强调最高阶段或者结果之‘止于至善’即可，作为过程、阶段的‘明明德’、‘亲民’，其意义已含摄于其中。”[①]因此说，“止于至善”的校训，高度浓缩了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精髓，赋予东南大学用之不竭的开拓奋进的精神动力。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东南大学对这个校训的再次确认足见杰出教育家郭秉文的国学功底、智慧远见和治校方略，也体现了21世纪东南大学积极传承先辈教育理想的坚定信念和精神勇气。

四、教育家郭秉文实践“止于至善”创建一流大学的启示意义

郭秉文秉承“止于至善”的校训精神，在短短十年间（1915—1925）在中国南方地区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教育奇迹，使名不见经传的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一跃成为有国际影响的国立现代大学。20世纪20年代，“在郭秉文、邓萃英的办理下，南北高师成为影响显著的两高师”[②]。国立北京大学是第一所现代大学，第二所国立大学就是东南大学，第三所国立大学是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一时名师荟萃，获得诸多美誉，如“中国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学校”、“近代科学摇篮”、“东方教育中心”、“中国最有希望的大学”、“一所最具规模的现代化大学”[③]。孟禄博士甚至预言：“将来该校之发达，可与英牛津、剑桥两大学相颉颃。”[④]难怪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秘书长Edwin R. Embree在1924年评价和比较郭秉文与美国大学校长的领导方式的相似性时写下这样的评语：“（郭秉文先生）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学者……也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⑤]显然，名校得力于名校长，名校长得力于先进思想。郭秉文在1920年提议“止于至善”，并刻于校徽上，不仅体现了其对中美教育思想比较思考后的理念抉择，而且表明其积极弘扬祖国优秀传统

① 董群. 对校训“止于至善”的说明[M]//郑立琪主编. 百年回望话精神，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230-232.
② 彭小舟. 近代留美学生与中美教育交流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18.
③ 朱耀祖. 郭秉文先生与“南高”“东大”[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63.
④ 朱斐. 郭秉文创办东南大学[J]. 民国春秋，1999(1)：12.
⑤ 源自伍斯特学院2011年7月27日发布的新闻 http://wooster.edu/News-and-Events/News-ReleasesJuly/Guo-Honor.

文化的理想信念。郭秉文的校长实践谋略在于：第一，“止于至善”也须站稳民族文化立场。他虽然受美国教育的洗礼和影响，但坚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不仅在留学期间深入研究传播中国教育传统文化，撰写我国第一部中国教育制度史著作，致力于使中国优秀教育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而且在南京高师—东大办学期间大胆实践其大学教育理想，以实际办学成就赢得社会支持；第二，秉承“持诚至善”的精神理念，坚持“中体西用”的策略方针，善于借鉴美国大学教育体制的有益经验大力推进中国一流大学建设，如在大学管理体制上率先引入美国大学模式，率先实施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率先设立大学董事会，率先实现“男女同校”，率先开展社会服务，“自我实现”大学校长职业化，科学履行美国式大学校长之两大职能：“聘请一流师资”和“筹集办学经费”。任职期间聘请了 50 多位毕业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著名专家学者来校任教，千方百计筹措办学经费维持学校正常运转，创造了特殊时期不拖欠教师工资的奇迹，赢得了全校师生的拥护和支持。“惟其这样，（东南大学）教职员薪给才能按月发放，十年间从未拖欠。”[①]在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郭秉文校长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国立东南大学“止于至善”的校训精神，展现了一名新时代教育家应有的理想追求和崇高的道德风范。

21 世纪，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无疑需要世界一流的教育家校长。毕业于世界一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郭秉文博士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开创性工作和伟大成就，对今天中国重点大学校长的办学治校行动，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先生已逝，然精神长存。南京高师学生高明先生代表众校友所敬挽联，彰显了杰出教育家郭秉文先生的伟大人格和历史性贡献：“巍巍钟山，万人空仰芳惠在。浩浩江水，千古长留教泽存。”[②]具体而言，第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首先要有崇高的境界追求和卓越品质。如同郭秉文倡议的“止于至善”境界一样，校长要始终怀有一种“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执着精神。校长人格亦须千锤百炼。“见先生恂恂儒雅，心气和平。凡所持论，洞见本末。旧学新知，两无偏倚。才识卓越，有非常人所能及者。”[③]第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校长须拥有先进的办学思想和理论建树。如同郭秉文著述《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和《学校管理法》等，在实践探索中创立“四个平衡”、“三育并举”、“寓师范于大学”等教育思想一样，创造性地引领学校走在全国乃至全球高等教育前列。第三，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校长须紧抓关键要素建设，善于“抓大放小”。如同郭秉文执掌南京高师—东大期间一样，

① 朱耀祖. 郭秉文先生与“南高”“东大”[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67.
② 王成圣. 中国哲人郭秉文先生[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100.
③ 薛光前. 追念郭秉文先生[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28.

紧抓一流师资队伍建设，紧抓办学资金筹集，紧抓校园文化和校风建设；一些细节管理问题要善于放权、授权部属去处理和解决。第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校长须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切实的国际行动。如同郭秉文执校期间经常“带着问题”考察美欧、日本等世界强国教育一样，准确了解和掌握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大势，为大学发展及时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和策略方针；其连续三届担任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和亚洲分会会长，被称为“国际公务员”①，是“我国从事国际文教合作，尤其是中美文教合作的拓荒者”②。第五，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须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办学原则。如同郭秉文校长爱生如子、亲历亲为、服务学生一样，充分表现出教育家培养未来人才的博大胸怀和真情实意。“公之处理校务，一本分层负责之原则，仅主持大体，而不亲细务。惟于学生有所请，必亲予接见。所请无论许与不许，均反复说明其理由，使人悦服而退。故在公长校时间，全校洽然。”③第六，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要善于开拓创新，引领发展潮流。一如郭秉文倡导男女同校，二如创办上海商科大学一样，善于谋划前沿性发展，敢于走出创新性发展道路。史料记载，第一年（1920 年）国立东南大学在投考百余人中录取 8 名女生，而同年北京大学只招收女生 1 名和几名旁听生。④ 几十年后，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给母校东南大学的校庆贺词中称颂道：“东南学府，为国争光。男女同校，唯此首创。”⑤“公之迁商科于上海，成为单科大学，致力国家经济财政融专才之训练，更属高瞻远瞩。其成就在全国大学中独树一帜。”⑥

① 王成圣. 中国哲人郭秉文先生[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99.
② 朱耀祖. 郭秉文先生与国际文教合作[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76.
③ 吴俊升. 业师郭鸿声先生教泽追思录[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8.
④ 冒荣. 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48－49.
⑤ 王德滋. 南京大学百年史[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83.
⑥ 吴俊升. 业师郭鸿声先生教泽追思录[M]//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11.

郭秉文教育思想在中国商科院校的实践与发展*

应望江　喻世红　宋旭璞（上海财经大学）

郭秉文先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先驱者。他秉承“寓师范于大学”的思想和“文理并重，学术并举”的理念，在政府支持下创建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二所国立大学——东南大学，实现了其“以欧美高等教育为蓝本、以中西融合的方式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的理想，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创办东南大学的同时，郭秉文还特别关注高等商科教育的发展①，依托上海工商界力量，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高等商科院校——上海商科大学（今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1921—1925年，郭秉文担任上海商科大学校长达五年之久，为中国高等商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的教育思想及商学教育实践，深刻地影响着历代商学教育者和莘莘学子，对现代中国高等财经教育改革与发展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 应望江（1963—），男，浙江永康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发展规划处处长、《财经高教研究》主编、经济学教授；喻世红，上海财经大学档案馆馆长；宋旭璞，上海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档案馆韩云云对本文也有贡献。

①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一、郭秉文教育思想和商科教育主张

(一) 郭秉文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郭秉文教育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建立在中西教育思想的融会贯通之上。郭秉文在美国一流的教育学院受到系统的教育专业训练,深受20世纪初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和熏陶,同时善于从中国悠久的教育传统中汲取精华。他认为"以西方之所长,与吾国数千年行之而宜者融合之,成为一种教育,庶几无枘凿之患"①。融合中西、取长补短、渐进改革成为郭秉文教育思想的特征。

基于这一思想,郭秉文在筹建南高师、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办学理念。主要包括:在培养目标上,提倡训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从而使学生才能、体魄、精神、道德和学术等全面发展;在学科设置上,主张文理并重,学术并举;在办学宗旨上,强调面向实际,服务社会;在管理模式上,实行校董决策,民主管理;在学术视野上,倡导面向世界,促进交流。② 其办学方针则可以概括为一个"平"字。郭秉文晚年曾对其学生张其昀畅谈50年前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里'平天下'的'平'字,乃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要办好一所大学,最重要的是要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人文与科学平衡"、"师资与设备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③

这"四个平衡"的方针,既是郭秉文办学理念的最好概括,也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认同美国通才教育观的基础上,提出应培养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在强调民族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同时,重视以美国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既注重名师名士的作用,又追求大学教育设施的高质量;认同置中国大学的发展于世界大学发展的大环境中的必要性,也意味着向当时世界一流大学汇集地——美国学习的必要性。④

(二) 郭秉文的商科教育理念

与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学、术分途,排斥术科不同,郭秉文倡导"教育贵普及,学术贵大成",鲜明地主张学科、术科并举,认为要大力发展商科等其他"术"科。他曾多次抨击国内教育的弊病,指出中国教育"成绩甚少、进步甚持者何也?我

①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上海:中华书局,1916:150.
② 朱迎平.郭秉文的办学理念与创建上海商科大学的实践[J].财经高教研究,2010(2).
③ 张其昀.郭秉文的办学方针[C]//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台湾"中央美术院",1971:1-3.
④ 周谷平,朱绍英.郭秉文与近代美国大学模式的导入[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7).

国教育界有公言矣，曰教育不切于实用也”[①]。郭秉文认为，中国传统教育“不为实际与日常生活而设，乃为官吏之养成”，其目的过于狭隘。新教育应“以农业、工业及其他生活之预备为其目的”，为社会培养多种类型人才。

在1924年所撰的《中国的商科教育》一文中，郭秉文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发展商科教育的主张。他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可以医治好我们民族的伤口，而只有工业、商业和教育，才有可能为解决重大国计民生问题而铺平道路”。他认为，“社会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教育机构，来致力于培养一大批不仅具有商业知识和技能，还有组织能力和领导素质的学生。”[②]在此基础上，上海商科大学创建伊始即将具有“组织能力和领导素质”的商业人才，作为学生培养目标。

上海商科大学的建立，是郭秉文“文理并重，学术并举”理念的典型体现。上海商科大学之所以能克服重重困难而最终创立，是与郭秉文坚守发展商科教育“不仅是用商业知识和技能，还要用组织和领导能力来对学生进行培训，为国家繁荣和国际合作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③]的信念，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大胆借鉴和探索的结果，也与他重视商科这个“术”科，在中国的商科教育尚处于婴儿时期就认识到其显现出的“成长的可能性”，并对创建事宜亲力亲为有直接的关系。上海商科大学的诞生，更是开创了中国高等财经教育的先河。连郭秉文自己在向社会介绍时都自豪地指出，上海商科大学“在中国高等商科教育所处的奇特和几乎独一无二的地位”。从这一点上说，办学实践本身客观地推动了中国高等商科教育的发展。

（三）郭秉文商科教育实践中的具体主张

事实上，郭秉文不仅具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更是重视将其贯彻于教育实践中。而通过具体的教育实践也能够丰富和升华其教育思想和主张。在上海商科大学创建和管理的教育实践中，郭秉文的商科教育主张就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和体现。

其一，郭秉文认为，“现今国民教育的重要问题”的关键是融合中西，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改革。他一直致力于移植与借鉴当时居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大学办学模式，在实践中探索中国大学发展道路。与蔡元培在北大——一所封建思想和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旧大学所进行的转型改革不同，郭秉文兴建东

① 郭秉文. 职业之引导[J]. 东方杂志，1915，12(1)：1－4.
② 郭秉文. 中国的商科教育[C]//远东工商活动：1924. 上海：商业大百科全书公司，1924.
③ 张次博. 上海商科大学的成立及其办学启示[J]. 财经高教研究，2011(3).

南大学、创办上海商科大学是在意识到中国近代教育“彼不顾学生就学之目的，轻视处境生活之需要，甚至教育之本能也”的问题之后，进行的大学彻底性变革。他凭借新学校传统阻力较小优势，顺利导入美国大学特点。在上海创立商科大学，便是在考虑“商科大学以人才和环境关系宜设在上海”的基础上的决策主张。

其二，受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郭秉文主张商科大学的教育内容应强调切合社会的需要。他认为“至于所思想所应用之事物，均以适合于社会需要为本。总期所思所用，皆与社会生活有密切之关系”。主张教育要“关系生活”，学习和探究知识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应用，以满足个人和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①] 其观点与当时以“威斯康星”为代表的美国大学理念的最新发展完全一致。当意识到社会需要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中时，他提倡商科教育的内容也应该与时俱进，以使学生“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而且还开设商业夜校、商业补习班等大力推广平民教育，服务社会，真正致力于带动整个中国高等商科教育的发展。

其三，郭秉文先生不仅将“养成思想及应用能力”并重的思想运用到东南大学工程教育实践中，更是将其融入到上海商科大学商科教育实践中，强调学生既要学会动脑，又要学会动手。[②] 在培养商科学生过程中，要求学生学会动脑，养成思想能力。一方面学生要有思想，即切实掌握“普通学程”和“专科学程”的基本知识，以达到“通”“专”平衡、“博”“精”兼济。另一方面学生要“会思想”，即掌握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方法与技能，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他认为，学生能思想才能够“探知识之本源”，而“只有明了知识的本源，然后才能取之不尽”。其次，要学会“动手”，养成“应用能力”。应用是知识的最终归宿，学习知识仅仅是第一步，因而切实应用知识就是在求“知识之归宿”。同时，知识的应用反过来又会促进新的知识的产生。

基于此，上海商科大学参照美国大学的先进模式进行管理和本土化改革，其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非常注重实用性，且随着社会需要的变化而逐步发生改变。

二、郭秉文的高等商科教育实践

上海商科大学虽是东南大学分设在上海的商学院性质，却因为其具有相对独立性，郭秉文又对其倾注了特殊的关切，使得郭秉文办学理念和办学方针得到

①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卷[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② 王悦芳.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的工程教育[J]. 教育与教学研究，2013(4).

了全面的贯彻和体现，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与东南大学一样，上海商科大学是按照美国大学的先进模式进行管理的现代大学。无论从它的行政组织系统、治理结构，还是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以及所设专业和课程来看，都为中国高等财经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治理结构

借鉴欧美大学的成功经验，上海商科大学的管理体制，既与东南大学保持一致，又自成特色。在筹建商大时，鉴于商大是东大异地办学的分校，东大已设校董会，商大再设这样的组织是不妥当的。于是，郭秉文等人商定设立商大委员会。

商大委员会成为与东南大学董事会相对应的商大决策机构。据 1921 年 11 月制定的《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简章》，商大委员会的职权有 4 项：审定商科大学之计划预算及决算，保管私人捐助之财产，推举商科大学校长，协助其他关于商科大学发展之事业。商科大学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消息屡见于报端，东大校董会屡屡在上海与商大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研究、讨论东大及商大办学和发展的重要事宜。事实上，商大委员会作为商大自身的管理决策和咨询机构，一直较好地发挥作用、稳定运行，不仅为商科大学在解决资金供给及与地方相处方面的具体问题等提供了便利，还很好地发挥了与母体学校东南大学的连接和共同协作作用。例如，关于东大校董会的 6 项职能，是在 1923 年 11 月 15 日的联席会议上议决的。原校董会简章规定的职能仅 2 项，即扶助学校之进行和保管私人所捐之财产。根据两年来校董会的工作实际和郭秉文对美国各大学校董会的考察，东大校董和商大委员均认为，东大校董会之职权实有扩充之必要，遂做出了修改校董会简章的决定。①

与郭秉文主持制定的《国立东南大学大纲》所强调的建立“责任制”和“合议制”相结合的体制相一致，上海商科大学在内部设立行政委员会、教授会协助校长治理学校，行政机构则有校长办公处、教务处、事务部、文牍部、推广部、图书出版部等一处五部。② 与东南大学的行政机构大体对应，体现了学校相对独立的架构。设立董事会或者委员会的做法对中国大学管理体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实践做法甚至对今日影响更甚。这种将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分开设置、共同治理学校的“治理结构”思想和实践，不仅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更是关于社会“治理机制”思想的雏形。

---

① 张次博. 上海商科大学的成立及其办学启示[J]. 财经高教研究，2011(3).
②《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卷[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7－131.

(二) 教育内容和设计

郭秉文认为,现行的班级教学制度存在着诸多弊端,遂借鉴美国现代大学的办学经验,于1920年9月实行“选科制”(即学分制)。上海商科大学在学系和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师资聘任等方面努力贯彻美国大学的模式,并进行了精心设计,使学生既不“流于空疏”,也不“流于狭隘”。当前中国大部分财经类院校依然在效仿和学习当初郭秉文时期建立的学科布局和制度设计。

事实上,上海商科大学由原南高师的商业专修科扩充为开设普通商业、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理财、国际贸易、交通运输和保险七个系的专门学府,在当时的商科院校中是最齐全的,会计、国际贸易等系科更是国内首次设置;商大一开始就实行选修制和学分制,本科学生以修满128学分为毕业,学校安排的课程总数达70门;为了适应上海商业发展的需要,学校对学生的外语要求很高,本科入学考试除国文外,很多科目都用英语考核。学生要修习第二外语,各课程教科书和参考书,全用英文原版;商科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都向美国大学看齐,聘请的师资以留美学生为主体,比例占到师资总数的60%。

上海商科大学学生所修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在主系外学有余力还可修习副系,充分体现了学术自由的理念。商大构筑了各系共同必修的课程平台,有效拓宽选课的自由度和修读的知识面。此外,选课制是对美国大学选课制进行“悉任学生自选”的调整和改革。商大的《普通规程》规定,每个学生必须选定一学系并按该系必修课程依次修习,其余学分得自由选读其他课程,四年里修满128学分为毕业。1923—1924学年,全校共开设本科课程70门,其中授课半年的48门、一年的21门、二年的1门(体育)。除各系必修课程外,本科课程中还包括:法文、德文等外语课程,经济学说、经济问题和经济学史等经济理论课程,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社会课程,世界或中国商业地理、世界或中国经济历史等史地课程,教育原理、学校组织与行政等教育课程。

以当时已设立且以后继续存在的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理财和国际贸易4个学系为例,规定的必修课程有19—20门、73—75学分(不含体育);经测算,学生可自由选修的课程有20门、50学分左右,选课自由度很大,修读的知识面很宽。必修课程中,各系共同要求修读的课程有13门(55学分),占到必修课程总数的2/3左右(学分数的3/4左右)。属于各系自身特别要求的课程仅6—7门(其中也包括与别系相同的课程)。①

(三) 学生自治

商大校内完全实行学生自治。当时《申报》称“该校校制采用欧美,学生全系

①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自动，效忠并不预闻”，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商大明确提出“治商业学科者，不独贵具书本上之学识，尤贵具实际之常识”，商大的教学除了课堂教学外，十分注重考察和实习，设有多家实习基地。学生经常利用假期，外出考察各地商业情形。商大将传授商学知识和训练必要的实务技术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实干的企业精神。此外，学校注重服务社会，设立推广部，广泛联系社会，开办商科夜校、商大平民夜校等，为各界有志求学的青年提供业余学习的机会。

（四）师资和设备

郭秉文认为师资与设备是搞好商科教育的基本保障，办学者既要注重延揽人才，搞好师资建设；又要注重加强学校建设，改善办学条件；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既注重“引凤”又注重“筑巢”，从而达到“师资与设备的平衡”，使商科教育获得良好的发展。一方面，郭秉文强调大学教育当然以师资为第一，办学者理应千方百计、大力延揽人才，搞好师资建设。郭秉文利用自身交游广阔的优势，为上海商科大学网罗了大批的优秀人才。1923—1924 学年，商大就拥有一支由归国英美留学生为主体组成的教员队伍，除 2 名美籍教员外，16 名聘用教员中，归国英美留学生 11 人，超过三分之二。讲授商学课程的教员，大多在工商企业兼职。另一方面，郭秉文千方百计谋求办学条件的改善。郭秉文凭借个人的能力和私人关系，辗转腾挪，采取公家拨款、独资捐助、个人赞助、校董会集资、银行投资、外国基金会捐资等多种渠道，为商科大学募集到大量的资金，配备大量的教学、体育场馆和教学设备、科研设施。

三、传承和发展

昔日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商业科、上海商科大学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记忆，但是它的办学模式和理念依然深深地影响着几经变迁的上海财经大学。经过近百年的淬炼，这所历史悠久的财经类高等院校已经成为跻身于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项目行列的、为国家和社会培育众多优秀商学和经济管理人才著称的现代大学。回顾历史，人们不难发现，如今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是郭秉文教育理念和办学精神传承和发展的结果。

（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

上海商科大学创建起就依照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实行现代大学管理体制。首先，商大委员会是实行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虽然随后更名的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及上海商学院并无成立校董会的记载，但

是使学校有章可循的传统一直在延续，逐步完善大学治理结构是每一代上财人坚持不懈的任务。郭秉文所倡导的大学“治理机构”理念和主张对上海财经大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上海财经大学成为依法制定学校章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积极引领者，成为积极探索建立校董会、理事会、基金会并发挥其咨询、支持和监督功能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这些都是对郭秉文办学理念的继承和发扬。

其次，上海商科大学参考美国模式实行学分制，实施必修选修的学程分配制，构筑共同必修的课程平台。本科一年级不分学系，课程有国文、英文、商法、商业算数、会计学、经济学、国文商业尺牍、英文商业尺牍等。虽然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不断改变，上海财经大学如今已经发展成为经管法文理等多学科的院校，但是商大学分制的传统和现代商学课程结构设置的基本原则始终是上海财经大学保持鲜明财经特色的基础和宝贵财富。商学始终是学校的核心学科和优势学科。如今，学校积极构建通识课程教育体系，推进“分层化的课程体系、多元化的培养路径、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教学改革，也是通才与专才平衡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其目的是使学生成为如郭秉文先生所说的“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

此外，面对世界商学教育发展的新态势，学校重组了商学院，探索建设商学创新平台，积极参与国际商学认证，既是为了保持工商管理类学科传统优势的内在要求，也是学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民族精神，富有创造力、决断力及组织力的卓越财经人才的使命使然。而其搭建商学学科共同必修的课程平台，更直接体现了对商大经验的继承和发扬。

（二）国际视野

郭秉文具有宽广的办学视野和强烈的国际意识，把中国教育置于国际教育的大背景中来把握其未来的发展——既关注国内，又放眼世界。在师资聘任上，上海商科大学成立之初，就注重延揽著名学者及海归教授任教，首任教务主任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马寅初。1923 年聘任的 24 名专任教师中，有留美经历的 14 人，其中博士 3 人、硕士 7 人、学士 2 人、研究院肄业 2 人，另有 1 名留英博士和 2 名美籍教授，共占教师总数的 71%；在人才培养上，郭秉文以国内与国际视野兼具的人才为目标。在培养方式上，郭秉文提出了包括交换教师、交换学生、交换访问、交换出版物，建立联合的教育事业，开设有关外国文化与国际问题的课程，组织国际大学联盟等。学校经常举办各种讲座，聘请国外著名学者和国内各界名流来校讲演，论题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各方面，以开拓学生的视野。如早在 1922 年 10 月，上海商科大学就邀请了美国伊利诺大学加纳

博士作“关于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演讲。

这一“国际”和“国内”平衡思想一直延续着。学校在各个发展阶段都坚持面向社会办学，坚持开放办学，将“匡持国家，补益社会”，培养具备国际视野、民族精神和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作为不懈追求。1981 年，姚耐院长率财经教育考察团访问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等学校，揭开了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序幕。如今学校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国际化战略，不仅让教师和管理人员接触到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学术前沿和管理经验，还有效引进了优质教育资源，提升了学校的国际知名度。为了大力引进海外优秀人才，最大程度地让高层次人才为我所用，学校创造性地实施了海外院长“非全时实聘制”、“常任轨”制、海外特聘教授制和国际化师资培养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更使上财在拥有世界先进管理理念和一流国际化师资的同时，扩大了国际学术影响力，并由此显著改善了课程结构，提高了人才培养水平。

（三）务实的学风

郭秉文“一方面根据本国情形，及在本国试验所得之方法施诸教育；一方面采取欧美先进良法”，终于找到了专修科中“学术”与“事功”的结合点，实行研究、教授、推广或实验“三结合”的办学模式，使得专修科的教育，不仅仅注重新理论或新技术的发明，更注重研究结果的及时推广和应用，“以期收东南数省农、工、商业上之最重要问题逐渐解决”，从而把“学术”与“事功”很好地结合起来。[①]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上海商科大学在厚德与博学并重的思想指引下，一贯严格教学，重视理论密切联系实践。正如原上海财经学院院长姚耐在 1987 年为学校校史作序时，认为“开办上海商科大学之初，对于在教学上既要重视理论又要重视实际应用这一重要原则，就有了相当的认识。上海财经大学的成绩，来源于一贯的严格教学和重视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优良传统学风”。实践证明，“求真务实”也成为学校长期坚持和传承的办学理念。

在注重向学生传授高深商学知识的同时，学校坚持训练其必要的实务技术，培养学生实干的企业精神。学校一贯强调手脑并用，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在课程设置上也充分体现了“学术”与“事功”的良好结合。有基于此，学校培养的学生都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其中不乏蜚声海内外的业界精英。此外，秉承郭秉文先生“关系生活”的理念，学校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持续开展以“走千村，访万户，读中国”为主题的“千村调查”等大型社会实践活动，成为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实践平台，取得了显著的育人效果，产生了广泛影响力。

---

① 王运来. 学术与事功平衡——郭秉文高等教育思想蠡测[J].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3).

值得一提的是，对照郭秉文办学治校的理念和实践，可以发现，其学术思想与实践行动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这种将“治事”与“治学”紧密结合的态度，尤其是其所强调的教育管理的教育性与持中之道，对处于社会转型与教育急剧变革时代的中国教育管理者而言，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郭氏秉文，中西闳通。为商制术，莫不景从。擢英济世，恒以为宗。淬砺节行，不绝弦诵。作为上财人，我们要永远铭记郭秉文校长创校办学的辉煌业绩和杰出贡献，不断传承发展先贤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精神，为早日把上海财经大学建设成为国际知名的具有鲜明财经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奋发努力。

郭秉文的办学理念与创建上海商科大学的实践

——纪念著名教育家郭秉文博士诞辰130周年*

◎朱迎平(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2010年是著名教育家、我校创始人郭秉文博士诞辰130周年。在全社会热切关注中国教育改革深入发展的时刻,纪念这位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重温他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以及创建上海商科大学的实践,汲取其中的丰富营养和宝贵经验,对于深入进行包括财经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1908年,28岁的郭秉文远涉重洋,踏上了赴美求学之路。郭秉文先入伍斯特学院主修理科,于1911年获得理学士学位。随后,他进入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这是一所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院,杜威、孟禄、桑代克等教育学大师名流,当时都在该院任教;而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中国著名教育家,也都在郭秉文之后入该院学习。1912年,郭秉文获硕士学位,两年后,他又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博士论文,获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在教育学领域获得博士学位者,这篇论文也奠定了其教育思想的基石。就在准备博士论文之时,郭秉文收到了正在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江谦校长邀请其出任

*[作者简介]朱迎平(1948—),男,浙江平湖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任上海财经大学档案馆馆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散文、古代文体和古代文献。

教务主任的聘书。毕业之后，他即归国赴任，投入到学校的筹建工作之中，使学校于1915年9月正式开学。1918年3月，郭秉文因江谦病休代理校长；翌年9月，被正式任命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0年4月，郭秉文正式提出将南高师改建为大学的建议，获得校务会议的一致赞同，并进而得到社会各界名流的支持。经过紧张的筹备，1921年9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诞生，郭秉文被委任为校长；同时，东南大学与暨南学校合设的上海商科大学也正式开设，郭秉文兼任校长。在随后的几年内，郭秉文殚精竭虑，苦心经营，使东南大学声名鹊起，成为国内科系设置最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而上海商科大学也蒸蒸日上，成为特色鲜明的高等商科学府。虽然1925年初郭秉文突遭北洋政府教育部免职，被迫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大学，并就此结束了办学生涯，但他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杰出的办学实践，却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份丰富遗产，留给后人许多启迪。

郭秉文的教育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因为它建立在中西教育思想优秀成果的融会贯通之上。郭秉文留学美国，在美国一流的教育学院受到系统的教育专业训练，深受20世纪初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的熏陶和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同时又善于从中国悠久的教育传统中汲取精华，将其与西方的教育理念熔于一炉。他首次从“公共教育制度”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上古以来中国列朝教育制度的沿革，重点考察了清末至民初新教育制度的设立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思考“现今国民教育的重要问题”。他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鲜明地主张：“以西方之所长，与吾国数千年行之而宜者融合之，成为一种教育，庶几无枘凿之患。”并引用其师孟禄博士之言称：“中国教育家之所当保持者，古代文化之所长与其精英，而非其糟粕也；所当取法者，西方文化之所长与其精英，而非其糟粕也；采西方文化时，融会而非变置，以渐进而非以骤几。”[①]这种融合中西、取长补短、渐进改革的思想，成为郭秉文教育思想的核心。

基于这一思想，郭秉文在筹建南高师、东南大学及上海商科大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办学理念，其要点包括如下数端：

在培养目标上，提倡三育并举、全面发展。郭秉文主张通过训育、智育、体育三者并举，而使学生的才能、体魄、精神、道德和学术诸方面都得以“相当的发达”，并对“三育”的内涵和方法做了深入的阐发。他认为训育的标准应“养成对于国家负责任之国民为意想中之人格”，而达成的途径则是“训练注意启发，使知其所以然；管理注意实践，使行其所当然。二者交相为用，以期知行合一”。对于智育，他提出“以养成思想及应用能力为智育标准，使学生能思想以探智识之本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中华书局，1916：150.

源，能应用以求智识之归宿”，要求“注重兴疑和试验”，“必使所学者皆有所用，所用者皆本所学”。他强调“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以养成坚强之体魄和充实之精神为标准”，要求学校从注重养护、锻炼、医治三方面实施体育，“务使人人能得康健之幸福”①。

在学科设置上，主张文、理并重，学、术并举。郭秉文认为：“不发扬民族精神，无以救亡图存；非振兴科学，不足以立国兴国。”②主张大学的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应该同步协调地得到发展。与蔡元培在北大实行学、术分途，排斥术科不同，郭秉文倡导“教育贵普及，学术贵大成”③，主张学科、术科并举。南高师在文、理两部外，陆续增设体育、工艺、农业、商业、英文、教育等专修科；东南大学成立之时，即设文理、工、农、商、教育五科，科系之多，居全国之首。东南大学首任工科主任茅以升曾于 1923 年称：“本大学学制，以农、工、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所在也。”④

在办学宗旨上，强调面向实际，服务社会。郭秉文多次抨击国内教育的弊病，指出中国教育“成绩甚少、进步甚迟者何也？我国教育界有公言矣，曰教育不切于实用也”⑤。他主张“教育必裨实用，他国所风行而收功之实际教育，当加意提倡之”⑥。大量设置“术”科，专门分设商科大学，正是这一宗旨的体现。在具体办学方式上，大力推广平民教育，举办商业夜校、商业补习班、植棉讲习所，连年承办暑期学校等等，努力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成为东南大学的鲜明特色。郭秉文很早就撰文介绍西方的职业引导事业，主张“引导少年选择适当之职业，诚重要事也”，“虽非学校独任其实，然学校则当其首冲”⑦，同样体现了教育服务社会的宗旨。

在管理模式上，实行校董决策，民主管理。郭秉文在筹备东南大学之时，参照欧美大学的惯例，设置校董会作为学校决策机构。校董会的组成除教育部代表和校长外，主要聘请“声望卓著，热心教育”、能“以学术经验和经济赞助本校者”担任。其职权为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审核预算决算、推举校长、决定科系设置等。校董会为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帮助解决办学经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① 郭秉文. 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G]//南大百年实录上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5－58.
② 王德滋. 南京大学史[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4.
③ 国立东南大学缘起[G]//南大百年实录上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99.
④ 茅以升等提议添设土木工程及电机工程案[G]//南大百年实录上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6.
⑤ 郭秉文. 职业之引导[J]. 东方杂志，1915，12(1)：1－4.
⑥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上海：中华书局，1916：147.
⑦ 郭秉文. 职业之引导[J]. 东方杂志，1915，12(1)：1－4.

用。在校内管理上，郭秉文主持制订的《国立东南大学大纲》建立起“责任制”和“合议制”相结合的体制，设立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和评议会，分别负责教学、行政和议事。① 校董会和校内“三会”相结合组成的管理体制，体现了民主治校的精神，确保了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

在学术视野上，倡导面向世界，促进交流。郭秉文是首位留美教育学博士，后又多次率领教育代表团出访菲律宾、日本和欧、美高校，并在1923年世界教育大会上被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主持亚洲部事务。他大力倡导大学教育要增进国际间的了解和友谊，并设计了一系列的方法，如交换教授和学生互相访问、交换学校出版物、联合办学、引进外国文明和国际问题研究的课程，乃至组织国际大学联盟等等。他强调培养世界大同主义精神，提出“大学的责任是造就具有国际头脑、贤明、无私、能够抛弃自己民族偏见与偏爱的世界主义者，其影响在国家之间的交流中会显现出来。大学的责任是培养四海之内皆兄弟、宽容、和谐与平等的精神。为了这一目标，应鼓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尽量避免过度的政治和资本的干涉。”“大学应该维护正义，敢讲真话，这样才不辱其最高使命。”②

郭秉文晚年曾对学生张其昀畅谈五十年前的办学方针，将其归纳为一个“平”字：“《大学》里‘平天下’的‘平’字，乃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就大学教育而言，应该力求：（一）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二）人文与科学的平衡；（三）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四）国内与国际的平衡。”③这“四个平衡”的方针，正是郭秉文办学理念的最好概括，也成为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郭秉文不仅具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理念，而且重视将其贯彻于教育实践之中。他不但是一位教育理论家，更是一位教育实践家。在前后十年间，郭秉文先是协助江谦创办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随后又亲手创办了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其中，上海商科大学虽然是东南大学分设在上海的商学院性质，但又有着相对的独立性，郭秉文对其倾注了特殊的关切，他的办学理念在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中也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并表现出鲜明的特色。

首先，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建，是郭秉文“文理并重，学术并举”理念的典型体现。1917年，当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强调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者”而停办商科之时，南高师却增设了商业专修科等一批“术”科。三年后，郭秉文主持制定的

① 国立东南大学大纲[G]//南大百年实录上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7－131.
② 郭秉文. 太平洋国家的大学如何促进国际间了解与友谊[C]//郭秉文先生纪念集. 台北：台湾“中央学术院”，1971：1－12.
③ 张其昀. 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C]//郭秉文先生纪念集. 台北：台湾“中央学术院”，1971：1－3.

《改南高为东南大学计划及预算书》就明确："商科大学因人才与环境关系，拟在上海择地建设。"随后，郭秉文在紧张筹办东南大学的同时，亲自奔波于宁沪之间，主持商科大学的筹办。从与暨南学校协商合设，一直到聘请教职员，郭秉文无不亲历亲为，终于使上海商科大学与东南大学一起于 1921 年 9 月开学。其后，郭秉文在执掌东南大学的同时，仍时时不忘上海商科大学的发展，举凡经费的筹措、校舍的筹建，直至学生会工作的指导，都事必躬亲，悉心治理，从中可见商科在郭秉文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其次，上海商科大学的管理体制，既与东南大学保持一致，又自成特色。学校在筹办之初，就成立了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其地位和职权略相当于东南大学的校董会。委员会制订了《简章》，规定了委员的名额、选举、任期及委员会的职权等，并推举出首批委员 15 人，包括沈恩孚（江苏省教育会会长）、黄炎培（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史量才（《申报》总经理）、聂云台（上海总商会会长）、钱新之（上海交通银行经理）、陈光甫（上海银行公会主席）、穆藕初（纺织业巨子）等上海学界、报界和商界的名流。此后，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消息就屡见于报端，并常与东南大学校董会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商议相关的重要事宜。商科大学内部则设立行政委员会、教授会协助校长治理学校，行政机构则有校长办公处、教务部、事务部、文牍部、推广部、图书出版部等一处五部，与东南大学的行政机构大体对应，体现了学校相对独立的架构。

第三，上海商科大学的培养目标，在"三育并举"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具体的方向，这集中体现在郭秉文 1924 年所撰的《中国的商科教育》一文中。在这篇中国最早的专论商科教育的文献中，郭秉文全面回顾了 20 世纪初以来中国商科教育的发展历程，指出虽然它尚处于"婴儿时期"，但已经显现出"成长的可能性"。他自豪地向社会介绍了上海商科大学"在中国高等商科教育所处的奇特和几乎独一无二的地位"，并高瞻远瞩地提出，"政治家和教育家们都已经逐步认识到，说到底，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可以医治好我们民族的伤口，而只有工业、商业和教育，才有可能为解决重大国计民生问题而铺平道路。随着商业的发展扩张，商业圈中的领导人士也开始意识到，社会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教育机构，来致力于培养一大批不仅具有商业知识和技能，还有组织能力和领导素质的学生。上海商科大学正在努力满足这种需求。"[①]这就明确地将具有"组织能力和领导素质"的商业人才，作为上海商科大学致力于培养的目标。

第四，为实现这一目标，上海商科大学在学系和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师资聘

① 郭秉文. 中国的商科教育[R]//远东工商活动：1924. 上海：商业大百科全书公司，1924：48－50.

任等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学校设置普通商业、会计、工商管理、银行理财、国际贸易、交通运输、保险共七系（后二系未能按计划招生），在同时的商科院校中是最为齐全的，全校安排的各系课程总数达 70 门。学校采用学分制，本科以修满 128 学分为毕业。学生所修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在主系外学有余力还可修习副系，如 1926 年毕业的曹立瀛就是会计和工商管理两系毕业的。学校对学生的外语要求很高，以适应上海商业发展的需要，本科入学考试除国文外，数学（代数几何三角）、经济学大意、簿记学、商业算术、世界近世史、世界商业地理等科目，均用英语考核；学生要修习第二外语（法文、德文），各课程教科书和参考书，全用英文原版。学校注重延揽著名学者及“海归”教授任教，首任教务主任为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马寅初，1923 年聘任的 24 名专任教师中，有留美经历的 14 人，其中博士 3 人、硕士 7 人、学士 2 人、研究院肄业 2 人，另有 1 名留英博士和 2 名美籍教授，共占教师总数的 71％。学校经常举办各种讲座，聘请国外著名学者和国内各界名流来校讲演，论题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各方面，以开拓学生的视野。

第五，为实现这一目标，上海商科大学实行学生自治，注意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该校校制采用欧美，学生全系自动，校中并不预闻。”校内成立学生自治会，“分评议、执行、纠察三部分，惟执行部再分交际、值务、膳事、经济、卫生、学艺七科。会务均有各部长、科长担任。”[①]自治会工作遇到困难，直接向校长汇报，郭秉文亲自接洽学生，帮助解决问题。学生的课余生活颇为丰富，校篮球队曾夺得华东八大学篮球赛冠军；春假期间，学生结伴出游，并顺便“考察当地的商业情形”。“五卅”运动中，不少学生积极投入，在校内成立了“自强会”、“自兴会”、“学生会”等，有的还参与了市学联的活动。

第六，上海商科大学注重贯彻“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商科大学的夜校是与日校同时开学的，“专为在外服务商界青年补习学问及应用知识而设，故所定之学程咸以注重实用为宗旨”。夜校受到社会的热烈欢迎，开办两年中“就学者达六百余人，先后所开学程有九种”，“报名者络绎不绝”。[②] 1924 年春，商科大学数十名热心平民教育的学生开设了“商大平民夜校”，由学校师生捐助经费，为小学程度的平民免费施教，两年内学生 500 余人。此外，商科大学校内还设立“介绍部”，旨在“沟通实业与教育”，凡本校毕业生“皆可在该部报名，外间欲觅相当

① 商科大学记事[N]. 申报，1922－4－4.
② 商科大学开办夜校[N]. 申报，1923－9－21.

商业人才者亦可函告该部代为物色”，[①]其功能类似今日的就业指导中心。

以上种种办学措施，既贯彻了东南大学普遍的办学理念，又具有鲜明的商科特色，是郭秉文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商科大学在短短几年内就步入正轨，生机勃勃，声名鹊起，享誉沪上，其中郭秉文校长无疑倾注了大量心血，而他也获得了广大师生员工的一致尊敬。诚如东大、商大学生在后来的“挽郭宣言”中所称赞：“砥柱东南，树人十载，春盈江国，有口皆碑，支大厦于一木，系一发于千钧”，“东大之所以产生，与其有今日之声誉，实系郭校长惨淡经营之功。”[②]因此，当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免职令下达的第二天，最先获知信息的上海商科大学师生群情激愤，连夜召开全体学生紧急会议和全体教职员联席会议，通电教部质问免职理由，坚决挽留郭秉文校长，并迅速影响到东大全校和整个社会，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挽郭”运动。尽管在强权政治的高压下，郭秉文被迫忍痛离开了为之倾注全部心血的校园，但他创建的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却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浓重的笔墨，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2010 年是郭秉文诞辰 130 周年，而他亲手创建东南大学及上海商科大学，也已将近 90 周年。可以告慰先贤的是，当年由他开创的高等学府，90 年后的今天仍在承续他的事业蓬勃发展，其中上海商科大学屡经嬗递变迁，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上海财经大学。郭秉文在 1925 年离开高等教育界之后，主要投身于商界和政界，历任上海信托公司总经理、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财政部常务次长兼驻英大使馆财务参事等职，并代表国民政府先后出席联合国世界粮食会议和货币与财政会议；1944 年起出任联合国善后经济总署副署长直至退休。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教育家的郭秉文，自创办商科大学起，就与经济结缘，并将此作为其后半生的主要事业，这是颇为令人深思的。

作为中国最早的商科大学，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的历史几乎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郭秉文校长当年创建这所学校的理念和实践，不但对于研究现代高等教育史、高等商科教育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仍然是重要的历史借鉴。温家宝总理 2010 年 2 月 27 日在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并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让教育家办学，我这里所说的教育家他们可能不是某些专业的专家，但是他们第一热爱教育，第二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郭秉文校长

① 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一览[R]. 上海：上海商科大学，1923：23.
② 东大分设商大全体学生宣言书[N]. 申报，1925－1－14.

创办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无疑是中国教育家办大学的典范之一。今天，我们纪念郭秉文博士，缅怀这位中国高等教育先驱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必将激励我们更好地继承先贤的遗志，深入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论郭秉文的高等教育改革观*

◎宋业春(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郭秉文(1880—1969)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改革家,是第一位连续三届被推选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的中国教育家,有“东南大学之父”之誉称。他曾多次考察过欧美日等国的高等教育,对中西教育发展颇有研究。早在美国伍斯特学院读书期间郭秉文就对教育改革产生兴趣,并放弃他原来学习法律的计划。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培养他的兴趣。[①] 1914 年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留学生。该书分析中国传统教育的兴衰,重点是对中国近代教育制度沿革进行了考察,是中国第一部教育制度通史。1915—1925 年他执掌南高师和东南大学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实践,在学习借鉴欧美大学尤其是导入美国大学模式、革除传统教育的弊端、探索建立有本土特色的高等教育模式等方面,均取得了明显成效,极大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郭秉文的成功与其教育改革理念是分不开的。“四个结合”,即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结合、现代与传统的结合以及创新与借鉴的结合,是对郭秉文高等教育改革观的高度概括,闪烁着一代教育改革家的智慧、胆识

*[**作者简介**] 宋业春(1972—),男,安徽肥东人,博士,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副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此文曾发表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 年第 11 期。

① [美]葛德卫. 郭秉文与伍斯特学院. 参见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83.

与魄力，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的改革取向

郭秉文认为，中国“数千年之教育性质皆偏于文学、哲学与道德诸方面，而近世所谓实验教育则百不得一焉。其教育之法颇似欧洲希腊文学复兴时代以前所盛行者”①。他指出当时中国教育问题之一就是不切于实用，培养的是官吏式人才，与人的日常生活脱节。他说：“欧洲昔时之教育视为宗教、医学、法律之预备。吾国亦然。教育不为实际与日常生活而设，乃为官吏之养成。故父兄对其子弟之最高理想，即希其得入仕途以为荣。此种见解深入吾国之人心，往往轻视工业，以为有损于士子之价值。虽至今日学校之毕业生仍以政府位置为报酬之具。法政学校招考则人数拥挤，而工业学校则应者寥寥。求学为作官之谬见，于新教育制度之下不当生存也。”②正是如此片面的教育导致我国近代艺术和科学进步的滞后。郭秉文“思有以革之者”，“盖以为非振兴科学，无以救亡图存；而培养人才，则有赖于教育。”③因而他提出教育必须着眼于实际，符合社会需要，主张借鉴西方教育，尤其是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改造中国传统教育，以培养国家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唯如此，教育才能有益于国家前途和社会进步。

在高等教育改革价值观上，郭秉文认为要善于把握世界趋势，适应国家社会需要，以“是否适合于世界趋势，是否适应国家社会需要”作为目标和依据。郭秉文在《战后欧美教育近况》报告中具体指出：“自欧战起后，世界各国对于教育咸起疑问，以前之方针，是否符合于世界之趋势，是否适应于国家社会之需要。无不希望在此改造期内，详慎研究，俾无遗憾。我国教育上之政策，亦应注意是否符合于世界趋势，是否适应国家社会需要。如其未敢自信，则于教育上之改革，宜如何致力研究。”④郭秉文认为，自欧战以来世界教育改革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世界各国对教育改革方针进行了“反思”，认为我国教育改革要对此高度重视，应该“致力研究”，在政策取向上要以“是否适合于世界趋势，是否适应国家社会需要”作为改革的方针依据。他的诸多教育改革举措基本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展开的。这是贯穿其教育改革实践的一条红线。

---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4.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5.
③ 冒荣. 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1－12.
④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16.

可以说，郭秉文高等教育改革在总体上是追求教育的社会化、民主化、科学化，以拯救传统教育空疏之弊。这一改革过程“本身就是在追随世界教育潮流，把中国教育变革纳入世界范围内的进步主义教育变革潮流中，而成为世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组成部分。然而如何在积极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同时，防止和避免中国高等教育完全西方化，丢失掉自己民族文化传统，即怎样更好地处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这是一个不易处理好的矛盾统一体”①。这一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表现为保存本土文化与西化教育的冲突和本国特定的国情与高等教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矛盾”②。郭秉文“平衡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而他的改革实践也处处体现了这一思想。在其相关论著中，他多次提及教育的世界精神，以及教育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的意义。他一方面强调教育改革要适合于“世界趋势”，瞄准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通过教育改革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化水平，缩小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发展的差距，实现中国教育的进步；另一方面则强调教育改革要适应“国家社会需要”，中国教育改革不是唯西方论，而是建立在自我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应国家社会之需求。在郭秉文看来，教育本土化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种切实的办学理念。

国际化与本土化如何结合是中国高等教育自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的课题。这一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在建设“世界一流”的过程中，能够保有自身的民族特性，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这是后发展国家高等教育所不得不面临的实际问题。就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而言，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我们既要有“全球视野”，也要关注“中国特色”；既要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优势，又要保留自己独特个性，在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寻找结合点。郭秉文提出的“四个平衡”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尽管他的一些改革举措未能贯彻到底，有的尚待时机融合，一些做法还存在外来化与本土化的矛盾，但郭秉文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改革成功推进，把名不见经传的东南大学建设成为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这与其提出的适应和平衡理论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当代高等教育改革正确的取向是将教育的普遍原则与中国的现实有机结合，在教育自身与世界环境“适应”的过程中，达到自身与外界的“平衡”，这样中国高等教育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① 张雪蓉. 1920 年前后中国大学变革的现实启示[J]. 南京社会科学，2005(6)：85.
② 张雪蓉. 1920 年前后中国大学变革的现实启示[J]. 南京社会科学，2005(6)：85.

二、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结合的改革路径

郭秉文认为，中国教育改革向来因袭的是自上而下的外在路径，缺少自下而上的内在动力。这一弊端根在教育缺少独立地位，“教育行政能力全出于政府”，“无地方自动的能力”，这是中国教育“独有之缺点”①。因此他主张吸取欧美国家经验，说：“吾国现政府对于教育之行政能力与欧美诸国较不啻只有半数也，美国教育最发达之州即国家、社会、学校三者通力合作最团结之州。”“故吾人于社会须有养成自动能力之觉悟，并促进学校与社会同负教育改进之责，与国家通力合作，以为补救。”②郭秉文认为教育要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培植通力合作的制度基础，尤其是加强教育与社会的联系，以此促进教育独立，担负教育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

郭秉文指出，教育改革的根本必须“自下而上”。1919 年考察欧美回国后，他在一次讲话中曾说：“英美教育家，以为英美瑞士诸国之教育，可供中国参考者，为地方自动的教育，此为共和国所最应注意者。盖教育原应由地方人民自行兴办，非可依赖政府。若山西省之教育，自上而下锐意进行。在此过渡时代，亦系一种办法。然欲从根本上举办教育，必须自下而上也……共和国之实际，在学校内注重于共和精神之培养，如职教员间之协力办事，学生方面提倡自治，发展自动之机会，养成互助之精神。或以为学生在今日，已极自动之能事，无提倡之必要。要知学生当此久静始动之际，容有出轨之处。”③对于传统“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模式，郭秉文客观地肯定其作用。但他认为从教育改革的根本而言，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因此，他主张教育改革要由教育家来推动，学校是教育改革的主体力量。他认为“学术之研究，应特别提倡，为国家根本计，学术不精，则凡百不能进步”④。他在南高—东大时期的改革，重在营造学校民主、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南高—东大时期学术成就的取得，与这一改革理念是分不开的。

郭秉文提出，教育改革还需要人们“上下尽心”，做到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结合。为此他提出教育改革“非但需最高之教育技能，且必以热诚、博爱与公心

① 冒荣. 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39.
② 冒荣. 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39.
③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16－117.
④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18.

赴之”。他说:“考吾国教育之状况,其缺点在所难免,然上下尽心教育之改造,颇为人所称道。全国国民之教育问题,规模大而性质复杂,非但需最高之教育技能,且必以热诚、博爱与公心以赴之,方得有成效之解决。”①郭秉文认为,中国教育改革具有复杂性,“规模大而性质复杂”。他强调的“上下尽心教育之改造”,说明他已经意识到教育改革的深层问题:人心向背关系教育改革之成败。如果一项教育改革仅仅停留于技术层面,没有形成改革的舆论与氛围,没有“热诚、博爱与公心赴之”,人人怀自私自利之心,那么这样的教育改革充其量是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而已,也必不能取得成功。因此,他主张教育家自身所应努力者,一是“使社会承认教育为一种公众事业,使人民承认其对于教育事业,应负一部分经济责任”;另一是“使自己所办教育,确有优良之成绩,庶足以示人教育之价值,而唤起对于教育之信仰,徒事空言无益也”②。

应该说,郭秉文教育改革是十分重视学校与外界的联系。郭秉文一直主张办学经费需要“政府与社会合力并筹”。在筹建东南大学之时,他就提出“惟兹事体大,非资群策力不足以立”③,希望通过“海内外热心教育之富豪”和其他社会人士,多方筹集社会赞助。他所强调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乃是针砭时弊,意在强调教育的自主发展,彰显大学的学术性,揭示大学改革之道与大学自身的责任。因为只有发挥大学自身主体创造性、责任感与使命感,才能真正产生改革的内在动力,而不是迫于外在的压力。

故在教育改革主体性问题上,郭秉文明确提出“自下而上”、“上下尽心”的教育改革理念。他认为大学最高使命就是“维护正义,敢讲真话”,他特别强调大学的责任与担当精神,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对国家负责任的公民”,以及“对于附近社会之风俗负改良之责任”。他创立的东南大学正是“国人自办之一新兴著名大学”,学校的成立体现了这一改革理念,其诸多改革措施兴起于学校,如建立董事会制度、开放女禁、倡导和实施“男女同校”以及“寓师范于大学”等,其后影响逐渐推开,并促进政府政策的改变。郭秉文更以其“热诚、博爱与公心”的教育家的“职业精神”,投身于中国教育变革中;以其担当意识、人格魅力与卓越成就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树立了一代教育家的良好形象,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先驱。

---

①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8.
②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25.
③ 国立东南大学缘起.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99-101.

三、现代与传统结合的渐进式改革策略

郭秉文十分重视教育制度的变革。他研究中国教育制度的沿革史，深知中国教育问题之所在。1915 年 8 月 31 日，郭秉文在南京演讲，题目是“吾国教育行政之缺点”，指出传统教育行政的三项缺点，其中之一就是“无教育标准”。“凡有事物，皆有一定标准，以为鹄的，如土木之于规矩，计算之于单位。”①而我国教育行政无一定标准，无一定尺度，无一定单位；判断一县教育行政之优劣，评定学生成绩之好差，均无“公认之基点”，无客观之尺度，往往“人各一致”，或随感觉更变。这是造成中国教育质量低效的原因所在。为了改变中国教育的落后现状，郭秉文力主推行新教育制度改革，认为教育制度“非改革不足以对外言竞争，对内致安宁”②。郭秉文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首次从“公共教育制度”、“人民教育”为视角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沿革，尤其是清末民初新教育制度的设立和发展，对诸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教育法”、“学校组织”、“教育制度中之财政问题”等“现今国民教育的重要问题”进行了思考；在“教育与国民进步”的关系论述中，郭秉文认为，“教育之改良为一轴纽，牵动各种事业皆随之而变。新教育造成人才，为国家之栋梁，措国家于磐石之安，故曰，与国民进步最有关系者，乃教育也”③。他期望通过教育制度的变革，加快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

教育制度变革当知文化特性。郭秉文较早认识到教育改革与文化传统的内在关系，认识到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等传统因素对教育改革的影响，指出中国教育改革“当知吾人保守性质以及改革激进之精神，皆有胜于人者”④，揭示中国教育既富于保守性又不乏改革精神的双重性特质，认识犀利深刻。他自觉意识到教育改革要“以合乎境地，审乎政治社会之现象为主”⑤，认为教育改革要尊重国情，“盖国情有不同，时事有变迁。善于彼者，或不善于此。宜于古者，或不宜于今”⑥。1920 年郭秉文邀请有关名流参加“筹备请改本校为东南大学委员会”的信函中，指出大学成立的目的在于“发展吾国文化”。强调大学在传承创新民族优秀文化方面所肩负的神圣使命，无疑是对大学功能范围的扩展。他较早提

① 冒荣. 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39.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③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4－105.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8.
⑤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8.
⑥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8.

出“科学与人文平衡”的教育理念，主张对中西文化兼容并包，对新旧学术兼收并重。这是对近代“中体西用”的教育改革思想的超越和发展，体现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的教育改革家的理性选择和开放胸怀。

郭秉文还对中国教育改革规律有着深刻的洞悉。他说：“中国教育家之所当保持者，古代文化教育之所长与其精英，而非其糟粕也；所当取法者，西方文化之所长与其精英，而非其糟粕也；采西方文化时，融会而非变置，以渐进而非以骤几。”“以西方之所长，与吾国数千年行之而宜者融合之，成为一种教育，庶几无枘凿之患。”[①]“教育家之理想即国民之理想，改良非可骤然而致，行一新制度未久，必有以保存古经与古教授法以为反对者。”[②]郭秉文认为，中国教育改革要既要保持传统之精华，又要善于取法西方文化之所长，以渐进之方式，取长补短，沟通中西，融会古今，形成具有自我特性的教育改革道路。这一融合过程决定了教育改革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文化上的“建构”与“融合”的过程，具有长期性与艰巨性。

改革之道是平衡之道，也是和谐之道。面对科学与人文、民主与集中、激进与保守等时代教育问题，郭秉文从整体性揭示教育改革不可趋于一端，而要在发展中保持张力中的平衡。他告诉我们，教育改革是多重力量博弈的过程，充满上（自上而下）与下（自下而上）、内（本土化）与外（国际化）、古（传统）与今（现代）的矛盾。改革的真谛就是寻求一种平衡。这种适度的平衡是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这就决定了改革是渐进的、历史的、文化的融合过程。这种渐进式改革策略依然是当代高等教育改革路向的理性选择。

四、创新与借鉴结合的改革模式

清末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初是师法日本。如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就是效仿日本大学模式。但其后这一路向发生了转移，教育改革出现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如在北方以蔡元培为代表借鉴德国大学模式，改造北京大学，使之成为研究高深学问之场所，这是在旧基础上进行革新的一种改良模式。而在南方，郭秉文借鉴美国大学模式，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创建综合性的大学，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如他提出和实践“寓师范于大学”；强调面向实际，服务社会，注重“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扩展大学功能；主张“学”、“术”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6－107.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58.

并重；设立学校董事会，辅助指导校务，负责筹资、预算、选择校长等学校重大决策；实行校长领导下的“三会制”，即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民主管理；实施“学生自治会”制度，实行男女同校，推行选课制和学分制，等等。这些改革主张与做法，尽管是借鉴了美国大学模式，但是“美国大学模式”毕竟是一种理念，这个“蓝图”要在中国本土“设计”“建构”起来，离不开结合本土的再创造。正如郭秉文在1922年2月《十年之教育调查》一文中所指出的，“教育事业之改进，不能凭玄想与空谈，非先实地调查，洞察现状，严密批评，提出解决办法，无从进行。”[①]张其昀在《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一文中说：“南高改组为大学，并非如一般人所想的升格，或好高骛远，而是他的教育理想的实践。”[②]因此，我们认为郭秉文的教育改革更多的是一种制度创新，其制定的重要改革措施，虽然受到了西方思想和方法的影响，但绝不是简单的照搬美国模式的做法。他的改革较之“中体西用”的教育改良派主张，确有历史进步之处，表现出新的不同的时代特征，并对中国大学的改革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变革如何在本土化的基础上做到融合创新，似乎做得还不够，尚存在制度移植的痕迹。这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也是郭秉文时代教育改革者两难抉择的问题，是教育改革中必然遭遇的深层矛盾问题，也是需要时间和过程去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苛求郭秉文。在旧传统的惯性束缚下，在反传统、呼唤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精神冲击下，这一改革模式在当时也不免遭受人们的非议。正如欧洲教育考察团批评的，“现在中国最显著之特征，即为一群人所造成之某种外国文化之特殊趋势，此或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或其他国家。而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为不合时宜。此种对于固有文化在教育上的价值之误解与藐视，其趋势乃为人所不能不反对也。”而新教育者对于中国之旧教育制度，“不但认为陈腐，急需改革；并谓之具有罪不容逭之性质，故不经任何过渡之措施，即将美国之教授课程与方法，代替中国千百年来之大智慧与学识，趋极端者，意欲目睹中国之美国化而甘心。”[③]郭秉文1925年离开国内教育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矛盾错综交杂的冲突结果。尽管如此，他的改革还是成效显著的。经过几年的发展，东南大学声誉鹊起，蒸蒸日上，成为一所在国内堪称一流的现代高等学府。郭秉文教育改革可谓功不可没。

---

①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21.
②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39.
③ 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C]. 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1辑）. 新北：文海出版社，1966：14.

总之，郭秉文“四个结合”的高等教育改革观强调的是适应与平衡，有其内在的思想逻辑。他以洞明世界之潮流、适合世界发展趋势为视野，以倡导国民之文化、适应国家社会需要为目的，以平衡协进、借鉴融合为方法，审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深刻认识到中国教育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中国教育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明确提出自下而上的学术自主的改革主张，希望中国大学担负起发展文化的责任，提高中国大学在世界教育中的地位，并积极投身改革实践，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一次有机融合与成功改造，形成具有独特性且比较系统的高等教育改革理论。正是对于中国教育问题的清醒认识，郭秉文认为必须借鉴西方教育的优点，改变传统教育性质，增强教育自主性，确立新教育标准，其教育改革举措基本上是围绕这三个方面进行的。他以美国大学模式为标准，但又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极力强调与本土实际结合，认为大学治理应力求达到“四个平衡”，即通才与专才平衡，科学与人文平衡，师资与设备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①] 他在南高—东大期间进行一系列教育改革实践，取得明显成效，与其讲究平衡之道是内在相联的。郭秉文高等教育改革思想与实践，为中国大学寻求自身发展、掌握自己命运提供了典型范例，丰富了中国教育改革思想，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为办好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提供了历史经验，开辟了新的思路，对于今天深化教育改革无疑具有重要借鉴与启示作用。

① 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40.

郭秉文高等教育分权管理思想述评*

◎宋业春(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作为近现代著名的教育改革家,郭秉文在其博士论文及相关论著中,对教育分权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较早系统地提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分权理论。基于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以及西方教育制度的考察借鉴,郭秉文认为要融合中西教育制度的长处,保持教育集权和分权的平衡,即利用集权与分权各自的优势,实现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新的教育管理体制。这与其"四个平衡"的办学思想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对中国国情进行深入考察和认真探索的结果。在南高东大时期,郭秉文推行了一系列教育分权式改革,提出了一整套实行分权制衡的教育制度设计,使得东南大学成为近现代最早实施分权管理模式的高校,并迅速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等学府。郭秉文的教育改革对后世影响深远,是现代大学教育分权制度改革的先导,为当代中国教育改革提供一个比较典型的范例,对于今天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乃至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郭秉文高等教育分权理论的提出

所谓分权,其实是"对权力的一种分工,通过分工明确各自

*[作者简介]宋业春(1972—),男,安徽肥东人,博士,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副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责任，以便互相制衡，共同完成使命。分权是人类社会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它不是某个国家某个阶级在某个特定时期所专有的东西。”[①]高等教育分权探讨的是采取何种教育行政方式，解决的是政府与高校、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以及学校内部学术与行政的权力分工等问题。郭秉文对教育行政有着深入的研究，较早对教育分权一些问题进行了论述。

1. 自下而上的教育分权观。郭秉文分析中国传统教育行政偏于集权管理的问题，指出教育行政管理须有“养成自动能力的觉悟”。1919 年郭秉文考察欧美教育回国后指出：“英美教育家，以为英美瑞士诸国之教育，可供中国参考者，这地方自动的教育，此为共和国最应注意者。盖教育原应由地方人民自行兴办，非可依赖政府者。”“地方自动的教育”，也即教育不应仅是自上而下的统一包办，强调自下而上地方的参与，发挥地方办教育的积极性。因此，郭秉文认为，“欲从根本上举办教育，必须自下而上也。”正如阿什比所言，“大学必须由下而上地工作。”[②]集权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模式，强调的是等级与权威；分权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协商一致”模式，注重主动参与和平等协商。郭秉文认为办教育须自下而上，这是对中国传统教育集权制的反思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对美国大学教育分权模式的经验借鉴，为中国教育变革指明了方向与路径。

2. 揭示教育分权存在的现实与历史合理性。郭秉文认为发展地方教育对于促进新教育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吾国地方教育官制之演成，为促进教育进步之重要分子。”[③]在关于民国教育官制的论述中，郭秉文指出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变化。“中央之教育权，较诸前清已略减，而地方之教育权则增加矣。”[④]“学校行政之精神即国家政治性质之反映也。在君主时代，学部所定之管辖学堂与学生诸章程条规，纤微毕举，而对于学校行政者，富含强制实施之权。民国肇兴，情形不同，崇信活动精神与放任政策。凡学校之章程以及学生管理法皆由校长参酌本地情形而定。仅国立学校须报告教育总长，地方立各学校报告地方行政长官而已。”又有教育体制方面的议论。“因新教育之推行，而有采代议政体之议……凡筹备之事，中央与地方共负其责”。[⑤] 显然，中央与地方的教育分权在当时已经成为事实，并纳入制度设计的框架中。同时，郭秉文考察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沿革，认为自古以来教育“分京师、地方二种”，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构成中国教育

① 卢勃. 试论高等教育的分权管理问题[J]. 高教探索，2006：1.
② [英]阿什比.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 滕大春，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51.
③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55.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71.
⑤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53.

制度的传统，从教育制度上梳理教育分权管理的历史合理性。

3. 强调分权并不意味政府简化职责。郭秉文不满于当时教育的分级管理，认为这是割断了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之间的联系。他说："现教育部所公布之法令，规定中央政府负高等教育之责任，各行省政府则负中等教育之责任，各地方政府则负初等教育之责任。如是之教育行政制度，以一定之官府，负专指之责任，免无谓之竞争，取巧之规避，反使教育进行有所窒碍，是谓吾国教育之一大特色。"[①]割断教育的有机联系，名义上似乎分职有责，其实恰恰忽视了教育的整体性，使得教育发展出现窒碍，违背了教育的规律。这样的"分权"遭到了郭秉文的批判。

4. 教育分权与教育公共精神的培育。在《民国十一年之高等教育》一文中，郭秉文指出："学校行政方面有应付之责任固矣，学生方面有不可逃之指摘固矣，而严密言之，则社会心理之影响为最大。以今日普通社会之无秩序、无纪律，鲜守法不渝之人，依法解决之事。青年为社会未成熟之分子，其所受之刺激与暗示，胥以暴力为归，则学校之常起风潮，亦何足怪？"当时国内教育民主声势渐大，各地学潮不断，学生动辄以自治名义，停课罢学。对新教育实施带来的问题，郭秉文同样指出这些问题的所在。他说："吾国教育制度之最为人所訾议者，莫学校训练与行政若也。新教育制度既行后数年，学生未免过趋于自由。各种学校暴动冲突之事，时有所闻。其故由于一部分之学生，颠倒于自由平等之想象，不受约束而肇祸，间或有性情怪僻之学生，亦为致乱之分子；此等学生大抵年事已长，智识早开，当入学校时，久蓄成见于心，不期而生，其结果则学生急欲发张其权势，逾越范围之举时作矣。"[②]"故今而后最当注意者，为学校全体共作之精神，非限于校长与教员之联络，而学生与教职员之情谊亦非疏通不可。若遇机缘，有几种自治团体使学生分任一部分关于整理学校秩序之事，所宜输入者也。"学生参与学校事务管理，分任一部分事务，培养锻炼自治的能力。而这样的分任又需要严厉的管束。倘若忽视了纪律，而任其行动，"骤改常度，则易滋流弊"。对此，郭秉文举美国教育例子来说明两者的关系。"以富于自治精神之美国人，因学校欲救训练管理之穷，而倡学生自治制度。据经验之结果，谓失败尚多。是以仓促废除严厉之管理与约束太驰，其利每不胜其弊。故自严厉管理时代而入学生自治时代，其过渡当以渐，庶无放纵扰乱之虞。"[③]可见，郭秉文对传统教育集权管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6.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89.
③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90.

理不是一味的否定，对美国教育分权带来的问题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郭秉文高等教育分权思想蕴含深刻的现实关怀和使命责任，体现一代教育改革家眼光独到的见解。“在世界文明各国中，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教堂、学校以及各种社会等，皆视职业引导为其分内之事。”[①]这里分的理念，既有郭秉文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也与其本人长期对中国传统教育不切于实用的深刻反思，从而指出中国新教育应担负实用的责任，使教育日趋于实用，学者学以致用，用其所学，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教育管理上，就要勇于推进新教育改革，使得教育引导职业，按照社会需要设科办学，而社会需要因时变化，因此教育应因之而变，管理体制也要适应这一变化趋势。

二、郭秉文论教育集权与分权的平衡

郭秉文在理论上具体阐释了教育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分析教育集权与分权的不同情形，主张融合两种教育制度之长，实现教育集权与分权的平衡。

郭秉文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具体论述了教育集权与分权管理的关系，对不同的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剖析，认识到长期以来的传统集权管理方式所存在的问题，主张改革集权制的管理体制，同时也提出这种变革是渐进式的，以平衡分权带来的体制上的变化，防止操之过急带来政治失序。对此，郭秉文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吾国今日当采何种教育制度乎？各问题中无有若此重要者也。以普通政情而言，当破除省界地方观念，而代以国民自觉心，提倡国语以救各地方言之不统一，又以养成国家观念之重要与遵守法律之习惯，是教育当行中央集权制之为是。反之，谓国家土地之辽阔，教育须合地方之需要，所以预谋本土之利益，教育行政必参合社会需要而定，故地方分权之教育制度尚矣。夫一种制度，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者，然亦未尝不可取二者之长而融合之，成为一种教育制度，庶免牺牲二者各有之利益。今日吾国之教育制度，似趋此方向而行者也。教育部公布教育大纲，各地方可斟酌情形而损益之。私人所编之讲义与教科书，虽必经教育部之审定，然各省设立之审查图书会，亦有权选择合于本省所用之教科书。各种制度，一方面为求统一起见，一方面又为各地方谋自己利益之余地甚多也。如是则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二种制度之极端危险可免，所希执政

① 郭秉文. 中国现今教育问题之一：职业之引导(1915年1月)[G]//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06.

者当尽力以赴之。”[①]采取何种教育制度，没有一定之规，郭秉文主张采取平衡适宜的态度。

在郭秉文看来，教育集权管理好在养成国家观念和遵守法律的习惯。而国家地域广阔，各地有不同情形，教育分权管理则有益于地方社会之需要。对此，杜威也有着同样的看法。他说，“教育制度应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不应该用机械制度，勉强使它一致，在中国越发不应该用机械制度。”杜威进一步说，用机械制度统一，这就是教育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若是用在一个小国，还可以适用，但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不能用了。所以，中国教育改良应该鼓励地方办教育，“各地方人去办各地方学校，使它都适应各地方的情形。”杜威认为美国教育之所以发达，正是在于各地方的人都注意他本地方的教育。“中国教育在原理上采取中央集权制度，其实并没有何等的效果，要去整顿必须使各地方人办各地方的学校，须适应各地方的情形。”[②]教育分权，强调的是因时、因地制宜，以期与社会的需要相适应。

在《学校管理法》中，郭秉文具体指出存在三种教育管理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教师独断于上，学生服从于下”。这一模式“规则甚繁，命令甚多，而执行又甚严，”师生关系如军官之与兵士，其利则学生养成遵守法律、奉行命令之习惯，而其弊则学生缺乏独立之智能，与合众之精神。第二种模式是“教师以身作则，学生以礼自守规则命令”，这一模式师生关系“均甚简单，如有功过则但劝勉之而已，故教师之与学生相敬如宾，相爱如友，其利则遵守法律，奉行命令之习惯，与独立之智能合众之精神，均可于不知不觉中养成之，而其弊则易流于放任，即不能养成遵守法律行行命令之习惯，又不能养成独立之智能与合众之精神，非教师与学生素有修养者，乌能去其弊而获其利哉”。第三种模式是“教师与学生分任其应尽之职务”，强调管理要“以分治之”，“组织学校如国家者则亦选择议员或派定长官及属员等，而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则亦有鼎足之势，然无论选择都会或国家之制，均当注意于精神，不可效其形式，其教师之与学生也，则以市民或国民待之。”“此体制之利则可以养成遵守法律奉行命令之习惯，及独立之智能与合众之精神于实事之中，而其弊则模仿过度，教师失其指导之力，学生养成傲慢之风，而学校反失其本体之功用矣。”对于这三种管理模式，郭秉文认为，“各有其利弊，然用之能审慎而得其节度，则其弊自去，而其利自来矣”。所谓“审慎而得其节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5－106.
② 杜威. 中国学校的科目问题[J]//单中惠，王凤玉.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90，191.

度”，也就是通过适当的权力分配，达至权力的平衡，避免权力过度集中或分散。因此，选择何种模式要遵循一定之准则。一般的标准有三种：“第一，则当计算何种体制为最有教育之价值，与完善之效果也；第二则常考察何种体制为最容易养成道德与消灭不道德也；第三则当研究何种体制为最合儿童身心之发育与社会种种之状况也。”对照这三种标准，郭秉文认为，第一种是趋向集权管理模式，利少而弊多；第二种属于自由放任模式，利弊参半，而第三种是对前两种模式的结合，利多而弊少。可见，郭秉文主张融合集权与分权管理模式的长处，提倡的是权力的分化和责任的担当。

集权与分权的平衡，兼集权与分治为一体，体现在郭秉文教育管理的多个方面。如他在《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中指出：“取训练与管理兼重主义。训练注意启发，使知其所以然，管理注意实践，使行其所当然，二者交相为用，以期知行合一。”[①]再如以实行自治、自动和指导、训练相结合的学生自治会制度和主辅修的人才培养机制，“旨在使学生在学业上有自学和自力研究的能力，在生活上能自力、自理，各种学术活动能自行组办，并发展学生的社会性和群体合作的责任心、服务心”，尊重学生主体，给予学生自我发展的空间。但是“欲自治制度之有成效，必赖一部分学校行政者之承认，且为各学生能力所及之事，夫教职员确知自己管理权之界限，而学生又能敬守学校行政者之法权，二者交相让，则学生自治之事进行，其庶几乎”[②]？注重学生天性，因人之性情，既有外在的引导教化，也有内在的自我激励，做到外内结合。郭秉文提倡“自动主义”，发挥每一个学生个体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自动主义也是分治的方式，让每一个自我管理，实现整体的有序。

刘伯明认为，“吾国政治，自古以来，崇尚专制。虽其间有王纲解钮，制裁稍驰之时，然就其大体言之，则恒为专制也。”“自由必与负责任合，而后有真正之民治。仅有自由，谓之放肆。任意，任情，而行无中心。以相维相絜，则分崩离析。而群体迸裂，仅负责任，而无自由，谓之屈服。”[③]民国以来，学潮迭起。究其原因，刘伯明认为，由于前之办学者滥用权威，事事专断，继之者则放弃权威，一专一放，其失维均。“一取一予，滥用权威者予而不取，近于专制。放弃权威者，取而不予，近于阿谀阿合。”[④]因此须折中于二者之间，提倡一种理性精神，力求融

①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 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4－55.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郭秉文与东南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39.
③ 刘伯明. 共和国民之精神[J]. 学衡第10期，1922年10月.
④ 刘伯明. 论学风[J]. 学衡第16期，1923年4月.

洽。就教育而言,“夫学校既为研究学术培养人格之所,一切权威,应基于学问道德,事功虽为人格之表现,然亦辨其动机之是否高洁,以定其价值之高下。”[①]这与郭秉文主张平衡治理精神是息息相通的,与其集权与分权平衡的改革理念具有内在一致性。

由此可见,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或决策方式,各有其存在的思想传统。就中国教育改革的权力结构而言,权力应该是分散的、平衡的和有限的。这样的权力结构能抵御集权主义专制的危险,又能避免过度分权带来四分五裂的危害。郭秉文指出,保持集权与分权的平衡,融合两种制度方式的优势,两相结合,彼此互融,各取其长,以生成新的教育制度。因此,平衡是贯穿其教育思想的始终,也是把握其分权思想的基本尺度。这是一种辩证的权力观,也是教育变革所具有的权力特征,更符合教育制度的特性。郭秉文的权力平衡论是其教育分权思想的重要内容,不走极端,稳妥推进,渐进融合,是其教育改革的基本方略。故改革也就是要在两端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郭秉文选择的是“第三种”教育制度,融合集权与分权制度的优势,这是分而治之、循序渐进的思想,也是一种理想的教育状态。南高—东大时期校园秩序井然,一心向学与郭秉文的平衡治理实践是分不开的。

三、郭秉文高等教育分权管理改革实践

基于对传统教育集权制的思考,郭秉文在南高—东大时期的改革是分权式教育改革,其分权管理思想也体现在其主持的校务改革各项举措中。

从当年组织设置结构来看,学校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满足社会需要为宗旨,科学与民主成为学校改革的风向标。故在其各项改革制度设计上,集中体现了分权管理的原则。

1. 分设科部,南高时期设 8 科 8 系,即文理科、工艺专修科、农业专修科、商业专修科、教育专修科、体育专修科、国文专修科、英文专修科。文理科中分设 8 个系,进一步完善清末以来的学科设置,使得学科设置朝着科学应用的方向,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南高诸所擘画,颇异部章,而专科增设之多,尤为高师说未见”。[②]

2. 分任教课,因材施教。如改革教授法,倡导教学合一;改革学年制,采用

① 刘伯明.论学风[J].学衡第 16 期.1923 年 4 月.
② 王德滋.南京大学史(1902—1992)[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0.

选科制，即学分制，学生对选修课程可自行选读。这两项改革都体现了教学民主的思想，是对传统教育集权制的突破，体现对受教育者权利的重视。这也是教育分权的结果，是民主共和观念的深入人心。因此这些制度一直沿用至今，显示出长远的生命力。

3. 分任职务，分工负责。南高初期，学校规模不大，组织结构分行政与议事两个系统，总务处总辖全校事宜，分设教务、斋务、庶务三个处；议事系统为校务会议，由校长及各处主任组成。其后学校规模渐大，机构分工逐渐科学严密，取集中与民主相结合，采合议与分任兼重之制度。《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1918 年 10 月)，其中组织概况，指出："本校校内行政之组织，采合议与分任兼重之制。有总务处，以总辖全校之事。有教务处、斋务处、庶务处，各设立主任一人，以分负各部之责。又有不专属于各处之事务，视其性质另组各部，分属于以上四处，各处理其属部之事务。"对于重大事情者，须经会议统一研究，其后分别实施。"凡事不专属于教务、斋务、庶务各处者，或专属于以上三处而事关重大者，须经校务会议，然后分别施行。"①

4. 分权治事。在东南大学的组织结构当中，《东南大学组织大纲》的出台及实施过程展示了权力的制衡，体现了郭秉文分权治事的原则。1921 年 7 月，郭秉文主持制定《东南大学组织大纲》，在行政管理上，除重大事务由董事会决定，日常事务由校长负责外，设行政委员会作为全校行政总枢，分设 11 个部门：教务部、事务部、会计部、文牍部、图书部、出版部、体育部、女生指导部、医药卫生部、建筑部、介绍部。学校校务会议议决重大事项，按照政议分开的原则，建立责任制与合议制相结合的体制，即"三会制"，分别负责议事、教学和行政事宜，从而将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分开设置、共同治理学校。一是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让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更好地体现分层负责和分工管理原则，有常设的和临时的；制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各委员会通则》，确立治理规则，"对于会中应行商榷之事项，应于相当时期内负责讨论，不误进行"，委员会体现了郭秉文在学校管理中为集思广益和民主决策而做的努力，推进了学校管理的分权化和民主化。二是变革学校行政系统，设立校长办公处取代总务处，将斋务处和庶务处合并为事务处，撤销学监处。"训育之责似宜为全校教职员工人人所共负"，"宜有学生自治会之役，以练习其自治之能力"。三是建立校务会议制度，以校务会议作为学校的最终决策机构，校务会议成员除校长为会议主席外，由各处、部、科和附中、附小各 2 名代表组成，其中一名为各部门主任，另一名选举产生。因而校务会议既

①《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1918 年 10 月).

有权威性，又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郭秉文以校务会议作为学校的最终决策机构。学校凡重要事务均交校务会议讨论决定。郭秉文对学校行政组织所进行的改革，在当时的全国高校中可以说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这些改革，一方面反映了他深受欧美教育思想的影响和企图把欧美大学管理模式移植到中国来的努力，另一方面反映了他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鼓舞下，在学校管理科学化、民主化方面所进行的尝试。

5. 分任自治。在学生管理上，提倡学生自治。学校分设学生自治会，主旨是使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学校校务会议设立学生自治委员会，专门指导学生自治会的工作。学校部分事务由学生分任，培育学生自动精神，称之为“自动主义”。郭秉文在《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具体阐述这一点：“故今而后最当注意者，为学校全体共作之精神，非限于校长与教员之联络，而学生与教职员之情谊亦非疏通不可。若遇机缘，有几种自治团体使学生分任一部分关于整理学校秩序之事，所宜输入者也……欲自治制度之有成效，必赖一部分学校行政者之承认，且为各学生能力所及之事，夫教职员确知自己管理权之界限，而学生又能敬守学校行政者之法权，二者交相让，则学生自治之事进行，其庶几乎？[①]”1919 年底，郭秉文在对学校组织系统进行改革的草案中指出：“学监处掌学生之训育及管理，关系一校风至重惟以数百学生之德行全赖一二人负督察辅导之责，心劳力疲，而其效亦甚浅薄，故训育之责似宜为全校教职员人人所共负，然后接触既多，耳目亦广，随时随地均有示范之机会……且高师学生大都成人之年，其辱小以前粗有办事经历者，亦复不少，似宜有学生自治会之设，以练习其自治之能力。”[②] 1919 年 12 月，郭秉文在《战后欧美教育近况》一文中疾呼“培养学生自动的精神”。他说：“共和国之实际，在学校内注重共和精神之培养，如职教员间之协力办事，学生方面提倡自治，发展自动之机会，养成互助之精神。或以为学生在今日，已极自动之能事，无提倡之必要。要知学生当此久静始动之际，容有出轨之处，将来具有经验，自能就范。”[③]肯定学生自治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这样的自治必待“养成互助之精神”，需要整体的合作。这些都体现了郭秉文教育管理上既强调分治，也注重整体的协调，分而有序，分而不乱。就管理而言，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治理思维方式，突出教育管理的主体性，发展学生的自觉、自立、自学和自治的能力。

---

①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39.
②《关于校内试行简章呈教育部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648，卷宗号 0005.
③ 郭秉文. 战后欧美教育近况[J]. 新教育，1919－12，第 2 卷第 4 期.

6. 分校办学。创办上海商科大学同样体现了郭秉文分权管理思想。上海商科大学是东南大学分设在上海的商科专业学校。1920 年郭秉文主持制定的《改南高为东南大学计划及预算书》就明确:“商科大学因人才与环境关系,拟在上海择地建设。”郭秉文按照分层管理原则,明确上海商科大学的管理体制,成立商大委员会。1921 年 11 月制定的《上海商科大学委员会简章》,商大委员会的职权有 4 项:审定商科大学之计划预算及决算,保管私人捐助之财产,推举商科大学校长,协助其他关于商科大学发展之事业。

郭秉文分权管理之所以得以顺利推进,一方面这是时代背景使然,当时科学民主思想深入人心,五四运动大大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觉悟,维护大学自治、自由成为自觉选择。另一方面,也与南高东大时期,尤其是郭秉文主持校务以来,学校人才结构密不可分的。南高时期教授有三分之二曾留学欧美,对欧美国家大学分权制管理较为熟悉,也比较认同,容易得到教授的支持,民主治校成为学校共识。内外因素的结合,使得当年学校形成民主管理氛围,推行民主体制,实行教师议政,学生自治。

对于郭秉文的分权式管理,南高师生也有评价。“公之处理校务,一本分层负责之原则,仅主持大体,而不亲细务。惟于学生有所请,必亲于接见,所请无论许与不许,均反复说明其理由,使人悦府而退。故在公长校期间,全校恰然。”①

四、郭秉文高等教育分权管理思想评价

郭秉文分权式改革,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大学分权管理模式的借鉴,突出体现在全国高校中首次引入董事会治理模式。“董事机构可以被视为一种分散的公众控制形式。”②美国大学董事会体现了分权特征。董事会成员多是外部人士。这种外部控制的方式,是美国高等教育重要特征之一。“源于美国高等教育具有三个明显的制度特征:分权、自主权和多样性,大学的法人地位及其创新机制、竞争机制。”③“美国高等教育的特殊发展历史过程造就了其以董事会为特点的治理形式,这种治理形式由董事会、校长、行政管理系统、教授、学生等团体组成。开始时,董事会权力较大,但是董事会的权力逐渐被校长、教师和学生所分担,形成了一种权力分享和权力制衡的‘合作治理’(shared governance)格局。

① 吴俊升. 业师郭鸿声先生教泽追忆录. 载《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
② [加]约翰·范德格拉夫,等.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92.
③ 阎凤桥. 克拉克的高等教育分权管理思想之评介[J]. 高等教育研究,2012:7.

在这种格局下，没有任何一个利益团体可以垄断大学组织内部的权力。克拉克得到的一条重要研究结论是，对于高等教育管理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权力的垄断，不论权力垄断方是学生、教师或者是董事会。”①“当今，美国拥有数量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这些一流大学都是国家规划之外的产物，这不能不说是分散管理制度之下创造的一个奇迹，而这种情况在其他管理模式下没有或者说很难实现。”②郭秉文在较短时间内将东南大学建设成为“中国最有希望的大学（孟禄语）”，这个奇迹的创造无疑与他借鉴美国大学董事会治理模式所进行的分权制度改革是密不可分的。

教育改革采取何种权力结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无论是朝着集权的方式，还是趋向于分权，往往要作具体的分析，其要在做到集权与分权的平衡。正如克拉克所指出的那样，权力结构本身无好坏可言，问题是“权力结构的改革方向，由它们各自模式的基本弱点决定”。比较不同模式的国家权力结构后，克拉克指出，“在欧洲大陆模式中，改革的目的是想从上层和基层的权力中拿出一部分来加强在‘部管’体制中历史上比较薄弱的中间行政管理层。在德国这个欧洲大陆模式的联邦型变体中，改革的方向是把权力引向一个明确的全国协调层（即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第二层），同时强化各州教育部以下的协调工作。在英国模式中，改革需要发展一个能够在政治方面和官僚统治方面决定中央政策的中央上层结构，以加强过去不成系统的自治院校的高层次协调。美国的模式也一样，改革的名称可以叫建立行政秩序，但改革仍然要在一个比较复杂的、至少有三个高级协调层的结构中进行，改革还需要加强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最接近庞大的自由放任的体制的协调和方向。在日本，权力也要向上移，要与英国一样，把权力移到中央政府，而不是像美国以断裂的方式上移。”③可以说，每一次教育改革无不涉及教育权力结构的调整与配置，教育政策的出台及实施过程也充分展示了权力的制衡。

中国传统是集权式的权力机构，政教合一决定了等级式的教育权力结构，教育自主权向来发育不够。正如郭秉文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教育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地进行，政治干预力量推动教育变革。到了1920年代，政治权力处于分散状态，军阀割据无暇顾及教育。这样给予了教育变革相对自主的权力空间，使得这批深受西方教育，尤其是美国教育影响的留美学生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在教

① 阎凤桥. 克拉克的高等教育分权管理思想之评介[J]. 高等教育研究，2012：7.
② 阎凤桥. 克拉克的高等教育分权管理思想之评介[J]. 高等教育研究，2012：7.
③ [加]约翰·范德格拉夫，等.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06.

育领域开始变革，而这场变革的方向就是扩大教育自主权，引入了外界力量，实际上是引入市场的力量，使得教育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大学开始建立自己的章程，大学更多关注社会的需求。郭秉文借鉴美国大学分权管理制度，提出教育分权改革主张，进行的是教育分权改革实验。如董事会制度的设计，扩大了东南大学面向社会办学的渠道，当然随之而来的董事会在学校的权力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到了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修改了董事会章程，扩大了董事会的职权。郭秉文后来取消评议会，在权力配置上削弱教授会的权力，扩大行政主导权，实际上是权力钟摆式的回归，也是试图从教授治校转向校长治校的努力，做到集权与分权的一种平衡。

郭秉文治校十年，是封建集权统治趋于解体的时代，也是社会高度分化的时代，各种文化思想流派纷至沓来。一方面，中央政令不一，一任教育总长一个令；另一方面当时军阀割据，连年征战，加之北京政府趋于薄弱，地方势力扩张，军阀们无暇顾及教育，对学术思想的控制相对较弱。“1928年以前的北京政府，因为多半由军人集团主导，长于武战而拙于文治，加以内部纷争你来我往，客观上为大学留下较为宽松的办学环境，至少是对于校园以内的事务直接干预很少，而对舆论传媒的控制也不怎么得心应手，这些因素为蔡元培们倡导的大学精神的张扬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舞台。”[①]虽然总体上教育事业因经费掣肘而经营困难，但这一时期文化教育事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空间。[②] 蔡元培1923年在致北大教职员函中意欲“与北京政府划断直接关系，而别组董事会以经营之”[③]，当时的北京政府已成破产之势，民心分散。教育分权改革似乎顺时势而进行。然而，这只是短暂的“黄金十年”。1925年，郭秉文突遭免职，学校随之陷入政治纷争与漩涡之中。“易长风潮”中的权力之争，体现在多方的博弈中，各种力量之间的较量和冲突表现得十分明显。其中东大校董会、江苏省教育会、校教授会、校学生会等与政府力量的抗衡，逐渐演化为校内师生对新任校长的抵制，实际上是分权与集权的对抗。权力之争也就转变为党化教育与自由教育的斗争。这场纷争中，郭秉文似乎置身于外。他选择了默默地离开，没有为自己做更多的辩护。而对于诋毁自己的言论，则未置一辩，如其给吴稚晖的函中对自身遭受的不实诋毁，也仅仅以质疑的方式“付之一笑”。郭秉文表现出的更多是坦然和平和，或许透露和折射他本人对于权力的深思。正如他本人在被免职后第一反应就是电请教

① 章开沅.序言——大学啊，大学！[M]//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② 张玉法.中国现代政治史论[M].东华书局，1988：168.
③ 高平叔，王世儒.蔡元培书信集(上)[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668－669.

育部及早委派人员“迅聘接替”，而不是做辩护他自己的工作。他带着对于教育的一份信念来到南高—东大，十年后他同样是在执着于教育的信念而离开这所学校，走向世界去阐释他的和平教育理念。十年甘苦，惟有自身知。反思郭秉文的突遭免职，似乎反常，其实一点也不意外。在时势已经发生变化，面对集权的党化教育，郭秉文所进行的系列分权改革，其实是与国民党即将实施的“党化教育”逆向而行的。因此，一旦国民党取得政权，必然循着中国传统政教合一的历史惯性向教育界渗透势力，改革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外部权力控制就会深入到学校的内部，他的教育改革就难免陷入一个精心编织的“党化教育”网络中，他的分权改革就不得不以夭折告终，自身也就难以避免被免职的结果。

教育集权与分权管理的融合，是近现代高等教育管理变革的发展趋势，也是各国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所显现的基本特点。教育集权与分权本身并无利害可言，到底采用何种权力方式，在于与文化传统、现实情境等因素考量。传统集权教育制度的国家往往趋向于分权改革，以扩大教育自主权为代表，体现教育的公共精神和决策民主，增加教育的竞争性和质量；而在分权教育比较典型的西方国家，则逐渐加大集权制管理，通过适度的集中，保证教育变革沿着国家需求的方向。如就美国以分权为特征的教育体制而言，“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使其在所有先进国家最混乱的高等教育系统变得更有行政秩序。25 年来，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权力一直稳定地朝着加强院校行政领导的方向发展，一直朝着精心设计的大力加强上层结构的方向发展，这个结构包括联合大学的行政管理，各州最高委员会，各州政府的计划和控制，地区协作和联邦政府更为经常更为系统地干预高等教育。”[①]今天，中国大学治理改革依然是如何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寻求平衡。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最大问题在于权力结构的制度设计，教育似乎需要独立自主，但又肯定离不开政治的干预，这或许正是中国大学改革的悖论。一方面我们呐喊“去行政化”改革，另一方面我们依然需要生活在高度集权的教育世界中；我们期待教育改革，但又充满困惑和迷惘。因此，如何处理这一内在的矛盾，郭秉文的高等教育分权管理思想为其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

① [加]约翰·范德格拉夫，等. 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04－205.

蔡元培与郭秉文之大学观比较研究*

◎王悦芳（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大学的办学实践都受办学定位的指导。蔡元培总结自己在北大改革的经验时曾强调说："这些穷年累月才完成的早期改革，同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有极大的关系"。[①] 事实上，蔡元培、郭秉文分别深受德国古典大学观和美国现代大学观[②]的影响，他们在北大、南高（含东大）的办学实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德国古典大学观和美国现代大学观

一、德国古典大学观

（一）蔡元培留学德国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城的"笔飞弄"。按照我国传统的历法计算，这一天是1867年（丁卯）的腊月十七，因而蔡元培是属兔的。蔡元培有兄弟4人和姐妹3人，他是家里的第二个男孩。

20世纪初，江浙一带的文化经过长期传承和沉淀，其底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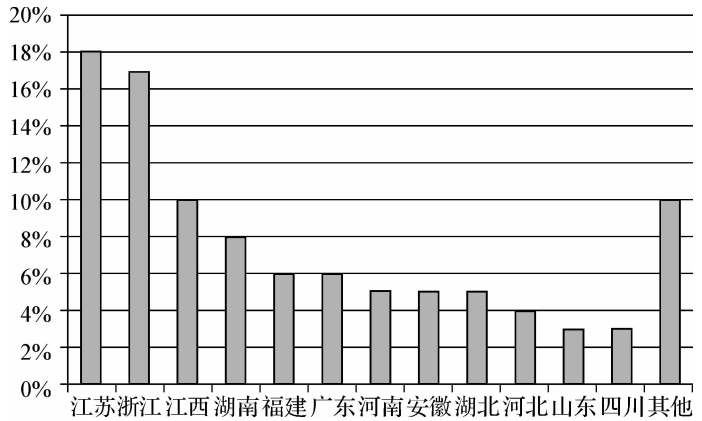
---

* 注：本文题目为编者所加。本文摘录于王悦芳博士专著《蔡元培、郭秉文办学思想与实践的比较研究》，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

① 沈善洪：《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08页。

② 为了便于本研究的开展，这里所说的"德国古典大学观"特指建立柏林大学时洪堡的大学观。相应地，"美国现代大学观"特指20世纪初美国"常春藤"私立大学如哥伦比亚大学所普遍奉行的大学观。

之深厚已领先于全国。“文化积累形成大师辈出的沃土”①，江浙的山水、文化养育出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学者、书画家等名人，其教育家的数量也居全国之首（见下图表）。蔡元培能够成为中国 20 世纪杰出的教育家，也是江浙一带丰厚的人文、地理、历史、文化所孕育的结果。



《教育大辞典》所载 398 位中国教育家地理分布②

蔡元培的父亲蔡宝煜经营钱庄，为人厚道，常周济亲戚、朋友、邻里。蔡元培 11 岁时父亲去世，其母亲周氏精明能干，不依不靠，全凭自己的力量，克勤克俭，抚育儿女成人。她常常勉励儿女养成“自立”、“不依赖”、“谨言慎行”的习惯。

1872 年，蔡元培开始接受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其主要的功课有四项：识字、读书、习字、对句。1880 年，蔡元培到离家半里之遥的王懋修（字子庄）处就读。王懋修中过秀才，精通八股制艺，在绍兴颇有名气。在王师精心指导下，蔡元培科举制艺的能力大进。此外，王师还注重思想品德教育，常向学生讲述山阴明儒刘宗周及反清志士吕留良、曾静的故事，给学生种下了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种子。

1883 年，蔡元培考中秀才后就不再到王懋修先生处就读，结束了他少年时代的私塾学习。蔡元培先是在姚家任塾师一年，学生 3 人；后又在单家私塾任教一年，学生 4 人。其所授课程仅限于传统的四书五经，内容也是旧式的对课与八股文。这两年的“塾师”工作是蔡元培从事教育生涯的开始。

1886 年至 1892 年，经田宝祺的介绍，蔡元培来到户部郎中徐友兰家，为其

① 孙孔懿：《论教育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 336 页。

② 《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教育大辞典》（合卷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注：当时上海属于江苏省。

子徐维则当伴读，并校勘刻书。1892 年 3 月，蔡元培进京参加殿试，中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5 月应朝考，被点为翰林院常馆庶吉士。1893 年至 1894 年春，蔡元培走亲访友，进行了近一年的游历，先后到过宁波、上海、南京、镇江、扬州、靖江，后又取道香港来到广州、潮州。这次游历使蔡元培感受到了西方近代文明和洋务新政的清新气息，启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价值转换。

1894 年，蔡元培应散馆考试，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开始供职于翰林院。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战事的发展，蔡元培深感忧愤。战败后，蔡元培认为既割地又赔款的《马关条约》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对腐败和无能的清廷很是失望。1898 年 6 月，维新运动拉开帷幕，蔡元培虽然支持变法，但没有主动结交康有为、梁启超。

变法失败后，蔡元培回乡出任绍兴中西学堂校长。该学堂是徐树兰于 1897 年初创办的一所相当于高小至初中程度的学校。1900 年 10 月，中西学堂因故暂时停办，蔡元培离开绍兴前往杭州筹办师范学校，几经奔波，终无结果。

1901 年上半年，蔡元培旅居上海，广泛收集各类新式学堂的学制和课程设置等资料，潜心研究，撰成《学堂教科论》一书。9 月，经刘树屏介绍，蔡元培进入南洋公学担任特班教习。1901 年 9 月至 1902 年 11 月，蔡元培在南洋公学特班任职一年多，时间虽短，却是他委身新教育后所从事的又一重要的教育实践活动。1902 年 4 月，中国教育会成立，蔡元培被推举为会长。

南洋公学虽是一所新式学堂，但学校里同样也存在着新旧之争。旧派教员思想僵化，在管理上非常专制；学生则日益受新思潮的浸染，富有自由、民主意识。1902 年 11 月，这种新旧观念上的冲突终于导致了“墨水瓶事件”：[①]

> 南洋公学旧派教习郭镇瀛素来专制霸道，令学生讨厌。1902 年 11 月 14 日，五班学生有人把墨水瓶放在郭讲课的座位上，郭上课发现后便小题大作，骂学生不敬师长，并毫无根据地把这件事栽赃在离他座位最近的学生伍正钧头上，并上报总办汪凤藻将伍开除，另以五班学生隐匿不告，全部记大过一次。五班学生不服，找总办交涉，要求解退郭，收回开除、记过成命。总办汪凤藻不但没有接受学生的要求，反而听信郭的一面之词，竟然以“五班学生聚众开会，倡行革命之由”，将五班学生全体开除。校方的这一无理决定，引起其他各班学生的公愤。15 日，各班学生 200 余人集体前往总办处，要求校方收回成命。总办放言：五班学生既已开除，各班学生不得干预，

① 赵庆元：《蔡元培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34 页。

有愿离校者，悉听尊便。学生对学校的专制行为忍无可忍，决定集体退学。

“墨水瓶事件”引发了南洋公学的“退学风潮”。蔡元培同情学生，与校方交涉，要求取消不合理的决定，无果。蔡元培遂辞职，带领离校的学生在中国教育会的协助下，于11月底成立了爱国学社。12月，蔡元培与蒋智由、黄宗仰等创办了爱国女校。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校）表面上在办理教育，实质上在鼓吹革命，成为国内最早的革命团体。

1903年6月，中国教育会内部发生争执，蔡元培辞职离开上海，前往青岛学习德语，为留学做准备。6月底，发生《苏报》案，爱国学社解散。9月，蔡元培返回上海，继续从事教育和反清活动。鉴于《苏报》案的教训，其革命活动更讲求策略和方式，不直接谈革命而谈爱国。蔡元培的革命活动主要以暗杀为主，希望通过较小的代价来实现社会的变革。1904年7月，由于暗杀活动收效甚微，再加上革命阵营内部不和，蔡元培顿觉革命目标遥遥无期，对暗杀活动也心生倦意，便想专办教育或出国留学。

1906年初，蔡元培辞职离沪，回到绍兴，任学务公所总理。该所于1906年4月下旬成立，蔡元培主持后，首先开办师范讲习班以培训师资，进而提议创建师范学校，但在筹集经费时遇到阻力，遂辞职。7月，蔡元培进京，等候清政府派遣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

当时世界上德国最为强大，国人寻其原因，皆认为是重视教育的结果。德国遂被奉为教育兴国的楷模，为许多中国人所心仪。走出国门、留学德国遂成为蔡元培多年的愿望。1907年4月，清政府任命孙宝琦出使德国，蔡元培向其表示愿意在使馆中任一职员，以便留学。孙宝琦感其精神，慨然应允。1907年5月10日，蔡元培随同孙宝琦取道俄国，由陆路前往德国留学。

蔡元培留德共四年多时间，其中一年多的时间在柏林学习德语，过语言关。1908年暑期，蔡元培离开柏林到莱比锡大学学习。据该校档案资料显示，蔡元培在3年的时间里，所修课程多达40门，涉及哲学、文学、心理学、文明史、人类学、美学、绘画艺术论和民族学等，其努力与刻苦的程度由此可窥一斑。

在课业之余，蔡元培还注意研究德国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其中洪堡、巴留岑的办学理念对他有很深的影响。通过对莱比锡大学的教学安排、学校管理、学生培养、师资建设、系科设置等方面的了解，蔡元培对德国大学教育有了切身的感受。另外，蔡元培常到邻近的中小城市及村镇如都格萨奇、柯纳维兹、罗泽等地参观当地的学校，进一步熟悉德国教育。

（二）德国古典大学观产生的背景

18世纪后半叶，德国的高等教育处于危机之中：那些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大学被视为僵化的行会组织，其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新建的专业学校及以哈勒和哥廷根为代表的新大学，也受到人们的抨击，因为它们只注重传授实用性和工具性的知识（如政商学、政治学等），不强调知识本身的价值。学生只学习那些谋生所需的实用性知识，一旦能够胜任所求的职位，便抛弃了学问。老师变成了谋生型学者，工作只是自己追名逐利的手段与途径。

1807年，普鲁士被法国的拿破仑大军打败。根据双方的合约，普鲁士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国土。哈勒大学（普鲁士最主要的大学）被迫关闭，师生撤离学校并拜见威廉三世，要求重建大学。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国王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决定“以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物质上的损失”①。

1809年，洪堡作为普鲁士内政部文化教育司的负责人，全力支持在柏林建立新大学的计划。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洪堡、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学者写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德国古典大学观开始形成。

（三）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内容②

1. 惟“纯科学”是重——新大学的信条

洪堡认为：那些专业和实用性教育不利于人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新大学”（即后来的柏林大学）应该与传统的教学机构相区别，“科学”探求应该成为新大学最主要的任务。洪堡所说的科学即所谓的纯科学。它建立在深邃的观念之上，能够统领一切，是关于世界上万般知识的最终归属，是各种学科的升华和纯粹形式，不同于包括历史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经验科学”，因为纯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只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大学便是研究这种纯科学的场所。

2. 重视学术研究——新大学的首要标志

在大学里，大学教师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学生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生，因为他们最主要的任务不再是学习已有的知识，而是从事研究，以探求未知的知识，教师不过是引导、帮助学生进行研究的辅助者。重视研究应该是新大学区别于传统大学的首要标志。

3. 人的修养——新大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地

新大学不仅仅注重知识的增进，也关照人的发展。新大学特别强调人的修

①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第29页。
②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修订版，第89页。

养。所谓人的修养就是人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最终达到理想道德境界的过程，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修养是个人内在的精神和道德的完善，因而排斥一切外在的、物质的、实用性或功利性的目的。一切以特定职业和行业为目标的教育都有悖于修养的原则，新大学不应当以此为内容。

第二，修养必须是普遍和全面的，而非专门的或职业的。一切实用和专门的教育都是褊狭的，不应当进入新大学的门槛。

第三，修养是个人的自由发展。由于人们日常的事务生活往往意味着物质、功用、服从、狭隘和庸俗，而人的精神生活则与自由、高尚、全面相联系。因此，新大学及其师生应当尽量摆脱政府和社会的限制，远离实际生活。

第四，修养建立在个人主义原则之上，具有个性化和自觉性的特征。该大学观认为，修养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全凭个人自觉自愿，新大学没有必要设立专门的课程。虽然修养是个人的事情，但它从根本上说又是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因为个人的最佳发展对于社会和国家都有最大的益处。

第五，科学被看成是修养的必由之路，由“科学而达至修养”是德国古典大学观的一条核心的原则。该原则认为，科学并不是一种客观经验的存在，而是真理、道德乃至神性的统一。让科学出乎其心，入乎其内，具有修养身心、变化行为，甚至示范生活方式的作用。

4. 寂寞、自由——新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

洪堡认为，要保证科学研究顺利进行，大学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组织原则：寂寞与自由。

寂寞的组织原则要求如下：

第一，大学应独立于国家政府管理系统。洪堡认为，国家从事世俗公共事务的管理，大学从事纯粹的科学活动，两者性质不同。国家对大学的任何介入都可能是一种错误，因而，要时刻警惕因为提供的经济上和组织上的保障对其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尽量不去干扰大学，否则，大学将不复存在。

第二，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大学所从事的纯科学的探究活动不同于社会经济所要求的知识技能。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纯粹的学问，寻求真理，而不在于满足实际的社会需要。大学应甘于作为纯科学探究场所带来的寂寞。

第三，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沉潜于科学活动之中。师生只生活在科学之中，他们的所求、所愿、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着科学而进行的。

自由的组织原则要求如下：

第一，保持大学机构的自由。国家应该尊重科学活动的特性，明白自身对大学的天然的和潜在的危害，尽量避免对大学的干预。大学内部也可能因为接受了某种思想，而去压抑或排斥不同的思想，因而要警惕和防范大学的自我封闭和僵化。

第二，保障教师研究与教学的自由。洪堡认为，大学教师的学术活动不受国家的管束，不受社会种种利益的牵制，完全服从科学的内在要求，自由自在地进行科学的探索。享有完全的自由是大学教师学术和教学活动本身的内在要求。

第三，保障学生学习的自由。洪堡认为，大学生的学习也是为着研究，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以便自主地从事科学思考。学习方式的选择也是自由的，学生既可以接受老师的指导，也可以独立研修，甚至连听课也是自由的。

5. 大学以自身的繁荣和科学的发达间接服务于国家与社会

洪堡认为，既然寂寞和自由能够促进大学的繁荣和科学的发达，而这些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因此，国家应当为大学创造保障其繁荣的条件——寂寞与自由，任其发展，而不是直接干预大学，让其服务于国家目前的种种需要，屈从于眼前利益。

（四）德国古典大学观的性质与特点

第一，神圣性。在德国古典大学观中，修养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科学也同样具有神圣性，是“通向（人类）终极和至高目标的阶梯”。[①] 以科学为天职的大学也被看做是“人类所拥有的至为重要、至为神圣的机构”，是“科学的守护神”[②]。从事科学探究的人也与普通人不同，他们生活于观念中，高居世俗生活之上。

第二，革命性。德国古典大学观倾向于推翻了旧大学一切成规和传统（如实用性、教学型），创造一种全新的（如纯科学的，以研究为主的）高等教育机构，而不是在原有的大学制度的基础上，经过逐步的改革和完善来实现大学的改造。

第三，精神性。德国古典大学观不太关注大学的具体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却十分关注人的精神。它试图通过革新人的精神来变革大学，即通过变化人的内心世界来变化大学这个外部世界。

第四，自由性。德国古典大学观认为，修养和科研都是纯粹的精神活动，不应受到任何制度化、程序化规定的限制，一切全凭师生内在的精神动力和信仰。

第五，学理性。德国古典大学观强调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排斥职业和实际的生活，将大学活动与世俗社会的需要严格对立起来，只从事纯粹的学理研究，不

①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修订版，第 89 页。
②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修订版，第 89 页。

问世俗的事务。

第六，宗教性。德国古典大学观作为一种信仰，带有反理性的宗教色彩。它能否被实施、推广以及实施和推广的程度如何，完全取决于学者们是否信奉以及信奉的程度。因此，洪堡把教授看做是大学成功的关键。他在建立柏林大学的过程中，最为重视、着力最多的是物色教授的人选。事实上，德国古典大学观的传播和被接受也是与洪堡、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一批头顶着光环的精英学者的崇尚与宣传有着直接的关系。鉴于上述特点，北大教授陈洪捷认为德国古典大学观具有卡里斯玛[①]性质，按照这一大学观建立的柏林大学是科学的圣殿、学术上的“象牙塔”。

第七，不稳定性。作为一种反理性的信仰，德国古典大学观具有人的依赖性，因而是极不稳定和难以长久的。20 世纪初，德国大学不断走向科层化、理性化。对此，韦伯评价说：“德国的大学正在向美国化发展，传统的大学观念和制度已经徒具其表了。”[②]

二、美国现代大学观

（一）郭秉文留学美国

郭秉文，字鸿声，祖籍江苏江浦，1880 年 2 月 16 日出生，按照我国传统的历法计算，这一天是 1880 年（庚辰）的正月初七，因而郭秉文属龙。由于父亲正在上海行医，郭秉文实际出生在上海，郭秉文有兄弟和姐妹各 3 人，他排行第三。

由于父亲是基督教徒的缘故，郭秉文早年的学校教育主要是在美国长老会举办的清心书院接受的。清心书院采用西方近代先进的教育模式：实行班级授课制，并分科分级教学；倡导男女教育平等；重视科学与技术；力求教学方法要符合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清心书院的教育不仅为郭秉文后来的出国留学奠定了知识和能力上的基础，而且对其后来的办学思想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冒荣先生曾评价说：

> 作为一所教会学校，清心书院相对于旧式书院来说，教学内容包含了较多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与社会实际联系较为密切，教学方法也更合乎知识接受规律。郭秉文在清心书院读书，较早地受到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精神的熏陶，这不仅为他进一步接受现代西方大学教育奠定了基础，也许与他以后注重适应社会实际需要的办学思想也有着难以割断的一缕联系。[③]

---

① 泛指个人、行为、观念、制度、角色或符号等所表现出的一种特殊的，被视为超自然的能力或作用。
②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修订版，第 100 页。
③ 冒荣：《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 9 页。

1896年，郭秉文在清心书院完成学业后，留校任教一年。这是郭秉文从事教育初次尝试，虽然时间不长，但他对教育也积累了一些感性认识。除教育外，郭秉文还对经济感兴趣，从1897年起，相继在海关、邮局和浙东厘金局等处任职。

清末国事败坏，中国被列强欺凌，面临瓜分豆剖的局势，许多经济领域如海关、税收等都被列强所把持。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需自立自强，彻底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对于如何救国强国，郭秉文认为，“思有以革之者”，“盖以为非振兴科学，无以救亡图存”。① 当时，中国的书院刚刚改为学堂，一批具有近代意义的高等学校才开始创立，都不能满足郭秉文“科学救国”的需要。因此，他必须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

1908年，郭秉文在工作了10年后毅然弃职求学，远涉重洋，赴美国伍斯特学院(College of Wooster)留学。该学院创办于1866年，位于伍斯特城，是一所本科层次的文理学院。该校经过近40年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办学特色：②

第一，以追求卓越为办学宗旨，注重使学生养成“精通的习惯”，力求能让学生留下“值得自豪的东西”。

第二，注重科学教育，强调“在生活中的任一领域和迈向科学的最高阶段上都能为人们做好准备”。该校对生物学、地理学、物理学、数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十分重视。

第三，注重品德教育，认为品德教育和科学教育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只有两者并重才能把“心灵的教育和心智的开发”结合起来。

第四，追求教育平等。一是追求男女教育的平等。从1870年起，第一任校长威尔士·罗德(Willis Lord)就开始招收女生，致力于男女合校教育。二是反对种族歧视，强调给予黑人平等的教育机会。威尔士校长宣称：“我们都是人，有同样的起源，这同时意味着我们最初的和本质上的平等……种族主义，不管以什么名义，都会打击人道和自由的灵魂。”19世纪80年代，伍斯特学院开始招收黑人，学院也以它的黑人学生为荣。

第五，注重办学的开放性。一方面，该校的许多毕业生都被输送到国外，从事传教等职业；另一方面，该校鼓励在国外传教者的子女，以及他们在国外所办学校的毕业生来伍斯特学院读书。

---

① 高明：《郭故校长秉文先生行状》，载《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年版。

② 主要参考了冒荣：《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4页。

伍斯特学院的上述学办学思想，无疑会对郭秉文后来的办学思想产生影响。同时，该校的实践活动使郭秉文的组织领导能力得到锻炼。当时旅美的中国留学生中，郭秉文年龄较长，又有一定的社会阅历，自然成为留学生活动中的骨干成员。他在伍斯特学院曾任《中国学生》（月刊）总编辑，《伍斯特之声》主笔和中国学生协会总秘书。①

基于科学救国的理念，郭秉文在伍斯特学院主修理科，受到了良好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经三年的学习，郭秉文于 1911 年获得理学学士，但没有立即回国任事，而是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这是郭秉文思想上的一次转变：要救亡图存，非千千万万人行动起来不可，虽然自己可以学成回国任事，但是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要想培养更多的人才必须依靠教育。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也称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院。当时在该院任教的就有实验主义教育大师杜威、著名教育史学家孟禄。著名心理学家桑代克等一批名流学者。中国许多著名的教育大家如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都曾在该院学习。

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尼古拉斯·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是美国《教育评论》的创始人，也是世界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提倡要从语言艺术和科学两方面培养年轻人。在他任职期间，哥伦比亚大学得到很大发展，成为美国教育改革和学术研究的中心。

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在管理上颇具民主特色，学校最终管理权属于董事会。董事会由包括校长在内的 24 个成员组成，其下有 10 个常设委员会，负责实施学校各项重要工作。此外，又设有参议院，作为学校立法机构，其下有 12 个常设委员会，以教授为主要成员，负责相应领域里的规则的修改或制定。

从郭秉文后来的办学实践活动看，哥伦比亚大学的上述办学理念，确是其办学思想的重要渊源。

1912 年，郭秉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14 年，他以题为《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②

（二）美国现代大学观的形成③

1492 年，哥伦布开辟新航路，美洲大陆被发现。此后，欧洲列强纷纷在北美

---

① 《郭秉文先生年表》，《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 年版，第 1 页。
② 冒荣：《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9 页。
③ 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20 页。

建立殖民地。1607 年,英国向美洲开始大量永久性地移民。1650 年,在北美各殖民地的五万多人中,英国人有 4.4 万。随着大规模移民,英国的教育模式在北美殖民地居主导地位。1636 年,马萨诸塞议会完全按照英国大学模式创建了哈佛学院。该学院的目标是培养基督教绅士,教师的主要职责是教学而不是研究。在管理上,评议会负责处理学院事务,但它的决议最终须经董事会批准,而董事会的许多成员都是校外人士。这种外部控制的方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其后,各殖民地又以哈佛学院为榜样,于 1800 年前建立了 8 所学院。其中,1754 年根据《国王宪章》而设立的国王学院即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

传统上,需要专门训练的职业一般是指教士、律师和医生等。在殖民地时期,这些职业准备不是由学校提供,而是以学徒制的形式完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各类专门学校。殖民地学院也开始建立相应的专门学院,取代以前的专业讲座而进行这些职业的训练,但发展十分缓慢。

受独立战争和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人们开始对殖民地时期旧的高等教育产生不满,要求政府组建新的更为实用的高等学校。1788 年著名政治家本杰明·披什(Benjamin Rush)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大学的设想,并主张这将是一所功利主义的、着重实用知识和职业教育的学校。美国开国之初的六任总统都赞成设立国家大学。其中,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任总统期间,曾三次向国会提出创办国家大学议案,但由于各州坚持自由发展的原则,议案均遭拒绝。后来,一些州试图把当时存在的学院改成州立大学。如托马斯·杰斐逊早在 1779 年当选为弗吉尼亚州长的时候,就设想把他的母校改建为州立大学,但未成功。但杰斐逊的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建立公立教育体系的主张,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从此以后,创建州立大学的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1818 年,杰斐逊成功地获得了州议会为新大学颁发的特许状。1825 年,弗吉尼亚大学正式成立并开学。美国教育家一致公认该大学是美国第一所州立大学,和旧大学不同,它完全是官方的、政府的事业,提供比学院更为高级的世俗教育,学生享有选择专业和课程的特权。

在筹建世俗化的州立大学的同时,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技术教育也开始出现,如 1802 年西点军校成立,1824 年伦塞勒多种技术学院成立,1865 年麻省理工学院成立。

南北战争后,各种职业性的专门教育和技术教育都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公立高校因受州议会的控制,失去了必要的自主性和办学的灵活性,学校的发展

受到了影响。1850年，密执安州成立了州立大学评议会，与立法、司法、行政部门并列，单独处理州内公立高校的事宜。其公立高校因此而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随后，其他州相继效仿，成立了类似的机构，只有少部分的州仍坚持议会控制州立大学的制度。

因为凡未经宪法确定的事项均作为各州的保留权，由各州处理，所以教育的管理权属于州而不属于联邦政府。而且，根据1819年达特茅斯学院案例的判决，州立法机关不能通过损害契约（如特许状）义务的法案，因为这样做违背美国宪法的相关条款。这样一来，包括国王学院在内的9所私立殖民地学院，彻底排除了来自政府的干预。美国著名法律评论家詹姆斯·肯特（James Kent）认为：该裁决有重大历史意义，它赋予了“我们国家的文化机构以稳定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①。另外，达特茅斯案例也极大地促进了州立法机关、各种宗教派别、私人团体等组建各自学院的努力，从而导致了各类高校之间的竞争，以及整个高等教育事业多元化的发展。美国教授考利认为：“这是达特茅斯案件裁决的最有意义之点。”②

19世纪初，洪堡等人创建柏林大学，并提出了“教授自由”、“学习自由”和“教学与科学研究统一”的思想，从根本上打破了大学只是传授已有知识场所的旧观念，树立起了“传播知识与创造知识相统一”的现代大学观，并使德国大学很快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获得了领导地位。美国的学者纷纷到德国留学或访问，以求取“真经”。

南北战争以后，随着美国社会工业化、都市化、专业化的加快，要求创办现代大学、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呼声不断高涨。同时，大批的捐赠基金投入高等学校，大批具有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从德国返美，为把德国古典大学观引入美国创造了必要的财力和人力条件。1876年，以霍普金斯大学的成立为标志，德国大学关于研究生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科学研究方法、新的教学技术，系、研究所、职位，以及学术自由等新观念，开始成功地移植到美国大学中来。美国大学第一次把培养研究生放在首位，使授予博士学位和开展科学研究成为一所学院变为大学的标志。在这种背景下，哥伦比亚大学由原来的英国式的学院改造为德国式的大学。

在引进德国大学模式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照搬照抄，而是把这种模式理性

① 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② 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化、制度化，即把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分开，建立研究生院和硕士、博士两个等级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同时，还把德国大学模式和本国的实用主义传统相结合，开创了更加注重社会服务的现代大学模式。该模式在康乃尔大学推行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校长怀特在总结经验时特别强调：美国的大学必须适应美国的人民，适应美国的需要，适应现代社会的条件，而不是去适应英国的生活或德国的需要，或者去适应以往的时代。[①] 威斯康辛大学秉承了康乃尔大学的理念，并把社会服务的职能发展到了新的巅峰。

康乃尔大学的理念和实践给美国高等教育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例，它最初只设有人文、科学和语言方面的学科，1767 年建医学院，1858 年才成立法学院。在南北战争后，随着美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急剧发展和康乃尔大学理念影响的加深，哥伦比亚大学一改原来那种崇尚“博雅教育”、以古典语言文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大量增设实用性为主的科系或学院，如工程学、政治学、建筑学、图书馆学、口腔外科、哲学、理论科学、教育学和新闻学等，成为拥有众多学科的名副其实的现代化综合性大学。

（三）美国大学的特点

美国现代大学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其中充满了斗争、探索、纠正、继承、借鉴、融合、创新等种种努力。20 世纪初，美国现代大学观已基本形成，其主要的特点如下：

第一，神圣性与世俗性相结合。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特别是常春藤联盟的高校，是科学的圣殿，但其学科设置亦多关系国计民生。另外，社会服务是美国所有的高校不可或缺的职能。

第二，精神性与物质性相结合。美国现代大学观不仅重视精神的力量，同时还注意搞好大学的组织、结构、制度、图书、仪器、建筑等基本建设，以及为学校的发展筹集大量的资金等。通过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物质相结合，共同推动大学的发展。

第三，自由性与规范性相结合。美国私立大学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可以完全不受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约束和限制，具有高度的大学自治性和学术自由性。公立大学则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的影响和制约。

第四，学理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美国现代大学观不仅强调精神、哲学、文化的价值，而且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科学教育、技术教育也很重视。美国大学不仅

① 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60 页。

关注人的精神修养而且关注人的实际生活。

第五，制度依赖与人的依赖相结合。和德国大学一样，美国大学也非常重视人的因素，重视对校长、教授甚至是学生的遴选。但美国现代大学的发展不仅依赖于人，更依赖于规章制度。人的因素只是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制度因素则是美国大学的根本。韦伯说，美国大学作为一种科层体制，是以一套规章制度作为运作基础的。①

第六，制度化与稳定性。美国现代大学观是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理性选择的结果，是其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这种结晶不断地制度化，以更加稳固的形式积淀下来，因而，具有极强的稳定性。

三、小结：比较与分析

带有卡利斯玛性质的德国古典大学观，适用于国家或者教育事业出现严重危机而迫切需要寻找出路的时候。该大学观的内容颠覆了以往一切成规和传统，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和无与伦比的神圣性、理想性。崇高的理想以其独特的魅力呼唤具有崇高精神的人们来为之无条件地奋斗，不计个人的得失利害，甘愿牺牲物质享受，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当这种危机缓解或消失之后，这种主张“仰望星空”、建立“象牙塔”般大学的理念所具有过激性、乌托邦性、非理性的特点便暴露出来，人们对自己无条件的信奉和献身也产生了怀疑，因而该大学观难以延续，其部分内容要么借助于传统，要么借助于制度而得以延续，但作为一整套的大学观必然被替代。

与德国古典大学观不同，美国现代大学观是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经过各州不断地探索、比较、借鉴、总结而形成的，适合于“常态”下的社会。只要美国社会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该大学观会一直持续下去，并得到不断补充和完善。同时，美国现代大学观吸收了德国古典大学观的优点，既注意“仰望星空”，又注重“脚踏实地”，既尊重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提倡人们为科学而献身，又强调大学为当下的社会服务，强调人们的现实利益。另外，一旦某一大学理念及其实践取得良好的效果，美国人便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因而美国现代大学制度具有可积累性、可持续性和极强的稳定性。参见下表。

① 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

德国古典大学观与美国现代大学观的对比

项目	德国古典大学观	美国现代大学观
出现	出现于国家危机时期，是对过去实用性、工具性大学观的彻底的否定	贯穿于美国的历史，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既消化、吸收了德国古典大学观的主要精神，又坚持了本国的实用主义传统
出发点	大学由国家所立，应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最终的标的	更多地提倡大学之间的自由竞争
主要任务	科研为主，教学服务于科研	科研、教学、社会服务
学科内容	纯科学	纯科学、应用科学
处理与国家社会关系的原则	寂寞、自由，追求绝对的学术自由	既讲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又直接为国家与社会服务
大学的形象	神圣的象牙塔	既是科学的圣殿，又关系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运作的特点	人的依赖性，即这种大学模式要依靠信奉它的学者而运行	制度依赖与人的依赖相结合，以制度为基础
稳定性	不稳定，一旦人们不再信奉它的时候，该模式难以长久持续	以制度为运作的基础，具有极强的继承性与稳定性
对人的关照	强调人的精神生活，反对关注人实际的物质生活	不但关照人的精神生活，而且关注人实际的物质生活
实施的切入点	注重人们在思想与精神上对该大学观的信奉	不但让人们了解并信奉，而且以制度建设的形式固定下来
给人们的印象	象牙塔式，崇尚“仰望星空”	常春藤式，既注意“仰望星空”又注重“脚踏实地”

蔡元培、郭秉文的大学观

一、蔡元培:“象牙塔”式大学

1917 年初,蔡元培到北大视事,面对腐败颓废、官僚气息浓厚的北大,决定借鉴德国大学的模式来治理、整顿它,力图把一所“官吏养成所”改造成为学术研究的“象牙塔”。

1. 大学为“学”,不为“术”

蔡元培认为:“学与术可分为二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法律、医学,非但研求学理,并且讲求适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①]那么,大学的内容是不是既包括“学”又包括“术”呢?“鄙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别,而不必有年限与程度之差……以此等性质之差别,而一谓之‘大’,一谓之‘高’,取其易于识别,无他意也。”[②]

鉴于“学”、“术”分治的理念,1917 年 1 月 27 日,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的议案:“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其理由有二: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一也;文、理二科有研究所、实验室、图书馆、植物园、动物院等种种之设备,合为一区已非容易,若遍设各科,而又加以医科之病院、工科之工场、农科之试验场等,则范围过大,不能不各择适宜之地点,二也。”[③]

蔡元培后来也回忆说:“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④]总之,蔡元培认为,大学应该办“本科”,以“学”为内容;高等学校应该办“专科”,以“术”为内容。

2. 大学以“研究”为取向,“教学”为其辅助

“教学”的目的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研究”的目的是发展知识,增长学问。受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影响,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强调“科学研究”,以发展知识为取向,“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即大学“为研究学术而设”,是“纯粹的学

---

① 沈善洪:《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69 页。
② 沈善洪:《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 569 页。
③《北京大学改制与蔡元培》,《申报》,1917 年 8 月 28 日。
④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年版,第 223 页。

术机关。”①

虽然育人也是大学的重要职能，但由于蔡元培笃信德国大学“由科学而达至修养”的理念，遂强调教学的科学研究取向。他说：“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②总之，与我国传统上把大学看做是教学机关相比，蔡元培更愿意把大学看做是“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③。

蔡元培还批评一些筹划大学的人们仍然抱有重“讲授”、轻“研究”的想法，认为是颠倒“教”、“研”之间的关系，所以导致了大学难办。若把大学看成研究机构，大学就好办多了。

> （现在）大学所以难办的缘故，因为筹备大学的人把它的性质看错了。大学本来以专门研究为本位，所有分班讲授，不过指导研究的作用。我们只看见日本的大学，重在各科讲义，限年毕业。又看见美国的大学，把各研究科别设一级，得了学士的学位后，才可进去。就当大学是以分班讲授为主体；专门研究的有无，可以随便了。哪知道欧洲的大学，还是偏重研究。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听讲的事，很随便。学生全是自己用功。若干学生必有一个专科的导师。应读什么书，应什么样的研究，有什么疑义，研究的有什么结果，都是在师生谈话间随时指导，并不在讲堂上。德、法等国的大学，杂[虽]然于分班讲授的形式也颇注重；但每科学问，必有一种研究所。有好多教员，是终身在研究所的。学生程度稍高了，也没有不进所研究的。所以一所大学，若是分班讲授与专门研究能同时并进，固然最好；若不能兼行，与其专做分班讲授的机关，还不如单做专门研究的设备，所费较少，成效更大。④

3. 大学是超脱世俗的神圣之地

大学在处理与外部社会的关系时，有两种最基本的态度，即“出世”和“入世”。蔡元培认为，大学“为纯粹的学术机关，神圣之地”⑤应当超脱世俗（即“出

①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见沈善洪编：《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页。
② 蔡元培：《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见沈善洪编：《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08页。
③ 沈善洪：《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57页。
④ 蔡元培：《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见沈善洪编：《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82页。
⑤ 蔡元培：《在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式演说词》，见沈善洪编：《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40页。

世”），不要为人们所利用，成为升官发财的阶梯。

第一，就教师来说，大学“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①]，并须设各种研究所，因为大学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②]。

第二，就学生来说，大学“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之目的”[③]。“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④]

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次演说就告诫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⑤]，“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人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⑥]。

第三，就大学本身来说，应只专设文、理二科，其他法、医、农、工、商五科应分别为独立之大学。大学治“学”，研究学理；高等专门学校治“术”，专心于应用。两者可各得其所。若合在一处，则治“术”的各科，“则为归集资料，实地练习起见，方且于学校中设法庭、商场等雏形，则大延现任之法吏、技师以教之……学生日日悬毕业后之法吏、技师以为的”[⑦]。这种风气必然会影响文、理科师生安心治“学”。另外，社会上怀有他种目的人，也会借法政、商业等“术”科，渗透到学校，影响师生。

第四，从管理上看，大学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来管理：“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

① 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见沈善洪编：《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69页。
②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见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
③ 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见沈善洪编：《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69页。
④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见沈善洪编：《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页。
⑤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见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3页。
⑥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见沈善洪编：《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页。
⑦ 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见沈善洪编：《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69页。

影响。”①

综上所述，蔡元培认为大学纯粹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是神圣的、超然于世俗之上的“象牙塔”。他之所以如此强调大学的“出世”态度，目的是为了尽力根除根深蒂固的陋习，排除外面花花世界的干扰与引诱，让师生安心于学问。

二、郭秉文：“常春藤”式大学

1918年，郭秉文开始主持“南高”。他没有拘泥于师范学校的框架，而是借鉴美国现代大学的模式来发展它，“南高诸所擘画，颇异部章，而专科增设之多，尤为高师说未见”②。至1920年，“南高”已拥有8系8科，实际上可与当时的北京大学相比。“民国十年(即1921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隐隐然称为中国高等教育上两大支柱。”③其后，郭秉文又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提出改高师为大学的建议。

1. 大学要“学”、“术”并重

郭秉文对蔡元培“学”与“术”分离的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大学与高专分立，意在以大学养成闳材硕学，以高专养成专门应用人才。盖教育分文化与职业两系，以大学居文化系统之首，而以高专居职业系统之首”④。但他不赞同这种思想，“言学理，其可批评者固多；言实例，则其制仿日本，而日本各高专，已纷起升格之运动”⑤。郭秉文主张，在一所大学内，既要设偏重学理的学科，又要设偏重应用的学科，不宜截然分开，如此，“学理”与“应用”方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按照上述思想，郭秉文在东南大学设置了文科、理科、教育科、工科、农科、商科，其学科之多，居全国大学之首。对于郭秉文“学”与“术”结合的办学思想，茅以升很是认同：“本大学学制，以农、工、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所在也。”⑥

2. 大学应“教”、“研”并重

郭秉文认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⑦，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是大学最基本的职能。因此，大学应首先重视教学，即改革课程设置，发展那些国家、社会“急所先务”的学科，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使学生的德行、学术、能力和体魄等都得以“相当的发达”。其次，大学应注意研究。大

①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
② 王德滋：《南京大学史(1902—1992)》，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页。
③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印行，1971年版，第1页。
④ 郭秉文：《民国十一年之高等教育》，《新教育》，第6卷，1920年第2期。
⑤ 郭秉文：《民国十一年之高等教育》，《新教育》，第6卷，1920年第2期。
⑥ 南京大学校史资料编辑组：《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内部资料，l982年版，第159页。
⑦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学所传授的是“高深学术”，在注重“教学”的同时，还要重视“研究”，以便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使之处于学术发展的前沿。再次，掌握高深学术不同于掌握普通知识，大学要想把真正的“高深学术”传授给学生，就必须把“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既要授人以“鱼”，又要授人以“渔”。1918 年，当中国最大的民间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从美国迁回国内时，郭秉文力邀该社总部落户南京，以便于彼此合作，使教学和研究互促互补。

3. 大学应以“出世”的态度，从事“入世”的事业

（1）大学的“入世”

郭秉文认为：既然大学向国家、社会培养、输送其所需要的人才，那么国家、社会就应该从经济和管理上来帮助大学，从而形成互利互惠、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国家、社会以尽可能的财力、智力来支持大学；另一方面大学以自己的学术成就、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来回报国家社会，进而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就国家、社会来说，不但中央政府，而且那些能够被大学所惠的地方政府，都应该从经济上、政策上支持大学，从而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共建大学的积极性。同时，大学董事会应该吸收社会各界著名人士，如实业界、金融界巨子，著名的教育家，以及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等，让他们为大学的建立、发展献计献策，给以经济资助。这样一来，大学就能够从政府和社会获得舆论上、经济上、政策上、智力上的支持，而且其办学活动也更能反映国家、社会的发展和需求。

就大学来说，其学科设置应尽量反映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社会的需求。师生的教学与研究也要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注重学理，也要注重实际的应用、操作和实验。他鼓励师生走出学校，到工厂、农场、商场、学校、政府等单位去实习，运用自己的所学直接服务于社会，参与中央或地方的建设。

（2）大学的“出世”

郭秉文并不是把大学变成一个“小社会”。实际上，郭秉文历来主张教育独立，不要参与政治，“近来教育界，鉴于政治活动之罪恶，又尊重职业的精神，多专力经营教育，目光悉注社会事业，以政治活动相戒”①。可见，郭秉文把教育视为社会事业，政府只要给予经济和政策上的支持即可，不要干预大学具体的办学事宜。大学应专心于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职能，不要参与政治斗争和党派活动。事实上，在郭秉文担任校长的十年（1915—1925）中，南高、东大师生一心向学，从未发生过学潮。

综上所述，受美国“常春藤”大学，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办学理念的影响，郭

① 郭秉文：《对于孟禄中国教育讨论之感想》，《新教育》，第 4 卷第 4 期，1922 年 4 月。

秉文认为大学是为国家培养硕学闳材，进行科学研究并服务社会的机关，应该走出象牙塔，积极参与国家、社会的发展；同时要同外部世界保持一定距离，以保障“学术中立”，进而实现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国家、社会应该允许大学以“出世”的态度，从事“入世”的事业。

蔡元培、郭秉文的办学目标

一、蔡元培、郭秉文大学观的差异

由上文的表述可以看出，蔡元培、郭秉文的大学观在大学性质、学科设置、主要的活动，以及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见下表）。

蔡元培、郭秉文大学观的差异

项目	蔡元培的大学观	郭秉文的大学观
性质	大学纯粹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	大学是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以应国家需要的机关
学科设置	大学应以“学”为界，作“纯学理”的研究	“学”、“术”并重，既重学理又重应用
主要活动	以研究为主，教学为辅	教学、科研并重
与社会的关系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神圣之地	大学应该面向需求，服务社会。同时，又要同社会保持距离
与国家的关系	大学着力于国家的长远利益	大学兼顾国家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蔡元培、郭秉文阐述自己的大学观，是有具体的目标指向的，即为北大、南高（含东大）进行办学定位，确定它们的办学目标。

二、蔡元培、郭秉文的办学目标

1. 蔡元培的办学目标

蔡元培根据自己对大学的认识和理解，将北大由原来的官吏养成所改造为学术研究的象牙塔；原来的北大以人才培养为主要活动，现在的北大要为以学问研究为主要活动；原来的北大以教学为主，现在的北大要以科研为主；原来的北大为培养官吏服务，现在的北大要为发展知识服务；原来的北大是教学机构，现在的北大是学术研究机关，而且仅设文、理两科，只进行纯学理的研究，即只关心理论知识的进步，不关注实用知识及当下的现实生活。

蔡元培认为文化与学术关系到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希望北大能为国家的这一根本利益服务，而不应过分专注国家的现实利益。他希望学生一心向学，将来能成为学者，继续做研究。总之，在蔡元培眼中，北大是学术研究的圣地，不参与任何政党、政治、商业等活动，也不希望外界的干预，北大自己管理自己。

2. 郭秉文的办学目标

受美国现代大学观的影响，郭秉文认为大学既应当关注国家、社会的根本需要，也应关注其现实需要，还要关注学生毕业后的生活。因此，郭秉文并没有囿于南高的师范性质的框架，而是仿照美国“常春藤”学校（如哥伦比亚大学），竭力将其打造成为综合性大学。

事实上，南高既设置理论性的学科，如文科、理科，以培养这方面的学者和师资，又设置应用性的学科，如农、工、商、教育等专修科，以满足相应行业对专门人才的需要；既关注教学，为社会培养人才，又关注研究，为国家发展知识；既关注纯学理的研究，又注重应用研究；既培养专家、学者，又培养行业和职业人才；既要做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顾及国家的长远利益，又要走向社会，服务中央或地方建设，关照国家、社会的当前利益；既要服务于社会，又要同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维护大学的自治和学术的自由。

三、蔡元培、郭秉文办学目标存在差异的原因

原因一：源于德国古典大学观和美国现代大学观的分野。

德国古典大学观是蔡元培大学观的思想来源，该大学观唯“纯科学”是重，并主张“由科学而达至修养”。因而，大学尽可以专心于纯知识、纯学理的探求；而其寂寞、自由的原则，又要求大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圣地，要与社会、政治保持距离，不为外界的种种利益和要求所左右。

美国现代大学观吸收了德国古典大学观的优点和长处，并和自己实用主义的传统相结合，形成了既注重理论科学，又注重实用科学；既注重教学，以培养人才，又注重研究，以发展知识；既关注国家、社会的长远利益，又服务社会以关注其当前利益。蔡元培、郭秉文办学目标的差异无疑源于德、美大学观的分野。

原因二：源于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状况与问题的认识上的差异。

蔡元培考察了清末、民初的中国高等教育，认为其最大的不足在于忽视学理研究。蔡元培认为，当时中国的学界只是注重研究和学习外国的工业、法律、医学、行政等“术”，并把这种学习、研究和自己今后的升官发财联系起来。蔡元培对这种状况非常担心，认为这只能学到别人的“技艺之末”，而没有学到其“学理之源”，是舍本逐末的愚蠢之举。这种做法只能为中国“输血”，而不能为中国“造

血”。长此以往，中国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在西方国家之后，而永无超越它们之时。他说：“留学生中，专为回国后占地位谋金钱的也很多。所以学工业，预备作技师。学法律，预备作法官，或当律师。学医学，预备行医。只从狭义做去，不问深的理由来。中国固然要有好的技师、医生、法官、律师等等，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技师、医生等，必须要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留学生做得到的。”①有鉴于此，蔡元培决心把北大改造成纯学理的研究机关，以纠正时弊。

郭秉文在博士论文中对中国教育作了通盘的研究，认为振兴实用科学为第一要务。我国教育“有一通病当医者，则以吾国之教育过重形式与文字之学，学校之师生富于想象之理想，于科学方法未遑多求……爱莲博士曾曰，扫除东方人心中之文学理想与连类之推想哲学，而代以科学、农业、商业、经济诸学，所有近五十年西人行而有效之实验法，以及实验室法，皆当提倡于东方之学校，于是改良教育之道，或有进步之一日。凡吾国近日之教育家，希望商业、工业、社会之改良，必自输入诸实验科学始”。②

原因三：源于北大、南高面临着不同的情况与问题。

蔡元培、郭秉文关于北大、南高（含东大）办学定位的差异也反映了当时北大、南高面临不同的情况与问题。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前的北京大学如下：

第一，官僚风气浓厚。北京大学源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开办之初设有仕学馆，是官吏养成之所。“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教师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不小。”③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他们“在校极力于巴结官僚，甚至在同学间盛行结拜兄弟，由十个气味相投的同学结成‘十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大家‘有福同享’”④。北大名为学府，实与官衙无异。

第二，学风不正。京师大学堂的仕学馆原本就是官吏的养成之所，再加上科举积习的流弊，来北大真心求学的学生寥若晨星，大都以升官发财为目的。

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

① 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见沈善洪编：《蔡元培选集》（上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69页。
②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③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载杨扬编：《自述与印象：蔡元培》，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6页。
④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载杨扬编：《自述与印象：蔡元培》，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6页。

> 业文凭……即使有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①

第三，“学课凌乱”。北大当时设有文、理、工、商、法五科，学科虽多，但课程建设很薄弱，而且偏轻偏重，如商科徒具其名，仅有普通商业一门；法科则被视为升官发财的捷径，学生蜂拥报考；理、工等科被视为“技艺之末”而备受冷落，学生甚少。

第四，风纪败坏。学风不正必然导致校纪松弛。“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受无兴趣。”一些老师也涉足风月场中，大损学校名誉。“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参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这种坏现象是从清末保留下来的。”②北大风纪之败坏腐败，深为社会所菲薄。总之，“蔡元培先生来担任校长之前，北大搞得乌烟瘴气，哪里像个什么最高学府”？③

为了彻底根除上述弊病，蔡元培决定以柏林大学为榜样，将北大建设成进行学理研究的纯粹的学术机构，一改其官吏养成所的性质。

与北大不同，郭秉文担任校长之前的南高如下：

第一，学风纯正。南高虽然开办不久，但它继承了两江师范学堂“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和“以不欺为本”的传统。副校长刘伯明注重学风的培养，遂形成了优良的“南高”校风：“吾校同学率皆勤朴，无浮华、轻游气习，而其最显著之优点，在专必致力于学。其坚苦卓绝，日进不已，至可钦佩，实纨绔子之学生所不能及者也。”④

第二，南高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发展问题。一方面，要考虑如何获得教育资源。郭秉文借鉴美国大学模式，面向社会办学，获得了大量的社会资助。当时军阀混战，库银多用于养兵和购买军火，必然致使教育经费严重短缺。南高“开校

---

①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页。
②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载杨扬编：《自述与印象：蔡元培》，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6页。
③ 顾颉刚：《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载杨扬编：《自述与印象：蔡元培》，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7页。
④ 张其昀：《“南高”之精神》，《国风》，第7卷第2期，第21页，1935年9月。

以来，为时局之关系，经常费每月发款大抵不能如期”[①]。郭秉文在向官方筹款百般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寄希望于“海内外热心教育之富豪”及组织，尽力争取社会方面的资助。作为回报，南高的办学也尽量反映社会需求，并积极参与地方建设。

另一方面，要考虑发展如何定位。南高、东大在办学资源上不但依靠地方政府，还要依靠外部社会，如果像北大那样把自己建成“纯粹的学术研究机关”的话，就不能更好地获得地方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东南地区的以纺织和粮食加工为主的民族工业获得发展，急需工业方面的人才。而且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推广良种和防治病虫害，培养商务人员遂成为当务之急。

鉴于以上原因，郭秉文遂借鉴美国现代大学模式，实行中央与地方相结合的办学机制，以解决教育资源、资金问题。同时，强调面向社会设科，突破师范框架，把南高建成综合性大学，以便为农业、工业、商业等培养人才，满足其多样化的需求。

① 《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载《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卓越与平衡:郭秉文大学经营理念探析*

◎张雪蓉(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前 言

美国高等教育家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Berek Bok)曾指出:“大学要在面临现代社会的多种挑战中取得成功和进步,最关键的一环在于校长能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上个世纪20年代,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在面临社会转型时期诸多挑战中,不仅将学校一举发展成为1920年代声名显赫的大学,而且他本人也因此成为那个年代具有风向标意义的大学校长之一。与同时期其他杰出大学校长相比,郭秉文在引导东南大学成功的经验上,最突出的一点是,用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去管理大学,走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他本人在其中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和办学业绩,深度展示了一位深谙美国实用主义教育经营理念的职业校长形象。

郭秉文接任大学校长之职,正是中国处在剧烈的转型变动时期。就大学发展的环境而言,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术环境,对大学的成长既是挑战也是机遇[①]。首先,从社会政治

*[作者简介]张雪蓉(1966—),女,教育学博士,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从事民国大学史、中美教育交流史研究。

[基金来源]2012年“江苏省高校首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境外研修计划”资助项目成果之一。

① 张雪蓉.《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29-31.

环境上看,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安,中央集权能力薄弱,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教育经费难以确保,校长办学几陷“无米之炊”的困窘状态;但从另一方面看,缺乏强力控制的政治环境,为大学校长施展自己的才华和办学理念,提供了自由伸缩的空间。在这样一个政府“干预”不足,“促进”尚不具备的“空闲”地带,大学迎来了一个较为自由发展的时期。其次,从经济环境上看,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经济对教育和科学技术的依赖,对大学的社会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要求教育培养的人才适应实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求大学的教育科研走向社会,服务社会,形成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互助。来自这一趋势的社会需求,考量着校长是否能做出积极的应对。第三,从文化环境来看,1920 年前后的中国尽管仍处于北洋政府黑暗统治之中,但借助于新文化运动对民主、自由的倡导,和从思想深处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客观上为大学追求学术自由、民主管理的自身逻辑提供了文化的外部氛围。第四,从大学内在发展需要来看,在南高师—东南大学办学的过程中,由于郭秉文有意识地吸引留美学者进入学校,学校从创立开始,就形成以美国教育背景为主体的师资队伍格局,这种浓郁的留美师资群的存在,一方面为郭秉文移植美国的办学模式奠定了良好的人脉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师资队伍的高层次,自然不会满足于学校现有的规模和办学层次,而对大学的发展有更高的期待。东南大学群策群力支持学校从师范学校发展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的历史事实,说明了这一点。随之而来,大学多学科的建设、教学科研配套设施的建立和完善,稳定人才队伍和推进人才创造力发挥的制度构建、实践基地的建设等等,郭秉文和他的美国教育背景的同仁们,在追求美国大学式的发展路径过程中,不断加强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大学发展出的“教学、科研、服务”三大职能变得日臻突出。

激烈变革动荡的时代,和不断扩张的大学职能,使大学管理变得复杂和头绪繁多。为了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发展的需要,作为当家人的校长,有意识地树立经营的意识,进行经营管理,变得尤为重要。“时势造英雄”,郭秉文正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勇于创新的意识和开拓进取的精神,“以事业经营学校”①,成功打造出与众不同的东南大学品牌和职业校长的形象。基此,本文试图从大学职业校长的视角,分析和总结郭秉文大学经营理念产生的背景、具体的内容和主要的特点,借此亦探讨现代大学职业校长的综合品质和校长职业经营大学的路径选择。

① 胡先骕:《东南大学与政党》,载《东南论衡》,1925:1(1).

一、郭秉文的成长背景与大学经营理念的产生

郭秉文的大学经营理念，除了应时代的需要产生以外，与他的学术教育背景、接受的价值观以及对大学教育规律的认识亦有十分密切的联系。郭秉文，1880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南京江浦。因父亲是基督徒，他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早年毕业于上海教会学校——清心书院，1908年他自费到美国留学，进入教会大学——伍斯特学院，毕业以后他进入杜威教育理论大本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深受杜威实用主义理论的影响，1914年他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为留美学生中获得教育学博士的第一人。其博士论文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教育制度史”①。毕业以后，他即受南高师校长江谦的邀请，出任教务主任、代理校长、校长，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任首任校长直至1925年因为“易长风潮”离职。在他个人的教育生涯中，有几个关键因子对他大学经营理念的形成产生影响。

第一，基督教的信仰。他自小生活在基督徒的家庭氛围里，又一直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基督教的价值理念对他的影响是终身的。作为基督徒，他们视基督伦理为自己行动的依据，基督伦理宣称：“他们(上帝的罪人)应当勤奋，以便最终能得到上帝的召唤……如果他们不能勤勉、奋斗、劳动去获得恩典和拯救，他们必将毁灭。”人们只有勤劳、务实，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这种伦理观念和博爱、服务社会、民主、自由、自律等基督教其他信条，通过教会教育、家庭教育、宗教活动多方位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影响基督徒们的人生态度和事业追求。郭氏“处事则实事求是，不容许有半分夸张”②。“尽最大的努力，做他应做的事情”“处世接物，重热忱而恶虚伪”③表现出务实、讲求功效的办事风格。

第二，国际教育的经历。1908年到1914年长达7年的海外生活和教育的经历，使他有机会切身体验和深刻感受美国大学的办学理念，而且培养了他个人领导的素质和能力。以他本科就读的伍斯特学院为例，伍斯特学院是一所文理学院，以通识教育和通才培养为特色。尽管郭秉文在伍斯特学院主修的是理科，但他同时对法律、教育产生兴趣，不能不说伍斯特学院作为一所文理学院在人才

① 杜成宪等：《中国教育史学90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2.
② 宋晞：《中华民国名人传·郭秉文》(第三册)，东南大学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157.
③ 浦薛凤：《如饮醇醪 如坐春风》，载《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

品质的形塑上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培养了综合的能力。这一人才培养模式深刻影响了他在南高—东大的办学理念,他提出的通才与专才结合,人文与科学相平衡,很大程度上是他接受文理教育影响的结果。不仅如此,美国大学注重学生自动能力的培养,训练了他组织领导的才能,在伍斯特学院时,郭秉文以演说和辩论而出名,曾为学校获得了许多演说比赛奖。① 在美留学期间他担任中国学生协会秘书、留学生会会长,《留美学生联合会会刊》主编,学校对他的评价是"郭是一位受过教育的学生,也是个天生的领袖"②,这为他日后领导东南大学展露出非凡的社会活动能力和工作业绩奠定了基础。而毫无疑问,国际的教育背景使他日后的办学思维更加开阔。

第三,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系统学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作为美国文化精神本身的体现和概括,是功利主义的典型,它相当程度上迎合了美国19世纪末以来工业化和都市化的时代需要。作为一个较长时间受到美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影响者,郭秉文在1911年选择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大本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作为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学校,通过系统学习和接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深刻领会和把握美式教育的精粹。完成于1914年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充分论述了他对中国高等教育历史的认识和见解,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他接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成果。在书中,他从比较教育的视角出发,梳理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得出结论:中国教育"必裨实用,他国所风行而收功效之实际教育,当加意提倡之"③。从而奠定了他实用主义大学经营理念的基础,即一方面,遵循学术自由,民主办学的原则;另一方面,强调教育的实用功效,表现在具体的实践中,就是用经营的意识和精神带动大学的发展。

经营,意味着精心的谋划策略,以追求效益与价值的最大化为出发点。在郭秉文校长办学的实践中,融入了经营的概念。关于这一点,当时许多人在谈及郭秉文对东南大学的贡献时,都用上这样的表述词:"心营筹划"、"惨淡经营"、"辛苦经营"④,可见经营在郭秉文校长身份认同中的意义,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

① 葛德卫:《郭秉文与伍斯特学院》,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83.
② 葛德卫:《郭秉文与伍斯特学院》,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83.
③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4-105.
④《东大分设商大全体学生宣言书》、《东大商大全体教职员宣言》、《校董会致郭秉文公函致马叙伦函》,上海财经大学编:《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210、211、214.

徒雷登就说过郭秉文是“按美国的模式来推进教育事业的”[①]。郭秉文执掌东南大学的历程，是一个把管理大学视作事业经营的过程。

二、郭秉文大学经营理念的主要内容

关于大学经营的理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方面，在大学内部经营上，校长是如何维持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主要立足在哪一点？抓住哪些环节推进大学的运转？教师、学生、行政人员三者的关系是如何平衡的？在外部经营上，校长是如何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协调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获取更多的自主权和外部的支持？围绕这两个方面，职业大学校长不但要善于运作大学内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和盘活可能潜在的社会资源，从而创造最大的教育效益。在郭秉文管理大学的历程中，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的把握和经营上。

1. 在把握校长工作重心上，紧抓人才与经费

郭秉文认为经营大学，最重要的也是最现实的就是两件事：人才和经费。郭秉文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实际的办学实践中，“礼聘硕学，不问畛域，力筹巨款，不辞劳瘁”[②]，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延聘一流的教师和筹措办学经费上。

（1）人才。郭秉文从筹办南高师开始，就把延聘一流学者作为自己工作的首要任务。他利用自己在美的人脉关系和非凡的活动能力，给这所普通高校延揽了一大批学有所成、造诣高深的留美学者，形成了该校一道亮丽的风景。该校师资队伍实力之雄厚，学历层次之高，令人叹为观止。据统计[③]，该校文科 22 名教授，2 人获博士学位，8 人获硕士学位，5 人获学士学位；理科 10 名教授，3 人获博士学位，1 人获硕士学位，2 人获学士学位；教育科 10 名教授，4 人获博士学位，4 人获硕士学位，2 人获学士学位；工科 6 名教授，1 人获博士学位，3 人获硕士学位，2 人获学士学位；农科 18 名教授，2 人获博士学位，8 人获硕士学位，7 人获学士学位；商科 18 名教授，2 人获博士学位，6 人获硕士学位，6 人获学士学位。中国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学者如竺可桢、秉志、胡刚复、胡明复、胡先骕、吴宓、梅光迪、陈鹤琴、陶行知、茅以升、廖世承、孟宪承、王琎、陆志韦等，都曾经是

①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96.
② 《东大商大全体教职员宣言》，上海财经大学编：《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211.
③ 张雪蓉：《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40.

东大的教师。这一壮观的师资队伍,自然成为南高师—东南大学最为自豪的事,“东大所延教授,皆一时英秀”,对于郭秉文非凡的揽才能力,时人更是啧啧称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即高度评价郭秉文,“延揽了50位留学生,每一位都通晓他自己所教的学科”。

(2) 经费。东南大学筹建于20年代北洋政府时期,教育经费难以保障是这个时期高等院校普遍存在的现象。东南大学“虽号国立,或国家费补助,实则均由江苏省国库支给”①。尽管东大的办学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处在军阀混战不休的20年代,江苏省也同样要面临着教育经费锐减的命运。“及江浙战事开始,苏省收入,全充军费,学校方面,益感困难。”②在这样艰难的形势下,东南大学要维持大学规模的正常运转,如果校长没有经营的意识,“殚其智虑、疲其精神于筹划经费中”③,是难以办到的。正由于郭秉文“苦心经营,设法维持”、“求社会之赞助”、“协助校务进行”,解决了东南大学办学中的图书馆、科学馆的建设,校园土地的购置,师生出国深造,合作交流、实践基地的建立等经费难题,从而为东南大学争取了丰厚的教育资源。正是由于郭秉文设法筹款,惨淡经营,使当时他同时经营的东南大学本部和上海商科大学“沪宁两校,仍能照常上课,”而且“罢课罢校索薪等事均无发生也。”创造了1920年代国内大学办学的奇迹。

2. 在治校方略上,提出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

20世纪60年代郭秉文在华盛顿接受南高校友张其昀的采访,将自己经营大学的方略,概括为一个字“平”。他自称,生平为人为事,终是本于“和平”二字,“平乃能和,和乃能进”,这种“平”的经营方略具体体现在:强调大学教育应该力求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④ “四个平衡”的办学思想反映了他对大学各项事务、各种人事关系的总体把握的原则,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教育思想。

(1) 通才与专才的平衡。通专结合,是郭秉文设计的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他认为,“正科注重通才教育”,但不忽略应用;“专科注重专才教育”,但不忽略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如此一方面使大学人才具有坚实、宽广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而一个综合型大学的好处就在于它能使通才与专才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于空疏,专才不致于狭隘”,培养

① 《苏省政务会议南高经费》,载《申报》1924年4月9日,第7版。
② 《学校经费之困难》,载《教育杂志》第17卷第2号(1925.2),“教育界消息”第8页。
③ 郭秉文:《民国十一年之高等教育》,《新教育》第6卷第2期。
④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49.

出来的学生能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①]。基于这样的办学理念，郭秉文力谋院系的扩充，把东南大学发展成为学科范围广大的综合性大学，同时打破院系的界限，实行选课制和学分制，允许学生跨专业跨系跨科选修课程，实现通专结合的培养目标。

（2）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在郭秉文办学实践中，人文与科学的平衡，意味着学校在学科结构上，既要发展文科，也要发展理工科，同时也表明大学在办学指导精神上，尽力达到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它使东南大学以科学名世，科学的实力在国内首屈一指。但是文史哲的实力也是相当强大，不输于北大。近代史专家梁和钧在比较五四时期的北大、东大这两所国立大学后，即称“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②]，国学大师和杰出的留美学者交相辉映，形成了十分活跃的学术高地。

（3）师资与设备的平衡。郭秉文清楚地认识到东南大学要跻身世界大学之林，必须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然而，罗致优秀师资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没有完善的教学科研设备作为保障，也无法保证师资队伍的稳定，和大学教师有效地开展学术研究。对此，郭秉文明确地指出，大学“当然以教师为第一，但是物质设备亦不容忽视”[③]。在任期间，他将完善教学科研设备作为校长分内的大事，尽力筹措经费，做到师资优秀与设备完善的平衡。

（4）国内与国际的平衡。郭秉文主张广求智识于世界，常以大学生应有国士的风度和志节，勉励大学生“以国事为己任”、“以天下为己任”[④]。在实际的办学中，郭秉文不仅致力于吸纳国内外学者云集东大，形成东南大学学术研究与交流的盛况，成为与北大并驾齐驱的两大学术重镇之一，而且以其国际教育家的视野，活跃于对外教育文化的交流与开拓，通过推动交换教授、毕业生留学、联系办学、合作研究等项目，扩大国际交往的渠道，吸纳世界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办学实践，使东南大学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先进办学理念、国际声誉的学府。这一力求国内与国际平衡的办学理念，使东南大学成为国内学术的中心，并因其卓越的贡献，使东南大学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美国教育家孟禄在考察多所中国大学后，称东南大学为“中国最有希望的大学”，“将来该校的发达，可与牛津、剑桥两大学相颉颃”[⑤]。

---

①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50.
② 王成圣：《中国哲人郭秉文》，载《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 年版。
③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50.
④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51.
⑤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卷 8，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236.

3. 在内部运营上,建立现代大学高效的管理机制

1920年代郭秉文按照美国模式建立起来的董事会制和"三会制"[①]相结合的内部管理运营机制,平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形成科学、民主、高效的行政管理制度。在这一管理体制下,董事会是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实行董事会下的校长负责制。评议会代表教师评议全校重大兴革,由校长批准后由行政部门执行。教授会指导全校的教学工作,议决全校教务事项,重要教务事项向评议会建议。行政委员会负责全校的行政事务。显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评议会和教授会是代表和保护大学教师学术自由的载体,保障了教师的学术自治权,提高了学校的民主管理的成分,又明确了校长负有全校管理的全部责任,并将各种事务交由各个职能部门,实行负责制。东南大学时期,董事会被确立为最高行政机构主要是出于提高校长决策权力和办事效率的考虑。三个决策机构董事会、校长及其行政会议、评议会(包括教授会)三方各司其职,相对制衡,这种模式体现出较为浓厚的美国大学管理中把教授的学术权力与以董事会和校长、行政会议为特征的大学行政权力结合起来的有效的管理模式的特色。美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移植无疑极大提升了学校经营的效率。

4. 对外联系上,竭力扩展学校的社会功能

郭秉文经营大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不断扩展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这首先体现在他提出的学术并重的办学理念和实践,重视应用学科,不忽略基础学科,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在学科布置、课程设置、人才培养上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其次,开创性地在中国大学里设立董事会,首届董事会成立后,在筹资、扩大东大舆论影响、决策咨询、调动社会力量辅助东大办学,成为当时国立大学最有特色的办学模式。再次,推广教育于社会。东南大学率先在办学宗旨表述中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业人才,指导社会事业"为宗旨,将服务社会明确为大学重要的职能。推广教育将大学引向另一种方向,即大学通过建立与社会的密切联系获得发展。通过设立推广部,以函授、讲习会、开办学术演讲、暑期学校、设立学校实践基地、派员下乡、推广科研成果等途径和形式,依靠自身的优势,传播知识,培养人才,解决工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获得地方更多的经费、场地的支持。

① 三会制:即郭秉文执掌时间,南高师—东南大学设置的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制度,简称"三会制"。

三、郭秉文大学经营理念的精髓:卓越与平衡

郭秉文大学经营的主要内容,渗透着他大学经营理念的精髓,这就是追求卓越与创新的办学理念和平衡动态的管理理念。

精髓之一:追求卓越与创新的办学理念

追求卓越、勇于创新指的是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追求高目标,善于发掘、开发新的思路,包括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勇于改革的精神。郭秉文经营东南大学的历程,即是不断将创新作为大学发展的动力,不断追求学校高远的发展道路。其内涵包括:第一,远大的战略目标。东南大学是在南高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南高师开办之初,按照教育部的《高等师范学校令》设立国文、理化两部和国文专修科,规模很小,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资为目的。但是郭秉文从一开始就没有按照这一路径办学,而是志向高远,"按美国的模式办大学","寓师范于大学",从学科设置、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不断拓展办学的层次和规模,朝综合性大学的方向发展,表现出独特的办学思路。第二,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追求卓越的过程,也是追求效益的过程。如何将效益最大化是郭秉文经营大学的最大特色。曾为南高—东大教师的胡先骕对此有深刻的感受,他说:"予为对于郭校长治校向表示不满之人,因其缺乏大学校长之度,无教育家之目光,但以成功为目的。""'以成功为目的',即是在经营大学中,将经济融入教育中,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对于郭秉文这种实用主义的办学理念,作为学校教师的胡先骕尽管并不十分欣赏,但认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以成绩论英雄,郭无疑是最了不起的人物,并称:"统观今日之大学校长,自蔡孑民以下,能胜于郭氏者又有几个乎?"[①]第三,敏锐的洞察力和不断创新的意识。在郭秉文的经营理念中,创新占到了重要的成分。在十年的办学历程中,郭秉文敏锐地捕捉住社会发展的各种机遇,捷足先登。他的创新变革就包括:①根据社会需求设置专科。"所谓南高诸所擘画,颇异部章,而专科增设之多,尤为各高师所未见。"[②]不仅适应了社会的发展需要,"以应中等职业学校之需求",也拓展了自己的办学空间。②首创"寓师范于大学"的师资培养模式,主张综合型大学的模式发展南高师,将师范教育放到综合性大学里,培养出上乘的师资。[③] ③首设董事会制度,依靠社会,开

① 胡先骕:《东南大学与政党》,《东南学衡》1925,1(1).
② 张其昀:《南高的学风》,《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181.
③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49.

拓多渠道筹资渠道。④首设商科大学于上海。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工商业发展的过程中,工商业对大学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郭秉文敏锐地看到这一大学发展的增长点,将为工商业发展服务作为办学特色,并从服务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出发,将商科办到上海。⑤首倡推广教育,扩展大学的社会功能。除此之外,他开创的大学创新举措,还包括:推行主辅修制,培养通专人才;实行男女同校和学生自治,发展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等等。他不断推陈出新的教育变革举措,也使东南大学成为20年代新教育的风向标。第四,国际的眼光。与同时期的其他大学校长相比,郭秉文表现出更为突出的国际眼光。20世纪20年代,他连续3次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3次被推为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其在世界教育舞台上的活跃程度,"1920年代在各国人士眼睛里,中国的外交界上只有顾维钧、施肇基,教育界上只有郭秉文"①。

追求卓越,勇于创新是郭秉文志向高远的办学理念,他为东南大学制定"止于至善"的校训,蕴含着东南大学始终以追求卓越为目标,以创新为动力,把握和利用机会,并适时将之转化为发展契机的内涵,这是郭秉文经营大学过人之处。由于追求卓越的战略目标,五四时期,南高通过一系列的改革,进一步提升学校的规模和办学影响力,并在1920年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成为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设有文、理、教育、农、工、商6科22系,这种在当时国内大学超大规模的设置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当时学校教师引以为豪的地方。茅以升就曾自豪地说道:"东大寓文、理、农、工、商、教育于一体,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意义深远。"②1920年代辉煌之时的东南大学,名师萃集,桃李芬芳,思想活跃,蜚声海内外,办学成绩斐然。

精髓之二:平衡的动态管理理念

"大学主要领导者的职能是保证有关维护学校紧密团结的决策既能符合大学的目的,又要顾全大局。要发挥这种作用,大学校长必须考虑平衡和远景。"③1920年代能以一位年轻的校长资历,去领导一个拥有众多学识高深的一流学者的大学,并一跃将其带到"中国最好的大学",成为可以与北大一比高低的著名学府,正是郭秉文杰出的领导艺术。体现郭秉文领导艺术就是"平",即努力使大学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四个平衡"的办学方针,充分体现了他追求平衡的

① 转引自丁钢《郭秉文与对外文化交流与开拓》,东南大学高教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96.

② 茅以升:《茅以升等7教授致东南大学教授会、评议会函》(1923年3月)《东南大学史》第一卷,1994:118.

③ 薛天祥:《高等教育管理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69.

办学理念，不仅如此，实际上在他的整个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中也无不渗透着这一治学治事的理念：如董事会制和三会制的制衡。董事会制为学校最高的权力机构，但不直接参与学校的具体事务管理，校长对学校的各项事务负有全部的责任，实行校长负责制。而在关于学校的各项教学学术事务上，通过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尊重教授的学术自治权，发挥教授的自动性，实行民主治校。再如以实行自治、自动和指导、训练相结合的学生自治会制度和主辅修的人才培养机制，“旨在使学生在学业上有自学和自力研究的能力，在生活上能自力、自理，各种学术活动能自行组办，并发展学生的社会性和群体合作的责任心、服务心”，尊重学生主体，给予学生自我发展的空间，但是“欲自治制度之有成效，必赖一部分学校行政者之承认，且为各学生能力所及之事，夫教职员确知自己管理权之界限，而学生又能敬守学校行政者之法权，二者交相让，则学生自治之事进行，其庶几乎”[①]？又如学术并重的思想，不仅在学科发展上，做到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并重，而且也反映在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并重，它不仅将社会作为学术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而且在大学内部又坚持以大学的学术性为根本，通过发挥学术机构作用，尊重学术发展的规律，尊重教师的学术地位。可以说，努力将学校管理的各种事务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之中，充分体现了郭秉文治校的艺术和策略所在。它使大学教育中的通才与专才、人文与科学、师资与设备、国内与国际、大学与社会、责任与自由，置于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中，从而有效地处理了大学内部管理中涉及的人、财、物。这种相对平衡中庸的治校方略，营造了和谐的学术环境。

受这一平衡观的影响，一方面，北大以文史哲著称，南高师则以科学名世，注重科学教育，形成办学特色。但另一方面，南高师—东大的文史哲亦不输于北大，南高文科集中了一批国学名家和留美学者，在新文化运动占据上风，白话文取得国语地位之时，秉承中西融通之精神，不偏不倚，不仅是吸纳传播西方新思想、新文化的主要人物，而且以不放弃文言文写作和旧体诗词吟唱，成为坚守传承传统文化的主要阵地。在这种融通的大学校园下，南高人才辈出，在国内影响重大。自然科学人才方面，如郭斌禾所言：“南高同学之学自然科学者，大都能甘于寂寞，穷年兀兀，做实验室研究之工作成绩优异，蜚声外邦者颇有其人。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动物、植物、人类各门，每门均有突出之人才，国内各大学及研究所，几莫不有南高校友之踪迹。”[②]史地人才方面，形成南高史地学派，与北京大学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形成南北学术的分庭抗礼之势。

---

①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郭秉文与东南大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39.
② 郭斌禾：《南京高师20周年之意义》，《国风》7卷2期，1935.

结　语

1920年代中国大学杰出校长辈出的时代,郭秉文是以能力取胜的典型。他长达10年的大学领导生涯,始终以“事业之心经营大学”,将追求卓越和发展平衡的治校谋略贯穿于南高—东大的办学实践中,通过以筹款、吸纳优秀人才作为校长的工作重心,建立起高效的美国现代大学管理体系,使东南大学在1920年代军阀统治、教育经费得不到保障的背景下异军突起,发展成为最杰出的大学、南北两大学术重镇之一。作为校长,郭秉文通过选择平衡学术发展和社会功利需求,谋取办学效益最大化,来维持组织的生存和发展,顺应了那个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内外部环境的需求,表现出较为浓厚的美国大学实用主义价值取向,是一位具有美式职业校长风范的大学校长:视校长职位为一职业,校长意味着更多的角色,不仅是学者,还是社会活动家、外交家、财政家。作为校长,郭秉文以事业之心经营大学表现出极强的校长职业意识,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位杰出大学职业校长的素质和能力。这就是:首先,是一位学者,有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其次,以追求卓越为目标,具有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第三,具备国际视野,拥有国际化的战略眼光;第四,始终将事功和学术的协调平衡,作为驾驭全局的方略。处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就现实的成功而论,郭秉文无疑是成绩最大的校长,他所领导的东南大学无论在规模还是实际成绩上毫不逊色于当时的北京大学。

平衡创新:郭秉文办学治校思想精髓*

◎耿有权(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在郭秉文教育思想体系中,“平”始终是“一根主线”,“平衡”是核心的哲学理念,“四个平衡”是郭秉文大学办学治校思想精华,“三育并举”是这种精神理念在人才培养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和创新发展,而“社会服务”、“学术并重”、“民主管理”,不仅是这种精神理念的内涵发展和外延拓展,也是郭秉文积极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学习借鉴美国大学模式办学治校的重要体现。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可以说,郭秉文教育思想,不仅直接指导和助推了二三十年代东南大学的快速发展,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为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模式多元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平和”、“平衡”与“四个平衡”教育思想

郭秉文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西方大学人文精神,善于将自身的教育思想转化为朴实而深刻的办学理念,如引用儒家教育经典《大学》,得南高师校训“诚”(1914—1923)、东南大学校训“止于至善”(1920—1927),并充分体现在南高师—东南大学的办学治校实践中。郭秉文认为儒家经典《大学》里“平天下”

*[作者简介]耿有权(1967—),男,安徽全椒人,博士,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教育伦理研究。本文曾发表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S1期。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重点课题“杰出教育家郭秉文的高等教育思想研究”(B-b/2011/01/002)阶段性成果之一。

的“平”字,“乃是治学治事最好的座右铭”。“郭师自称,生平为人治事,终是本于和平二字。平乃能和,和乃能进。”[①]就大学教育而言,郭秉文认为应该力求达到: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②] 虽然,近年来有学者总结提炼出“学术与事功的平衡”,作为郭秉文教育思想中的“第五个平衡”[③],但是,这“四个平衡”则是郭秉文亲自总结出来的并经过实践成功检验的最重要的“平衡思想”。

1. 通才与专才的平衡。郭秉文认为,大学应该培养“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培养这样的人才,仅依靠南高师存在不足之处,应该放在综合性大学里进行。在他看来,在综合性大学内,学校既可开展“通才教育”,也可实施“专才教育”。为此,他以南高师为基础,把它扩展为一“综合大学”。既设立“正科”,服务于“通才教育”,也设立“专修科”,服务于“专才教育”。正科分文史地部与数理化部,专修科设立工、农、商、教育、体育等科。这样,让“通才和专才相互调剂,使通才不致于空疏,专才不致于狭隘”[④]。这可以说是南高师—东南大学一贯相承的学风和教风。

2. 人文与科学的平衡。郭秉文认为,大学不仅要成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而且要成为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基地。主政期间,他延揽了一批包括人文大师在内的50位优秀学者,如刘伯明、柳诒徵等,并创办了《学衡》杂志,“主张发扬民族精神,沟通中西文化,不要仅作空泛的介绍,而当更作深入的研究”。[⑤] 他还将创办于美国的“中国科学社”迁入东南大学,使东大成为中国重要科学研究中心。“当时东大提倡科学,为全国各大学之冠。”[⑥]北伐胜利后,国立清华大学等名校皆借重南高—东大培养的优秀学生,成为科学方面的教授。这应该说是郭秉文办学期间的一项重要成果。

3. 师资与设备的平衡。郭秉文认为,师资是实施大学教育的第一要素,但是物质条件也不容忽视,两者应当保持适当的“平衡”。在他所聘请知名教授中,科学家如任鸿隽、秉农山、孙洪芬;教育家如陶行知、陈鹤琴、刘伯明、孟宪承;人文学者如梅光迪、吴雨僧、柳诒徵等诸先生,均为当时中国的学界泰斗。主政期间,郭秉文还想方设法筹集资金改善办学条件和教学环境,如他从美国洛氏基金会募捐20万元建设中国大学最早的科学馆;利用私人捐款建设东大图书馆;采

①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C]//编委会编.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3.
②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C]//编委会编.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3.
③ 王运来.学术与事功平衡——郭秉文高等教育思想蠡测[J].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11(2).
④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C]//编委会编.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1.
⑤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C]//编委会编.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5.
⑥ 宋晞.我所敬仰的郭鸿声先生[C]//编委会编.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46.

用银行投资合作方式建设学生宿舍；在成贤街、三牌楼和大胜关附近设有农场，将北极阁作为气象台，把玄武湖作为水生植物和鱼类的实验池。商科设于上海发展。“凡此种种规划，无非是要注重实验，而达学以致用的理想。”①

4. 国内与国际的平衡。郭秉文是留学美国的教育学博士，深知办大学要有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他“主张广求智识于世界，务使同学们放宽眼界，开拓心胸，则爱国之心，油然而生”②。而实现这个教育目标，必须要有一流国际型师资。主校期间，他不仅派遣教师、学生出国留学，如派遣陈鹤琴、卢颂恩等赴美求学，还延揽了一批从国外著名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使东南大学留学教师占总数的64.4%③，同时邀请一批世界著名学者访问东大并作短期讲学。那个时期，国内外著名学者可谓云集东大，阵容强大。国内学者有梁启超、胡适、黄膺白、顾维钧等，国际学者如杜威、孟禄、推士、罗素、杜里舒、泰戈尔等。其间，郭秉文出席了三届世界教育会，曾以大学教育与世界和平为题，阐明大学里的“平天下”的志趣。如此等等，反映了郭秉文大学办学的国际视野和博大胸怀。

（二）“训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

郭秉文凭借其渊博的知识修养和真知灼见，协助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谦校长制定了“三育并举”的育人方针，并在实践中坚持这一方针。可以说，这是他“四个平衡”教育思想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体现。郭秉文主张“以诚为本”，要通过“训育”、“智育”、“体育”三者并举而使学生在才能、体魄、精神、道德和学术诸方面达到“相当的发达”的境界。为此，郭秉文不仅对“三育”的概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而且提出了明确的标准、方法和实施途径。

1. 训育。郭秉文认为，“训育”必须“以诚为本”，应“取训练和管理兼重主义”。郭秉文强调“训练注意启发，使知其所以然；管理注意实践，使行其所当然：二者交相为用，以期知行合一”。标准是“以养成对于国家负责任之国民为意想中之人格。”即“具有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而于道德、学术、才识三者又有适当之培养。”④实施训育时，一重修养，二重服务。修养方面，“于学生则重躬行与省察；于职员则重感化与考察。”服务方面，“于学生则重实践与研究，于职员则重示范与检查”。⑤显然，郭秉文的这种教育理念，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① 张其昀. 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C]//编委会编.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2.
② 张其昀. 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C]//编委会编.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3.
③ 王德滋. 南京大学百年史[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97.
④ 郭秉文. 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节录）[M]//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11.
⑤ 郭秉文. 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节录）[M]//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12.

2. 智育。郭秉文认为,智育"亦以诚为本",要"依据诚训,以养成思想及应用能力为智育标准。必使学者能思想以探智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智识之归宿"。因为"明智识之本源,然后乃能取之无尽;明智识之归宿,然后乃能用之无穷"。至于"所思想、应用之事物,则以适合于社会需要为本"①。就实施来说,可分为六种:一为设科;二为教授;三为实验;四为研究;五为实习;六为参观。郭秉文的"六管齐下"的教育举措,可谓夯实了东南大学人才培养的基石。

3. 体育。郭秉文认定"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强调"欲求德智高尚,苟使身体孱弱不徒,任重道远,难以负担,且不足以表示优秀国民之完全人格"。在他看来,"体育之标准"是"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②。主政期间,东南大学在疾病预防、膳食卫生、日常锻炼、疾病医治等方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和实施,效果十分显著。

(三)"社会服务"必须"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郭秉文是近代中国留学美国的首批教育学博士之一,对美国大学曾做过深入的考察和比价,对二三十年代前后美国高校"社会服务"观念转变的状况有深刻的理解和领悟。有学者评论说:"他与蔡元培主张不同的地方,归结到一点,就是强调学校与社会的联系,适应和满足社会需要,并依靠社会力量办学。"③在南高—东大办学实践中,他强调大学必须"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促发展,将"社会服务"贯彻于其"四个平衡"教育实践过程中,使"社会服务"演变为中国大学的一项重要功能。

1. 服务国家。郭秉文特别反思欧战以后世界各国对教育的认识和政策,认为我国教育政策,"亦应注意是否符合于世界趋势,是否适应国家社会需要"④。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建设,他主张教育要从"专科"层次向"大学"层次发展,要建设更多的大学。他指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⑤大学要培养"对国家负责任的公民",具体而言,就是要培养大学生具备"钟山之崇高,玄武之恬静,大江之雄毅"这样一种有"国士的风格与志节"。所谓"国士者,以国事为己任,又以天下为己任"⑥。郭秉文强调,"本校依据智育标

① 郭秉文.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节录)[M]//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13.
② 郭秉文.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节录)[M]//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15.
③ 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59.
④ 郭秉文.我国今后教育问题[M]//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16.
⑤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74.
⑥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C]//编委会编.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3.

准，以适应社会需要，为设科主旨。但社会需要随时变更，是所设之科亦因之而异。”[①]由此，郭秉文服务国家的教育理念，显而易见。

2. 实验教育。郭秉文认为，我国教育向来注重“文字教育”和“道德教育”，却不够关注社会生活的“实验教育”，而后者却是西方教育强国之重要途径。“盖学生之抛弃社会而求学于学校，毕业后既不能为农又不能为工商，教育之本质安在哉?”他认为，“欲医斯病，必慎选教材，与夫改进各种科目教授之法。”[②]他赞赏“学校之课程为学生将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之一物，是一进步也。”[③]那么，学校课程之如何编制？“第一，应加手工与练习觉官之科目。无论如何，借学生以机会，熟认具体与实用之理，或实验法与归纳法之知识……学校盛倡假期旅行，实为实习功课之好现象。”[④]关于教学法，他认为我国“自古重记忆之教育法，吾人已知其不合于教育，而渐废除之。”[⑤]“幸而今之教育新进者，渐知急所先务，翻然变计，注重实用教育，不出十稔，必有成效可观已。”[⑥]

3. 科技推广。郭秉文认为，大学只有适应社会需要发展科研，才能更好地推进自身的发展。主政期间，东南大学将“商科”设立于上海，目的是培养地区发展需要的推广人才；东南大学教育科以陶行知教授为主，在全国率先开办暑期学校，率先推广教育实验和改革教学方法，推进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东南大学农科确立“为农民服务、为中国农业改造服务为宗旨”，实行“教育、研究、推广并重的方针”，大力“推广地方事业”[⑦]，使东南大学的农科很快成为改良江苏全省农业总机关，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学术并重”必须落实通专结合、学以致用

学术并重，不仅是郭秉文“四个平衡”教育思想的内涵延伸和发展，而且是郭秉文实现高等教育模式美国化转变的重要标志。实际上，如何对待“学”与“术”，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高等学校探索理想办学模式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留学美国的郭秉文，与留学德国的蔡元培，可谓泾渭分明，各有千秋。如果说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的改革是“重学轻术”，那么，郭秉文校长在东南大学推行的政策则是“学术并重”，具体表现为“平衡”发展“文与理”、“学与术”，“平

① 郭秉文. 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节录）[M]// 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13.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2－103.
③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2.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7.
⑤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7.
⑥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3.
⑦ 朱斐. 继长南高，建业东大——郭秉文首开我校第一个鼎盛时期[M]// 朱一雄主编. 东南大学校史（第一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61.

衡”培养各类专业人才。

1. 学术平衡。学术,显然包含两个方面:“学”与“术”。郭秉文认为,“学术”是由“学”科与“术”科构成的;“学”重的是学理,“术”重的是应用;“学”是基本,“术”是枝干;“学”包括文理法等,“术”包括农、工、商等。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郭秉文认为大学只有做到学术并重才能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他说:“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东南大学教授茅以升曾不无自豪地说:“本大学学制,以农、工、商与文、理、教育并重,寓意深远。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亦即本大学精神所在也。”[①]郭秉文与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差别显见。

2. 通专结合。郭秉文认为,大学应该培养各种类型的人才,既要培养通才,也要培养专才。为“平衡”起见,通才教育不忽视应用,专才教育不忽视基础。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应该平衡发展,以造就“对国家负责的国民的完善人格”和“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在东南大学瞄准综合性大学目标的办学实践中,郭秉文既重视建设偏重理论的学科,也重视设立偏重应用的学科,使学科之间做到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从而培养和谐平衡发展的优秀人才。执校期间,东南大学从 1915 年只有国文、理化两部和国文专修科,逐步扩展到 6 科(文、理、农、工、商、教)31 系。文理学科之齐全,居全国之冠。其中,不少学科为中国大学之鼻祖,如开创了第一个物理系、气象系、航空系、体育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金融理财系、国际贸易系等。

3. 学以致用。郭秉文认为,教育关系学生的生活。在他的观念里,“彼不顾学生就学之目的,轻视处境生活之需要,甚非教育之本能也”[②]。因此,教育必须关照学生的未来职业发展和就业前途。郭秉文认识到我国上世纪 20 年代所办教育不实用的情况,明确指出:“夫教育不切于实用,则凡教授、训练、管理等,必不能深合于社会之需要。”“如欲教授、训练、管理等,深合于社会之需要则奈何?余以为非于发达学子身心之外,复注意于学子职业之选择,而予以正确之引导不可也。”[③]“故引导少年选择适当之职业,诚重要事也。此重要事,虽非学校独任其实,然学校则当其首充。”[④]可以说,郭秉文的这种教育实践理念即使放在今天

① 茅以升. 茅以升等提议添设土木工程及电机工程案[M]//《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 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6.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02-103.
③ 郭秉文. 中国现今教育问题之一:职业之引导[M]//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06.
④ 郭秉文. 中国现今教育问题之一:职业之引导[M]//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09.

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五）推进民主管理必须实行制度制衡、自治管理

在南高—东大的办学实践中，郭秉文引入民主管理和民主治校的思想，既有对我国传统教育模式和旧时代教育的深刻反思，也有对高度发展的“美国大学模式”的内在认同和主动借鉴。郭秉文认为，在建设中国大学的过程中，要“搜集前清至今日兴新教育之经验，再参用欧美制度之所长，以及保存吾国自古教育之所宜是也”①。可以说，这也是郭秉文平衡创新教育思想在管理制度设计方面的反映和体现。

1. 制度制衡。郭秉文强调教育管理的“持中之道”，认为大学管理也要实现“平衡”理念。在大学办学过程中，他坚持实行董事会、校长领导下的“三会制”，并制定和实施《东南大学组织大纲》。所谓“三会制”，即指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校长兼此“三会”的主席。职能上，“三会”各有分工，各就各位，各司其职，达到相互制衡。评议会议属于议事机构，职能是决议学校教育方针、学校规划与各项经济支出等重大事项；教授会是负责全校教务；行政会是负责学校行政事务的机构，协助校长处理校务。董事会是全校最高的立法和决策机构，地位和校长并列甚至更高。设立董事会，是郭秉文校长的一大创举，其最大作用是沟通大学和社会各界之间的联系，以获得社会各方面的舆论、物质、经济等大力支持，使东南大学得以快速发展。事实证明，董事会在东南大学早期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2. 自治管理。郭秉文认为大学本质上是学术机构，大学管理采取自治模式最适合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自由发展。在他看来，自治管理，不仅指教师的自我管理，而且指学生在学习上的自学和自力研究、在生活上的自立和自我管理，以及各种学术活动、文体活动的自行组织和主办。设立教授会，目的是实行教授在教学、学术等事务上的自治管理。建立学生自治会，下设评议会、执行部、仲裁院三个机构，既是实现自治管理，也是为了达到制衡管理目标。评议会是议事机构，讨论决定学生自治会的计划、任务、章程等重大事项；执行部是组织执行机构，负责主办各种学术、文艺等活动，参与宿舍、食堂等管理；仲裁院是调解处理各种矛盾的机构。为加强学生工作，东南大学专门设立一个学生自治委员会，选聘德高望重的教授，如刘伯明、陶行知等曾担任委员。

3. 授权管理。郭秉文深谙教育管理之道，曾著《学校管理法》，详述教育管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10.

理之方法和原理[①],其管理大学的方式独到而效果显著。通过制定大学章程实现董事会治校。通过战略分析和授权管理,达到超脱具体事务,以把握大学发展方向。任校长期间,郭秉文在正确把握学校发展方向的同时,主要负责三件事:筹款、聘师资和国际交流。这与美国大学校长的管理模式如出一辙。郭秉文因繁忙的国内外事务,经常不得不长期离开学校,因此所有校务都全权授权或交办刘伯明副校长处理,而刘伯明凭借哲学家和教育家的卓越智慧,成功地管理学校各项事务,使东南大学文明、有序、高效地运转。同时,郭秉文利用自身强大的人脉资源和社会网络,充分发挥其演讲与沟通才能,直接向国内外筹款,建设东大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等重要设施。据学者朱耀祖回忆说,虽然当时办学经费十分紧张,但是学校"教职员薪给才能按月发放,十年间从未拖欠"[②]。应该说,在当时背景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办学成绩。同时,他在国内外交流活动中,始终把聘请一流师资作为学校的中心任务,确保使精英学者、学子云集东大。

4. 人格感化。郭秉文始终把"平"作为自身为人处世、办学治事的座右铭。学生伍天纬回忆说:"先生为人谦逊,胸襟广大,遇人亲切,无所矜饰,其交游之广阔,尤为国际学者所礼敬。'南高','东大'时期,国内外学者云集于此,而成为学术之重镇者,盖有由也。"[③]口字房失火,可以说是南高东大历史上一件最大不幸事。在这件事情上,郭秉文的管理方式,令人印象深刻。学生宋兆珩回忆说,当时看到失火后,立即前往救火,他们将重要图书仪器"抛出室外,再由同学接运安全处所。正忙迫间,见郭校长立余前,命余停止,余唯唯而出。翌晨,校长巡视现场,笑谓余曰:救火,抢运图书,是好事,惟学校保有火险,青年人健康安全最为重要。故而命汝停止,抚余以示勉,其言蔼如,予我以极深印象,校长之平易近人,大率如此"[④]。透过这些事例,我们不难看出郭秉文校长那高尚的精神品格和高超的管理艺术。显然,这对当代大学校长办学治校也很有启发意义。

结　语

郭秉文平衡创新的办学治校思想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一是要注重各类学生素质的均衡发展,并落实在人才培养的

① 郭秉文.学校管理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3.
② 朱耀祖.郭秉文先生与"南高""东大"[C]//编委会编.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67.
③ 伍天纬.追忆郭师秉文二三事[M]//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165-166.
④ 宋兆珩.哀先师,忆母校——追忆郭秉文校长[M]//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167-168.

各个方面、每个环节上；德育是先导，智育是关键，体育是基础。站在新的起点上，大学应该自觉落实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育要求，要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协调发展的各类人才。要注重本科生和研究生素质的平衡发展。本科生教育要注重通专结合，强化基础，注重应用；研究生教育要突出学生的拔尖创新能力培养。二要不断完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努力推进依法治校的历史进程，不仅要依靠人的自觉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而且要建设符合时代需要的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要充分发挥教授群体在学术建设和人才培养上的作用，尊重和维护学生和其他群体的合法利益，科学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三要加速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努力建设国际化、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把国际交流合作的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建设国际知名学科和培养一流人才的重要平台。

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

◎许小青(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一、引言

在民国灿若星河的教育家群体中,郭秉文因其跌宕起伏的教育人生,让人唏嘘、令人感叹:一方面,他是民初学成归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回国伊始,即广泛联络新教育社团、充分运用现代报刊媒体,培育新教育的"公共空间",广泛传播新教育理念,推行新教育实践,思想与行动双管齐下,很快成长为民国新教育界最引人注目的明星式人物,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教育的国际代言人;另一方面,当他正处于事业顶峰时,一场"易长风潮"却让他无端陷入政治漩涡,被迫远离国内教育界,从此中国国内教育界难以再见他的声音与踪迹(虽然在国际舞台上,他还努力为中国教育代言)。这种巨大落差,难以在其他教育家的身上重现,因此,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其始也兴,其亡亦速"的独特景象。另外,在某种程度上讲,他是一位行动大于思想的人,所留下的系统大部头的教育论著并不多,其教育思想火花更多是一种实践性总结,散见于民国早期的各类教育期刊中。因此,长期以来,郭秉文这样一位很早就声名显赫的教育家,其声音与踪迹却淹没在历史巨流中。迄今为止,除了郭秉文

*[作者简介]许小青(1969—),男,湖北蕲春人,历史学博士,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教育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

最重要的教育论著《中国教育制度史》等少数论著再版外，还没有一部收罗全面的郭秉文教育文集或全集公开结集出版。多年来，除了少数受他当年栽培的桃李外，其思想与业绩并不为其他后来者特别重视，有关研究亦多属纪念性的回顾。近十余年来，这一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已有学者专门深入地讨论其办学的实绩与思想，并有专门的“郭秉文教育思想研讨会”召开[①]。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学术界对郭秉文的研究，仍多集中于郭氏本人的教育理念与办学成就，尤其是其办理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实绩方面，而对于郭秉文与民国时期教育界的关联，鲜有全面的论述，仅有少数论文提及其与国际教育界交流。因此，要想全面准确理解与把握郭秉文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特色与地位，只有将其置身于民国教育界之中，从前后左右的相互联系中，才能得到真切地理解和把握，因此，学术的视域仍有待进一步放宽。

笔者认为，知人论世，只有将郭秉文置身于民国早期中国的教育大变革中，才能真切地把握郭秉文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张灏先生曾专门论及 1895 至 1925 年前后三十年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年代，主要的变化有二：一是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体的大量涌现；一是新的社群主体——知识阶层出现。[②] 郭秉文在现代中国教育界活跃的年代，正处于张灏先生所言转型时代的后半期，郭秉文深度参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几个关键因素——新式传媒、学校与知识阶层的建设中，尤其对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影响远远超过一般的知识人。只有充分理解了这样一个关键的转型年代的意义，才能充分认识郭秉文对中国现代教育的影响和贡献。同时，笔者亦认为，郭秉文并非凭借一己之力来谋求中国教育的新生，应该充分认识到，在那样一个关键的转型年代里，有一群像郭秉文一样抱着“教育救国”理念的知识人，共同谋划中国教育的新生。因此，只有将郭秉文先生放置于这样一个群体中，从群体的相互关系与影响中，才能真切地把握郭秉文所思所为的特别意义。这里，特别要借助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探讨郭秉文与民国早期教育界的关系。在布迪厄看来，“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场域可以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者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说得更为直接一点，“根据场域概念进行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受张

① 代表性的成果有冒荣《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王悦芳《蔡元培、郭秉文办学思想与实践的比较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专门的学术会议近期有东南大学于 2011 年召开的“郭秉文教育思想研讨会”。

② 张灏先生对“转型时代”的表述范围前后略有调整，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二十一世纪》总第 52 期，1999 年 4 月，第 29－39 页）将转型确定为 1895—1920。几年后，他在《转型时代中国乌托邦主义的兴起》（《新史学》第 14 卷第 2 期，2003 年 6 月，第 1－41 页）修订为 1895—1925。

灏与布迪厄理论的启发，在思考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的关系时，则始终要考虑到以郭秉文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网络”问题，注意考察郭秉文师友关系中的地缘、业缘诸要素，并要围绕现代传媒（如《新教育》杂志）、新式社团（如江苏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新式学校（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和郭秉文时代的南高与东大），放宽视域，将郭秉文置身于民国早期中国教育转型的各种网络中，通过郭秉文所思、所言、所行，来探讨其与民国教育界多重关系，来把握郭秉文在民国早期教育转型中的角色、作用与地位。需向读者特别说明的是，一篇小文是无法对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的关系作一全面论述，本文所能补充的，只是就前人研究中相对薄弱的几个侧面，诸如民国教育界何以成为一个新思想运动的中心“场域”？郭秉文何以能成为民初教育界的中心人物，背后的资源何在？其办理南高东大，除了实际业绩外，对近代中国学术的派分等“虚”的一面影响若何？1925 年郭秉文离开中国教育界，当作何评价？对于前人研究相对比较丰厚诸如郭秉文的教育思想与办理东南大学的业绩等问题，本文则多作为背景作简单的引述，不再重复展开了。

二、媒体与社团：郭秉文与民初国内新教育界

郭秉文活跃于民国早期教育界的年代（1914—1925）正是中国现代教育转型的关键时代。中国教育界面临的主要难题，正是新旧、中西并立与竞争的问题，正如当时教育家程其保先生所总结，民国早期中国教育存在三大隐忧：新旧两势力的冲突；大小团体的冲突；真伪是非的冲突。[①] 这样一个时代正是教育转型关键时期，为各种教育的思想试验提供了难得的交锋机会与实践舞台。一大批抱“教育救国”理念的新知识人，充分运用清季以来现代报刊新媒体的新阅读空间，广泛地宣传与鼓吹新教育运动，其中留美归国学生为主体创办的《新教育》等新媒体更是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不仅为各种教育理念发布与实践总结提供一个公共平台，亦使教育的新理念得以广泛的传播，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回应，使得一批留学归国的新知识人很快成为影响全国的教育公共知识分子，这一个庞大的群体为“新教育界”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可以说，民国早期，也是现代中国教育家群体成长最为迅猛的一个阶段，大都从这一时期开始推行其教育思想与实践。对民国教育影响深远的教育家，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张伯苓、黄炎培、陶行知、陈鹤琴……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

① 程其保：《教育界的隐忧》，《中国评论》1925 年第 1 卷第 11 期，第 13－14 页。

本人所讨论的主人翁郭秉文。

1914年郭秉文即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时，即被南京高师校长江谦聘为该校教务主任，因此由外而内全力投身于中国教育界，很快在中国教育界引起极大的关注，并成为其中最为活跃的教育家，个中原因当然离不开时代的需要和个人的追求，此外如果从关系网络的角度来分析，还有两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其一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育理念及其毕业生在中国教育界的影响力。郭秉文毕业的学校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这所大学正被誉为世界新教育研究中心的机构，这所师范学院对中国新教育运动影响极为深远，有研究者称“中国教育体系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控制和指导”①。以杜威、孟禄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随着哥伦比亚大学一批留学生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回国，很快传入中国，并迅速在教育界、思想界占据支配的地位，成为民国早期中国“新教育运动”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重视社会的改造和实践的训练、重视思维在教育中的突出地位，这些对中国新教育的影响尤其深远，成为当时其弟子们在中国不断宣传与实践的金科玉律。更为难得的是，他是留美第一个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民初崇尚西学的世风下，他的这一身份也为其在民国教育界大展拳脚提供了一个巨大便利。

其二是郭秉文回国之初即得当时教育权势影响最大的社会团体——江苏教育会的支持。郭秉文回国后即担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并于1918年正式提升为南京高师校长。他还同时在江苏教育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基会等教育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很快成为民国早期新教育运动中最为活跃的教育家。众所周知，江苏教育会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团体之一，对近代中国教育影响极为深远，中山大学桑兵教授甚至称江苏教育会为清末民初影响中国近代教育三大枢纽之一，其影响力更是“主导全国教育界”②。郭秉文活跃于民国教育界的舞台，背靠江苏教育会无疑是其中至为关键的因子之一。此外，他亦为一虔诚的基督徒，与中外基督教教育团体关系密切，而民国早期教会在中国教育界势力大、影响广。如，1921年夏，北美教育团体会议决定组织教育考察团，后英国加入，派出教育家来华考察，并邀请国内华人教育家参与其中，受邀请的大学校长只有两位，即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与南开校长张伯苓，个中缘由，除了南高的

① [加]许美德、[法]巴斯蒂主编：《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5－76页。
② 桑兵：《大学与近代社会——栏目解说》，《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59页。

办学实绩与声誉外，亦与郭秉文的基督教身份有关。郭秉文兼具本土与外来两种人际网络资源于一身，这在民国教育界并不多见，这些因素无疑为其很快成长为民国教育界的中心人物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当然，郭秉文之所以影响民国教育界，根本还在于他的教育理念与行动体现了时代的脉搏，其教育思想与实践正成为当时中国新教育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呈现出以下的特色：

1. 倡导自由主义的新教育思想

民国肇始，共和教育为核心的新教育逐步推行，新旧教育激烈冲突，尤其是袁世凯上台后，推行尊孔读经，一时旧势力颇具声势。不过，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民主与科学的时代精神在教育界广泛接受。郭秉文走在时代潮流前列，与蔡元培、胡适、陶行知、张伯苓、蒋梦麟等一道，推行教育民主化、国际化和中国化的新教育理念，积极改造中国的传统教育，倡导共和国民的道德建设，在教育实验中引导新科学方法的应用，努力建设适合中国国情又与世界教育合拍的现代教育。在新教育运动中，郭秉文成为其中一位不可或缺的中心人物。

郭秉文在归国初期，即撰写完成《学校管理法》一书，全面论述学校管理的原理体制和训练方法，其目的首先在于国民新道德的推行，建立起与共和新制配套的管理教育方法，积极推行共和国民的教育。归国初期他在江苏省教育会的专题演讲中，明确呼吁教育家自觉地承担起培养国民新道德的重任。“夫欲培养国民之道德，为巩固民国之基础。非当今吾教育界之惟一大问题乎？共和国民不当以刑威，不可以法制，而宜以德道之。学生者未来之国民也，不先有以培养之，则今日为不道德之学生，安能他日为道德之国民乎？是故当今吾国之教育家，如不欲培养国民之道德为民国之基础也，则亦已耳。否则，此惟一之大问题不能竭尽心力以解决之，将谁负其责，而谁任其咎也？”[①]共和国民教育新理念，成为郭秉文一切教育思想的出发点，这种观念集中反映出民初中国社会转型对教育思想领域新的时代吁求，成为现代中国新国民教育的先声。

郭秉文共和国民教育思想，在他办学的主要阵地——东南大学得到极大的发扬。过去学术界有一误解，将东南大学的“学衡派”纳入保守主义的派别。其实，学衡派对于现代文明所倡导的民主与自由等现代性的政治观念并不排斥，相反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如作为郭秉文办事东南大学的主要助手、时任东南大学副校长的刘伯明，就先后在《学衡》上发表《共和国民之精神》和《杜威论中国思

① 郭秉文：《学校教育法》（在江苏教育会演讲之讲义），《教育杂志》1914 年第 6 卷第 12 期，“演讲”栏第 1 页。

想》等论文，对于科学与民主等理念抱有和《新青年》一样的热情。刘伯明认为："新文化之运动，确有不可磨灭之价值"，对于五四运动的原因和意义也有真切的认知，他说五四运动是"激于世界之民治新潮，精神为之舒展，自古相传之习惯，缘之根本动摇"，其意义在于"新潮漫溢，解放自由之声，日益喧聒"，结果使得社会发生"激烈之振荡，而后能焕然一新"。进而，他提出与五四运动相一致的"共和精神"，提出"共和精神非他，即自动的对于政治及社会生活负责任之谓也"，并主张共和国民应当同时具备自由和负责任的精神，即"余观之自由必与责任合，然后有真正之民治。仅有自由，谓之放肆任意任情而行，无中心以相维相系，则分崩离析，而群体迸裂。仅负责任而无自由，谓之屈服，此军国民之训练而非民治也"①。显然，这些思想与郭秉文是一致的。此外，郭秉文对当时引入西方校友会制度时，亦借机发挥其国民教育思想，特别倡导"合群"精神，他在南高校友会杂志中提出"人者能群之动物也，其群或大或小，要必有共同之精神贯注弥漫于其中，夫而后其群可以强固，而遂其滋长发荣之能。学校者，亦群之结合也，故其盛衰兴废亦惟校内共同精神之有无强弱"②。"立会宗旨在崇尚情谊，砥砺道德研究学艺，修炼才识，培养坚强之体魂活泼之精神。"③这些思想的背后都浸润着共和国民教育精神。

学界共知，郭秉文新教育思想的主要源头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郭秉文从杜威思想中汲取最多的是以下两点：一是杜威的自由主义思想；二是美国大学与社会结合的思想。郭秉文曾多次强调知行合一论，如对于道德教育，他提出"非独知之且宜行之，是谓知行合一"④。1918 年，他在南高提出"本校训育采取训练与管理兼重主义。训练注意启发，使知其所以然，管理注意实践，使行其所当然，二者交相为用，以期知行合一"⑤。同时提醒"吾国今日教育最后之一重要问题不可不特别注意者，曰教育有关系于受者之生活问题是也"⑥。暑期讲习所一直是郭秉文所倡导的，他 1921 年在演讲中专门提出："大家利用这机会，得新知识，并且大家可以讲道论理，把许多专家集合在一起，犹如一个总发电处，将来分布于各地，则是各个之发电池。"⑦这些均可见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

① 刘伯明：《共和国民之精神》，《学衡》第 10 期（1921 年月）。
② 郭秉文：《发刊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8 年 1 卷第 1 期，第 3 页。
③ 郭秉文：《校友会成绩报告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8 年 1 卷第 1 期，第 11 页。
④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第 89 页。
⑤《代理校长郭秉文于本校概况报告书》（1918 年 10 月），收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54－55 页。
⑥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第 102 页。
⑦ 郭秉文讲，华超记：《暑期讲习所及国语统一之重要》，《教育杂志》第 13 卷第 11 号，1921 年，第 4 页。

子。在实际的办学中，郭秉文将杜威的教育思想转化为“三育并举”的办学方针。在南高师担任教务主任时，郭秉文就曾协助校长江谦制定了“三育并举”的育人方针，日后在担任东南大学校长时，更将其不断完善，他主张通过训育、智育、体育三者并举，使学生“养成对于国家负责任之国民为意想中之人格”，“能思想以探智识之本源，能应用以求智识之归宿”和“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①。

在推行新教育运动中，郭秉文团结了一大批留学美国拥有新理念的教育新锐，在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任教的学人，就有陶行知、陈鹤琴、孟宪承、廖世承、郑宗海等，这些新学人能聚合于南京高师，多源自于郭秉文的新教育思想吸引。陶行知就是一例，早在 1916 年夏天，陶行知在与郭秉文接触后，服膺于后者的新教育理想，在美国期间就急迫地想尽早回国协助郭秉文工作。陶行知后来如愿进入郭秉文领导的南京高师，并被委以教务主任的重任，从此，陶行知渐渐发展成为新教育运动重要领导者。

2. 组织新教育社团，广泛联络教育界

郭秉文时代最为重要的新教育团体当属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出现是在《新教育》杂志社与实际教育调查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 1918 年底，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发起成立“中华新教育社”，并创刊《新教育》杂志，郭秉文被推举为几个主要的编辑之一，与刘伯明、陶行知、朱进一道成为该刊的南京高师编辑代表。该刊前后三位编辑蒋梦麟、陶行知、徐则陵，主要作者群陶行知、俞子夷、蒋梦麟、郑晓沧、胡适、陈鹤琴、郭秉文等，均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有学者统计在《新教育》杂志上发稿 5 篇以上的作者共 31 人，其中哥大师生占总数的 45％以上，因此可以说，《新教育》杂志是留学生特别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同仁杂志”。② 该刊先后发行过“杜威号”、“孟禄号”，宣传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成为当时新教育运动的主要阵地。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份杂志与南京高师关系尤其密切，不仅三位主编中有二位出自南高，主要作者群中大半亦出身南高，作为南高校长的郭秉文正处于哥大毕业生与南高同仁的交集点，其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更是他人难以企及。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源头之二是实际教育调查社。郭秉文倡导“教育事业之改进，不能凭玄想与空谈，非先实地调查，洞察现状，严密批评，提出解决办法，无从进行”③。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1921 年夏，郭秉文与当时中国最为著名的南

① 郭秉文：《代理校长郭秉文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载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研究室编：《郭秉文与上海商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1、113、115 页。
② 周晔：《〈新教育〉与中国教育近代化》，《高等教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89 页。
③ 郭秉文：《十年之教育调整》，《新教育》1922 年第 4 卷第 3 期，第 369 页。

北教育家严修、范源濂一起发起成立“实际教育调查社”，并积极推动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博士来华从事调查事宜，设计的范围包括：教育行政机关、各种学校、教师训练、学校经济、学校设备。

1922 年 12 月，为联合国内新教育各机关，郭秉文与蔡元培、黄炎培诸先生一道促成实际教育调查社与新教育共进社及新教育杂志社合并改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郭秉文当选为九名理事之一，与当时著名教育家及社会活动家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湘宸、袁希涛一道成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领导层。事实上，中华教育改进社很快成为继中国教育会（1902 年）、中华职业教育社（1917 年）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民间教育团体，出版发行《新教育评论》杂志，建立更为广泛的教育网络。《新教育评论》宣称其创刊宗旨在于：“根据民治的精神，科学的态度，评论教育思想与实际两方面之问题，以谋教育之改进。”其办刊的方针：“（一）批评本国现时教育上之政策；（二）建议今后本国教育上各种革新的计划；（三）介绍和批评外国最新的教育制度和学说；（四）报告各地教育调查的结果。”[①]显然，这种新教育批评空间的建立和新教育实践的推广，对于民国新教育界的成长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新教育社团与媒体成为中国“新教育运动”高潮期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郭秉文都深度参与其中。

新教育的推广与普及是民国初期中国教育的时代追求与时代精神的体现，作为时代教育的引领者，郭秉文对职业教育尤其关注。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年会日刊的发刊词中专门论及教育发展方向，他指出：“若今日国家社会之纷扰，则生计之压迫为之总因。根本补救，惟在职业教育。如裁兵问题，失业问题等，无不与职业教育有关。”[②]在第一届苏浙皖赣职业学校出品展览会时，郭秉文聘任审查委员，提出两条标准：一有教育的价值，包括有创作之精神、美术之观念、技术之改良；二应社会之需要，包括增裕生活、有益社会。[③] 这种总结与提升职业教育的标准，引导社会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同时，郭秉文亦对教育普及十分重视，1920 年他最早在南京高师开办暑假讲习所（即暑期学校），目的就是要利用假期的教育资源，以提高在职的中小学老师的素质，实现教育的普及工作。他亲自为学员上课，还邀请北大胡适、陈衡哲等名教授来校讲课，学员人数多达千人以上，遍及全国十七个省份，影响广泛。

---

① 《伟大的教育界舆论机关》，《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25 年第 1 卷 4 期，第 85 页。
② 郭秉文：《第一次年会日刊发刊词》，《新教育》1922 年第 5 卷第 3 期，第 729 页。
③ 郭秉文：《第一届职业学校出品展览会审查委员会报告书》，《教育与职业》1922 年第 34 期，第 25 页。

今日留下的《南京高师日刊》等珍贵的史料，就大量刊载南京高师暑期学校的消息。其后，南开大学等大学也跟进，相继开办暑期学校。在担任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的校长期间，他充分利用大学的雄厚师资和办学条件，因地制宜进行教育推广工作。为推广平民教育，郭秉文还义务举办“昆明学校”、“明夷小学”，为城市平民和乡村失学儿童进行义务教育。为推广农业改良，他利用南高和东南大学农科雄厚的师资力量，义务组织农村巡回演讲团，农业展览会，不仅进行了一般性的农业科学知识的普及，还重点进行优良品种的改良推广，并引领其他学校跟进。同时，他还坚持举办商科夜校、商业实习学校、补习学校，多为免费或近似于免费的义务教育。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民国最为活跃的教育家，作为媒体社会关注的焦点人物，对于许多社会文化热点问题，他多能从教育民主化（普及）等新的角度来谈及特殊的意义，如对于当时国语统一问题，他从教育家的立场出发，看到其巨大的教育普及意义，因此专门演讲推广，“推行国语用注意字母，使不识字的识字，教育可以逐渐普及，实在是很重要的。”“统一言语是强国的一种要素，而教育普及则更为重要。”①

三、考察与交流：郭秉文与国际教育界

作为中国留学美国并第一个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的教育家，郭秉文认为知识无国籍，科学无国界，一个民族欲使自己的文化永立于世界之林，还须除旧布新、融合中西，创造和发展新文化。因此对于开展国际文化之间的交流，他尤其重视。回国之初，他自觉地承担起介绍欧美教育新理念、新制度、新方法的任务，利用著述、演讲、报告等方式，向中国教育界翻译、介绍西方的制度等。同时，受政府与民间教育团体的委派，他先后多次赴欧美、日本等国考察教育，将国际教育经验带回中国，供国人参考。更为难得的是，郭秉文充分发挥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生的优势，主动联络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等思想家教育家来华考察中国教育，对中国当时兴起的新教育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郭秉文在国际教育界也获得了相当的声誉，成为中国教育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要代言人。可以说在民国早期的教育界，郭秉文在打通国际与国内教育的联络渠道方面，发挥了当时其他教育家不可替代的作用。

---

① 郭秉文讲、华超记：《暑假讲习所及国语统一思想之重要》，《教育杂志》1921年第13卷第11号，第5页。

1. 出国游历，考察各国教育

教育史专家田正平教授已考察出1912—1937年间，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教育考察人员的统计情况，其中1914—1923年间就多达14次[①]，其中郭秉文参加了其中重要的三次。

根据现有的材料，郭秉文最早系统考察欧美教育制度现状的时间，是1913年10月至1914年夏，郭秉文学成归国之前，受江苏教育会的委派，与俞子夷、陈容等在美国与英国进行教育考察，考察内容涉及范围广泛，重点在新的教学法应用方面。回国后，他将考察各国教育情况向教育界报告，为国内教育的变革提供国外经验的借鉴。他曾在江苏教育会作专门演讲，系统比较英美德法等国的学制，提出教育界应集中关注于改良课程、开展儿童卫生、改善学校经济三个“共同关注点”[②]。通过教育报刊与教育社团，他即时将欧美教育家的重要思想与动态等信息传播到国内教育界，其中重点引进、实践推广教学法，尤其是道尔顿制。

第二次是1917年1月8日至3月，历时两个月。受教育部的委派，出任教育考察团团长，率领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成都高师校长韩振华、武昌高师校长张渲、江苏教育会长黄炎培，以及实业家聂云台、基督教青年会领导人余日章等赴日本、菲律宾考察职业教育。回国后重点推广职业教育。

第三次是1919年3月8日至1919年9月20日，受全国高等专门以上学校及各省教育会的委派，与陶履恭考察一战后世界教育发展趋势。他们广泛游历英、美、法、意、瑞和日本，考察各国教育状况，每到一地，则与当地教育界咨询，“其关于教育事件，则载之笔记，用为他日讨究之助”[③]。此次访美期间，他先后调查檀香山教育概况、访谈美国教育局长克勒士顿博士(Dr. Clayton)、考察美国教育会议的缘起与事功等。他特别注意到美国近期日益兴起的职业教育，关注了美国教育家倡导的教育宗旨之一是“预备将来谋生之法”，重新理解美国教育宗旨与生活的密不可分[④]，这为他们大力倡导杜威等美国教育家的思想，提供了实践的背景。在日本期间，他与陶行知一道，会见日本教育家与主持教育官员，重点访问日本文部省教育调查会，重点考察日本教育改革进步之举[⑤]，并且将日本教育考察的报告刊登于国内教育媒体，指出日本近期教育改革进步表现在以下四点：初等中等教育之科学教授大加进步、体育加意讲求、女子教育之增高、推

① 田正平：《论民国时期的中外人士教育考察——以1912—1937年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第171－172页。
②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59页。
③ 郭秉文：《记欧美教育家谈话》，《新教育》1919年第2卷第1期，第41页。
④ 郭秉文：《记欧美教育家谈话》，《新教育》1919年第2卷第1期，第41页。
⑤ 郭秉文、陶履恭：《调查教育通信》，《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4月18日，第355期“附张”。

广职业实习教育[①]。其中不少内容成为中国新教育仿效的目标与方法。在日期间,他促成了杜威访华计划的落实,此事对中国近代教育影响深远(详后)。回国后,马上整理与各国访谈成果,向教育当局提交报告,除演讲外,还发表《战后欧美教育近况》系列考察报告,汇列刊布以供国内教育界参考,为中国新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与参考。

郭秉文的国际教育考察与报告,成为对照中国教育与国际先进之间的重要尺度,他专门撰文指出:"自欧战起后,世界各国对于教育咸起疑问:以前之方针,是否符合于世界之趋势,是否适应于国家社会之需要,无不希望在此改造期内,详慎研究,俾无遗憾。"由于中国今日教育的改革,不惟关系中国前途,而且因人口众多,教育方针制定必然影响世界,因此他提出中国教育变革要密切注意英美教育界这一动向,"我国教育上之政策,亦应注意是否适合于世界趋势,是否适应国家社会需要。如其未敢自信,则于教育上之改革,宜如何致力研究"[②]。有鉴于此,他其后在中国大力推行职业教育、生活教育、国民教育以及增设国立大学的倡议与倡导学术研究。

2. 邀请外国教育专家来华考察教育,谋求中国教育新进步

民国早期是国际教育界来华考察的重要时期。据田正平先生的统计,民国早期(1913—1922年)外国教育人士来华考察讲学多达10次,其中主要是美国(占其中8次)。[③] 对中国教育界、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当属杜威、孟禄、罗素等来华。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外国教育家来华的推手在民间,当时影响最大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而郭秉文等留美归国学生则负责联系、接待、陪同、宣传等的全程工作,对中国新教育的推进起了积极参与的作用,其中杜威与孟禄的来华更是与郭秉文直接推动相关。

杜威先生自1919年4月至1921年8月来华对中国十余省进行教育考察,并在华发表200余场演讲,在中国思想界、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初动议并邀请杜威先生来华的正是郭秉文。当时机缘巧合,郭秉文正受教育部的指派,前往日本考察教育,正值杜威先生在日本游历,于是当即邀请杜威先生到中国来,同为杜威弟子的陶行知给胡适的书信即称,"今日接郭秉文先生的信,他说到日本已经见过杜威先生,杜威先生并不是帝国大学的交换教授,不过游历的时候

① 《郭秉文陶履恭调查日本教育报告》,《教育潮》1919年第1卷第1期,第85-88页。
② 郭秉文:《战后英美教育近况》,《新教育》1918年第2卷第4期,第5页。
③ 田正平:《论民国时期的中外人士教育考察——以1912—1937年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第176页的"表2"。

带着演讲是了。郭先生请他到中国来，他就一口答应。”[①]事实上，郭秉文一行到达日本第二天即与杜威先生接洽，得到杜威先生首肯后，一方面代表中国教育界与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方协商杜威来华事宜，另一方面与国内的陶行知、胡适、蒋梦麟等商洽接待事宜，郭提出由北京大学、江苏教育会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三方代表共同邀请之法。[②] 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拥有郭秉文、陶行知等众多弟子，亦是新教育运动的重镇，自然南京高师是杜威来华讲学行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站。对于郭秉文的促成之功，有教育家如此评价说：“公为杜氏及门弟子，杜氏赴华讲学，公实促成，而杜氏教育学说之影响于中国教育甚钜，公有倡导传播之功。”[③]

其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部主任，同时身兼美国国际教育学会远东部主任的孟禄来华亦有郭秉文之功劳。在20年代，全力推动孟禄博士在华的主要机构为实际教育调查社。如前所论，该社发起人主要由当时中国资深教育家严修、范源濂、袁希涛、张伯苓及郭秉文等组成。郭秉文因与孟禄有着不同寻常的师生关系，孟禄曾专门为其博士学位论文作序给予高度评价，自然联络孟禄来华的实际工作就由郭秉文来担任。孟禄自1921年8月来华，在中国展开实际教育调查，先后历时4月，对于中国教育的批评，引起社会巨大反响。郭秉文亦在不同场合宣扬孟禄的教育思想，他借孟禄之口，重申“中国教育发达最大之障碍，为不良之政治”。其后他进一步申论：“孟禄此言，可云药石。政治与社会事业，休戚相关，决无废其一而举其它之可能也。故政治不良，教育实无从发达。近年教育界，鉴于政治活动之罪恶，又尊重职业的精神，多专力经营教育，目光悉注社会事业，以政治活动相戒。驯致政治之黑暗愈增，而己所从事之教育亦终被其害。经此番孟禄博士之提撕警觉，教育家当不忍再漠视其参加正轨的国民政治活动之天职。遇重大政治问题，当本其纯洁之意趣，缜密之思考，发为正当之言论或行动，为社会倡导。至于盲目的奔竞，或仕途之觊觎，则与教育家职业的精神相背驰，自不取耳。”[④]显然，对于教育与政治的思考，正是郭秉文时代中国教育家面临的主要难题。

此外，郭秉文利用其师友关系，说服其导师孟禄先生同意由“国际教育会”每年派遣教育专家来东大讲演或开设讲座，使郭秉文领导下的南高—东大的国际

---

① 《陶行知致胡适》(1919年3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33页。
② 《陶行知致胡适》(1919年3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34页。
③ 吴俊升：《教育与文化论文选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202页。
④ 郭秉文：《对于孟禄中国教育讨论之感想》，《新教育》1922年第4期，第676－677页。

学术交流活跃,“几成为东西文化、学术交流的热点,各国著名学者来华讲演、讲学,几乎必来南高、东大。”①

3. 代表中国教育界,活跃于国际教育舞台

万国教育会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教育界决定在纽约成立组织万国教育会议,作为了解国际教育之间的补充。郭秉文很为敏感,即时将万国教育会议宣言等教育资料翻译成中文在国内杂志刊登,贡献于国人②,培养教育上的一种开放学习的风尚。正是由于在当时中国教育界巨大的成就和影响力,郭秉文亦被国内教育界推举为国际教育舞台上的主要代言人。1923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6 日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万国教育会议。出席者有 60 国之多,中国政府与民间教育团体十分重视,推举郭秉文为首席代表出席大会,并提交《中国代表团报告书》。在离开中国前,郭特别指出这是国民外交的重要举动,他在上海商科大学发表演说,提出此次参会目的在于传播中国近年教育状况,报告中国教育的进步。③ 开幕之日,郭秉文即发表主题为“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应以教育促进世界和平”演说,因主旨鲜明,态度诚恳,颇获好评。④ 这次会议正式成立了“世界教育联合会”⑤,他当选为二位副会长之一,这是中国教育界在国际得到极大肯定的一件大事,陶行知先生称:“到会者实有五十余国之多,而我国代表,竟得此荣誉,实为空前未有之举。”⑥ 7 月 2 日,他在万国教育会议太平洋组上专门发表《太平洋各国大学如何最能增进国际了解与友谊》的演讲,进一步倡导和平教育理念,提出具体的方法为:“所谓交换教授、交互留学、交互访问、交换出版物、发起合办教育事业、增加外国文明之课程、研究国际问题、培养大同主义之精神,以及组织万国大学联合会皆是。”⑦在 20 世纪 20 年代,郭秉文连续三次作为中国教育界的首席代表出席世界教育会议,并连续被推举为世界教育会的副会长,成为中国教育界在国际教育界舞台上的主要代表和发言人,亦为中国教育界在国际舞台上赢得较高的声誉。即使因 1925 年东大易长风潮而被迫离开中国教育界后,他仍在美国创办华美协进会,努力传播中国的教育与文化。可以说,在 1920 年代的国际教育舞台上,郭秉文成为当仁不让的中国教育界最重要的代表。

---

① 郭秉文:《五十年来中国之高等教育》,申报馆编《最近之五十年》,上海申报馆 1923 年,第 152 页。
② 郭秉文:《欧美教育新资料》,《新教育》1919 年第 2 卷 1 期,第 77 - 80 页。
③《郭秉文赴世界教育会之谈话——中国方面之准备》,《商大学生欢送郭秉文》,分别载《申报》1923 年 5 月 30 日、6 月 5 日。
④《美国全国教育联合会与世界教育会议》,《教育杂志》1927 年第 10 期。
⑤《世界教育会议我国代表之活动》,《爱国报》1923 年第 4 期,第 34 - 35 页。
⑥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 1 卷,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第 539 页。
⑦ 郭秉文:《太平洋各国大学如何最能增进国际了解与友谊》,《教育与人生》1923 年第 5 期,第 4 页。

四、“双峰对峙”:郭秉文与南高学风

如果就教育实绩而论,接办南京高师和创办东南大学毫无疑问是郭秉文教育事业的高峰。郭秉文筚路蓝缕,将“寓师范于大学”理念变成现实,创立现代中国第二所综合性国立东南大学,并成功将美国大学模式引入中国。在“四个平衡”的办学思想指导下,他长袖善舞,在军阀割据、教育经费奇缺的年代,成功地将东南大学办成与北京大学齐名的国立大学,二者之间形成了二十年代中国大学特有“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如有研究者称北大与南高的学术文化之争称为民初教育界的“蜀洛之争”①,这种现象对民国教育学术影响深远。学界对郭秉文执掌东南大学的曲折过程及其思想已有相关深入的研究②,这里笔者认为,要认识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的关系,还须从中国现代大学的整体“场域”出发,采取比较的视角,将郭秉文所创办的南高—东大与北大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注意这两所大学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学术风格的竞争与交流,从更为长远的时段中,才能真切把握郭秉文对民国教育界的影响力。因此,这一部分笔者有意简略郭秉文办理南高—东大的实际举措,而重点分析他与南高学风形成的关联,及南高学风对于现代中国教育的影响。

东南大学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界迅速崛起,并成为现代中国学术重镇,毫无疑问与“东南大学之父”——郭秉文息息相关。郭秉文办学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要是个人主义,表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他的自由教育思想分为向内与向外两个向度:向内而言,即对于学生的教育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方式,其要点为:在教育目的上崇尚个性主义,促进个性的自由发展,典型地表现在学生训育方法上。1918年他提出六条原则:利用天性之原则、触发统觉之原则、引起兴味之原则、应用暗示之原则、选择思想之原则、养成习惯之原则。③ 当然这种对内自由的教育方法,他是有限度的,特别是从过去严厉管理制度过渡到学生自治时代,“其过渡当以渐,庶无放纵扰乱之虞”④。就对外而言,则主要是教育要脱离政治,即在教学过程中坚持学术自由,要求学术超然于政治和宗教,包

① 罗志田教授语,见其《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91页。
② 除前引冒荣先生专门著作外,其他还有校史类:朱斐主编《东南大学校史》(第一卷)(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拙作《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21—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亦有论及。
③《代理校长郭秉文关天本校概况报告书》(1918年10月),收入《南大百年实录》上卷《中央大学史料选》,南京出版社2002年,第55页。
④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90页。

括思想言论自由和教学研究自由。从总体上看，郭秉文担任校长期间，一度推行比较温和的改革，提倡学术自由，主张学校远离政治，但他最终还是渐渐趋向政治上的保守，对于20年代国民党势力的日益扩张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

作为第二个国立大学的东南大学，与第一个国立大学的北京大学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与北京大学效仿德国模式不同，东南大学主要效仿美国大学模式。二是东南大学崇尚古典主义和人文主义，而北京大学力主新文化。两所大学地处南北，办学风格迥异，学术风格上形成强有力的竞争，东南学风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当时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与北大新文化一起构成了20年代中国"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学术格局，影响深远。

东南大学创办后，郭秉文对于东南大学学风的形成有引导之功，其办理东南大学理念中最为显著的特色就是大学与社会协调的平衡，即"四个平衡"的办学理念，也就是"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和"国内与国际的平衡"①。其中对于中西文化，他主张发扬民族精神、沟通中西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应当作更深入的研究。在郭秉文的倡导下，一方面，校园内涌现出了史地研究会、学衡派、国学研究会等校园人文性学术社团，出版发行《史地学报》、《文哲学报》、《学衡》等新报刊，广泛地传播人文主义理念；另一方面，在郭秉文的大力吸引下，创办于美国的留学生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也转移至东大校园，其成员如竺可桢、胡刚复、杨杏佛等进入东大，倡导科学研究。这种聚合人文与科学于一炉的办学理念，日渐催生强烈的南高学风：朴实刚毅的学风、中西文化兼顾、人文与科学相融。30代中期，南高学人自己就对郭秉文时代的学风进行总结时，将其归纳为：保持学者的人格、尊重本国文化、认识西方文化、切实研究科学。② 显然，南高学风的形成，正是郭秉文"四个平衡"教育思想在南高—东大开花结果的表现。

就整体而言，南高学风的形成多少有直接针对北大学风的深意。新文化派之所以能迅速取得全国文化领导权，关键在于以群体运动的方法提倡文化，并在全国的青年中引起巨大共鸣。③ 当时东大的学衡派对北大的新文化派的提倡新

---

① 张其昀：《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收入"国立中央大学建校七十周年纪念特刊"：《中央大学七十年》，台北：七十年特刊委员会1985年版，第75－76页。

② 郭斌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二十周年纪念之意义》，《国风半月刊》第7卷第2号，1935年9月，第1－4页。

③ 桑兵曾专门指出：学者论证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时，每以思想与学术相混合，如果由此而判断学术的水平与影响，则容易犯以众从的范围来判断高下的毛病。今人论胡适在现代中国史上的地位，每以思想与学术混合，结果将其思想史上"暴得大名"以致众从与其学术影响相混淆，反过来再以影响的广狭，论证学术的成败以及高明与否。（桑兵：《横看成岭侧成峰：学术视差与胡适的学术地位》，《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46页。）由胡适推及整个新文化派，这一现象均有表现。

文化(尤其是新学术)的动机与方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就动机而论,梅光迪称新文化派"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他认为:"学问家为真理而求真理,重在自信,而不在世俗之知;重在自得,而不在生前之报酬。故其毕生辛勤,守而有待,不轻出所学以问世,必审虑至当,而后发一言;必研索至精,而后成一书……今之所谓学问家则不然,其于学问,本无彻底研究与自信自得之可言,特以为功利名誉之念所驱迫,故假学问为进身之阶。"[①]就方法而言,学衡派尤其反对新文化派用所谓运动群众的方式,运动青年学生传播伪学,认为这种学术平民化的趋势只会导致学术文化倒退:"彼等以群众运动之法,提供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党徒,无所不用其极。"而事实上学术之事则多依赖于少数个人天才大师,"故倡学大师,每持冷静态度,宁守而有待,授其学于少数英俊,而不汲汲于多数庸流之手,则误会谬传,弊端百出,学术之真精神尽失……今之学者,非但以迎合群众为能,其欲所取悦者,尤在群众中幼稚分子,职中小学生之类。吾国现在过渡时代,旧智识阶级渐趋消灭,而新智识阶级尚未成立,青年学生为将来之新智识阶级,然在目前则否也。而政客式的学术家,正利用其智识浅薄,无鉴别审择之力,得以传播伪学,使之先入为主。"[②]针对北大新文化派的活动,梅光迪提出真正学者的标准:"真正学者,为一国学术思想之领袖,文化之前驱,属于少数优秀分子,非多数凡民所能为也,故欲为真正学者,除特异天才外,又须有严密之训练,高洁之精神,而后能名副其实。"[③]柳诒徵其后专门撰文,批评当时者多专营"术"而忽视"学",并对学者产生之法进行分类,"学者产生地有两种,实验室、图书馆一也,官厅、会场、报纸、专电、火车、汽车二也。前者有学而无术,后者有术而无学。潮流所趋,视线所集,则惟后者为归。故在今日号称不为官吏,不为政客,不为武人,不为商贾,而自居于最高尚最纯洁之地位之学者,其实乃一变相之官吏,特殊之政客,无枪炮之武人,无资本之商贾,而绝非真正之学者。官厅所见此等学者也,会场所见此等学者也,专电所登此等学者也,终日奔驰于火车汽车而不息此等学者也。此等学者愈多,教育愈坏,学术愈晦,中国愈乱,乱而学者之术愈进步。"[④]根据有学无术与有术无学将学者区分为二类,前者难而不显,后者易而实惠,批评锋芒所向,尤指北大新文化派胡适一系有术无学。学衡派诸人对北大新文化派学风的批判,得到东南大学史地系学生的极大响应,他们批评说:"近来自号新文化运动者,大都浮浮在信,稀为专精之研究。即其于所常谈之文哲诸学,亦仅

①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② 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学衡》第2期,1922年2月。
③ 梅光迪:《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学衡》第4期,1922年4月。
④ 柳诒徵:《学者之术》,《学衡》第33期,1924年9月。

及表面，而于专门学科，益无人过问；循是不变，将使名为提倡文化，而适以玷辱文化。”故他们决定组织中国史学会，“促进实学之研究”①。

学风的出现实际上表明一所学校传统的形成，若从人员构成而言，则形成所谓“派”。正如30年代初有人回顾总结说：“国内大学，大都有一种传统观念，故每一所大学，有其特殊之系统。近之所谓‘北大派’、‘师大派’、‘东大派’、‘高师派’等等，虽为不幸之名词，但在一部分人心目中，已成一种之事实。观念既深势难得彼此融会之利益。”②正是这种学术上的地缘与派分，造成了20年代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南北两峰对峙的格局。

30年代初周谷城评论说：“从前北大曾新极一时，凡奉行新教育主义的，当然到北大去。与北大对抗的有南高。那么反北大，而且专拜古典主义的，当然到南高为好。在教育界能因主义不同而树党派，不仅不是坏事，简直是好现象。”③周氏所论，显然是受到北伐迁都后中大与北大地位转换的影响，不无可商之处，尤其称提倡新教育主义都到北大去，更与历史事实不符。五四时期南高——东大在推行新教育主义方面，并不落在北大之后，以《新教育》杂志为中心，团结了一大批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尤其以蒋梦麟、郭秉文、胡适、陶行知、孟宪承、郑宗海等为代表，共同倡导杜威的教育思想。除了胡适、蒋梦麟等大力介绍杜威的教育思想外，南高学人也大力将杜威的教育思想引入中国，如郑宗海专门撰写《杜威教育主义》，称“今日教育思潮之领袖，当推约翰·杜威”，并从“何为教育”、“何为学校”、“教育之材料”、“方法之性质”、“教育为社会进化及改良之根本法则”五个方面，全面介绍杜威的教育思想。④ 不久，如前文所述，以《新教育》杂志为中心，北大、南高、南开、暨南等校联合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共同推动新教育在中国的实践。因此，上引周谷城所论，的确与史实有相当的出入。不过，周谷城文中所提及的南高与北大的对抗，主要指的就是北京大学《新青年》派与东南大学的《学衡》派之间的论战，并且将二者并提为20年代中国学术文化派分的重要指标，确有见地。张其昀晚年回忆说：“民国八年（1919年）以后，新文化运动风靡一时，而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中心的学者们，却能毅然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世人对北大、南高有南北对峙的看法。”⑤南北两大学之间主义不同而形成对立，时人有“北大尚革新，南高尚保守”之语，据当时的知情人

① 陈训慈：《组织中国史学会问题》，《史地学报》第1卷第2号，第2页。
② 程其保：《论大学校长》，《时代公论》第7号，1932年5月13日，第10－11页。
③ 周谷城：《官场似的教育界》，《社会与教育》第5期，1930年12月13日，第1页。
④ 郑宗海：《杜威教育主义》，《新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3月，第129－137页。
⑤ 张其昀：《吾师柳诒徵先生》，《张其昀先生文集》第9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8年，第4712页。

说,“其说盖起于胡适之”[①]。

自南京高师成立以来,北大南高(含东大)隐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重镇。在学术风格上,东南大学持其所特有的古典主义风格,倡导文化民族主义,逆北大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潮流而动,独树一帜,在学术文化上与北京大学分庭抗礼,成为20年代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东南大学“学衡派”的形成轨迹十分类似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的聚结。如果说北大“新文化派”的出现与蔡元培的用人之道不无关系,那么东南大学“学衡派”的出现与郭秉文的办学原则和刘伯明的引进人才有直接渊源。蔡元培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办学原则,聘请陈独秀入北京大学,陈独秀招引胡适到北大,从而形成北京大学内的《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群体,并引导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同样,郭秉文以“四个平衡”为办学的基本方针,尤其注重人文与科学的平衡,既注重大学里的人文与自然两大学科的平衡,又在引进西洋文明的同时,注重提倡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刘伯明聘请梅光迪入东南大学,继而梅光迪招引吴宓,并主持《学衡》,进而形成与北大“新文化派”抗衡的学术文化派别。

20年代北大与南高在学术上的分歧,给世人留下学分南北的印象,其中主要表现在文化观念与学术研究理路诸方面,“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文化论争和整理国故中的南北异趣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例证。两所大学倡导的文化风格相异,北京大学以《新青年》、《新潮》为主的杂志提倡新文化,而南方学术重镇东南大学的学人以《学衡》、《史地学报》为中心提倡古典人文主义。正如美国学者傅乐诗在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大的关系时称:“大学造成了各团体的结合;大学为此结合提供了大部分的参与者,并给他们同样的社会地位和影响。”[②]张其昀后来在台湾华冈创办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的前身)时,回忆北大与南高竞争的这段历史,作过这样的比较:“民国十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有南北对峙的形势。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而南高则是人文主义的大本营,提倡正宗的文化。Classics一字,一般译为经典,南高大师们称之为正宗……本人在南高求学期间,正当新文化运动风靡一世,而南高师生,主张融贯新旧,综罗百代,承东西之道统,集中外之精神,俨然有砥柱中流的气概。南高北大成为民国初期大学教育的两大支柱,实非偶然。”[③]这多少有点夫子自道的意味,北大东大

① 张其昀:《刘伯明先生逝世纪念日》,《国风半月刊》第9号,1932年11月,第68页。
② [美]傅乐诗:《五四的历史意义》,周阳山编:《五四与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年,第293页。
③ 张其昀:《华冈学园的萌芽》,《张其昀先生文集》第9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部1988年,第9038-9079页。

并称，还在于二者同为新教育运动的重要基地，其分歧也只是在“新”之下的分歧，决非所谓“新旧”之分可以概括得了的。事实上当时南北大学的学术文化之争，集中反映出当时学术自由的一面，正如《新教育》评论说：“文明之进步，赖自动的领袖，自动的领袖赖高等教育之思想及议论自由之养成之。‘大学学问自由’（Academic Freedom）之主张已成为欧美先进国家学问之大宪章。”①

20年代早期南北两大学之争，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派系之争的先河。30年代初《大公报》就有一评论：“民五以前，教育界原无党派之分，从事教育者，共皆纯洁自守，孜孜以熏陶青年为职志。别无利用青年之念产，更不杂些政治意味。民六以后，北大声誉日著，渐有笼罩全国之势。当时东南学阀，虽在地方崭露头角，隐操学权，而与北方之北大领袖人物尚能保持协调，维持南北策应之局面几及十年。”②虽然话语中充满了国民党上台后对郭秉文与江苏教育会的诋毁之意，但也部分反映了民国十余间年中国南北教育学术的基本格局。事实上，五四新文化之后北大与南高既有竞争的一面，又有合作协调的一面，这当是理解当时多为南方出身的知识界复杂多面的关系一把钥匙。的确，在探讨北大、东大学风竞争的同时，应该注意到还有一大批教授学人不曾参与学派其中，而游移于派系的门户之外。事实上二者之间依然存在很大程度的同一性与相似性，尤其二者同为民初倡导新教育运动的两大主阵地，无论其成员的籍贯、地缘，还是教育理念，均有相当程度的认同，只是到了北伐以后，南北大学地位转换，时人回首观察此段历史时，往往放大了二者之间的分歧，以致留下南北学术完全对立的印象。

郭秉文时代塑造的南高与东大，与蔡元培时代塑造的北大，成为民国早期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代表，其学术风格与地缘派分影响及于整个民国时期。兹举一例来说明，1962年胡适在台北去世，社会各界纷纷撰文纪念，南高毕业生张其昀回忆说，1954年他出任台湾“教育部长”时，胡适曾对南高老校长郭秉文戏言——“南高征服了北大”，郭秉文严正地回应：“学术为公，再不可有门户之见。”③胡、郭二氏一谐一庄，语及“南高”、“北大”及“门户”等语，实牵涉到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学术的一桩公案，即民国时期北大与南高—东大—中央大学学风的歧异与竞争。这一史实影响到1949年以来学人对海峡两岸学术文化走向的评价，其中曹聚仁所言颇具代表性。早在50年代，曹聚仁就

① 《高等教育与思想及言论自由》，《新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3月，第1页。
② 《整顿学风》，《大公报》1930年12月8日，第2版。
③ 张其昀：《敬悼胡适之先生》，中国文化大学华冈学会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与思想》，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第324－325页。

有一观察:“过去三十年的‘世变’,真是伟大,其波澜之壮阔,比法国大革命、苏联大革命还要奇丽些,从文化的波澜,好似今日的中国大陆,乃是‘北大’系的天下,而台湾则是‘东南’系的世界,因此,‘学衡派’的思想正在左右草山的风雨。”[①]姑且不论曹氏所论是否确切妥当,其所揭示的“北大系”与“东南系”则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界不可忽视的两支重要力量,而二者的形成正是在郭秉文主政南高之际,因此可以说,民国早期中国的高等教育如果离开了郭秉文,实在是无法厘清的一段历史。

五、结语

民国早期教育界的形成,新式传媒、现代教育团体及新式学校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使教育界开始形成一种具有“公共空间”现代性场域,郭秉文不仅直接投身于这一场域的构建,深度参与其中,无论是在新式教育媒体、现代教育社团还是新式学校中,郭秉文都在发挥着积极的推动者、建设者的关键角色,在许多方面都留下其个性色彩的个人烙印。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郭秉文是现代中国早期“教育界”这一公共空间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郭秉文也是这一公共领域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不仅在场域中获得巨大的声誉,更是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取得巨大的成功。在民国早期的教育公共空间中,郭秉文处于留学生、传统教育会等新旧权力资源网络的中心位置,能极大地调动各种教育资源,如人力上的留学生、物力上的地方实业精英、国际上的教育名家,在与多方的互动中将其教育理念逐步落到实处,他亦成长为民国早期中国教育界最为“显赫”的权势人物,成为中国新教育运动的中心人物,其影响力透过传媒、社团与学校,不断影响到整个教育界,使民国早期中国教育处于一种不断寻求变革与发展的轨道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新教育运动的发展。

郭秉文与民初教育界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既是时代使然,亦得益于他所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背景。就前者而论,民国初建,共和制度与观念极大地影响到教育界,新旧思想观念、力量交锋激烈,新文化运动展开,随着留学生大批归国,新教育运动亦成教育现代性追求的主要特征。郭秉文学成归国正赶上这样一个教育革新的时代,使其所思、所学有充分发挥的舞台。就后者而论,郭秉文归国之初兼有学缘、地缘与业缘等多重关系网络优势,如第一个拥有世界新教育中心之称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头衔,得到影响全

① 曹聚仁:《学苑思故》,《天一阁人物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第 216 页。

国教育界的江苏教育会青睐，这双重资源成为郭秉文领袖群伦的重要资本。一方面，民国早期新教育运动中，留学生更是主导了其思想与进程，其中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生更是其中的引潮者。另一方面，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更是新教育运动的中心，正如日本教育史家阿部洋先生所指出："当时留美归国学生集中于南京高师及后来的东南大学，形成新教育的中心。"[①]作为前后两所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更是拥有了其他学人无法拥有的教育资源，这亦是郭秉文深刻影响民国教育界的两大原因。

正因如此，回顾郭秉文与民国早期教育界的关系，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给郭秉文作出如下的历史评价：他是民国早期新教育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实践者，亦是民国早期教育界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是中国教育界在国际上最重要的代言人。他所创办的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不仅成为新教育运动的中心，而且对于现代大学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郭秉文在中国新教育最为活跃的年代（1914—1925），也恰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思想文化界最为活跃开放、中国教育变革最为积极的时期，也是现代中国教育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各种教育思潮与实践在传播与试验，其中美国教育家杜威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与试验毫无疑问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支。民国早期的教育界亦是自由主义教育的时代，这与民国早期中国政治生态格局息息相关，那虽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教育的经费常呈现奇绌的景象，但政治势力对于教育界无力顾及，因此造就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界与教育界，郭秉文与民国早期教育界的关系也只能存在于这样一个时代。随着国民党力量的崛起，在教育界大力推行"党化教育"，郭秉文所代表的自由主义教育潮流走向了终点，1925 年发生在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潮"，即是郭秉文被迫离开中国教育界的象征。

1925 年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潮"，就其实质而言，是国民党人侵蚀地方自治力量的结果。1925 年元月郭秉文的免职，是 20 年代中期中国内部政治发展过程中军阀政治与政党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内部政权更迭的结果。[②] 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讲，郭秉文免职之事的意义已超出了郭作为"国立东南大学之父"的个人悲剧范围，对这样一位现代教育思想主要输

---

① [日]阿部洋：《美中教育交流的轨迹：国际文化协力的教训》，霞山会 1986 年第 9 页，转引自前引周畔文，第 89 页。

② 相关研究可参见吕芳上：《学阀乎？党化乎？民国十四年的东南大学学潮》，台北《国父建党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第二集，1995 年 3 月，第 127－160 页。储朝晖：《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牺牲者郭秉文与东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拙作《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第一章"东南大学国立化与地方社会、政党"亦有较多涉及。

入者的政治攻击，亦代表着新教育运动的终结。[①] 郭秉文命运的起伏，恰似中国新教育改革历程的缩影，在某种程度上说，郭秉文离开中国教育界，标志着民国早期新教育革新运动的结束，中国现代教育进入到一个“党化教育”的新阶段。

从此，作为国民党党化教育的牺牲者郭秉文基本上远离了国内教育界，再也无力直接引导、参与中国的教育实践，但他仍以两种间接的方式继续对民国教育界发挥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力。一种方式主要表现在国际上，在海外透过华美协进会等媒介，在其有生之年继续为美中教育与文化交流作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亦更为重要的是，郭秉文时代所形成的南高学风，流风余韵不仅影响及于整个民国时期的教育界、学术界，直到今天的中国依然可以看到他长久的影响力。

① Barry Keenan：*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P113.

教育独立之梦：大学校长郭秉文的选择与困境*

◎张正峰（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界开始学习借鉴美国的教育制度。大批从美国学成回国的留学生参与到近代教育改革中，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郭秉文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08年赴美留学，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聘请参与到学校的筹建中，并任教务主任。1919年正式出任南高师校长，1921年改建南京高师为国立东南大学，仍任校长。在筹建东南大学期间，借鉴美国高等教育制度，创建了国立大学董事会制度，为实现高等教育独立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探索。由于种种原因，他于1925年被北京政府免职，董事会制度也被取消。研究郭秉文的高等教育改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呈现上个世纪20年代的教育家们对于教育独立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及当时的历史困境，有利于为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大学校长郭秉文面临的经费问题

郭秉文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指出："新教

*[作者简介] 张正峰（1977—），男，山东泰安人，教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研究。

育制度之最难问题，莫财政若也。”[①]教育经费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物质前提，尤其是公立学校对政府的依赖性更强。20世纪20年代前期，军阀争雄，战乱不断，苛捐杂税，国库枯竭，不仅教育事业费七折八扣，预算成了一纸空文，甚至教职工的工资也经常发不出来，减薪、停薪、欠薪事件频频发生。从1919年底的首度罢教直至20年代末，北京国立八校几乎始终在经费短缺的动荡不安中度过，“呼吁无门之京师教育”、“啼饿号寒之京华大学教育”、“首都教育的危机”、“北京国立教育破产吗”等题目时常出现在各大报刊上。[②]

教育经费受政局牵连而短缺在当时的全中国几乎是普遍现象，只是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程度差异而已，而且在经费之争中，教育独立呼声的兴起也是比较普遍的。《教育杂志》1920年第18卷第2号有“啼饿号寒之全国教育界”，内中记载了北京、江苏、浙江、福建、河南、四川、陕西等省的教育经费窘境。[③]

1915年建立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不例外，同样面临着经费短缺问题。代理校长郭秉文在1918年10月的《关于本校概况报告书》中写道：“本校开办费5万余元，以修建校舍，购置器具为大宗之支出，于关系教科设备，未及十分之二三，至于历年预算，原有逐次增加之计划，但自4年秋开校以后，为时局之关系，经常费每月发款大抵不能如期。若临时费，4年份下半年预算28 370元，完全截发；5年预算30 480元，仅领到22 000余元，当时会计年度更改，重定五年度下半年预算69 654元，仅领到3万元；六年度预算73 016元，仅领到35 000元，总计开校三年以来，临时预算共有211 520元，实仅领到87 000余元，不过总数十分之四。至未经领足之数，共有1 140 000余元，因是教科上之需设备，校舍上之需建筑，历年进行未能悉照原定计划。至7年度经常费预算，共计师范、中、小学三部212 700余元，尚未经财部核准，自本年7月起仍据六年度预算，每月核发12 419元，此于事实上最为困难者也。”

郭秉文在1919年1月份“呈省公署补领七年度不足经费文”中谈到：“核定本年度预算总数以12个月平均每月计银10 602.333 3，自7月至12月应共领银96 014元。现自7月至12月造送支付预算书及请额凭单，共只列银74 514元，应照补领银21 500元，适合新预算半年度应领之数。为此谨呈钧署鉴核，请准令行，财政厅照案如数补放，以资填补前半年内悬短各款，而维校务，实为公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91.
② 姜朝晖.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97.
③ 姜朝晖.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99.

便。”[①]而江苏省财政厅对于经费的复函中却敷衍、拖延:“查近日省储奇绌,派员四处商挪,迄未就绪,因此欠发军需虽亦刻不待缓,正苦无从应付。明知贵校盼款綦迫,奈乞贷无门,各机关不免同受困难。在敝厅固十分愧对,然亦事实上迫于万不得已。席函前因勉筹 5 000 元,先填通知书送请查收,暂应急需,一俟借款有成,再当设筹分拨。”[②]可见当时南高师财政之窘况。

因此,在 20 世纪 20 年代左右,“筹款成了各类学校校长们最头疼的事情。”[③]如何解决办学经费问题成为当时教育索薪运动、教育独立运动和教育改革的主题。

二、创建东南大学的制度设计

教育界的罢课停职并没有圆满解决经费问题,而且经费愈欠愈多,教育界与政府的冲突亦愈来愈剧烈,因此,“教育界觉得政府之不可靠”[④]。1921 年高等工业学校开教职员大会讨论教育经费问题时就提出:“因教育事业隶属部内,经费支绌,事实上实难发展,且有多数富于声望之教育家及银行家,虽欲尽力辅助,亦不便越俎代庖,嗣后拟将教育事业归之公共管理,设董事会,关于一切重大事务,如经费、校长等,皆由董事会决定,如此,则教育事业可以离部而独立,庶几一劳永逸,教育之进行不致再有妨碍。”[⑤]1923 年 6 月 24 日蔡元培在“致北大教职员函”中谈到,“对于北大及其他北京国立各校之根本救济,鄙意宜与北京政府划断直接关系,而别组董事会以经营之,已于复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一函言其概略,想为诸先生所赞同也。”[⑥]他在“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合会议函”中对此表达得更清楚,他认为“北京政府破产之势已成,而政客官僚摧残教育之计划且方兴未已。国立八校当此危险时代,若不急筹高等教育独立之良法,势必同归于尽。诸先生素抱维护八校之热诚,鄙意似宜及此时机,由八校教授会公推全国最有信用之人物,组织一北京国立八校董事会,负经营八校之全责。凡八校维持现状及积渐扩张之经费,均由董事会筹定的款。且对于中央或地方担任拨款各机关切实监督,定期交付,不使有挪用或拖欠之余地。而各校校长宜先由各本校

---

① 《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9.
② 《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90-91.
③ 闵卓. 梅庵史话[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14.
④ 舒新城.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184.
⑤ 京学界教育费独立之运动[J]. 教育杂志,第十三卷第四号.
⑥ 高平叔,王世儒. 蔡元培书信集(上)[G].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668-669.

教授会公推，再由董事聘请，不复受政府任命，以保独立之尊严，而免受政治之影响。”[①]可见，当时主张建立董事会制度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可以解经费不足之燃眉之急；二是可以获得教育经费独立，以保障办学自主权，独立于政潮之外。

由新教育共进社（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组成，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从第二卷第三期起加入）主办的《新教育》也着力发起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独立”运动。1922年《新教育》第四卷第三期发表的蔡元培《教育独立议》一文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另外，《新教育》还发表了《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宣言》和《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章程》等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宣言提出三大主张：“教育经费之应急谋独立也”；“教育基金之应急谋指定也”；“教育制度之应急谋独立也”。章程则明确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宗旨为“以运动全国教育经费及学制之独立”[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也是其编辑代表之一，并发表11篇文章。他在《新教育》第二卷第四期上发表的《我国今后教育问题》一文中指出：“英、美教育家，以为英、美、瑞士诸国之教育，可供中国参考者，为地方自动的教育，此为共和国所最应注意者。盖教育原应由地方人民自行兴办，非可依赖政府。若山西省之教育，自上而下锐意进行，在此过渡时代，亦系一种方法。然欲从根本上兴办教育，必须自下而上也。”[③]1919年刚刚成立的私立南开大学由于经费不依赖政府，依靠社会资源，经费比较有保障，校长张伯苓从不欠薪，尽管薪金比较低，反而延揽到了许多新回国的留学生做教员。[④] “工商界资本的经费捐助”使“大学不必再仰赖国家官款补助，从而给予这些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免于政府控制的自治权”[⑤]。因此，在郭秉文创建东南大学时也遵循这种思想和经验，借鉴美国大学制度，开创了国立大学设立董事会制度之先例，以实现大学教育之独立。

在1920年12月15日“筹备东南大学之经过”报告中，郭秉文指出：“办大学有两个大难题：一为人才，一为经济……北京大学仅文理法三科，每年需经费80万。本校分科更多，且有农工等科，需费更属浩大，而政府又财政困难，此项经费不得不除国库以外，尚多赖海内外同胞加以资助。”[⑥]“海内外热心教育之富豪必

① 高平叔，王世儒. 蔡元培书信集（上）[G].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672.
② 周晔.《新教育》与中国教育近代化[J]. 高等教育研究，2005(1)：91.
③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54.
④ 姜朝晖.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89.
⑤ 叶文心.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83.
⑥《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0.

尤乐出巨金以助斯校,政府社会合力并筹”①,经费方面尤为轻而易举,人才自然吸引而至。因此,“以欧美各大学为求社会之赞助起见,往往设立董事会协助校务进行。东南大学将来为东南各省学府,于东南文化之发展影响至为重大。现当创办之际,所需社会之赞助亦至大且急。本星期三日下午四时,特开全体职员会议决议,依据前日发起人呈经教育部核准之计划书,组织董事会,并订定简章,推举张謇(甲午科状元,前实业总长、农工总长)、蔡元培(前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校长)、王正廷(多届内阁外交总长)、袁希涛(历任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聂云台(上海总商会会长)、穆湘玥(纺织业巨子)、陈光甫(上海银行公会主席)、余日章(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严家炽(江苏省财政厅长)、江谦(南高前校长)、沈恩孚(江苏省教育会会长)、黄炎培(江苏省教育司司长)、蒋梦麐(代理北京大学校务)诸公(共十三人)为董事,不日将呈请教育部函聘。此次所举诸董事或为耆德硕学,或为教育名家,或为实业巨子,于社会事业均极热心。东南大学得此助力,其发达之速可预卜矣。”②后复推举钱新之(上海交通银行经理)、荣宗敬(棉纱、面粉大王)二人及教育部司长任鸿隽共十六人组成东南大学董事会。以江苏省教育会成员为主构成的董事会促成东南大学与上海当地工商业界的广泛接触,获得了很多社会经费的支持。

在1924年6月25日教育部通过的《国立东南大学校董会简章》,规定校董资格分二类:一是当然者,即教育总长指派之部员一人和校长;二是选聘者,即声望卓著、热心教育者和以学术经验或经济赞助本校者。校董之职权包括六项:“(一) 决定学校大政方针;(二) 审核学校预算决算;(三) 推选校长于教育当局;(四) 决定学校科系之增加,废止或变更;(五) 保管私人所捐之财产;(六) 议决学校其他之重要事项。”并且,“校董会议决事项应由校长呈请教育总长核准施行。”③可见,董事会除了筹措经费外,对于校务也具有很大的权力,尤其是拥有推举校长,审查预算等重要权力。这种制度设计,一是保障了经费,二是获得了校长的推举权,使东南大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远离政治纷争,可以独立办学。两者之间,又以前者为基础,董事会只有发挥其经费之保障作用,才能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

---

①《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上)[G].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00.
②《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上)[G].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6.
③《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上)[G].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7.

三、东南大学董事会制度发挥的作用

东南大学校董会在办学过程中的确发挥了一定的经费筹集作用。比如1921年6月6日郭秉文就报告了个人及各机关对于南高—东大之赞助情况："1. 美国克兰公使夫人捐助学额费4 000元，分赠东南大学学额二名，高等师范特别生学额十名，两校合办之暑期学校学额2 000名，外人之提倡女子高等教育，极为可感；2. 穆藕初先生捐助器具院建筑费6 000元，又捐助银5万两，选送东南大学毕业生，留学欧美，又捐助银5 000两，选送高师教员留学美洲中校，鉴于国内体育人才之缺乏，已决定派高师体育教员张信孚前往，研究体育；3. 穆杼齐捐南汇造桥生试验费1 000元；4. 上海额粉公会补助改良小麦试验费，每年6 000元，又拟扩充试验场40亩以上，约购地费46 000余元，购地事尚在磋商之中；5. 上海纱厂联合会补助改良植棉试验费，每年2万元；6. 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补助本年蚕桑试验费4 000元；7. 各省高等专门学校补助采集各省植物标本费18 000元。"[①]

1921年11月，全体校董名义发表了《东南大学图书馆募捐启》，郭秉文写信给江苏督军齐燮元，成功劝说齐燮元独资捐建东南大学图书馆暨配套设备费用15万元。1923年8月12日，全体校董名义发表了《东南大学体育馆设备及附设游泳池募捐启》。1923年12月12日，东南大学口字房毁于火灾后，董事会发布了《关于火灾及募捐等事的报告》，并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10万的捐款。1924年，东大同时拟建生物馆，并经校董会议决通过，由经济校董筹资10万元，洛氏基金会亦表示予以赞助。[②] 这些捐款使东南大学很多教学设施得以建立起来，为东南大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但是，东南大学董事会在筹措经费方面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以东南大学1922年度经教育部核定的预算为例，经常费为397 454元，临时费为151 700元，共达549 154元之巨。[③] 可见，以上从民间所获得的捐助相对于东南大学的预算来说，也仅是杯水车薪。因此，东南大学大部分经费还是直接来自政府的财政拨款。教育部关于东大1921年度经费的训令中规定："东南大学应支经、临两费，与财政部商定，准就苏省承认一半之数计183 000元。即以此数定为该校十

① 《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3.
② 朱斐. 东南大学史(第一卷)(第二版)[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102.
③ 《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34.

年度预算,由苏省国家岁出项下开支。随后由本部咨商浙皖赣各省得其分担同意及确数,再行徐图扩充,方无窒碍提付公决。”[①]由于江西、安徽、浙江并无分担诚意,因此,1922 年教育部又修改原来的分担比例,规定“由苏省担任三分之二,其余三分之一,咨商江西、安徽、浙江三省分担,业经提出国务会议议决照准,除咨江苏省长暨江西、安徽、浙江三省,并咨财政部令行各省财政厅迅予遵办外,合即令行遵照。”[②]

但是在郭秉文致皖浙赣三省督军省长厅长公函寻求经济上之援助时,浙江督军省长致东大校长称:“东南大学之设立,原为就近各省学生便于升学起见,顾名思义,所需经费,亟应分任。惟查浙省财政万分艰窘,近年预算出入相衡,不敷甚巨,全赖设法借贷,以资济用。本年蚕荒之后,又继以水灾,以致丝蚕两捐及田赋收入骤短巨数。现在本省应需各款尚属应付维艰,早已罗掘俱穷,自顾不遑。且本省筹办大学经省议会议决后,亦以经费无着,未能即办。其财力困难于此可见。所有东南大学经费,浙省现实无力分任等。”[③]江西财政厅致东大表示:“查东南大学经费既由省分担,自应勉力筹给,但赣省前编十年度预算,并未列有专款。值此库空如洗,应放一切固定经费尚属积欠甚巨,挹彼注兹,殊形困难第事关培植士子,又系分省担认,容俟奉到省长行知,自当会商教育厅酌定办法,另筹的款呈请核示办理,俾垂久远。”[④]安徽省长致东大也解释道:“遵查此项经费,关于高等教育之进行极应设法分担,以资补助。惟本省财政奇窘,又值灾祲迭见。以十年度国家经费而论,收支两抵,计不敷 280 余万元,是预算内应济之需,尚苦穷于罗掘,预算外增支之款,更属无可腾挪。所有东南大学经费,拟俟库储稍裕,再行酌量筹济等语。”又复称:“佥谓皖省现正筹备创设大学,益以财政困难,一时无款可筹。容俟财政稍裕,再行协济等情。”[⑤]总之,浙江、江西和安徽三省无法分担东南大学之经费。可见,东南大学的经费还是主要以江苏省财政拨款为主。但由于受到 1923 年和 1924 年连续两次的江浙军阀混战,苏省财政亏空达一千三四百万之巨。[⑥] 教育经费也就无法得以保障。郭秉文在 1925 年《东大复省署请拨发欠薪文》就称:“查敝校自去年七月以来,受时局影响,江苏财政厅短发敝校经费达 38 万元,校中欠发中西各教职员薪水在 11 万元以上。各教职员仍热心从公。而薪资则以来源短少,未能按月照送,抱歉良深。现在向会计部索取欠

①《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上)[G].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7.
②《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上)[G].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34.
③《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上)[G].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30.
④《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上)[G].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30.
⑤《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上)[G].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31.
⑥《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上)[G].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84.

薪者日必数起，应付为难……兹拟恳请贵署令行财厅将短发敝校经费从速筹拨若干，以备专发欠薪之用，俾各教职员均得维持生活，安心服务，以利进行。”①

因此，单纯从经济的角度看，郭秉文借鉴美国大学制度设计的董事会制度在东南大学发展中发挥的筹款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无法承担起东南大学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作用，甚至经济独立也无法实现。基于这样的现实，同时也由于董事会“常有侵越权限情事”②，被教育部一纸训令废除了。

四、郭秉文无法超越的历史困境

郭秉文的去职标志着他在东南大学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之一是由于受到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动而引起的党派纷争与人事纠葛。③ 而另一个更为重要也更为深刻的原因在目前的研究中还没有被提及，即郭秉文所设计的董事会制度缺乏民族经济的支持，它无法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经费独立问题，因此他不得不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因而其改革无法避免政治的干涉，最终走向失败。这也是他无法超越的历史困境。

郭秉文筹建东南大学时所面临的问题及教育运动等背景，我们在前文中已经分析过了，而所处的民族经济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也应该是其所考虑设计董事会制度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民国建立后“群知非实业不足以立国，于是有志于实业者项背相望”，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实业救国与建国的热潮。“1912—1920 年间，国内工业产品销路扩大，企业利润丰厚，新厂不断开设。这 9 年全国工业生产按总产值计，平均年增长率为 16.5%；按净产值计，平均年增长率为 13.4%。”④“据专家统计，1920 年比 1913 年新增工厂 1 061 家，资本额增加 16 980万元。又据专家统计，1914—1919 年共新设厂矿 379 家，投资额 8 580 万元。我们以专家为准，扣除少量的官办企业，并考虑到本期巨大的利润和积累，那么 1914—1920 年大战前后七年时间，民族工业新设工厂为 500 家左右，年均投资在 2 000 万元上下……另据专家按生产能力、产量和投资额对重大行业分别计算，估计本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为年增长 12%—13%，这一增长率

① 《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34.
② 《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 南大百年实录(上)[G].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82.
③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研究有冒荣著的《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239－247)、许小青的论文《论东南大学的国立化进程及其困境(1919—1927)》(高等教育研究 2006 年第 2 期，97－99)、储朝晖的论文《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牺牲者郭秉文与东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6 期)。
④ 陈争平，兰日旭.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00.

略低于初步发展时期,但相比之下增长范围已大为扩大,尤其是利润的优厚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①]这一时期被一些史学家称为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民族工业的繁荣发展,为大学筹措民间资金、实现教育经费独立提供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也使董事会制度的创建具备了可行性条件。因此,郭秉文在最初设计的"校董会的性质及职权"主要是:"一为扶助学校(事业)之进行;二是保管私人捐助之财产。"[②]从前文的董事会成员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聂云台、穆湘玥、陈光甫等都为实业巨子,在20年代初期他们在捐款和筹措民间经费方面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1921、1922年到1927年),民族工业处境日趋艰难。[③] 经过重新排队的帝国主义势力,纷纷卷土重来。"1920—1921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又使得这一反扑越发变本加厉。反映在中外贸易上,1920年出口锐减,进口净值由1919年的6.4亿海关两猛升至7.6亿海关两,1924年更递增到10.1亿海关两。中方入超1919年仅为0.16亿海关两,1920年跳升到2.2亿海关两,1921年突破3亿海关两,此后便居高不下。日、美、英等国大量的商品倾销,夺走了民族工业大片的国内外市场;而此时国内的军阀混战已是经年累月、愈演愈烈,战争对生产的破坏和政府的横征暴敛,促使民族工业的产销全面告急。以棉纺织业和面粉业为例。1920年一包纱可获利65元左右,1921年则亏本20元以上。由于产品滞销和跌价,纱厂经营开始由赢利转为亏损,被迫停工减产。经中国纱厂联合会两次议决,至1923年3月已宣布停工50%。面粉工业在经历1918—1921年连续4年出超的黄金时期后,1922年开始进口突增、出口猛降,每年入超达数百万担。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如茂新三厂,福新二、四、八厂都因原料销路两缺而被迫停工减产,中小企业更是朝不保夕,宛若风前残烛。"[④]由于受到此时民族工业经济形势的影响,东南大学在民间经费的筹措上已无法开展,郭秉文也就不得不求助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政府,甚至向北洋政府求助。[⑤] 在这种情形下,东南大学发展自然受到政治的牵制,无法实现教育之独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所谓民间捐助在当时中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能力局限下,其实很难对全国教育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务实地说,政府财政拨付还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支柱,而军阀政府反复无常的本性和低下

① 徐建生.民族工业发展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75.
② 朱斐.东南大学史(第一卷)(第二版)[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86.
③ 王方中.中国经济通史(第九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211.
④ 徐建生.民族工业发展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00.
⑤《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上)[G].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28-232.

的执政素质注定其没有发展教育的诚意和能力，所以教育界的主观设想最终都不免落得画饼充饥的结果。”[①]要实现大学的独立，只有获得经费的独立，而经费的独立必须获得民间经费的支持，而民族经济的发展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民国时期的教会大学之所以获得自由的发展就是得益于从教会而不是国民政府获得了经费支持。当民族经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而自顾不暇的时候，它也就无法为郭秉文所追求的教育独立提供支持。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正是由于民族经济衰弱的影响，大夏和复旦等大学无奈中接受了政府的拨款，“改制为由政府控制的国立大学”，“独立自主的私立教育领域从此一去不复返了。”[②]这是郭秉文们所无法掌控和超越的，失败是必然的了。

当然，民族经济发展遇到的困境自然与当时的国家政治状况密切相关的，上个世纪 20 年代军阀混战，政权不统一，外国势力在华横行，使得民族经济也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统一的发展环境，这是民族积弱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影响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就像郭秉文在《对于孟禄中国教育讨论之感想》一文中所言：“‘中国教育发达最大之障碍，为不良之政治。’孟禄此言，可云药石。政治与社会事业，休戚相关，决无废其一而举其他之可能也。故政治不良，教育实无从发达。”[③]经济与政治互相影响，大学发展也必以二者为基础，是我们今天不得不引以为鉴的。

① 姜朝晖. 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15.
② 叶文心.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84.
③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60.

“培育一种文化生活”:郭秉文时期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校园文化之形态及育人影响*

◎李　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一、“课外作业,为学生自动的精神所表现”

1928年,舒新城主编的《中国新教育概况》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在这本旨在“使一般教育者了解中国近代教育史实及现况为目的”,“在内容上注重于各问题之代表著作,在形式上注重于文字之优美”[①]的教育著作中,舒新城特别选择由陶行知、邓萃英、陈东原、庄泽宣等二十一位教育名家,通过分别撰写从教育思潮到学制改革,从幼稚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女子教育到留学教育等十四个专题,详细梳理了现代中国教育的成长脉络和发展历程,以期完整呈现当时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基本现状与存在问题。

殊为巧合的是,曾于1923至1924年短暂担任国立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可以自称为“东大人”的舒新城,选择由另一个特殊的“东大人”来执笔撰写“中国之高等教育”专题。当舒新

*[作者简介]李力(1982—),男,陕西西乡人,教育学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大学校园文化之形态与功能研究:基于人才培养与大学发展的分析”(12YJC880041)。

① 舒新城编.中国新教育概况[M].上海:中华书局,1928:凡例第1页,117.

城正不遗余力地以东大附中为平台在国内竭力倡导道尔顿制的时候，这个特殊的“东大人”作为校长已经在南高和东大积极践行自己的教育理想八年之久。他就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育学博士，1917 年开始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校长，1921 至 1925 年担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被后世誉为“东南大学之父”的郭秉文。

在这篇题为《中国之高等教育》的文章中，郭秉文分别从高等教育制度沿革、高等教育概况、外人经营之高等教育、女子高等教育、海外留学、学生之课外作业以及现在高等教育诸问题七个方面回顾与梳理了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与今后亟待正视的问题。在面临究竟应该选择哪些基本方面来如实反映与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态构成与发展走向时，郭秉文并没有单纯痴迷于诸如大学管理体制、大学精神与理念等易于引起学者研究兴趣的“宏大理论”课题。相反，他却把目光投射到“学生之课外作业”这一通常易于被研究者认为缺乏理论深度的“边缘”与“非主流”课题上，并且使用了不小的篇幅来予以阐释。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会对“学生之课外作业”青睐有加，将其视为介绍“中国之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原因正是在于：“课外作业，为学生自动的精神所表现。无论在学问上，艺术上，体育上，皆应与学校课程同一注意，教育家宜尽量发展而指导之。”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当时普遍重视“学生之课外作业”，所以“学校生活，亦呈现自由活泼之象”①。

如果将郭秉文之于“学生之课外作业”的偏爱置于其长校南高和东大的办学实践中加以审视，可以发现，这种行为恰恰是其长期办理高等教育的宝贵经验。郭秉文在长校伊始就注重在南高和东大校园积极发展“学生之课外作业”，对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与热情。郭秉文心目中的“学生之课外作业”究竟由哪些要素构成呢？在《中国之高等教育》中，他将“学生之课外作业”分为学生自治、学艺组织、体育、社会服务和国事表示五个方面逐一进行讨论。其实这并非郭秉文首次专门述及“学生之课外作业”及其之于学生个体和高等学校发展的独特意义。早于 1919 年 12 月，他就在《战后欧美教育近况》一文中疾呼“培养学生自动的精神”理应成为中国亟须重视的教育问题：

> 共和国之实际，在学校内注重共和精神之培养，如职教员间之协力办事，学生方面提倡自治，发展自动之机会，养成互助之精神。或以为学生在今日，已极自动之能事，无提倡之必要。要知学生当此久静始动之际，容有

① 舒新城编. 中国新教育概况[M]. 上海：中华书局，1928：凡例第 1 页，117.

出轨之处,将来具有经验,自能就范。①

事实证明,这种积极发展“学生之课外作业”以养成“学生自动的精神”,从根本上着眼于育人的学生生活方式的设计与构想,在历经南高和东大数年的办学实践检验后,不仅一致为当时的社会舆论与南高东大师生们所认同,而且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作为南高东大继承者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办学面貌与精神境界。

1924 年,上海《学生》杂志社曾经发起组织过一次针对北京、天津、江苏、上海和广东五地十七所高等学校的校情调查,其中不乏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等知名高校。此次调查的一大特点就在于重点考察各校之学生生活和活动,进而对该校之整体特点做出评价。调查者在对东南大学学生生活进行评估后,给予东大高度评价:“校风淳朴质素,毫无嚣张气习”、“全校均富进取精神”、“全校均富合作精神”。② 作为一所组建成立仅四年的国立大学,能够得到如此上佳的评语实属难能可贵。而如果离开了作为校长的郭秉文苦心孤诣地通过发展“学生之课外作业”来培植“学生自动的精神”,着实很难想象调查者仅仅根据东大学子的校园生活就能够得出上述好评。

郭秉文所力倡的“学生之课外作业”,也深刻地影响到南高和东大学子健全人格和独立个性的养成。1919 年考入南京高师史地部,日后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奠基者的张其昀曾于日后高度评价自己度过的学生生活:

> 南高时代学生自治会最有生气,课外研究又设有各种研究会,其目的在培养良好的公民资格,如公正无私,同情心,责任心,牺牲个人利益,尊重他人权利等事。从事政治活动而不根据于道德,则政治生活亦必致卑鄙龌龊,令人有贱视之心。南高师学生个性虽极度发展,然绝不因主张之同意,隐隐有局部之对垒。学生界党同伐异之败德,母校独无征迹,这也是当年学校生活最感愉快的一点。③

金耀基认为,完美的大学生活理应由“知性生活”与“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两部分构成。而在他看来,“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之于作育人才与大学发展的效用也许更为独特与深远:

---

① 郭秉文.战后欧美教育近况[J].新教育,1919-12,第 2 卷第 4 期.
② 全国高等学校概况调查表[J].学生,1924-05-05,第 11 卷第 5 号.
③ 张其昀.南高的学风[M]//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181.

> 实际上，第一流的大学，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无不有意无意地都在培育一种文化生活……文化生活常决定大学的风格，常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文化生活简单地说就是生活得有文化。我这里所用的“文化”一词非文化人类学所指的文化，而是指一种有文学气质、有文生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①

无疑，郭秉文所推崇的“学生之课外作业”正是此种对于南高东大学子具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从 1917 年以教务主任身份代替江谦行使南高校长职务，到 1920 年成为国立东南大学校长，再到 1925 年黯然离职，郭秉文作为南高东大的舵手长达八年之久。期间，注重从营造优美中正的大学校园文化入手来陶冶和熏陶学生，注重基于学生生活方式之重构来引导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和独立个性之张扬，一直贯穿于郭秉文办学实践的始终。本质上而言，郭秉文始终是站在培育适应民主社会生活的理想公民、构筑崇尚研究高深学术的大学文化与精神氛围，以及大学引领与示范社会前行的高度来思考与定位“学生之课外作业”在南高东大办学实践中的地位。可以说，“学生之课外作业”之所以会使得郭秉文念念在兹，其实绝非其个人的办学偏好所致，也并非单纯地指导学生消遣课余生活的办学手段与管理方式。在他看来，“学生之课外作业”本质上是作为旨在培养南高东大学子完美品性，深刻影响南高学子心灵发育的校园文化而存在。

文化是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②。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师生所创造的物质环境、精神产品和生活方式，它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行为方式，师生是大学校园文化的主体，以校园价值观为内核的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灵魂。从 1914 年南京高师成立到 1927 年国立东南大学被纳入合并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在并不算长久的十三年办学历程中，南高和东大在顺利完成从新学旧学杂糅的师范学堂向文理学科并存的现代综合大学转型的同时，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杰出人才，树立了其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以校长郭秉文主政时期南高与东大校园文化的表现形态为考察中心，着重阐释其形态之构成与特点，进而论述其独特的育人影响。

---

① 金耀基. 大学之理念[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8.
② 周勇. 江南名校的中国文化教育[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总序 2.

二、“历史背景尤为大学无价之宝”

作为大学存在的物质基础,理想校址的选择往往令办学者煞费苦心:作为物理空间,它不仅能够满足破土动工,大兴土木的建筑要求,从而使得学习生活其中师生的日常生活要求能够得以满足;作为“文化空间”,它最好还拥有优良的校园景观,或是自然风光旖旎,使得生活其内的师生能够终日目睹美景,赏心悦目;或是历史底蕴深厚,能够成为大学接续历史与人文传统的中介与津梁,从而对学子的健全人格和优良性情进行熏陶与陶冶。南高和东大无疑正是坐拥此种理想校址的代表。

1929 年 11 月 1 日出版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的扉页上印着一帧照片,整个照片的主体只有一棵高大的松树。这棵其貌不扬的松树就是被南高和东大人无比珍视的六朝松[①]。1924 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日后成为著名文史学家的陈训慈曾这样形容六朝松:“现在东南大学还矜夸着他校园里有一枝‘六朝松’,这枝松是否真起于梁朝,却也须费一番考证,或者是因梁代国学建于这里而起的传说,也未可知。但是通常终不曾措念到这里曾有梁代来设学。”[②]无论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抑或后人善意的附会,仅仅从字面上就不难感受附着于六朝松之上悠久的历史感。南高东大校园中可以与六朝松相媲美的还有梅庵。陈训慈对于梅庵的来源也进行过一番考证:

> 只是现在东大校舍中有一个名称,还保留着两江的一位人物的影子。两江的最后监督李瑞清,就是长于写字的“清道人”,有时题着“清道人阿梅”,是因为他的号叫做梅庵。据说他作监督时,也不停地在一字房楼上挥笔。高师创立以后,江校长易园因为他和两江关系很久,便篆著“杲奔”二字,做校园中小屋的名称。我们后进的学生们,也便不问来由的以“梅庵”二字当做校园的名称,这“梅庵”二字倒可与东大终古了![③]

从学子们普遍用梅庵来代称东南大学,就不难感受东大校园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对于学生们的濡染和熏陶。1922 年,一位南高东大学子更是用生

① 插图[J].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11-01,第 1 卷第 2 期.
② 东南大学的渊源与沿革[J].学生.1924-09-05,第 11 卷第 9 号.
③ 东南大学的渊源与沿革[J].学生.1924-10-05,第 11 卷第 10 号.

动形象的笔触向外界描绘和勾勒出一幅完整立体的南高东大校景图：

> 这两面一体的学校，位置在北极阁之下，旁有鸡鸣寺，古台城；东望钟阜，双峰插云，而烟雨不时，使生活在这伟大而优美的自然环境的千百男女学生，得着丰厚的人生意趣。学校里有一个梅庵，拓地虽不广，然布置得疏密恰当，用两句俗语来形容他："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长春之景。"并有一棵道貌渊然的六朝松，起人不少缅怀往昔的遐思。①

其实无论是注重校址的自然风光，还是珍视校址所蕴含的历史底蕴，办学者对于校址的重视根本上是着眼于其文化价值，即重视校景对于学生人格的陶冶与熏陶，重视大学接续人文历史与光大文化传统。

天然优美的校景对于学生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陶冶功用。正如蔡元培所言："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②在他看来，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追求道德的不断向上发展和进步，而辅助道德发展则无外乎智育和美育两种途径，而美育的最终着眼点恰好在于陶冶人格和熏陶情感。

1935 年，国民政府曾动议将国立中央大学迁离原址，另于南京市郊辟地新建。时任中央大学地理学系教授的张其昀专门行文予以反驳。而其力主不迁校的原因正是在于"历史背景尤为大学无价之宝"：

> 况且历史背景尤为大学无价之宝。此校为明代国子监的旧址，是五百年前国立大学的所在，永乐迁都以后，南监依然存在。诗人吴梅村曾充最后一任的祭酒，至清兵南下，学生始星散，故吴梅村诗有"弦管消沉""极目萧条"之语。嘉庆间的火灾，把前明国学全毁，但成贤街之名尚保存至今。清末两江师范的旧事，姑且不提，即就四年以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艰难缔造的历史，究竟也含有相当的价值。③

"富于历史，使人常能领略数千百年以来之文物，以启发他们广大国粹的心思。"④作为高等教育与文化学术机构，大学在阐扬民族传统，光大固有文化方面更是具有难以推卸的责任。1924 年，陈训慈曾于考证南高东大校址历史时，对

① 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学生生活[J]. 学生. 1922－07－05，第 9 卷第 7 号.
② 张汝伦编选. 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376.
③ 中央大学迁校问题[J]. 独立评论，1935－10－13，第 172 号.
④ 陶行知. 行知书信集[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1.

于东南大学有幸能够接续前代学术文化传统赞赏有加:“不过一个事业的价值,本不在于表象浸润于明代的学风文化无形的传沿到今——这不是南监的最大成效么?何况,五百多年后,地灵诱致着一个新的学校,建设在他的残迹之上,到现在好容易长出一个东南大学来!形迹是完全不同了,可是我们还依然维护着一个大学和五百年前的先驱,隐相衔接呢!”①

三、“教育贵乎薰习,风气赖于浸染”

曾有学者将大学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喻为大学校园中“永恒的风景”:“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必须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②其实,无论是历史传统,抑或文化精神,都属于大学精神。作为大学校园文化的精神表现形态,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灵魂与核心。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大学校园中,由师生日常生活方式直接表征的核心价值观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氛围。南高与东大时期的大学精神从源头发生、外在表征再到形成传统,具有自身特有的内在逻辑:大学校长及其确立的校园核心价值观为精神源头,优美成熟的校风为精神表征,民主和科学作为内核的精神传统。

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日后成为著名记者与作家的曹聚仁曾这样评价一师校长经亨颐:“‘一师’先后,有过许多校长,可是,我们说到‘我们的校长’,只是指经子渊(亨颐)先生而言,跟其他校长毫无关系。”③对于南高和东大而言,郭秉文也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被学子们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校长”。因为正是郭秉文自身的高尚人格以及其所坚持的办学宗旨,才为南高与东大大学精神的生成发育植入了最初的基因。

正如中大学子日后对其所做的极高评价:“国立中央大学之基础,实奠定于南高、东大之时;而南高、东大之规模,实建立于先生之手。凡我同窗,霖恩霑化,固无不仰望先生,如泰山,如北斗也。”④郭秉文之所以受到师生们的高度赞誉,与其高尚的人格与严格遵循教育规律办学和育人密不可分。曾有东大学子这样回忆校长郭秉文:“出则戴黑礼帽,乘旧马车,正襟危坐,志念深沉,每值生徒,则

① 东南大学的渊源与沿革[J].学生.1924-09-05,第11卷第9号.
② 陈平原 夏晓红编.北大旧事[G].北京:三联书店,1998:代序1.
③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07.
④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郭秉文与东南大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160.

高举其帽，微笑示意；见之者，则伫立答礼候其去。斯诚君子之风，足以表率群伦者。”[①]凑巧的是，顾颉刚和潘菽在北大校长蔡元培身上也曾亲炙类似的平易近人。时就读于北大预科，日后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曾如此回忆蔡校长：“他天天坐着马车到校，看门的校警看见车子来了，站到门前立正行敬礼，照例校长是昂首直入的，想不到这位新校长竟脱下铜盆帽，向校警回鞠了一躬。这使得满脑子装着封建思想的学生奇怪起来，觉得他有失上下之礼！就在这样有意识地改造环境之下，渐渐养成了全校平等的气氛，使得教职员、学生、校工们无形中趋于亲密团结。”[②]毕业于北大，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的潘菽，也正是感召于蔡校长的高尚人格才决定报考北大：“（我的大哥）听到我要去投考北大时，便写信告诉我说，以后的北大校长将是蔡先生，并且告诉我蔡先生的为人，说他常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并且有时还自己淘米。我听到这个消息，很庆幸自己没有选错了路。这是我在心中深深景仰蔡先生的开始。”[③]无独有偶，曾任教于东南大学，日后成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的胡先骕就曾将郭秉文与蔡元培相提并论：“统观今日之大学校长，自蔡孑民以下，能胜郭氏者又有几人乎。”[④]由此不难感受作为校长的郭秉文人格之高尚。

郭秉文以身作则示范南高与东大学子的同时，也十分注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来开展办学实践活动，其为南高与东大奠定了“三育并举”的独特人才培养理念。具体到校园文化建设，就是开始在南高与东大重建注重发扬师生合作精神，注重培植学生自治能力的学生训育制度。[⑤] 正是在郭秉文的主持下，极具现代性的学生自治会成立于南京高师。而在成立学生自治会的同时，郭秉文还聘请留美归来，熟谙学生自治内涵的刘伯明、陶行知、陈鹤琴和廖世承等教师负责主持第一届学生自治委员会。正是由于教师委员指导有方，再加之师生合作无间，使得东南大学学生自治会成为五四时期各项工作开展较好的高校之一。[⑥]

郭秉文在为学校奠定了核心价值观之后，便注重通过全校师生的通力合作来对其加以普及和推广，入手的途径正是师生的整体生活方式。正是在校园生活方式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上述核心价值观才有可能被潜移默化地嵌入，在同化为师生整体的深层心理结构的同时，凝聚形成能够代表一校整体精神风貌的校

①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165.
② 顾颉刚. 顾颉刚自述[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55.
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编. 潘菽全集·第十卷[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116.
④ 胡先骕. 东南大学与政党[J]. 东南论衡，1925，第1卷第1期.
⑤ 冒荣. 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92－101.
⑥ 张雪蓉. 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M].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91.

风。“校风者即学校精神之现象也。”[①]正是在郭秉文的长校过程中,南高和东大形成了自身所特有的“精神现象”——南高和东大校风。

> 教育贵乎薰习,风气赖于浸染。刘伯明先生经庶者出身于教会,寝馈于哲学……先生引为副贰,校内事一以付之。薰习所及,浸染渐深,遂成为南高、东大朴质勤敏之学风。非先生之知人善任,曷克臻此耶?[②]

给南高东大学子留下深刻印象的刘伯明先生,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其不仅人格高尚,而且学识渊博。由于郭秉文忙于校外事务,因此他成为学校实际的主持者,对于南高与东大校风的影响至深至远,甚至其着装打扮都成为当时南高学子纷纷效仿的对象。曾就读于南高,日后成为著名近代史学家的郭廷以十分清楚地记得,时任南高校长办公处副主任的刘伯明先生,“平常头发垂过前额,几乎盖过半个眼睛,学生们就模仿起来,他的言行无形中影响了全校,而成为全校的精神重镇。”[③]由此可见南高学生对其的推崇和爱戴。郭秉文的知人善任对于南高与东大校风的形成至关重要。正是由于一系列在人格与学识方面俱佳的教师以身作则,躬亲示范,才为南高和东大校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顾颉刚曾指出,维持一个国家乃至民族的根本在于“民族精神”。[④] 大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大学之所以得以维系和传承,正是由于大学精神的绵延不断。大学精神代表和构成了大学的文化传统。南高和东大俨然形成了能够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它就是经常出没于南高和东大人口中的南高和东大精神。郭秉文与南高和东大精神的形成密不可分。“在南高时期,他协助江谦校长制定了‘诚’之校训。在东南大学,他又提出‘止于至善’的校训。持诚至善,贯之以恒,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朴实、勤奋的南高—东大学风和以科学精神、民族精神为核心的南高—东大精神。”[⑤]南高—东大精神一经形成就相对稳定,并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一届届的南高与东大学子。尽管东南大学于 1927 年被改建,但是其所形成的大学精神却直接为后继者中央大学所继承:“国立中央大学,前身为国立南京高等师范与国立东南大学,学校名称,虽有改变,而其精神,则为一脉相承。”[⑥]

---

① 《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编. 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896—1927(第一卷)[G].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235.
②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161.
③ 郭廷以. 郭廷以口述自传[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86.
④ 顾潮. 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扉页.
⑤ 冒荣. 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63.
⑥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165.

四、“学生与教职员之情谊亦非疏通不可”

早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期间，郭秉文就十分留心学生自治之于学生身心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他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这样论述师生合作基础上的学生自治的意义：

> 余则养成学生自治与守秩序习惯诸美德之学校组织，尤当变今之道而提倡之。故今而后最当注意者，为学校全体共作之精神，非限于校长与教员之联络，而学生与教职员之情谊亦非疏通不可。若遇机缘，有几种自治团体使学生分任一部分关于整理学校秩序之事，所宜输入者也……欲自治制度之有成效，必赖一部分学校行政者之承认，且为各学生能力所及之事，夫教职员确知自己管理权之界限，而学生又能敬守学校行政者之法权，二者交相让，则学生自治之事进行，其庶几乎？①

值得注意的是，郭秉文并非一味地为学生自治争取无限制的权力，他反而将“学生与教职员之情谊亦非疏通不可”视为“而后最当注意者”，“欲自治制度之有成效，必赖一部分学校行政者之承认”。在他看来，理想的学生自治理应是师生合作与学生自治的完美调和，而这恰恰是由大学特有的组织特性所决定：“大学校园文化既是一种教育环境，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环境……教育环境明确地规定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地位任务，而文化环境中更重视两者间的群体关系、双向影响。”②纵观郭秉文时期的办学实践，师生合作基础上的学生自治不仅成为南高与东大校园的基本生活方式，俨然也成为其特色鲜明的育人理念与模式。

师生合作的前提在于师生人格之平等，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师生之间在彼此尊重人格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共同合作的意识，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基本行为方式。南高东大学生自治会的成立和运行固然最能代表和体现南高东大的师生合作与学生自治完美融合的理念，当时校园内所形成的其他极富特色的生活方式，同样很能说明南高东大师生合作无间与学生高度自治之成效。

> 先生诲训学生，首重品德。高等师范，系以培养经师而兼人师。为求达

①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39.
② 潘懋元主编. 新编高等教育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88.

“教育即是生活”之目的,而其着手,则又在衣食住行之中,住则六人一室,早晚自修,安静异常;衣着简朴,不尚华丽;饭厅之中,每晨早餐,事前备有甚多之面点,学生鱼贯而进,各取食品,遂以所值,投钱入预置之木盒中,虽无备工管理,餐毕,总其所得,从无短少,吾读东大时,仍袭此制,“中大”亦然。此种自觉,自治之风尚,后虽任教数十年,未之一见。①

仅从“吾读东大时,仍袭此制,中大亦然”一句,就不难体会师生合作与学生自治已然成为南高、东大和中大所共有的文化传统,而蕴含其中的高度自律和守持意识更是对南高东大大学精神之内核——诚的高度彰显,由此也可见大学精神之于南高东大学子影响之深刻。

基于师生合作的学生自治,也鲜明地体现在南高和东大各类学生社团的发起办理与实际运行中。为了推动学术研究,东大各科纷纷以教师指导、学生创办的方式,组建了许多学术社团,而且均由师生共同参与。② 虽然许多刊物都是以学生名义举办,但是丝毫不影响刊物的学术质量。学生在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反而发表了许多颇具学术含量的高水平研究论文。这种独特的育人方式也成为当时南高东大校园文化和人才培养的一大亮点与特色。

1920 年考入南高,日后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郑鹤声就是此种生活方式的受益者:“《史地学报》及《史学与地学》中所刊文章,大体而言,皆是课程作业中的优良作品。就我个人而论,1925 年我作毕业论文时,柳先生拟出‘汉隋间之史学’一题……柳先生评阅后,作‘一时无两’的评语,写于论文卷首,推荐《学衡》杂志发表。后从《学衡》上抽印成为《汉隋间之史学》一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③郑鹤年所提及的柳先生正是任教于南高与东大的著名文史专家柳诒徵。1918 年考入南高,日后成为中国现代物理学开创者的严济慈,在大学高年级即成为由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的编外编辑,协助教师胡刚复初审稿件,此种经历使得严济慈自谓“从中受益匪浅”④。1917 年考入南高农业专修科,日后成为我国水稻螟虫防治研究先驱的邹钟琳,在校读书期间就潜心研究植物真菌病,后经教师邹秉文推荐,研究成果同样发表于《科学》杂志。⑤

---

①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165.
② 张雪蓉. 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M].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158.
③ 柳曾符,柳佳编. 劬堂学记[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03 - 104.
④ 王大明. 试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的社会声望问题[J]. 自然辩证法,1988(06).
⑤ 张剑. 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宣传及其影响[J]. 自然辩证法,1988(06).

五、“它仿佛可和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相比”

1920年考入南高，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吴俊升曾这样生动地形容南高卓越的育人影响与实绩：“南高不仅完成了训练师资的使命，它还尽了孕育文化和造就学术界与事业界各种人才的责任，在这一方面，它仿佛可和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相比。”[①]在他看来，南高在作育人才方面几乎可以与曾经培养出诸如罗曼·罗兰、萨特、巴斯德以及福柯等科学与人文艺术大师的巴黎高师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其对于南高育人成绩之满意。而在张其昀看来，南高的人才培养水准几乎可以与当时的欧美大学相比肩：“南高毕业生留学外国的很多，外国的教授们，常常说南高学生的科学程度，可以同欧美大学同年级的学生程度相比，这的确是南高最有荣誉的教育成绩。”[②]

其实，并非身为南高人的吴俊升与张其昀不切实际的偏爱母校。据后来研究者统计，在南高与东大的毕业生中，日后有十二位被遴选为新中国的中科院院士。除此之外，农业昆虫学家邹钟琳、体育学家夏翔、语言学家吕叔湘、历史学家郭廷以、历史学家向达、地理学家胡焕庸、地理学家张其昀以及历史学家陈训慈等等也均出自于南高与东大校园。[③] 如果联想到由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三校合组，在办学不到九年时间里，共培养出78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二人为双院士）[④]，就不难体会，对于一个办学时间仅有十三年的高校而言，能有如此的育人成绩实属难能可贵，由此也不难感受南高和东大在育人方面的特色与影响。

简而言之，南高与东大校园文化的根本价值，正是在于培养出一大批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优秀人才。由于郭秉文对于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的高度重视，并坚持将其贯穿于南高东大校园文化建设的始终，并努力形成各类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生活，最终为其发挥积极的育人影响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南高东大的办学时间并不悠久，但是育人始终被郭秉文置于办学实践的首要位置。也正是由于他认识到“学生之课外作业”在育人方面

---

① 冒荣. 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4.
② 张其昀. 我所希望于本校同学者[J]. 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12－01，第1卷第4期.
③ 张雪蓉. 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M].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236－237.
④ 西南联大建校65年培养两院院士90名[EB]. 清华大学新闻网. 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news/4205/2011/20110225231319406382201/20110225231319406382201_.html，2002－11－14.

所特有的价值,因此才积极创设和推展各类校园活动。无论是学生自治组织的创办,还是学生社团和学术刊物的办理,学生们正是在此种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积极互动与交流中,培育了大学自身的精神文化氛围,在无形中提升了学术研究能力,潜移默化地陶冶了人格情操。

郭秉文男女同校教育思想的历史考察*

◎陆　华(东南大学军事教研室)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男女性别歧视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依旧是非常严重的社会现象,在教育领域表现为相当一部分女童依旧得不到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女童教育,特别是中学阶段对社会和女孩本身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变革力量:这是一个取得几乎每一个期望发展结果一致的积极决定因素,从降低死亡率和生育率、减少贫困和公平的增长到社会规范的变化和民主化。”① 在 2013 年 10 月 11 日国际女童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了为女童提供应享的教育是“增强女童权能,确保她们的人权,并克服其面临的歧视和暴力”,从而实现整个人类大家庭的进步。五四之前中国的高等学校,除个别私立大学(包括教会大学)外,只招男生而不招女生,是为“女禁”。作为我国留美获教育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郭秉文先生 1914 年回国后,先后担任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下文简称南高师)、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等职,历时整整 10 年,首开“女禁”并实现男女同校。全面梳理与研究郭秉文这一思想的历史来源及具体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教育的平等、提高妇女地位,实现妇女的全面发展有诸多启迪。

*[**作者简介**] 陆华(1969—),女,江苏宝应人,博士,东南大学军事教研室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防教育、教育思想等。

① http://www.un.org/zh/events/girlchild/

一、郭秉文男女同校教育思想的形成因素

郭秉文男女同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中国近代社会男女平等民主思潮涌涨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中国女子教育思想的弘扬与扩展，更是他汲取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及实践经验之成果，是关系到近代中华民族个人—家庭—社会整体教育良性发展的重要环节。

(一) 清末民初国内女子教育的发展为郭秉文首开“女禁”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是在中国社会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逐步拉开帷幕的。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势力的不断挤压与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办女学的刺激感召下，较早觉醒的部分中国士大夫感受到女子教育乃是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一大要务。兴办女学以实现女子解放渐渐成为新闻舆论界关注的焦点，接受新式学堂教育的女子也已表现出自立自强、人格独立的时代特征，部分女界先驱则成为争取女子解放、兴办女学的积极实践者。1907 年清政府颁行《女子小学章程》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从制度上保证了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正常发展。这一年也被郭秉文视为“实女子教育发达之纪念年”，因为“官家不独倡议设女子小学，且推而及于女子师范学堂，其企图为每州县必设一所。惟初办时，可暂于省城及府城，由官筹设一所，与男子师范同”①，教育的宗旨以养成道德、灌输知识、发达身体为主②。

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男女是否共学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提倡男女共学，另一种则提倡分而授之。1911 年，时任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主编的陆费逵撰文《男女共学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分校为正则，共学为权宜。二者当兼采之，不可拘泥也”③，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男女共学存在的合理性。民国成立后，男女教育开始趋于平等，教育宗旨中提出的反封建精神、民主意识与张扬个性的价值追求，成为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发展和男女同校共学的重要转折点。1912 年 9 月至 1913 年 8 月，民国学制正式颁行。该学制规定：一是初等小学男女可以共学；二是高小以上可设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及女子高等师范；三是女子学校不另立系统。在 1915 年《国民学校令施行细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61.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59.
③ 教育杂志(第 2 年第 11 期)。

则》中又规定，男女共学的学校，男女生须要各编学级，分班教授，不可混同。1913年7月，浙江省教育会周心华发表了《男女教育平等说》一文，她从女子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华民国四万万男女所共有之国，则男女同是国民，当无轩轾，其应享权利，无论公权、私权，举凡男子所应享者，女子无不应行享有”；因此，“凡我女界同胞，欲争胜男子则当于男女教育平等以定其基。如教育平等，则他日于权利上形式之平等，或能幸达乎”①。

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人们对于女子解放的关注，对男女能力同等、应接受同等教育的宣传为中国近代女性教育观的变革注入了新的因子，男女共学逐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正如时人所概括的：“近几年来，国内明白人，就知道这妇女问题，是非早一点儿安排他不可；而且想到要解决这个问题非先从男女受平等教育下手不可；欲使受同等教育，又非男女共同教育不可。于是乎这男女同学的呼声，就一天高起一天，遂成了教育界的一个重大问题。”②而“‘五四’运动的霹雳，早把我国数千年的思想，从迷梦中惊醒，‘女子解放，男女机会均等，男女共同教育……’的声浪，已经澎湃全国”③。在1919年10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上就有议案提出，男女皆有受平等教育之权利，教育者不宜歧视之。一面遵教育原理，一面应世界潮流，一面参酌国内情况，拟改革女学制度数端，主要内容包括国民学校及大学宜共学，舆论均已一致，具体实施则在于执行者与教育家共督促。“高等师范学校应同校同班，唯须为女子特设家事等特别部门。大学及专门学校应同校同班……”④。陆费逵1920年又发表了《女子教育的急务》一文，提出女子教育的四个目的：即健全女子的人格；养成贤妻良母；在男子能养家的时代从事无害生理无妨家庭的职业；预备充足的实力于必要的时候代男女做国家社会一切的事⑤。而后，高一涵、罗家伦、李光业等人纷纷撰文阐述改革传统女子教育的观念。这种关注到女性人格独立与完善的教育观，通过男女共学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应该看到，从清末到民初中国女子教育特别是男女共校思想及实践的发展为郭秉文在高等教育领域首开“女禁”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社会土壤，并使其能够顺利开花、结果。

---

① 浙江省教育会. 教育周报(13期，言论). 1917年7月：4－6页.
② 刘爽. 男女同学问题的研究[J]. 钱江评论(1920年)//梅生编. 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 民国丛书第1编(18)，上海书店据新文化书社，1923年版影印：183.
③ 区华德. 本校男女生共校的经过[J]. 一中十周纪念册//朱有瓛.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3辑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522.
④ 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决议案(1919年10月)，教育杂志第11卷第11、12号.
⑤ 中华教育界(第9卷第1期).

（二）美国高校男女同校的理论与实践成为郭秉文这一思想的源发地

早在1901年5月，中国近代教育家王国维在上海创办《教育世界》杂志并担任主编期间，就较为系统地评价了西方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重点介绍和宣传了美国教育制度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其时正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产生之际，年轻的中国人“需要西方的知识和方法，以便他们自己独立地运用它们去发展中国，而不是抄袭其他国家。”[①]与其他怀揣理想与抱负的年轻人一样，郭秉文无法满足在清心书院受过的中等教育，受新思想和新理论的影响，同时深感“国事败坏”，“思有以革之者”，“盖以为非振兴科学，无以救亡图存；而培育人才，则有赖于教育”，于是“担簦负笈，游学于美”[②]。

1908—1911年郭秉文远赴美国在伍斯特学院学习了3年，担任过《中国学生月刊》总编辑、《伍斯特之声》主笔和中国学生协会总秘书，他还是该学院以训练演说和辩论艺术为主旨的雅典娜俱乐部和林肯俱乐部的成员[③]。1862年美国政府颁布了《莫里尔法案》，极大地鼓励了美国高校实施男女同校制度。1870年伍斯特学院创办伊始就在第一届34名学生中招收了4名女生，并接受男女同班教育。尽管遭到了很多争议，但在第一任校长威尔德·罗德的主张下，这一做法还是坚持了下来。1882年，该校将第一个哲学博士学位授予了一名女生，许多毕业女生在涉外事务中谋得了职业[④]。1889年被本杰明总统任命为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著名教育家哈里斯深信：“学校应该是一种大工具，全民所有阶级皆能借此工具提升到另一种境界，来参与文明社会的生活。”他很早就倡导男女合校，认为女性如由此走出家门投入生产事业中，对她们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就如同男性也经由相同的学科研究之后可以有更高的智力一般；女性有能力接受与男性相同的学科学习[⑤]。美国教育界对女子教育认识的提高特别是伍斯特学院男女合校的做法给郭秉文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毕业后，郭秉文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学。他用3年时间完成了硕士、博士的学习，不仅在学术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哥大的办学思想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特别是注重宽广的知识面和精深的专业知识相结合，注重积极筹集资金谋求学校发展，注重教师参与学校各方面的管理，等等，都成了日后郭秉文办学思想的重要渊源。其间，杜威及孟禄等人的女子教育思想

① J. A. Boydst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The Middle Works, Vol. 13,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Carbondale, 1983, p. 230.
② 高明. 郭故校长秉文先生行状[G]//郭秉文先生纪念集. 台北：中华艺术院，1971.
③ 冒荣. 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5.
④ 冒荣. 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2－13.
⑤ [台]林玉体. 美国教育思想史[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284.

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1905 年起，杜威从芝加哥大学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和师范学院任教，一直到 1930 年退休。他在芝加哥大学时期因创办的实验学校和形成的芝加哥学派等已经是“美国思想界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①。对于女子教育及男女同校问题，杜威在芝加哥时期就充分地表明了他的立场。首先，他认为教育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自从在原始部落中发现可称得上教育的东西以来，教育功能一直是社会性的”②；“作为社会中心的学校概念出自我们整个民主运动。我们处处能感受到，人们正越来越意识到共同体应该为其每一位成员提供充分的发展机会”；“拓展共同体知识和精神资源的共享范围和程度，正是共同体的本义”③，因此，女子教育既是女子权利的一种自然反映，也是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他从自己十余年的教学所得充分肯定了男女同校同授课的优越性：“我成熟而坚定的信念是，男女同授课不仅道德上有帮助而且理智上也是有益的”；“男女同授课是不可或缺的一种预防措施。要建立年轻男女之间的身体接触和社会交往而不先经过教室和实验室遭遇的克制和代偿，将会不负责任地引起困难并带来危险”，之所以有人会提议男女分开授课正是因为他们抛弃了男女同校的本质所在④。在杜威看来，“男女同校的根本原因就是，通过在理智探究和讨论中的联合，男女生熟知彼此的观点、想法和做事方法，并学会相互同情和尊重；这种理智上的同情和尊重是异性间真正所具有的社会和道德态度的一个深刻原因。不同性别的个人彼此适应，这理所当然应该在某个生命时期进行。对于为正确调适而依据理智搭建起来的最有利客观条件，有意进行抑制，或者有意鼓励养成单独的情感、思想和行动习惯，这从根本上就革除了男女同校这一观念”⑤。再次，他认为取消男女同校授课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他曾于 1902 年两次致信给当时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反对将男女分开教学的相关提议。他认为接受男女同校意味着一种责任，不能因部分人的提议或诋毁性的社会舆论而改变既定方针，“大学对女性高等教育事业负有某种道德义务，所采取的（男女同校）做法不能被那些反对此种教育的学校处处加以利用”。这种提议往往会降

① 复旦大学杜威与美国哲学研究中心. 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二卷[M]. 张留华译，周水涛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中文版序第 2 页。

② 杜威. 为社会中心的学校[M]//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二卷. 张留华译，周水涛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60.

③ 杜威. 为社会中心的学校[M]//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二卷. 张留华译，周水涛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68.

④ 杜威. 致哈珀校长论男女同校的备忘录[M]//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二卷. 张留华译，周水涛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9－80.

⑤ 杜威. 致 A. K. 帕克论男女同校的信函[M]//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二卷. 张留华译，周水涛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84.

低大学的女子教育水平，也是对学校男女操行的一种不当考虑。“没有任何问题如性别问题那样会令公众情绪对之具有如此深刻而广泛的敏感性。甚至劳工问题也要相形见绌……有一点仍旧是事实，即当一种体制在性别关系上采取了某种政策之后，若该共同体中大多数人没有从内心相信要么它被认为有害于女性利益要么它不论意向如何却在事实上产生那样的结果，该政策就不可能改变”①。

作为杜威思想的追随者，郭秉文不仅在理论上受其影响，而且在回国后不久便和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使其任职的南高师成为中国杜威教育思想的两大影响中心之一。杜威在华 200 多场演讲中，多次阐述他的男女平等的教育观，“普及教育是为民国所急需而不可缓者。爰将普及教育之方法言之”②；“共和精神，就是要教育普及。这教育呢，是男女都要注重的，因家庭教育全靠女子，男子有男子的责任，女子有女子的责任，然后他们各人做各人的事情，这是共和国的好现象。照这样看起来，女子的教育很重要……因青年脑筋没有坚固，容易感化，能受他父母的教训，可以得完全人格和知识。一天一天进步，全靠着贤母，所以女子最重的是教育……这普及教育，是共和国最紧要的事体”③；“我们重视今天的教育，有三大要义：(1) 注意小学教育和平民教育；(2) 男女必须受同等的教育；(3) 须注重穷乡僻壤的教育”④。诚如郭秉文学生吴俊生所概括的“公为杜氏及门弟子，杜氏赴华讲学，公实促成，而杜氏教育学说之影响于中国教育至钜，公有倡导传播之功”⑤。杜威关于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成为郭秉文日后践行其女子教育思想尤其是首开男女同校之禁的动力之源。

(三) 志同道合者的大力支持坚定了郭秉文首开“女禁”的信念

郭秉文认为，欲办好高师，必须有上乘之师资；欲办好大学，首重广延名师。在回国担任南高师校长之后，他就开始着手为学校的发展物色人才，从各科专家到教育管理者，礼贤下士，竭诚相聘，各类人才以受聘东大为荣，一时间，名师荟萃，蜚声海内，甚至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情况。其中不乏在女子教育和男女共学方面和郭秉文有志同道合者，陶行知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被誉为“敢探未

① 杜威. 致 A. K. 帕克论男女同校的信函[M]//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第二卷. 张留华译，周水涛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85.
② 杜威. 平民主义之教育[J]. 朱公振笔录. 1919 年 5 月来源于单中惠，王凤玉.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C].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51－252.
③ 杜威. 教育与社会的关系[J]. 时事新报 1920 年 6 月 9 日来源于单中惠，王凤玉.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C].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48.
④ 杜威. 教育与社会之进步[J]. 民国日报 1920 年 11 月 8 日来源于单中惠，王凤玉. 杜威在华教育讲演[C].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71.
⑤ 吴俊升. 教育与文化书信选[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202.

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陶行知1915年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即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深造，1917年应郭秉文之聘提前回国，担任南高师教务长。有着相同教育背景的陶行知不仅大力倡导男女教育平等，而且在实践中成为郭秉文首开“女禁”的强力助手。在1919年12月17日南高师的校务会议上，陶行知就提出了《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他认为“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最不发达，中等学校毕业以后，女子几无上进之路。本校各科功课，有宜于女子旁听者，可否通融办理，容其旁听，遂其向学之志愿，未始非辅助女子教育进行之一法”①。并于次年1月14日临时校务会议通过。4月21日的校务会议上他再次表明，无论男女如来校应试，成绩及格均可录取。这一提案奠定了南高师首开“女禁”的基础。

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则在北方为男女同校进行了尝试，与郭秉文形成了南北呼应的局面。早在1902年他就创办了以培养从事革命女性为目的的爱国女学校；1912年任教育总长时主持制定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其中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1917年他利用法国的庚子退款筹建了孔德学校，倡导高小、中学男女同校；同年华法教育会创办的由蔡元培任馆长的高等法文专修馆招生也不分男女。这些既是蔡元培男女教育平等思想的真实体现，也为日后他在北大酝酿开“女禁”提供了实践经验。1919年3月15日，蔡元培在北京青年会作《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演说时明确提出，应该仿效西方国家，尊重女子的人格和平等权利，实行社交公开、男女同校，根据“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之惯例，主张先通过试验，再加以推广。蔡元培的演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甘肃女生邓春兰5月19日致信蔡元培，希望能按照“添设女生班，俟升至大学预科，即实行男女同班……以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使自己能够有机会“负笈来京”②。后又代女界上书，草拟了《请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毕业暨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和《春兰上蔡校长书》并转北京《晨报》发表，一时间引起了各界热议。11月重回北大的蔡元培明确表示，“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③。与此同时，胡适等人也积极倡导男女同校，他在《大学开女禁的问题》一文中明确主张在北京大学接收女旁听生作为招收正式女生的过渡，并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使与大学教育相衔接。这一建议得到了蔡元培的赞同，1920年春北大开始招收女旁听

①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C].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329.
② 郑勇编撰. 蔡元培影集[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154.
③ 王悦芳. 蔡元培、郭秉文办学思想与实践的比较研究[M].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09.

生。不难看出，蔡元培执掌的北大在男女同校问题上与南高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二、郭秉文男女同校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

郭秉文在对中国历代教育制度进行梳理时就概括出了教育中的平等精神，“夫吾国人民，实富于平等精神者也，其于教育制度亦然。古制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受同等之教育……时至近世，学制虽变，而平等精神仍存”①。不仅如此，他还关注到了性别差异在教育管理中的区别，在 1916 年出版的《学校管理法》一书中他专门讲到：“男子多注意于物，女子多注意于人；男子多善作事，女子多善用情；男子多善争斗，女子多善看护。皆不能相勉强，更调者也。夫万世万国终无二人有同一之性质者，奈之何用？同一之方法，以管理之乎是宜。保存其固有之个性。而善为损益之，则管理儿童之善法也。”②到了 1919 年他则将女子教育与女性解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年 12 月，郭秉文在《我国今后教育问题》中谈到：“各国所共同注意，务使男女在教育得同等机会，世界潮流所至，我国亟应注意。在此次大战中，女子都入社会服务，社会上已承认其与男子有同等能力，自应受同等教育。近来国人盛唱女子解放，其实在欧美各国，女子早已解放。我国在实行解放之前，先须有机会养成女子独立之能力，则不解放而自解放，否则不从根本入手，徒知提倡解放，适以害之也。鉴于世界潮流，男女同学，各国久已实行，我国至于今日，始知提倡，已嫌过迟。亟应自高等小学起，逐渐开放，此次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已有议及之者，深望其及早实现也。”③他还多次强调，“世代以来，我们的妇女一直承担着忠实妻子和慈爱母亲的角色。在这个新的时代，从现在起，除了这两种角色之外，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不论性别差异，通过赋予他们同等的受教育权和同等的受尊重权以在男女中培养走在时代前列的领导者”④。

在就任南高师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期间，郭秉文为推动男女同校、首开“女禁”进行了如下实践：

（一）成立女生指导部，并任命女职员为女生指导部主任。这是当时“任何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绪言 8.
② 郭秉文. 学校管理法[M]//教育丛书[C]第二集第六编. 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9－10.
③ 郭秉文. 战后欧美教育近况[J]. 新教育第二卷第二期。
④ Mr. Way Sung New(牛徐亦蓁). As I Remember. *In Memoriam Ping Wen Kuo*(1880—1969), China Academy, September, 1971, Ivi.

一所政府下辖的师范学校、大学中前所未有的”[①]。郭秉文冲破了人们传统的思维藩篱，在男性主导的学校中将一主任职务授予一女性，并要让所有教职员工接受，这已是一种创举。而在主任人员的选择过程中，郭秉文也颇费了一番心思。为提高对南高师女生的教育管理能力，期待着男女同校后女生管理工作的成功，郭秉文在筛选了数十位应聘者资料后，最终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5 名首届毕业生中精心挑选了徐亦蓁（吴贻芳的同学）做女生指导部主任。徐亦蓁在校期间，主修历史，辅修心理学，上大学前曾有过 8 年的教龄。她后来回忆说，在这个新时代开启的新的教育运动中，郭秉文先生顶住了很大的压力选择她这个接受过基督教传统、年轻且无太多管理经验的女生担任这个重要职务，显现出他的一种勇气和前瞻力。为了能让徐亦蓁来校任职，郭秉文还在 1919 年 7 月 5 日专程到金陵女子学院参加她的毕业典礼并想在她毕业的第一时间得到明确的答复[②]。正是他这种执着的勇气和诚意感动了徐亦蓁，并激发了她内心深处教育中国年轻一代的意识，从而使她能在一生中专注于先进的教育心理学研究与训练，并取得相当造诣。郭秉文出任南高师校长之后，就在成立的校务委员会中正式设有招收女生委员会，刘伯明任主任，陶行知、邹秉文、张士一、俞子夷、李玛利、徐亦蓁任委员。在 1921 年 2 月 5 日的《东南大学组织大纲之议定》中也明确规定校行政机构中设立“女生指导部”，专门用以指导女生教育诸事项。

（二）取得教育部的同意。1920 年初，郭秉文委派陶行知就南高师正式招收女生一事赴京与教育部接洽，取得了教育部的基本同意。教育部还指出应注意的事项：“兼收女生问题宜注重三点：一、须规定女生入学资格以期程度相当；二、须备有宿舍使学生起居妥善；三、须有相应女职员负指导责任。如筹划妥当，暂行试办。”[③]考虑到这一举措可能遇到的阻力，为造声势，郭秉文与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商定，决定南北一致行动，共同开放“女禁”。在南高师和北京大学的南北倡议及教育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3 月 24 日教育部对改革女学制度案批复云：“改革女学制度案，应斟酌地方情形，准其试办。”[④]

（三）正式招收女生，首开“女禁”。1920 年 4 月 7 日，郭秉文主持召开了由 18 人参加的南高师第十次校务会议，讨论招收女生一事，转达了教育部的三条注意事项，经表决，多众赞成，当即决议请招收女生委员会草拟兼收女生的详细

① Mr. Way Sung New（牛徐亦蓁）. As I Remember. *In Memoriam Ping Wen Kuo*（1880—1969），China Academy，September，1971，Iiii.
② Mr. Way Sung New（牛徐亦蓁）. As I Remember. *In Memoriam Ping Wen Kuo*（1880—1969），China Academy，September，1971，Iiv－Iv.
③ 南大百年实录（上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87.
④ 参见《教育公报》第 7 年第 5 期。

办法，并决定自1920年暑期起正式招收女生。

南高师首开“女禁”的决定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每一种公开出版的期刊无不强调这是一种新理念、新思想、新青年、新教育哲学、新逻辑科学”①。与此同时，也引起了朝野哗然，各种流言蜚语不堪入耳，甚至思想比较开明的张謇和南高师老校长江谦也明确表示反对。经郭秉文、陶行知等人多方解释，招收女生的入学考试如期进行。经过严格考核，在前来应考的百余人中最后确定正式录取了8人，她们是：李今英、陈梅保、黄叔班、曹美恩、吴淑真、韩明夷、倪亮、张佩英。其中，教育科2人，英文科6人②。此外，在贵州、四川、察哈尔三处的特别生中招收了女生20人，同年还招收了50余名女旁听生，从而使南高师成为中国第一个招收女生的高等学府。为方便对女生的管理，学校还设有女生指导员2人，专门负责“女生教科、膳宿之接洽照料等事”③。1921年夏，作为国立东南大学五大学院之一的上海商科学院建设方案由教育部正式批授，9月28日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决定，该学院第一期入学人数为294人，其中包括10名女学生。如此，招收的各类女生数达86人，占了全校总人数1 041人④的8.2%。

三、郭秉文男女同校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

郭秉文打破传统教育思想的樊篱，倡导男女同校并首开“女禁”，揭开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篇章。南高师和北大的试点取得了成效，“最可喜的是看见当初反对大学男女同学的父母，现在也渐渐的送他们的女孩儿到这些学校里去上学了”⑤。熊希龄参观学校后感慨：南高东大，实行男女同校，很有意义，令粗犷之男生，渐次文质彬彬；令文弱之女生，渐显阳刚之气，盖收男女同校之效也。美国克兰公使夫人来校参观时极其感动，离去后特委托杜威博士发来贺函，并以私人捐资2 000美元鼓励女生深造⑥。这是对近代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实现男女教育平等之现实需求的一种有益尝试，也从一个层面彰显了20世纪初女子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当时与后世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

① Mr. Way Sung New(牛徐亦蓁). As I Remember. *In Memoriam Ping Wen Kuo*(1880—1969), China Academy, September, 1971, Iiii.
②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C].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339.
③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C].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340.
④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C].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341.
⑤ 陶行知全集第一卷[C].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525.
⑥ 朱斐. 东南大学史(1902—1949)[M](第一卷).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60.

郭秉文首开“女禁”直接推动了以男女同校共学为主要形式的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1920 年 10 月，全国教育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再次就促进男女共学以推广女子教育问题呈案教育部。决案鉴于“一年以来，各地高等专门以上学校男女同学已逐渐实行，惟女子中等教育尚未普及，专门大学招考女生及格者自居少数”，因而提出“兹为增多女子求学机会，促进男女同学起见，拟请大部通令各省区各级学校招收学生或绝对的男女同学，或部分同学，或添设女子班或附设，各就地方情形，酌择办理，庶人才经济两问题较易解决，习惯不同之障碍不以减少，男女共学之目的，亦易达到”①。1922 年 11 月 1 日，以大总统令公布学校系统改革方案，新学制遂正式建立。该学制中不分性别，表明教育为男女所共有，男女在平等的原则下享受同等的教育，从幼稚园到大学院，都为毫无差别的男女享受。至此，中国女子教育才算走上正轨，真正的男女平等教育在制度上得以确立。正如程谪凡在《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中所言，“这新学制已显示教育不是男子的或女子的教育，而是‘人’的教育了。教育既是‘人’的，自无须再分辨男女，以性别为施教的标准，男子和女子，应该同站在‘人’的地位，同等的参与教育活动。这种教育制度，才是真正的平等的教育”②。王世杰则评价道：“这样普遍地采用男女同校制，在欧战以前差不多只有文化最高、社会习惯最优美的几个北欧国家。中国是一个贫国……所以男女同校制普遍实行以后，所谓教育机会平等的主张，便得着了一个广大的基础。”③这是给全国妇女界的一种真正的实惠。

郭秉文首开“女禁”及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女性解放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21 年夏，陶行知在安庆暑期演讲会上又专门作了一次题为《教育者之机会与责任》的演讲，再次从三个方面强调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即“女子同为人类，自应有知识技能，去谋独立生活……所以女子必须受教育，去共同担负社会的责任”、“女子富于感化性，能将坏的男子变好，并且可以溶化男子的性情与人格”；“女子受教育，必定十分顾及他子女的教育”，因此普及女子教育意义重大。1925 年夏天，郭秉文在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基金学院中华教育促进会会长时，组织了第二届远东问题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公开演讲。在概括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时，郭秉文专门讲到女子教育对中国带来的影响：“在现代中国，妇女活动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家庭或过去的领域，而是大大地拓展了。她们在工厂中的地位已经牢牢地建立，并且正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① 关于促进男女同学以推广女子教育案[J]. 教育杂志. 1920 年(第 12 卷第 12 号)。
② 程谪凡. 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M]. 上海：上海中华书局. 1936：115.
③ 郑勇. 蔡元培影集[M].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157.

那些接受过教育的妇女更是在护士、医生和教师中找到了自己的职业。商业活动也正向她们开放。上海已出现了一家由妇女创办和操作的现代银行，不过同时接纳男人和妇女。男女同校被引进中国证明是成功的，妇女拥有和男人一样的追求教育的平等机会。在上海一所特殊为妇女开办的法律学校已经建成。受教育的妇女正表现出对社会活动和政府公务的积极兴趣，并日渐成长为现代社会一支重要的影响力量。”①当然，“现代教育正被视为是一种将男女从传统的自我兴趣中解放出来的工具”②，它更强调其社会角色，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正是完成其社会角色转变的重要前提。破除制约个体发展的性别限制，通过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利以造就独立自主的健全人格，正是实现女性解放从而构建理想社会过程中不可缺省的一环。过去如此，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

① P. W. KUO. Political，Economic，and Social Tendencies in Modern China. //*Orient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ar Eastern Problem*（Lectures on the Harris Foundations 1925），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5：129.

② P. W. KUO. Political，Economic，and Social Tendencies in Modern China. //*Orient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ar Eastern Problem*（Lectures on the Harris Foundations 1925），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25：131.

论郭秉文的高等师范教育思想*

◎宋业春（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

我国师范教育发展较晚。1897 年盛宣怀在南洋公学中设师范院，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师范学堂。我国近代最早的高等师范学堂是于 1898 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这两所学堂的师范教育都不是独立的系统。1902 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式开学。1904 年《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颁布实施，确立了师范教育的独立地位，由此师范教育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然“癸卯学制”基本上沿袭日本师范教育模式，是一种封闭式的定向培养制度，在确立师范教育独立地位的同时，也抑制了师范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国内教育界人士开始对师范教育制度进行反思，改革师范教育的呼声愈益增强。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围绕师范教育体制的“独立”与“合并”之争论，国内发生了“高师改大”运动。其中以郭秉文为代表提出了“寓师范于大学”的改革主张，首先突破高师独立的体制。这一变革借鉴了高等师范教育体制的“美国模式”，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改变传统封闭式的师范教育体制，形成以非定向培养模式为特征的开放式师范教育体制，成功推进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整体转型。郭秉文在中国高等师范教育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作者简介**] 宋业春(1972—)，男，安徽肥东人，博士，东南大学校长办公室副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93－94.

一、郭秉文的师范教育观

师资不足及其质量不高是近代师范教育面临的一大问题。郭秉文指出:“合格教员选择之难,为吾国近世教育进行之一大障碍。当新教育之发轫,政府、人民于教育实质上之建设,若校舍、器具、地图等,规模务求其备,然惟聘请正式养成之教员则终觉不足。非政府懵于教育之大计,而不欲进近世教育于光明也。盖设立学校易,养成教员难。教员非若学校可以短时间成就者也,生长发育以待成熟,为时颇久。况学校愈多,需用教员愈繁。西哲有曰:炮制就已驾设,惜无施放之人。旨哉言乎。学校之骤然增加,如何供给多数合格教员,实为颇费解索之一问题也。”[①]这里,新教育在校舍、器具、地图等,规模务求其备,但在合格教员的选择上存在严重不足问题。原因不是因为政府不关心教育,而是在于师资培养非一时之事,“设立学校易,养成教员难”,师资培养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这是其一。其二在于当时新式学校设立较多,师资需求量较大,而当时的师资来源较为单一,国内师资供给远远不能适应新教育发展的需要。

郭秉文具体指出了当时师资来源的四种途径:一是教会学校毕业生。“是故吾国政府人民当速求得教员之法,以济急需。为中国近世教育之先导者,教会学校也。而得新教员最先之源,亦为教会学校。盖教会之大中学校多授新教育,其毕业生较宜充新学校之教员。吾国官私学校之聘请教会学校毕业生为教员者甚多,不独需要之大,且学校增加颇速,故往往有求过于供之虞。”[①]这里,郭秉文较早指出近代教会教育在培养师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二是“素著声誉之学士”。“新学校教员第二之来源为素著声誉之学士。彼等知社会之情形已变,非改志趣难以图存。遂由间接而学新知识,急切从事,欲速则不达,幸而有得亦残缺浮薄者耳。推彼等多数之意,以为教育可由捷径而得。各种科学之特点仍付学生自习之,不必深究其原理。此类之人可名曰教育事业家。受各种被动力而养成,或为受人一念而然,或为经济关系而出。然论其大体,较之旧式学校教员,其思想之进步,奉职之热诚,所胜实多;但以己身过去之历史为标准,以儿童委托其手乃属危险之事。”[②]这些来自于传统又具有革新思想的人士,是新教育制度下师资重要来源之一。

三是聘请外国教师。“当新教育制度之初开幕也,教员不得不借材于异国,

①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94-95.
②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95.

惟以高等程度学校为限。自中学起至大学止，其数不多。其故由于高等程度学校之居少数也。”[①]早期延请外国教员者皆归各学校自己之主张，到1907年情形开始一变，始有聘请外国教员章程，且事前须得到学部承认。

四是留学生。“留学回国之学生亦为教员之一种。”[②]留学生也是新教员来源之一，只是当时人数较少。

由上述可知，当时师资来源，不仅规模不够，质量不高，而且师资来源要么依赖于外，要么来自于旧式知识分子。新教育的师资培养不能自主。因此，郭秉文指出应大力发展师范教育，师范学校应是师资培养的重要来源。“师范学校与师范养成所皆为产出教员之地。”[③]但当时师范教育存在诸多问题。

郭秉文指出，“吾国人数占全球1/4。若施教育而无充分之预备，是大不可也。教员最要预备为教员之养成。若吾国新教育之教员，能取材于旧式学校，则学校之增加虽多，亦无难问题之发生。所惜吾国之旧教员之其素养不合于近世学校之需要，其故由于科举时代，只知争得一矜之荣，即终身恃此以为衣食。设馆授童无教员检定书、教科书、课程表等，惟知笃守遗规，藉执教鞭而已；或被聘为西席，或受徒于己家，学生之数鲜过20以上者；教授重记忆而轻推理力。”[④]旧式学校中的教员素养不合于近世学校之需要，他们“只知争得一矜之荣，即终身恃此以为衣食”；死抱着旧式教育不放，“惟知笃守遗规，藉执教鞭而已”；所教学生人数有限，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学方式重记忆，轻推理，死记硬背的多。加之当时的教师构成多来自旧制学校，教师习惯于传统的封闭式教学，习惯于以“强压与骄慢之精神”对待学生。

故当时的教师队伍不能尽职或胜任，甚至有教师教授荒谬，违背教育科学。“由是而言，吾国新学校之教员尚不能谓之曰尽职或胜任愉快也，间有若干学校之教授荒谬，背乎教育原理者。然师范学校之毕业生，吾国教育家对之尚多不足之辞，若其然也，何怪之有？盖青年学子之肄业师范学堂，多数非初高等小学毕业者，基本学问已不完备，而师范学堂科目繁多，时间短少，以致教授学习大概多属皮毛，每星期之钟点自34小时至36小时，不仅所习之科目有囫囵吞枣之弊，且于卫生大有妨碍。欲矫正斯失，师范学生必习正科，而入学资格限以曾受小学教育者。如是知师范毕业生程度较优，而教育事业亦有改良之望。”[⑤]因此，郭秉

①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95.
②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95.
③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96.
④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94.
⑤ 郭秉文.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96.

文深感师范教育改革之必要。他在1914年就提出“中国今日之所需者为高等师范学校之改良”。

郭秉文指出,新教育制度推行以来,教师地位及素质都在发生变化,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均不同于旧式教育,现代教学手段逐渐引入课堂。他说:“自新教育之制度行,教员之地位与前不同,所知者不仅经学与古文,所教者非个人乃全班,教员不独启发学生记忆力,并注重推理力,此皆非旧式教员所能为也。旧式教员富于保守性,不肯轻弃其夙习之旧式教授法,然有时也不得不承认一部分新学问、新教授法之灵便,而露其惊愕之意。因无适从之道,一旦改入新学校为教员,对于教科书谨守其范围,少有变化,且仍偏重记忆力,若助学生思想之法则非彼所习或非彼所喜也。于近世教育学在彼视为一种新科学,彼或无所取,或能重视之,然而不能善用之以尽其效。”[①]新旧教育的变化,郭秉文在其博士论文及相关论文中都有充分的论述,其对于新教育的倡导,对旧式教育的批判,体现了郭秉文对于师范教育的高度重视。

师资供给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师范教育现状令人担忧,对此郭秉文认为要从师范教育体制上查找原因。“历来教员养成之数,不能与各种学校之需要相应合,是亦立法有未尽善也。”[②]而师范教育体制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各派意见分歧,形成了我国师范教育改革史中第一次大争论。有主张废止师范,认为高等师范无单独设置的必要,从而否定师范教育的专业性和合理性,属于比较极端的一派,他们认为“高等师范学校,实是大学及专门学校的赘疣,大可割去”[③];有主张高师自为一体,高等师范要独立设置,如经亨颐、俞大同主张特别把师范教育另立一个系统,称为“师范学制系统”,内部可以依次升学,这是对传统的延续和继承;更多的是主张改革现行师范教育,或改为综合师范大学,或“寓师范于大学”。

在诸多的观点中,郭秉文的看法相对要“折中”得多,显得更为理性。一是他反对“虚无派”,反对某些学者否定师范教育的主张,认为师范教育很重要,尤其是师资培养为教育首要,不得不高度重视,要尽力从事师范的培养。另一方面郭秉文针对当时师范教育存在的封闭式、单一性严重问题,他认为当时的师范教育远远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师范教育的改革在紧迫之内,是当务之急的事,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改革主张。在郭秉文看来,师范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为社会培养数

①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94.
②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96.
③ 李友芝.中国近现代师范教育史资料[Z].698.

量足够的、合格的师资力量，师资培养模式不是仅仅限于单一的师范教育体系中；要从社会需求出发，改革高师培养模式，通过将师范教育纳入到大学教育体系中，突破传统师范教育的狭隘性；同时加强师范教育的学术性，提高师范教育的层次，从整体上提升师范教育的地位。郭秉文的师范教育观，为中国现代师范教育的转型奠定了理论基础，丰富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理论，对于师范教育的中国化意义深远。

二、郭秉文“寓师范于大学”的倡导和实践

1.“寓师范于大学”是对美国师范教育理念的引入

最早把美国高师教育制度引入中国，倡导并成功实践的是郭秉文。1908 年郭秉文赴美留学，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美国最著名的教育学院，也是美国综合大学办师范教育的成功典范。郭秉文深受美国师范教育模式的影响，1915 年学成回国，开始执掌南高师，结合对当时国内情形的分析，提出“寓师范于大学”的办学理念，认为综合大学兼有培养师资的功能，力主把南京高师办成一所综合性的国立大学。在他看来，“师范学院应办在大学之内，教师的来源不必局限于学院”①，综合性大学的优秀学生，若经过一番教育理论的训练，往往能成为优秀的教师。因此，“南高改组为东大，并非一般人所想的升格，或好高骛远，而是科学的教育理想的实践，因为中等以上的教师，应该是双料的学士、硕士和博士”②。显然，郭秉文的良苦用心在于，通过综合性大学教育，使专才向通才发展，做到“通才与专才的平衡”，培养学生获得宽厚的基础知识和科学研究的精神和能力，使优秀人才经过一定的教师训练，成为上乘的师资。

“寓师范于大学”成为郭秉文教育改革的重要主张，并得到了陶行知等一批教育改革家的呼应。陶行知《新学制与师范教育》一文中概括地较为全面：“高等师范入学之资格毕业之程度既与大学同，似宜以单科大学称呼他。因为这种机关不止培养师资简直就可称他为教育科大学，那设在综合的大学里面的就叫他为大学教育科”，“高级师范以培养地方教育行政人员、初级中学同等程度之办学人员、指导员、教员为目的；招收高级中学毕业同等学力的来校学习，修业年限三年以下”，“教育科大学以培养教育学者、教育行政人员及高级中学同等程度之指

① 朱一雄. 东南大学校史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52.
② 刘正伟. 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1.

导员、教师为目的。修业年限四年以上”,“大学得设教育科及高级师范”。[①] 至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寓师范于大学”成为国内高师改革的主导方向,从而进入体制运行实施的新阶段。新学制改革是中国现代高师教育史上影响最深的一次变革,标志我国高师教育由“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转变。

2. “寓师范于大学”经郭秉文大胆实践得以成功实施

郭秉文在东南大学实行的“寓师范于大学”改革最具影响力,也最为典型。1915年,郭秉文在出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时就开始“寓师范于大学”的教育规划。1918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筹办东南大学,首先突破高师独立的体制,实现“寓师范于大学”的办学方式。1919年,郭秉文就任南京高师校长。1920年4月7日,郭秉文提出“在南京高师的基础上创办一所国立大学”的议案,得到了南京高师校务委员会的一致赞成。9月25日,郭秉文会同张謇、蔡元培、蒋梦麟等十位先生联名上书教育部:“拟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设东南大学,以宏造就。”12月7日,经北洋政府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并定名为国立东南大学。12月16日,成立“东南大学筹备会”。1921年教育部核准《东南大学组织大纲》,东南大学正式成立。8月,东南大学预科和南京高师本科同时招生。12月,南京高师正式并入东南大学。

在办学方向上,因社会需要设科,寓师范教育和实科教育于一体。南京高师的办学宗旨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一方面故为养成优良教师,另一方面劝求深造,兼欲养成专门学者。”[②]南京高师把培养专门学者作为两大目标之一,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培养中学教员,这必然会使其课程、教学、管理等的方法具有普通大学的性质,“以社会需要为设科主旨,但社会需要随时变更,是所设之科亦因之而异”,首先设置国文、理化两部,是“鉴于国文、理化教法之改良”;设体育专修科,是“鉴于社会体育不振,而任体操教师者又多不明体育之原理”;设工艺专修科,是因“人民生产力薄弱,而一般毕业学生又乏职业之知识技能”[③]。南高师在学科理念和设置上已经突破了师范的局限,具有了综合性大学的基础。郭秉文强调“根据智育标准”和“适应社会需要”为“设科主旨”,并认为“社会需要随时变更”,所设之科也应“因之而异”,其学科结构并未囿于师范学校的框架,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之中。1920年南高师共有8系8科,突破了师范界限,寓师范教育、基础教育、实科教育于一体,已具综合大学雏形。有人评价:“南高师所擘画,颇异

① 陶行知.新学制与师范教育[C]//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985-986.
② 吕春晖.20世纪20年代的高师转型及其实践[J].现代教育科学,2007(3):56.
③ 吕春晖.20世纪20年代的高师转型及其实践[J].现代教育科学,2007(3):57.

部章，而专科增设之多，尤为各高师所未见。”①

在教学制度和课程设置上，主要是推行选科制即学分制。郭秉文认为师范教育要寓于综合性大学中，在综合性大学中开设教育科系实施师范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师范人才。从教学制度上实现开放，改变单科的师范教育，主张综合的师范教育，培养综合型的师范人才。1919 年南高师校务会议一致通过《改良课程案》，决定自 1920 年 9 月开始实行选科制。选科制的实施，有利于因材施教，推动了教学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受到学生的欢迎。其后选科制为其他高校广泛采用。

在管理体制上，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而选择在当时日渐增大的美国“大学教育学院”的办学模式，首先实行董事会制度，注重分权制衡管理。这种领导体制在国立、公立各高校中是首次建立，加强了学校与政府教育与社会的联系。董事会制度有利于学校面向社会办学，在职能定位方面强调社会性和服务性。

可以说，郭秉文“寓师范于大学”是对师范教育的整体改造，是师范教育的体制改革，包括高师办学方向、课程设置、管理体制等，是全方位的变革，使得高师教育突破传统师范教育封闭式的办学体制，使得中国师范教育开始第一次转型。

3. “寓师范于大学”的评价

郭秉文“寓师范于大学”并不是要取消师范院校的独立地位，更不是忽视高等师范教育的独特作用，而是在高等师范教育路径上走的是综合培养道路。他充分认识到，清末以来高等师范培养存在的模式单一化弊端，希望引入综合性大学培养师资来拓宽高师教育的道路，应该说在当时是先进的理念。他的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是符合世界师范教育改革的走向。

郭秉文高师教育改革，打破了定向培养师资的体系和模式，增强师范体系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正是“寓师范于大学”，大学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教育科学研究和师资培养工作，1922 年后我国高师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实质的变化。高师教育既有师范大学，也有综合大学的教育系、教育学院；从职能上看，高师不再是单一的培养师资，还负有研究教育学术的责任。师范教育的概念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师范教育体制由封闭走向开放，师资培养由垄断走向竞争，师资来源由单一走向多元，形成了多元化的师范教育体制。

“寓师范于大学”改革促进了我国近代大学的整体发展，综合实力有了显著提升。虽然也造成了师范专业院校数量明显减少，师范功能弱化，师范教育生存危机，但高等教育整体性功能得到了增强，使得近代一批大学崭露头角，具有较

① 王德滋. 南京大学史(1902—1992)[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20.

强的竞争力，推动了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正是经历了高师教育的综合化，高师教育的专业化才有了更扎实的基础，为后来高师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三、郭秉文对中国近现代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历史贡献

郭秉文是我国近现代高师教育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是我国高等师范教育改革的先驱，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多元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其关于师资教育的主张，关于师范学校的主旨、高师的培养目标等问题论述，均触及近代高师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从高师教育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郭秉文高等师范教育改革有其合理和进步意义，第一次冲击了封闭型师范教育体制，推进了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国际化进程，符合世界师范教育变革的趋势，表现出极大的改革创造性，无论在改革理论上，还是改革成效上，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意义。

第一，开创了师范教育在综合性大学中的先河。其后，师范教育在综合性大学中逐渐发展起来，开始出现多样化、灵活化与开放化。“寓师范于大学”，20 年代后期，一些国立和私立大学相继开始参与师范教育，培养中学师资。如国立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均设立教育学院，实行开放式师资培养模式。20 世纪 30 年代，国内知名大学建立师范学院，提高了我国高师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成绩是不容抹杀的。综合性师范教育在中国近现代高师教育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正是在此后，师范教育体系日趋完整。尽管之后，因各种原因，师范教育一度低迷，但正是综合性大学开始接纳师范教育，或者说，中国师范教育开始进入大学化时期，师范教育成为综合性大学中的一部分，其主要目标是培养教育学术人才，与综合性大学研究生教育相衔接，提高了师范教育的综合性、学术性，师范教育才有可能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师范教育才真正融入整体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确立了师范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丰富了我国高师教育结构，形成了完整的高师教育体系。

第二，奠定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体制转型的基础。中国近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师范性与学术性理念的冲突，这是师范教育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事实上，这种冲突对师范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关键问题不是回避师范性与学术性理念的冲突，而是要努力寻找这两种理念的一个契合点。这个契合点应该是我国师范教育机构转型的目标所在，既

提高学术性，又不忽视师范性，使它们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①]1920 年前后，美国教育理念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日益加深，特别是随着杜威、孟禄等人相继来华讲学，美国大学模式深刻影响中国教育改革进程，开始由清末民初模仿日本转而学习美国。南高师受到美国大学教育学院模式的影响，强调社会需要、适应性，注重能力的训练。“如果说，在南高师出现以前，中国高等师范教育仅一种模式的话，那么从南高师开始，两种模式同时开始对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发生着深刻的影响。由此，在 1922 年后的高师升格运动中，北高师坚持要办成师范大学，南高师全体一致赞同改成普通大学，就不是偶然的了。”[②]其中以郭秉文为代表无疑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郭秉文提出的“寓师范于大学”，借鉴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教育办学模式，将师范教育与综合性大学教育结合起来，实现师范教育与高等教育融为一体，从而将师范教育真正纳入高等教育的主流之中，取得了与综合性大学的医学、法学、工程等学院同等的专业教育地位，由真正追求数量进入了注重质量的阶段，将高等师范教育从定向型转向开放式培养，提高了师范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使师范教育的师范性与学术性真正从分离开始走向融合发展的道路，打破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师范教育的封闭式体制，为中国师范教育的成功转型奠定了基础。

第三，推进了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科学研究。普通大学教育学系、教育学院开始承担教育科学的引进、传播与创新的责任，为中国教育科学的科学化、专门化做出了贡献。综合性大学不仅通过各种形式，如设师资培训班、师资专修科、第二部等，参与中学师资培养，而且开展教育科学的研究，引进各种新教育学说，试验各种新教学方法，辩论各种不同教育观点，编纂各种新式教材，全面提升了我国高师教育质量和水平。南高—东大时期教育科学研究日益活跃，教育理论如实验、心理、统计逐渐本土化，教育科学的本土化，南高—东大时期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一新的思想传播离不开哥大留学生，其中郭秉文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当时南高—东大时期教育思想十分活跃，教育科学派别林立，不同的教育观点激荡，教育启蒙，有利于冲洗当时封建残余影响，正是教育思潮汹涌，极大冲击了传统教育思想。

作为我国近代杰出的教育改革家，郭秉文成功改造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高等师范教育制度的中国化进行过不懈的探索。他借鉴了美国高等师范教育模

① 王晓宁. 英国师范教育机构的转型：历史视野与个案研究[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248.

② 霍益萍. 中国近代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史略[J]. 教师教育研究，1989(1)：69.

式，融合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创造了选修制，高师教育向社会开放，为更多的知识进入高师殿堂打开了大门，也为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激励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大胆开放女子高等师范教育，倡导男女平等，民主教育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受日本师范教育模式影响的近代师范教育发生转型，实现了师范教育本土化和综合化的变革。其提出的“寓师范于大学”主张对于近代师范教育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郭秉文的高等师范教育思想至今仍然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郭秉文教育思想研讨会综述*

◎耿有权　汪　琴(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在东南大学迎来109华诞之际,为纪念我国近代杰出教育家郭秉文先生首任东南大学校长90周年,由东南大学发起并主办的"郭秉文教育思想研讨会"于2011年6月5日在东南大学隆重举行。东南大学党委书记郭广银教授出席研讨会并致开幕词,东南大学校长易红教授做主题报告。会议开幕式由东南大学常务副校长胡敏强教授主持,东南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左惟教授、副校长郑家茂教授参加了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同东南大学社会科学处等相关部门领导、老师、同学相聚一堂,共同纪念和缅怀郭秉文先生,总结郭秉文先生对东南大学乃至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建设发展所做的杰出贡献。

台湾"中央大学"教务长李光华教授应邀参加并作特别报告,指出台湾"中央大学"与东南大学同根同源,郭秉文教育思想不仅是东南大学的办学旗帜,也是"中央大学"的重要指导思想。郭秉文本科就读学校美国伍斯特学院校长Grant H. Cornell特派该校历史学讲座教授葛德卫(David Gedalecia)和该校在南京大学任教的斯诺(Don Snow)博士组成伍斯特学院校长代表团参加了本次研讨会。葛德卫教授发表题为《郭秉文与伍斯特学院》的演讲,同时代表伍斯特学院向东南大学赠送郭秉文就读期

*[作者简介]耿有权(1967—),男,安徽全椒人,博士,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教育伦理研究。汪琴(1988—),女,安徽宁国人,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生。本文曾发表于《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间的学籍档案和“杰出校友”荣誉证书，丰富了会议研讨内容。郭秉文博士就读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校长 Susan Fuhrman 发来贺信，指出郭秉文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杰出校友，他不仅是哥大师范学院和东南大学之间的特殊纽带，而且使东南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发挥了卓越作用。台湾“中央大学”李淑萍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丁钢教授、南京大学冒荣教授、厦门大学张亚群教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储朝晖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许小青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陈履伟校长、东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时巨涛部长等分别为大会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他们的学术报告从不同的层面，全方位、多视角、多维度地展示了郭秉文教育思想研究新成果，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郭秉文的研究领域。

郭秉文先生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留下了大量关于教育问题的精辟阐述，这些阐述共同构成了郭秉文教育思想体系的丰富内涵。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郭秉文教育思想这一主题，对郭秉文教育思想的历史来源、核心理念、办学思想等作了充分研讨，形成了重要共识，即郭秉文是我国近现代杰出教育家和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开拓者。本次研讨会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主题报告

东南大学校长易红教授为本次研讨会做了“继承和弘扬郭秉文教育思想，加快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步伐”的主题报告，指出本次研讨会目的在于使人们更加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郭秉文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杰出贡献和重要地位，为推进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易红校长提纲挈领地回顾了数十年来郭秉文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些成果中取得的共识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首先，从四个方面阐述了郭秉文的教育贡献，认为郭秉文是学贯中西的教育理论家、真抓实干的教育实践家、勇于创新的教育改革家、具有国际影响的教育活动家。作为把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引入中国的先行者、融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教育理念的成功实践者以及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多元化的杰出贡献者，郭秉文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开拓者。其次，高度概括了郭秉文教育思想体系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四个平衡”的教育理念、“学术并重”的办学思想、“三育并举”的育人方针、“服务社会”的办学特色和“民主治校”的管理模式。郭秉文教育思想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教育理念的有机结合，是理论和实践融会贯通，集科学性、创新性和前瞻性为一体的完整体系。最后，易校长结合现实，强调 2011 年是郭秉文先生担任东南大

学首任校长 90 周年，也是东南大学“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作为一所融光荣历史和创新精神为一体的百年名校，东南大学将秉承郭秉文确立的“止于至善”的校训，不断汲取郭秉文教育思想，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合作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科学谋划学校发展目标和战略，加快建设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步伐，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郭秉文教育思想来源研究

关于郭秉文教育思想的来源，多数专家都认为源自留学教育和中国文化双重影响。从留学教育方面看，伍斯特学院讲座教授葛德卫认为郭秉文的教育思想起源于其就读美国伍斯特学院期间。他指出，郭秉文在伍斯特读书期间就对教育改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924 年，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孙洪芬博士曾在伍斯特学院的校友杂志上写道：“在伍斯特学院，郭秉文放弃了他原来学习法律的计划，而对教育改革发生兴趣。”这显然是受到伍斯特学院始终倡导的人文教育理念影响的结果。伍斯特学院对郭秉文的影响，不仅在于激发了他对教育改革的兴趣，还体现在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办学主张里，尤其是“人文与科学的平衡”。此外，葛德卫教授还对郭秉文就读期间的事迹做了详尽的介绍，提供了报刊、杂志、图片等多种丰富资料，补充了国内郭秉文研究史料上的不足，对史料搜集整理有深远意义。

台湾“中央大学”校史馆李淑萍副教授通过挖掘郭秉文的教育著作《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评述了其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对先秦两汉教育与学术的反思，深入探寻了郭秉文教育思想的历史来源。她提出郭秉文“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来源，得益于郭秉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深受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博士“实用主义”及其教育哲学的影响。郭秉文身处于中国风雨飘摇之际，为了挽救积弱不振的祖国，他毅然赴美留学并选择攻读教育学，目的即是希望能够透过教育推行改革，使得国家得以强盛。因此他认为教育必须着眼于实际，符合社会需要，于是“实用主义”的理论主张应运而生。可以说，郭秉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既是郭秉文教育思想的历史来源，也是郭秉文将其教育思想正确运用于实践的体现。

此外，李淑萍副教授还特意展示了台湾“中央大学”“秉文堂”照片，该讲堂位于“中央大学”首栋建筑物“科学馆”的二楼，1969 年为悼念郭秉文先生逝世而命

名，是“中央大学”学生入学、求学及毕业的重要活动场所。“中央大学”著名校友高明先生曾这样称赞郭秉文：“国立中央大学之基础，实奠定于南高、东大之时；而南高、东大之规模，实建于先生之手。”

三、郭秉文教育思想国际理念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丁钢教授将郭秉文“国际公务员”身份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中，帮助我们认识到作为在国内享有教育改革家盛誉以外另一面的郭秉文，丁钢教授将其定义为“美国的现代中国学拓荒者”。1925 年，郭秉文应邀担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基金讲座讲授，以“中国·远东·外交”为题作连续报告，不仅开创了以中国大学校长身份主持美国大学讲座的先例，还较早地确立了现代中国学的区域研究范式。1926 年，郭秉文在纽约组织成立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宗旨的华美协进社并担任会长，邀请国内名流到美讲学或表演，宣传中国教育与文化，成为“国人访美的中枢”。丁钢教授提出，郭秉文的对外文化交流与开拓活动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成功主办了 1926 年费城博览会中国教育展览。郭秉文采用由“东西方文化史比较”、“最近我国新学制一览”、“中国教育制度之进化”三表组成的名为“Five Thousand Years of Education of Republic of China（五千年之中国教育）”的英文壁展，向公众展示了中国教育的历史、现代教育的迅速发展以及在西方影响下的新的中国文明的发生，引起了观众的关注，展览取得空前巨大成功，并获博览会大奖“特等金质荣誉奖章”。作为中美教育交流的资深组织者，郭秉文任职华美协进社 10 年间，辅佐协会成为国际上最具广泛代表性的权威教育联盟，将其作为中国教育界向世界同行展示新形象的透明窗口，始终活跃在国际教育文化交流的第一线。

介绍了一系列具体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后，丁钢教授借用胡适先生的话阐明了郭秉文当年对外文化开拓活动对中国教育发展的里程碑意义：“1920 年代在各国人士眼睛里，中国的外交界上只有顾维钧、施肇基，教育界上只有郭秉文。”办学国际化是郭秉文教育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说明大学发展的国际化理念和要求由来已久，而郭秉文先生也以他切身的实践证明了国际化办学理念的正确性和重要意义。这启示我们要扩大国际交流合作，树立将学校的发展置于国际高等教育发展全局之中的理念，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向着建设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奋进。

四、“人文与科学平衡”思想的研究

张其昀在《郭师秉文的办学方针》中将郭秉文的办学思想归结为“四个平衡”: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平衡。“四个平衡”思想是郭秉文办学思想中最独具特色、最完美的创新。南京大学冒荣教授从当今大学办学新形势出发,对其中的“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做了更深入、更全面的分析。在他看来,郭秉文注重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出自他建设“完备大学”的办学理想,正是对“真与善”的追求,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追求。在南高东大的办学实践中,郭秉文完整地诠释了如何实现“人文”与“科学”的平衡。

郭秉文的“人文与科学平衡”的办学思想,不仅反映在学校学科结构中的人文和科学的平衡上,反映在要求学生掌握科学知识和增进人文素养的平衡上,还反映在期求大学同时承担传播发展现代科学和弘扬光大民族文化的双重使命上。南高东大当年既是以发展科学为职志的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又是以“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己任的“学衡派”的策源地,就是其对这双重使命的自觉承负和有力证明。因此张其昀曾说:“南高又有一最可自负之点,即留学生与国学大师的合作。文科方面有几位大师对中国文化有透彻的研究与超越的见解;同时他们也注意于科学的方法,故思虑周密,其探究事理常带有批评的精神。”这其实反映了郭秉文所倡导的人文与科学的平衡理念。

最后,冒荣教授总结了郭秉文强调的人文与科学平衡在今天中国大学办学中的实践意义,指出当今大学面临着三对冲突矛盾的制约:科学技术双刃效应不断强化、社会道德危机日益严重、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隔阂和矛盾愈演愈烈。面临这几方面的矛盾冲突,大学需要重新树立郭秉文所倡导“科学与人文平衡”的办学理念,必须注重强调人文精神,加强对大学生在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人文素质教育,不仅要使学生掌握高深的科学知识,还要使学生全面、辩证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理解当代科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以更好地运用所学的科学技术知识造福于人类。的确,在“工具理性”至上、“人性关怀”缺失的当今现实社会,重温“人文与科学平衡”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对当前构建和谐共生的社会价值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五、郭秉文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张亚群教授站在比较的角度，通过介绍郭秉文与曾任厦门大学校长的林文庆的办学理念之间的异同，得出了“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结论。这种比较研究方法扩大了郭秉文研究领域的范围，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郭秉文教育思想和大学办学的独特性。张亚群教授的报告主要围绕郭秉文和林文庆二人办学理念的两大来源、办学理念的核心内涵，以及治校方略和办学成效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在办学理念来源上，郭秉文与林文庆的办学理念皆主要受留学教育和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同在于，郭秉文主要受留美教育影响，而林文庆主要受英国留学教育影响；关于办学理念的核心内容，两位校长不谋而合，均将“止于至善”作为各自大学的校训，旨在贯通古今“大学之道”，充分体现了二人在核心内涵上的相通之处；在治校方略上，虽然二人各具特色，但郭秉文“四个平衡”办学方针与林文庆的“十项”《校旨》仍有相通之处；在办学成效方面，虽然两校有国立私立之分、治校方略不尽相同，但办学均卓有成效，培养出了一批杰出人才。通过张教授的分析比较，我们得出结论，即郭秉文、林文庆二位校长治校方略各具特色，但文化追求与办学理念近乎一致。这说明不同大学的发展其实有相通之处，此相通之处即大学发展的规律，只有正确把握和积极顺应大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大学才能办成功。

六、郭秉文教育思想核心理念研究

被誉为“东南大学之父”的郭秉文在灵活务实地创办东南大学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高等教育思想。通过对郭秉文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的论析，华中师范大学许小青教授提出了独到而鲜明的观点，指出功利与自由是郭秉文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

对于“功利与自由思想”缘何是郭秉文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许小青是从三个方面来解释的：第一，郭秉文办东南大学的思想源头是美国杜威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郭秉文攻读博士时就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并从中吸取了两点：自由主义思想及大学与社会结合的思想。第二，郭秉文主张的功利主义并不带有中文常见的褒贬之义，而是一种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

学说。功利主义在办学中的体现就是他强调的大学教育要面向现实，服务社会。第三，功利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仍是个人主义，因此郭秉文教育思想又表现出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许小青认为，郭秉文自由主义大学教育理念分为向内与向外两个维度：向内而言，指的是在教育目的上崇尚个性主义，促进个性的自由发展，对于学生的教育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方式；对外而言，则主张教育要脱离政治，即在教学过程中坚持学术自由，要求倡导思想言论自由和教学研究自由。

然而，随着政党政治的兴起，郭秉文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一贯主张的“学术超然于政治和宗教”理念被抛诸脑后，东南大学不再是一个身处世外桃源中的“象牙塔”，南北国民党势力的崛起与郭秉文所尊奉的自由主义的办学理念形成了尖锐的冲突，郭秉文陷入了功利自由主义教育的困境。冲突愈演愈烈，最终上演了“免郭事件”，郭秉文及其自由主义教育思想成为政党争夺的牺牲品。表面上看，是杨杏佛与郭秉文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易长风潮”，实际而言，国民党力量的崛起和政局的变动才是东大“易长风潮”的根源。在政党纷乱的时局下，郭秉文不卑不亢，始终践行着以“功利与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教育理念，为振兴中华教育而努力，郭秉文的这种无私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大力弘扬和学习。

七、郭秉文中学教育思想研究

本次研讨会还特别邀请了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陈履伟教授参加讨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即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故与东南大学是同根同源，可以说郭秉文先生也是该校校长。研讨会上陈校长代表附中作了题为“郭秉文教育思想在附中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及现实意义”的学术报告，结合附中的发展探讨中学如何实现与大学的对接。陈校长首先介绍了郭秉文教育思想在附中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他提出，郭校长对附中发展的直接影响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在大学与附属中学的关系定位上，郭秉文认为：“夫各国大学，多有附属中学之设，其旨约有三端：一、所以为升入大学之预备，以得训练上一贯之利；二、所以备大学学生视察实习之所，以得就近驾便之益。三、所以藉大学之设备与环境，发展中等教育之事业，以为专办中学者之借镜。”可见，附中是大学发展的预备和基础力量，同时也是大学生实习训练之场所。第二，使得中学的办学方针与大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郭秉文的“四个平衡”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贯彻到附中办学中就形成了附中“既不取国家主义，又不独守个性

主义，而是在两端取得一种平衡”及“中学的重要目标在就各人个性，养成社会各界有用的人才”的办学宗旨。第三，在对“训育”问题的见解上，附中与东南大学一脉相承。继而，陈校长结合附中百年历史进程及当前教育改革实践两个方面阐述了郭秉文教育思想在附中发展中的现实意义。

郭秉文及其教育思想对附中发展的影响贯穿于附中百年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办学宗旨，还是管理体制，或是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上，附中始终将自己定位于“大学发展的预备和基础力量”，为更好地实现与大学的对接而不断努力。陈校长的学术报告展现了郭秉文研究的新思路，挖掘了以往研究的盲区，丰富了郭秉文教育思想体系的内涵，让我们了解到郭秉文不仅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领军人，也是近代中学教育的护航者。大学的建设需要郭秉文式的教育家，中学的发展也需要继承和学习郭秉文的中学教育思想。高等教育的发展与中学教育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的，所以人才培养不单单是大学的任务，中学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新时期中学的发展应着眼于为大学培养更多基础扎实、发展全面、素质优秀的预备人才，以实现中学与大学的完美对接。

八、郭秉文校长成功因素探析

郭秉文作为东南大学首任校长，是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先行者，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多元化的杰出贡献者，是融会贯通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教育理念的成功大学领导者。那么，郭秉文为什么能成功？东南大学校史研究专家、党委宣传部部长时巨涛指出，郭秉文校长的成功主要有四个方面原因：第一，社会的变迁转型为郭秉文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其次，特殊的历史条件为郭秉文营造了有利于变革的内外部环境。第三，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巧合为郭秉文提供了施展才能的舞台。第四，郭秉文的个人特质和经历是其成功的重要条件。郭秉文深谙中国教育的特性及其弊端，又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了然于心，而且他长交际，善演讲，在留美学习期间结交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学界精英，这些都为他日后出任大学校长，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变革提供了坚实的学理基础，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最后，时巨涛指出，郭秉文对东南大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高超的整合各种资源的本领，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学校发展和正常运转筹集了大量经费，这是当时东南大学得以快速发展和集聚人才的必要条件。时巨涛对郭秉文成功因素的分析有理有据，准确而清晰地定位了郭秉文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业绩和贡献。

九、结语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教育家，郭秉文先生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作为一笔宝贵精神财富，经过百年洗礼，历久弥新、熠熠生辉。本次研讨会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深入了解郭秉文教育思想的学术平台，是该研究领域内的一次创新。与以往的研讨会相比，本次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的交流和讨论更加全面、深入、具体，如丁钢教授对郭秉文对外交流活动资料的搜集十分详尽，很多资料都是首次展现在大家面前；冒荣教授对“人文与科学”的深入解读，也是以往所未能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储朝晖研究员从历史的角度提醒人们要深刻反思大学教育的顶层设计问题，令人印象深刻。此外，陈履伟校长的报告强调了郭秉文教育思想对中学教育的借鉴作用，及时填补了以往该研究领域的空白。

当前海内外学术界对郭秉文教育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与同时代的蔡元培、梅贻琦等著名教育家相比，郭秉文的教育思想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且不说研究成果数量十分有限、研究成果的影响不够大，就说郭秉文学习美国模式推进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色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等重要问题，也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挖掘和研究，如郭秉文为何能在短短几年内就把名不见经传的东南大学建设成为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其国际化办学思想及其成功实践的当代价值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人们深入研究。总之，在建立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思想及其体系的过程中，只有更加全面深入地挖掘包括郭秉文在内的诸多中国杰出教育家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义，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来源、发展道路和未来使命，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事业。我们相信，以此次研讨会为新起点，我国学界关于郭秉文及其教育思想的理论研究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后　记

2014年是郭秉文先生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一百周年。一百年前，郭秉文先生以《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毕业后，郭秉文先生回到祖国，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校长及国立东南大学校长并兼任上海商科大学校长，前后任职时间达10年之久。在此10年间，郭秉文先生带领全体师生员工，通过大胆的科学的改革和开创性的建设，使东南大学一跃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著名的一流大学，为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探索了新的发展道路，也形成了他自己的教育思想。

在东南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的历程中，深入研究、总结和传承郭秉文校长的教育思想，无疑对我们探索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之道，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013年以准备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东亚图书馆、华美协进社等联合举办的“郭秉文与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和中美教育交流——纪念郭秉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契机，以东南大学是郭秉文校长的母校名义，我们向国内外专家学者发出专家约稿函，得到了令人惊喜的支持和鼓励。于此，我们汇集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教育领导者所提交的数十篇论文和文章节录。这些论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面研究探讨了郭秉文校长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实践、教育特色和学术贡献。

本书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教育领导者的关心、指导和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周洪宇教授，长江大学教育学院陈竞蓉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许小青教授，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王运来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张亚群教授，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储朝晖研究员，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张雪蓉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应望江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朱迎平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档案馆喻世红馆长，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陈学军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张正峰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周慧梅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李艳莉博士，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王悦芳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李力博士，上海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宋旭璞助理研究员等专门撰写论文；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李淑萍副教授、刘学伦助理教授专门撰写论文；东南大学军事教研室陆华教授、校长办公室宋业春副研究员积极撰稿。联合国中文组组长、美国华美人文学会共同主席何勇教授特地将自己多年前撰写的一篇演讲稿翻译成中文惠赐本书，同时赐序；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之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丁钢教授应邀于百忙之中审阅书稿目录并赐序本书。东南大学党政领导非常关心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前所长程明熙教授审阅了部分书稿内容并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可以说，正是得益于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教育领导者和友好人士的关心、指导和支持，本书的内容才得以充实，价值才得到提升。

本书得以出版，应该感谢美国 Mattawin Company 公司及郭秉文家族成员 Carolyn 女士的项目经费资助。本书是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杰出教育家郭秉文的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编号：B－b/2011/01/002）的项目成果之一。

东南大学出版社张新建总编辑一直关心和支持此书的出版，东南大学出版社陈淑女士为本书编辑等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之前她也负责编辑出版了《郭秉文与东南大学》一书；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李昕博士、李可君老师提供资料支持；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吴艾玲副教授、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韩樾夏博士帮助校正本书英文目录；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刘琼、狄晶晶、吕哲、吴丽、郭超君等同学为本书打印校对付出了辛苦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耿有权

2014 年 8 月 18 日